

戴德生——摯愛中華(史蒂亞)

目錄：

序言

- 1· 儲物房中的轉變
- 2· 從阿羅本到郭實獵
- 3· 堪作典範的兩位德國人
- 4· 極佳的投資
- 5· 從麵包與水到牛排和酒
- 6· 中國傳來震動心弦的消息
- 7· 重重險阻赴中華
- 8· 追尋人生的意義
- 9· 初抵上海
- 10· 危險中的歌唱
- 11· 你的話是真理
- 12· 縣大老爺的款待
- 13· 在中國的遭遇
- 14· 打破藩籬
- 15· 快樂的日子
- 16· 汕頭及長安的艱苦旅途
- 17· 見死不救
- 18· 禱告的果效
- 19· 愛情道上
- 20· 好事多磨
- 21· 額上的玉手
- 22· 她是我的珍寶
- 23· 取得資格
- 24· 伯萊墩的奇事
- 25· 穩渡風浪
- 26· 杭州工作的開展
- 27· 新巷回復生氣
- 28· 擷取了的玫瑰

29·誰言要安息？
30·揚州教案
31·炮艦下的基督教
32·喜樂與能力之路
33·在天家相聚
34·愛是不嫉妒
35·百般的試煉
36·沒有缺乏
37·夢想成真
38·已是家傳戶曉
39·比板球更好的事
40·作美好的工
41·推翻慕迪的原意
42·基督命令的再思
43·渴求聖靈的能力
44·一次家庭旅行
45·面對不同的質疑
46·少種的少收
47·配得殉道者的冠冕
48·回天家的路
後記
附錄

序言

再沒有誰能象戴德生一樣，願意為神的緣故，完全獻身給中國。他甘心衝破傳統，換上中國的服裝，更積極超越宗派界限，一心要把福音傳到新的疆土裡。戴德生之所以義無反顧，獻身與主，絕非出於一時衝動，或是自我表現，而是他深切關懷到一群尚未認識救主耶穌的人。他一生勇往直前，是由於他愈來愈確信神的信實。

戴德生對神的信心，正是今天千萬中國信徒的寫照。他們矢志不渝，正好見證神是多麼信實。今時今日，大家都極之關心中國的狀況，尤其國家領導人及國內的信徒。本書的出版，實在是合時不過了。今天很多教會視自由為理所當然的；然而中國信徒卻在諸多限制和剝削下，依然堅忍不屈，滿有平安，怎能教我們不羞愧哩！其實，他們只存一個單純的信念：「有一位永活的主，他借著道向我們說話，他所說的，必定成就，也不會背乎他所應許的。」

本書對於簡樸生活、理性的順服、信心的禱告，以及恆久忍耐，都作出深刻的描寫，叫我們不得

不反省自己，究竟怎樣才是基督裡的人。此書的出版，實在令人興奮。盼望神使用這本書，透過它鼓勵我們，並彰顯他的榮耀。

葛培理

第一章 儲物房中的轉變

「親愛的神，如果你賜給我們一個兒子，願他將來為你到中國工作。」

時值傍晚，英國約克郡（Yorkshire）班士尼鎮（Barnsley）生意最忙的一家藥房的後廳中，戴雅各（James Taylor）和他的妻子賀美亞（Amelia）正在那裡禱告。廳中放置著一系列大型的書架，愈來愈多的書把它們壓得吱吱作響。戴雅各幾乎對所有關於中國的東西著迷了，許多古老大國如波斯、希臘和羅馬，已然歷盡興衰不再複存，但中華帝國及它所代表的古代繁華，卻仍然屹立不倒。戴雅各更關心的是，當這個世界邁進十九世紀，卻仍沒有一個基督教的傳教士踏足在中國的土地上。

日子漸長，賀美亞的腰圍漸寬。冬季過後，春天又臨，在 1832 年 5 月 21 日賀美亞二十四歲時，她的兒子出生了。他們為他取名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戴德生的父母都是循道會（Methodist）的信徒。小時候他的父母時常帶他到班士尼針迭山（Pinfold Hill）上的一所小教堂去，那是做石匠的曾祖父戴萊（James Taylor）所建的。在那裡，戴德生留下許多早年的回憶，他最喜歡聽曾祖父的故事，特別是他怎樣接待一位貴客——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故事。1786 年 6 月，八十二歲的衛斯理來到班士尼鎮，就住在老戴萊的家中，他剛在市集旁對一大群人講完了道，那些人好象都聽得津津有味。

戴德生童年時代的家——齊賽街（Cheapside）21 號，就在衛斯理講道之處不遠，可以看到座落於五月青（May Day Green）的市集。它是班士尼鎮的中心地帶，戴德生的父親就在這兒開了一間藥房，自己兼任配藥師和醫生。不久他便以高尚的道德品格、勤奮的工作態度及對顧客的關懷，贏得了很好的聲譽。

樓下藥房的生意一直都很好，戴雅各有時把後面的房間也用來作會客廳。客人都很信任他的診斷，但覺得他有點害羞和內向。他還會催眠術，為那些患上失眠的人催眠，聽說他有一次成功地使鄰居的狗安靜下來，不再發出使人煩擾的吠聲！

和好朋友一起時，戴雅各感到自然得多。他們常到他家中聚會，談論有關教會增長或者國外佈道的事情。很多年後，戴德生的妹妹戴賀美還記得他們少時怎樣愛聽父親和朋友高談闊論：「他們以懇切和智慧的態度討論神學、講章、政治。以及主在國內和國外的聖工。這一切均使我們這群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戴德生有時會說：「當我長大成人，我希望能成為一個傳教士，到中國工作。」這時，戴德生的父母就會想起他們的禱告，他們交換一下眼色，卻不說什麼。

戴德生和他的兩個妹妹一塊兒長大。戴賀美（Amelia）比他小三歲，露惹莎（Louisa）比他小八歲。另外還有一個弟弟威廉（William），七歲時便不幸去世了。戴雅各每天都會把孩子帶到他的睡房，扶著

他們的肩膀，跪在床前，逐一為他們祈禱。之後，戴德生和妹妹們便各自回到房間閱讀聖經。

「學會愛你們的聖經，」父親常說：「神不會說謊，他不會誤導你，他也不會失信。」

下午，戴賀美、露薏莎和戴德生會在藥房後面的客廳一起做功課。母親一邊縫紉，一邊聽他們大聲誦讀，又或者由她朗讀，孩子默寫。孩子們用辭不當、文法錯亂或讀音不正，都是她不能忍受的事。

戴雅各是位嚴峻的父親，有時也會發脾氣。他不准任何人吃飯時遲到。但他也有另一面的性格，當他知道顧客實在負擔不起醫藥費時，他會把部分診金退回，或者對顧客說：「算了吧，我會把帳單寄到天國去，在那兒結帳。」

父親也是孩子的老師。教導他們法文、拉丁文和數學。教完這些後，他就會轉到他最愛的话题上來：

「有哪一個國家比英國大一百倍，人口占了世界的十分之一？」

「中國。」

「對了！如果把中國人排成一列，每人中間相隔一碼，他們足可環繞赤道七次之多。還有，是什麼人發明火藥、羅盤、紙張？什麼人發明印刷術呢？」

「中國人！」

「對了！中國人早在基督的時代就發明了火藥和紙張。在我們的撒克遜王亞瑟士丹（Athelstan）的時代，他們學會了怎樣印刷。」

戴雅各並沒有規定孩子們只准工作，不准遊戲。星期六的下午，他常帶著他們沿著渴福路（Cudforth Road）步行到侖活林（Lunn Woods）和約克郡的鄉郊。在林蔭下、青山旁，父親會暫時忘掉中國，告訴他們自然之美，共用花鳥蟲魚之樂。

戴德生開始熱愛自然，在林中搜集一些奇花異草，帶回家去種植。父親很鼓勵他，替他訂購了一份關於自然歷史的雜誌，而且從藥房那兒拿來許多空藥瓶，裝置蝴蝶和其他昆蟲的標本。

維多利亞女皇在位第六年，即 1843 年秋天，十一歲的戴德生第一次離家入學。但他在校不過短短兩年，當另一位令人不大滿意的校長接掌學校時，戴德生就辭學回家受教，同時在父親的藥房幫工。這個穿著白圍裙，頭上長著髦發的孩子，對於和藥、椿藥和包藥等事情，做得十分開心。

戴德生十五歲時，斑士尼鎮一家銀行正要聘請一位初級文員。戴雅各認為兒子應該學習怎樣記帳及如何書寫商業函件，於是大力鼓勵他去應徵，結果戴德生便獲得這份工作。

新的工作擴闊了戴德生的生活經驗，也把他從齊普春街 21 號的小圈子，領進一個充滿懷疑和物質誘惑的世界裡。行裡的同事們喜歡捉弄他，說他的信仰守舊和古板。他們向他提出許多疑難的辯題，所用的言語和辭句也是他從來沒有聽過和想過的。

「基督徒都是偽君子。」他們說。

「他們口口聲聲說相信聖經，但從他們的生活看來，你真不會相信他們讀過聖經。」

戴德生啞口無言，不知怎樣回答。有好一陣子他心內思潮起伏，感到矛盾不安。他追憶童年往事，回想自己從幼年開始便知道祈禱和讀經的重要。直至現在，每天清晨吃過早餐，父親都會朗讀一段經文。這還好，但他跟著使用聖經中的一些屬靈詞句來祈禱。這長達二十分鐘的禱辭開始使戴德生感到厭煩了。突然間，他覺得父親的禱告空洞無物，令人難耐。

不過，戴德生這樣想道：如果有一位神，我便相信他，跟從他，並且完全地事奉他，那確實是最好最美的路。因此，他盡力使自己成為一個基督徒。但這努力是白費的，他開始感到沮喪和挫敗。最後他想：某些原因註定我不能得救了。那麼，我們不儘量享受這個世界的歡樂，因為我的來生毫無希望。

同事們談論各樣事情，往往令這個一向循規蹈矩，在循道會家庭長大的孩子瞠目結舌，不知所云。他不再祈禱，而且不願上教堂去，他也象同事們，懷疑信仰的真實性。雙親常說不信的人將來要受審判，但如果同事們的話屬實，那就無需擔心將來世界末日的臨到。

戴德生在銀行工作了只有九個月，是年冬天，他患上眼疾，被迫辭掉工作，回到父親的店裡幫忙。但這時的戴德生對周圍的世界已不再如以往般單純，對自己的信仰也不再象從前滿有信心。父親不明白他為何悶悶不樂，而且對於他的心神恍惚，頗不高興。母親比較明白他，但她並不查根究底，只用慈愛和禱告支援他。

1849年6月，戴德生已十七歲了。六月的一個下午，他放工後，百無聊賴，便在後廳隨意流覽群書，打發時間，無意中撿起一本福音小冊。

「開頭總是一個故事，」他想：「結尾就是教訓，讓我只看故事部分，講道部分就跳略了吧！」

在那時候，他並不知道在五十哩外漢笛（Humber）河邊巴頓鎮（Barton）姨母家中作客住宿的母親，正在想看怎樣利用下午的時間。午餐後，她回到自己的房間，把房門鎖起，立意為戴德生的悔改祈禱，並且決定除非感到禱告蒙允，否則她不踏出房門。

在班士尼的戴德生，也正拿著那本福音冊子，走到房子後面的儲物室去閱讀。在那裡，他可以避免受到騷擾。

那個福音故事是關於一個患有嚴重肺病的森馬錫（Somerset）煤礦工人。在他病逝之前，有些基督徒探望他，同時向他傳講一些聖經的道理。那礦工對於一段經文印象尤深。那段經文說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他的身體背負了我們的罪孽。當那些基督徒訪客說到耶穌在十字架上大喊：「成了！」時，那礦工便認識到它的意義，於是接受主，成為一個基督徒。

這個故事十分簡單，卻有力而真實，使以往銀行的同事們種種花言狡辯，顯得無聊極了。

戴德生思想這個故事時，更想到自己的罪，以及他對罪置之不理所帶來的危險。「成了！」這句話也引發他的深思。什麼是「成了」？他從一些並不完全明白的講道之中，以及自己對聖經的認識裡，逐漸找到了答案：「『成了』。的意思是對罪作了完全的補償——有人代我們還清了罪債，他就是基督，為我們的罪而死。」

他想：我還能為自己做什麼呢？我為何要用盡自己的方法去成為基督徒？

對他來說，也正如他自己指出，「聖靈光照我的心，我在世上沒有什麼可作了，惟有跪下來接受這位救主和他的救恩，永遠讚美他。」

在班士尼鎮的儲物房裡，戴德生跪在地上，正式成為一個基督徒。同時，在漢笛河岸的巴頓市，戴德生的母親亦已感到她的禱告得蒙垂聽，她充滿信心，開始讚美神。從聖靈而來的感動，使她知道戴德生已回轉歸向神。

數天后，戴德生告知妹妹戴賀美他的生命如何轉變過來，而且要她答應保守秘密。兩星期後，母

親回到家裡，一開門便看到戴德生。

「媽媽，我要告訴您一個好消息。」

母親伸開雙臂，摟著他的頸，說道：「孩子，我知道了，我為你的好消息已經高興了兩個星期！」

「為什麼，難道戴賀美沒有遵守諾言？她答應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戴賀美沒有不守諾言，我不是從任何人得知的，我在神應允我的禱告時，便知道你已悔改了。」

不久之後，戴德生檢到一本記事簿子，和他自己的那一本一模一樣。他翻開一看，才知是妹妹戴賀美的。上面記著妹妹在數周前寫下的一句話：「我會每天為哥哥的悔改祈禱。」戴賀美的禱告在一個月後才獲得應驗。

1849年夏天，戴德生一家都充滿快樂。戴德生的眼神恢復了光彩；父子間的矛盾已經消失。母親和妹妹都因她們的禱告蒙允而雀躍不已。

戴德生和妹妹的關係更加密切，他們決定不參加星期日晚崇拜聚會，一起到班士尼鎮的貧民區挨家逐戶派發福音單張，偶爾也向他們傳講基督。

但九月卻帶來了打擊。戴賀美被送到巴頓市姨母康夫人（Mrs·Hodson）所辦的一所寄宿學校去。而姨母卻把她的長子康約翰（John Hodson）送來住在班上尼的舅父的藥房中當學徒。約翰就住在戴德生的家裡，和戴德生同住一個房間。約翰的嬉皮笑臉和悔改後的戴德生，有點格格不入——戴德生很想有更多的時間安靜讀經和祈禱。

約翰雖然時來打擾，但戴德生仍開始沉醉於聖經中。可惜不久之後，他又有一段日子處於靈命低潮裡，覺得禱告吃力，讀經枯燥乏味。直至發生了三件事情，他才把這段困難的日子克服。首先，他讀到《衛斯理雜誌》（Wesleyan Magazine）裡面刊載的一篇題為「聖潔之美」（"The Beauty of Holiness"）的文章，使他覺得美善充滿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其次是他從會友卡上的一段經文得到很大的鼓勵，那是以西結書三十六章 26 節：「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親愛的主啊，」戴德生這樣祈禱：「求你除掉我的石心，賜給我一顆肉心！幫助我相信你話語的應許！我內心一直都盼望有這種完全的聖潔。」

第三件事是畢特街教堂（Pitt Street Chapel）的工作。戴德生被邀協助該教堂的輔導工作，使到逾百名青年成為基督徒。這事令他得到很大的鼓舞。

一個星期天，戴德生患了感冒，留在家中。他於是寫信給巴頓市的妹妹：「感謝神，」說：「在他的愛裡，我十分快樂，但我不配受他這許多的賜福。我常經受不起試探，我是那麼淺薄和輕佻，有時還喜歡嘲弄別人。親愛的戴賀美，請為我祈禱，我正在追求全然成聖。」

那天晚上，他在房間向神祈禱，也竭力聆聽他的聲音，他好象經驗到神與他同在，充滿一種喜樂，是他從未嘗過的。他一次又一次地感謝耶穌在他身上所作的一切。

「親愛的神，請你給我更多事奉你的機會，以表達我對你的愛和感激。」

經過這次，戴德生更確實知道神對他的餘生有何旨意。他說：「我覺得自己好象與至高無上的主宰立下盟約，縱然我想毀約，也不能夠。他好象在說：『你的禱告已蒙應允。』從那時開始，我對於為主到中國去的信念從未動搖。」

第二章 從阿羅本到郭實獵

基督教進入中國的歷史，是由一段富傳奇性的經歷開始。主後 431 年，一個叫涅斯多留（Nestorius）的人被攻擊為散播異端者，但到了第五世紀末。波斯一地愈來愈多人信仰他所傳揚的教義，他的信眾通稱為涅斯多留派，而且逐漸向東擴展。到了主後 635 年，屬於涅斯多留派基督教的一名傳教大阿羅本（A-lo-pen）抵達中國，來到大唐帝國的京城——長安。皇帝待他禮遇有加，而且學習基督教義，容許甚至下令讓它在國內傳播。

涅斯多留派在中國稱為景教，在華流傳超過二百年。景教在中國建有很多教堂，深受佛教感染的中國人稱之為寺廟，傳教士的影響多在教堂之內，並不深入民間。

主後 845 年，景教遭受逼迫。唐朝的皇帝反對寺廟和莊田，禁止佛教，解散寺院，命令僧侶還俗，影響遍及所有宗教，景教也受牽連。在以後的幾百年裡，信徒大大減少。到了 987 年，一位從中國返抵歐洲的傳教士說，他在偌大的中華帝國之中，再找不到半點基督徒的蹤跡。

十三世紀時，蒙古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北部後，認為應當尊重各種宗教，所以涅斯多留派得以在中亞一帶重新崛起，更在 1275 年忽必烈統治中國時，於北京設立了大主教。

與此同時，馬可勃羅（Marco Polo）也數訪中國。首先是馬可勃羅的叔叔從忽必烈處帶回一度給羅馬天主教皇的手諭，要求派遣博學之傳教士赴華，「以公正不阿的論據，證明基督教之信仰超越了其它教，比它們真實得多。」

二十年來，這要求仍未受重視，其後才有教皇派遣大約翰（John Of Monte Corvino）赴華之舉。大約翰約於 1294 年抵達北京，受到忽必烈的繼承人帕木兒（Timur）熱情款待。皇帝自己並未歸入基督教，據說他是「拜偶像太久了」。大約翰建築了一所教堂，聲稱他在 1305 年之前，已替超過六千名信徒受洗。為此教皇卡裡門五世（Clement V）封他為大主教。但在 1328 年，大約翰逝世後，中國的教會又進入長達兩個世紀的低沉時期。

1557 年，葡萄牙人在香港不遠的澳門建立了據點。這個葡萄牙殖民地從此成為許多傳教工作的跳板，包括著名的天主教耶穌會（Jesuits）傳教士利瑪竇（Matthew Ricci）。1600 年，利瑪竇抵達北京，透過他修理時鐘及繪畫地圖的技巧，博得皇帝的稱讚。利瑪竇在北京十年，逐漸建立了一個為數二千人的教會，信徒包括一些著名氏族和傑出的知識份子。他也出版了一套中國教會禮儀守則及其它的基督教書籍。

利瑪竇跟後來許多的傳教士一樣，在華傳教時，面對著一些難題：如何用中文辭彙解釋基督教的真理？哪一些中國古代的習俗可以被基督教所接受？如果要中國人接受基督教，一定要減少它的異域特性——但說時容易做時難。經過許多學習和思考，利瑪竇認為中國人有關敬拜孔子的禮儀和對家庭的觀念，有其社會意義，華人基督徒可繼續遵行。他相信中國基督徒最終可以自己定出持守或廢棄的指標。

繼利瑪竇之後，有德國籍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e Adam Schall von Bell），他在 1622 年抵達北京。

湯若望通曉天文學，能準確地預言日蝕、月蝕的時間，在皇宮的欽天監和曆學館中得到一份差事。那時基督徒的人數增加得很快，其中包括了皇帝的一位妃嬪和她的兒子。在大明帝國滅亡之後，湯若望幸保性命，而且得到滿清皇朝的任用。

在十七世紀中，除耶穌會外，還有天主教方濟各會（Franciscans）及道明會（Dominicans）的傳教士在華工作，也均有一些成績。1674年羅馬教廷設立了第一位中國主教。

然而關於如何稱呼神及哪些中國禮俗可被教會接納等爭論性的問題，卻仍然存在，甚至後來使教廷和中國教會的關係惡化，產生磨擦。踏入十八世紀，對基督徒的逼迫增加了，教友大為減少，教堂也受到毀壞。到了十八世紀末，天主教在中國的基業幾乎完全崩潰，只有少數勇敢的傳教士仍在暗地裡堅持和奮鬥。

戴德生的父親應該常常提到第一位到華傳教的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在1807年9月乘一艘美國商船抵達廣州。他初時差不多被迫在躲藏中過活，但到了1809年，他卻被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聘任為「通事」（翻譯），給他薪金，也給他安全和保護。他成為一位中國語文及哲學的專家，他說中國人的智慧是「神賜予任何族類中一件最大的禮物」。

馬禮遜在廣州工作二十五年，這也是歐洲人唯一能踏足的中國土地。馬禮遜認為中國人最需要的是基督，他努力不斷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為的是更有效地向他們傳講福音。1814年，他為第一個中國信徒施洗；1819年，他完成了中文新舊約聖經的翻譯工作；之後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漢英字典。愈來愈多中國基督徒受洗加入教會，其中一位後來更受按為牧師，在華人當中傳教。

然而，當馬禮遜在1834年逝世時（戴德生當時只有兩歲），在中國傳道的機會並不比他來時好得了多少。直至那時，只有三名來自歐洲的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工作。負責印刷的麥都思教士（Walter Meshurst）在1817年來華，以中國裝束在內地旅行，並分發福音小冊；衛三畏（Wells Williams）在1833年抵華，他就是後來著述《中華帝國》（The Middle Kingdom）一書的歷史家；還有一位來自美國的醫生伯駕（Peter Parker），他在廣州開設了一家眼科醫院，使一般中國人稍減對傳教士的歧視。

在戴德生的青年時期，已久聞一位傳教士的大名，他就是荷蘭傳道會差派到中國傳教的郭實獵（Gutzlaff），後來成為英國殖民地香港政府的翻譯。郭實獵的書籍鼓舞了英國許許多多年輕基督徒的心靈，他在中國沿岸的種種傳奇事蹟，對於商人、海員及政客皆耳熟能詳，令人津津樂道。郭實獵有一個想法，就是訓練中國基督徒到全國的十八個省份傳教。他成立了以中國基督徒為主的聯會，協助推行分發聖經和教導聖經的工作。

可惜郭實獵被他屬下的華人信徒欺騙了，他機構裡的人幾乎全是騙子及吸食鴉片煙的癮君子，他們所寫的旅行佈道日記都是虛報的，所呈遞的受洗信徒名單也多是捏造的。當郭實獵獲悉這一切，他極之灰心失望；他雖然竭力重組一切，但新工作還未開始，他就鬱鬱而終了。

中國人的仇外情緒是十分普遍的，除了廣州外，外國人均不准到任何地方。縱使英國的基督徒為中國傳教工作已經祈禱了將近半個世紀，但最後令中國的大門打開的，卻是西方列強加予中國政治和經濟壓力。中英鴉片戰爭之所以在1839年爆發，一方面是由於英國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堅持要向中國售賣印度鴉片，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對貿易關係的限制，以及對外人的不平待遇和敵視。

1842年，鴉片戰爭終以簽訂南京條約結束了。英國人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讓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

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開放；外國人享有治外法權；外國可以在各條約口岸設立領事館，領事官員可和地方官平起平坐；英國人民可免受凌辱和限制等等。南京條約中沒有提及宗教，但傳教士當然和商人一樣盡量利用這個機會。

當然，傳教士都討厭戰爭，但他們相信神借此打開了中國的福音大門。然而後來基督教常為人詬病者，亦是由於它隨著堅船利炮而進入中國。

南京條約使英國的基督徒察覺到一個新時機已然來臨，傳教士可以到中國去，在條約口岸和租界裡學習中文，甚至興建房子、設立學校、開辦醫院和建立教堂。由於郭實獵的事蹟和異象，以及湧現各種新機會，英國的商人籌辦了一份鼓勵海外傳教的刊物，稱為《海外佈道雜誌》（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從其於 1850 年 3 月創刊開始，戴德生的家庭即已訂閱這份刊物。此外，戴德生又發現在倫敦有一個由不同宗派人士組成，名叫中國協會（Chinese Association）的組織，也在計畫徵召到中國去的傳道人，和現存的差會加強合作，要把救恩傳到未聞福音的中國內陸各個省份。

戴德生寫信給中國協會的秘書長皮爾士（George Pearse），要求協會提供資料，使他可以把協會及它向中國傳道的工作介紹開去。

他又聽聞班土尼鎮公理會的牧師有一本麥都思著的《中國的現在與將來》（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決定嘗試借來閱讀。

「你要借這本書，當然不成問題，」牧師說：「但請問所為何由？」

戴德生回答說：「神呼召我把生命獻出了到中國傳道」

「那麼你計畫怎樣到中國去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會象初期猶太地的十二使徒和七十個門徒一樣，沒有杖，沒有袋，沒有糧，沒有錢，出去時全然倚靠那供應的主。」

牧師把手輕輕放在戴德生的肩膀上，說：「啊，孩子，當你稍為長大一點，你就會變得聰明一些；這種想法在基督還在地上時是很好的，但現在可不同了。」

許多年之後，戴德生回憶當年舊事，說道：「我現在已經長大多了，但並沒有變得聰明一點。我只是愈來愈相信如果我們遵照主的指示，也完全相信他對初期使傳所作的保證，那麼這些指示和保證在昔日有效，今天也同樣適合我們的時代。」

麥都恩的書著重醫療傳道的價值，所以戴德生決定集中於醫學研究，作為到中國傳教的準備。他也開始多作戶外運動，又捨棄羽毛的床褥及其它舒服的享受，訓練自己，準備迎接前面艱難的日子。

他開始用心地學習中文。這當然不是件易事，一位早期的傳教士曾經說過，這需要「鐵打的身體、銅造的肺、橡木的頭、鋼的雙手、鷹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的記憶力，以及瑪士撒拉的生命」才能成功。

戴德生手頭沒有中文的文法書和字典，他只有一本中文官話的路加福音。他和表弟約翰一起學習。他們首先在英文本裡找到一節經文，然後再找十來處不同的經文，若內中有一個詞語是與第一節裡的相同，他們便翻開中文聖經找尋第一節經文的所在，又找另一節有詞語的經文；換句話說，他們是從英文詞彙著手，學習中文詞彙。他們把這些字彙及其意義寫在紙條上，又從其它的句子中找出相同的詞語，以作參考。並且把這些中文字彙用筆寫在英文字典中，意思若不肯定，可先用鉛筆記下，直至

肯定後，才用鋼筆寫下來。

這樣，他們慢慢地掌握了一些常用的中文字。

戴德生每天早上五時起床用功。他寫信給戴賀美說：「如果我真要到中國去，我必須學習。我既然決定要去，現在只有努力作好準備。我打算溫習拉丁文，學習希臘文和基本的希伯來文，以及一切的普通常識，請多為我禱告。」

1849 年聖誕，戴賀美返家度假，但她並非獨自一人，和她一起來的是一位年輕活潑的少女，名字叫韋瑪莉（Marianne Vaughan）她是哈拿姨母所辦學校中的一位教師。韋瑪莉的出現使戴德生很高興。雖然戴德生全家都懂音樂和彈琴。但聽韋瑪莉的彈奏和獨唱，真有如沐春風、如在天國之感！她是個極有吸引力的少女，而且對戴德生也很有好感。

戴氏兄妹和韋瑪莉時常到山頂騎馬。在假期還未結束之前，戴德生感覺自己已沐浴在愛河中。就目前來看，戴德生並未有顧慮到韋瑪莉對中國的興趣並不濃厚。

對於戴德生來說，1850 年是困擾的一年。他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到中國去，但怎樣才可知道韋瑪莉是否應該同行呢？與她分離卻又是何等痛苦難受！戴賀美的建議是，如果他要帶韋瑪莉同往，最好是由一個龐大的差會差派出去。

「對是對的」，戴德生說「但哪一個差會適合呢？」

衛斯理會在中國沒有宣教站。英國聖公會有一兩個分會，但他又不屬於聖公會的；浸信會及其他一些獨立教會也有差派傳教士到中國去，但他的觀點和他們並不一樣。至於中國協會，則經濟拮据。

「只有神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需要其它……」

「你猜猜她知道我愛她嗎？」戴德生寫信問戴賀美。「或者，你認為她關心我嗎？請坦白告訴我！」

妹妹的回信（已然不存）使戴德生有點摸不著頭腦。「我不知道讀過你的信多少遍了，尤其是最後一次讀時，心中更夾雜了希望和恐懼，但我決定交托給主！」

在父親的藥店工作五年，使戴德生成了配藥方面的專家，但他希望自食其力，而且覺得要成為醫生的助手，他更要在醫學知識上求進步。

他繼續和中國協會的秘書長皮爾士通信，協會也慎重考慮派遣戴德生到中國的可行性。皮爾士認為協會可以先送戴德生到倫敦醫院接受醫學訓練，作為到中國傳教的準備。

戴德生不能接受這個安排，因為他沒有能力負擔在倫敦的生活費。就在這時，荷爾（Hull）一位忙碌的醫生——哈拿（Hannah）姨母的妹夫赫迪醫生（Dr Robert Hardey）——正需要一個助手，戴德生就這樣到了荷爾。

第三章 堪作典範的兩位德國人

1850 年代的荷爾是一個漁港，就在荷爾河畔，下游直接漢笛。戴德生乘火車出發，在 1851 年 5 月 21 日他十九歲生日的那一天正式上斑。赫迪的工作間和住家都在莎樂蒂街（Charlotte Street）13 號，那兒是荷爾鎮上醫務所的集中地。赫迪醫生除了有自己的診所，亦是一所醫院和數間工廠的外科醫生，

同時也是醫學院的講師。

13 號的房子向陽，前門的圍牆長滿攀藤。這位助手抵達時，赫迪醫生親自出來開門。甫一照面，戴德生就對他產生好感。赫迪醫生長得高大，渾身是勁，而且十分幽默。不久，戴德生便發覺他是荷爾鎮上一位最受歡迎的人物。

赫迪把戴德生引到飯廳，從那裡可以望到花園的一邊及遠處的配藥室。赫迪把戴德生介紹給他的太太，但赫迪夫人卻不象赫迪醫生那般熱情和懇切，她較為冷淡和嚴肅。她並不多言，只把戴德生帶到早為他安排的臥房裡。之後，一天忙碌的工作便開始了。當晚十一時，戴德生寫信給戴賀美說：「我已看過我的新環境，我想我會十分喜歡這裡。」

戴德生漸漸習慣他的新工作：配藥、記帳、裹傷、跟赫迪醫生來往接生，以及到醫學院上課。赫迪醫生也時加指導他的學習。赫迪是個熱心的循道會教友和主日學教員，兩人很快便成為好朋友，常常在手術室中一起禱告。

禮拜天，戴德生在朱安德(Andrew Jukes)的教會聚會。朱安德的教會和早期普利茅茨兄弟會(Plymouth Brethren)的組織相近，朱安德本人在英國著名學府哈路(Harrow)畢業，曾經是聖公會的執事；他是位極佳的教師，能深思熟慮，也能引發別人思考。當戴德生開始在荷爾碼頭附近傳道時，教會中許多會友都是戴德生的同工。

在朱安德的教會裡，戴德生的思想和生命深受一位傑出的傳道人——布裡斯托(Bristol)的穆勒(George Muller)所影響。穆勒是在德國的何禮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念書時信主的，之前他是個酗酒、說謊的人。他在布裡斯托當牧師，教會人數增長得很快。他非常關心的一件事，就是很少基督徒(包括他自己教會的會友)相信神垂聽禱告。他一直希望有機會向信徒證明「神的真實」。

在當時的英國，一般人因為讀了查理士·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苦海孤雛》(Oliver Twist)，對孤兒不幸的遭遇極表同情。穆勒這樣想：如果他只靠禱告和信心，成立及管理一所孤兒院，必定能加強基督徒的信心，也會使非基督徒看到神的真實。

穆勒於 1836 年在布裡斯托創立了第一所孤兒院，房子是租來的。1849 年，他又興辦了一所新的孤兒之家——這次設在布裡斯托城郊山上自建的樓宇裡。到了 1851 年，在他照顧下的孤兒多達三百名，而工作還在大大地擴展；與此同時，穆勒仍多方接濟在海外傳教的傳道人。他從未公開要求捐助，也從未向個人要求支持，他喜歡倚靠及信賴那位豐富的主。在荷爾的教會中，戴德生時常聽到穆勒在聚會中朗讀一些帶著見證的信。

中國學會〔 Chinese Society，前身是中國協會(Chinese Association)〕已經開始刊行其《海外佈道雜誌》(The Glean)，戴德生在當中常常讀到另外一位德國偉人的嘉言懿行，他就是德國傳教士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他曾經是郭實獵牧師的同工，在中國傳教多年，是中國條約口岸以外有著實際傳教經驗的極少數教士之一。

1851 年 9 月，《海外佈道雜誌》宣稱羅存德來到了英國。文章還呼籲基督徒獻身到中國去，尤其是具備醫藥知識的傳教士。

戴德生決定到倫敦拜訪羅存德。那時候，倫敦的海德公園正在籌備一個盛大的博覽會，以簇新的水晶宮為會場，向世界各國展示先進的英國科技產品，同時鐵路公司設有特價的火車票，鼓勵英國各

地的人前往倫敦博覽會。

戴賀美的生日就在 9 月 20 日，戴德生又獲得一個禮拜的假期，因此舅父赫治文（Benjamin Hudson）便為這兩個年輕人在倫敦的蘇豪區（Soho）訂下了旅店，使二人有機會到倫敦一行。

當他們從畢卡地利廣場（Piccadilly）走向海德公園時，陽光正照耀在那燦爛輝煌的宮殿上，令人目為之眩。兄妹二人在展覽會場溜達了數小時之久，然後為了慶祝戴讚美的生日，戴德生帶她到一家高貴的餐廳用午膳，大快朵頤，以一度蜜汁鳳梨為尾菜——當時算得上是奢侈享受了！

他們走過人群摩肩接踵的倫敦市，來到市區另一邊的英國銀行，拜會皮爾士。他是中國學會的秘書長，同時也是股票市場的負責人之一。皮爾士為他們安排在星期日到托頓威（Tottenham）布魯街（Brook Street）的弟兄會參加聚會，在那兒他們終於見到羅存德牧師。

這位德國教士定睛望著這個來自班士尼的藍眼金髮的小個子說：

「你看我的頭髮比你的深色得多，但他們還是叫我紅毛鬼。相信他們見到你，必是嚇得逃之夭夭！你一定無法叫他們留下來聽你說話。」

然而戴德生平靜地回答說：

「是神呼召我的，他一早就知道我的頭髮和眼睛是什麼顏色。」

不久之後，羅存德對戴德生改觀了，不再認為他不適合到中國去傳道。

赫迪醫生的家添了一名成員，所以戴德生把房間讓出來，搬到住在肯士頓廣場（Kingston Square）的哈拿姨母家中。那幾離開赫迪醫生的手術室和戴德生上課的醫學院都很近，姨丈理察（Richard）是位攝影師，姨母哈拿是個擅繪人象的畫家；他們並不富有，但都很熱心和慷慨，而且由於沒有兒女，所以很樂意替姊姊賀美亞照顧她的兒子。在荷爾，他們有很多朋友，家中時常高朋滿座。戴德生在那裡生活得很愉快，尤其是妹妹由巴頓前來和他共度周日的時候，更令他雀躍不已。

但有一件事令他不安。當他讀到幾段有關的聖經經文後，他決定把至少十分之一的收入拿出來用在神的事工上。可是，他的薪金需用來每月支付在姨母哈拿家住宿的房租和生活費。他應否把這些算在什一奉獻上？如果他從總收入中扣取什一奉獻，他就所餘無幾，生活拮据了。

經過禱告之後，他決定搬到一個較省錢的地方居住，這樣他可以奉獻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余錢尚夠應付每月的生活費。

城郊不遠有一排工人房舍，他在那兒租了一個樓下的房間。那排房子建在河岸上，那道河稱為格定漢河（Cottingham Drain），戴德生住的房子，是格定漢台三十號，房東是一個名叫芬治（Finch）的船長，時常不在家裡。房東太太是個基督徒，她把一個房間租給戴德生，每月租銀三個先令。房間不足一百五十方呎，裡面有一張桌子、椅子和床，對著窗戶還有一個壁爐，抹得很乾淨，顯然定時得到芬治太太細心的拭抹。

從他的窗戶向外望，戴德生可以看到正在捕魚的漁夫，以及棲身在蘆葦中的水鳥。鄰居們時常把一罐攪拌過的牛奶（制乳酪用）放在河水中，讓它們冷凍。在冬天的傍晚，他可以享受到芬治家的溫暖，又或者（如果經濟許可的話）在壁爐中添一些柴，點一把暖烘烘的火。

1852 年 3 月 22 日，戴德生寫信告訴他的母親，他和朱安德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清楚知道，神的呼召是要他儘早到中國去。

為了準備面對這個大使命，戴德生現在的生活只有兩個目標：忍受困苦和節省開支。他發現他可以用很少的錢就能維持生活。他也發現一種粗麥餅，價錢和麵包一樣廉宜，但好吃得多。所以，每天早上他吃麥餅及青魚（比牛油便宜）作早餐，和著咖啡吞下去。午餐是煨馬鈴薯和牛腳，還有梅子蘋果批，或者米糕布丁。有時以青豆代替馬鈴薯，偶然還有魚。他找到一間小店，那兒的幹乳酪每磅只賣四至六個便士，有時味道比家裡常買八便士一磅的乳酪更佳。他又用一便士買些紅葉，放在三便士半的醋中，這樣就有好一大瓶的醃菜了。

節儉但變化多姿的生活，使戴德生有能力奉獻十分之六的收入，而他奉獻愈多，愈感快樂。他記述說：「整天都充滿了難以言喻的歡愉，每天都是我快樂的經驗。神，甚至我的神，是光明活生生而真實的！我一切能做的，只是喜樂地事奉他。」

然而，他仍覺得他「屬靈的肌肉」需要更多的鍛煉。他想：「我到了中國後，我將不再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我唯一的依靠只有神。所以，在我離開英國之前，我一定要學會單靠祈禱，借著神感動人的心。」於是，他與神開始一連串的屬靈實驗。

第四章 極佳的投資

「到了發薪金的日子，你要提醒我。」赫迪醫生爽快地說。這就是戴德生已定下的考驗：他立定心意不會向他的雇主提起發薪的事情，他請求神幫助他去提醒。

有一陣子這事不成問題。但有一次季末發薪的日期已過，赫迪醫生卻象完全忘記了似的。當星期六晚上戴德生計算他每週的開支時，他發覺口袋裡只剩下一塊銀錢——兩先令半。

他懇切祈禱。

翌日，主日崇拜之後，他沿著熟悉的車道走過荷爾區的碼頭，那一帶有上百愛爾蘭工人聚居在一些破落的舊房子中。這是臭名昭彰的地方，暴力和罪案頻頻發生；員警也很少巡邏，他們出動亦至少一隊六人以上，才敢踏足於此。

或許由於他的雇主是受人愛戴的赫迪醫生吧，戴德生常單獨前來此地也沒有受到騷擾，他來到這裡探訪病人、分發單張，甚至有時向聚集一處的小撮人傳講道理。「在那些日子，」他記述說：「我真覺得在地若天，我所作的一切，只是令自己更能享受快樂。」

那天晚上十時，他好象聽到有人叫他，從口音聽來，顯然是愛爾蘭人。

「我的妻子病得快要死了，請來為她祈禱好嗎？」

戴德生答應了，但他問來人：「你為什麼不去請牧師呢？」

「我去過了，但他要求十八便士的費用，否則不肯來。我不夠錢，我整家人都在餓肚子哩！」

戴德生想到他袋裡唯一的銀錢。他所有錢財都在這枚銀錢中。回到他的房間後，他看見明天的早餐尚有著落，但午餐卻沒有了。

「你落在今日的景況，實在是你自己的錯，你為什麼沒有見社會福利部的官員呢？」

「我去過了，他們約了我明天見面。然而我怕我的妻子過不了今晚。」

戴德生禁不住這樣想：「如果我不是只有一個兩先令半的銀錢，而是兩個先令和一個六便士的銀

錢，我會十分樂意地把一個先令送給這個可憐的家庭！」

戴德生跟著這個人走過一塊院地，他記得上次來這裡時，曾經遇上惡棍，他們把他的福音單張撕碎，又恐嚇下次再見到他時，必對他不利；所以戴德生忐忑不安地跟著那人走過一系列狹窄的樓梯，來到一個骯髒的陋室。

五個小孩帶著蒼白的臉和空洞的服神望看他，他們的母親躺著不動，手中還抱著一個嬰兒。

「如果我有兩個先令和一個六便士就好了……」戴德生反復在想。

「不用絕望，」他自言自語：「我有一位慈愛的天父看顧我。」

但這時他好象聽到內心說：「你這個偽君子！你向這些人說神是慈愛的，自己竟不能捨棄一塊銀錢，去學習信靠他」

他轉過來向那人說：「你請我來是為你的妻子禱告。」說著就跪下來，但還未開始祈禱，內心又責問說：「你的銀錢還在口袋裡，你竟敢跪下口稱天父的名字？」

他的內心激動，口舌不靈，禱告不能繼續。那個人說：「先生，你看我們的情況真是苦不堪言，如果可以的話，請你為著神的緣故給予援手吧！」

戴德生望著他，又望望他的妻子和孩子，腦中浮現馬太福音五章 42 節的話：「有求你的，就給他。」

他把手放進口袋裡，拿出那塊銀錢。

他把銀錢交到那人手中，說：「你可能認為我給你的不過是很小的數目，但它已是我所有的錢財了，我說的全是實話。神實實在在是可以信靠的父親。」

戴德生從屋子出來，行過寂靜無人的街道，經過那條黑暗泥濘的車徑，他的心情和他的口袋一樣地「飄飄然」回到家中吃了一碗稀粥，味道分外甘美，就算用它去換皇宮的一頓禦宴，他也不肯。

他跪在床前禱告，說：「親愛的神，你說過凡分給窮人的，即是借給神。這次的貸款可不能借得太久啊，因為我明天的午餐還沒有著落哩！」

那個愛爾蘭人的妻子終於熬過去了，孩子也都活過來。每逢想起這事戴德生就會說，如果他不是鼓著勇氣相信神，他的屬靈生命可能一蹶不振。

第二天清晨，當戴德生正在吃他最後的早餐時，郵差在叩門。芬治太太遞給他一封信，信封上的筆跡是他不認得的，而房東太太濕漉漉的手又把郵戳的日期弄得模糊不清。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張紙包著一對小孩的手套。當他把手套拿起，一枚一鎊的金幣便掉在地上。

「讚美神，」他由衷地說：「十二小時就獲得四倍的償還，真是好利息！如果荷爾的商家能收回這麼高的利息，他門不知有多高興！」

他決定把他所有錢財放進穆勒所謂「不會倒閉的銀行」中。他說：「如果我們在小事上忠必，便可獲得更多的經驗和力量去幫助我們應付生命中更嚴峻的考驗。」

這次的經驗大大增加了他的信心。當然一鎊並不多，就算在當時也不是大數目，不可能維持以後的生活，所以戴德生不斷祈禱，求神供應他的需要。

但這一次禱告好象未蒙應允。十天之後，他又回復一貧如洗的境況。

「親愛的神，求你提醒赫迪醫生吧，發薪的日期已過去多時了。」他迫切地祈禱。那不單是金錢的問題：如果他在神面前祈禱的力量不夠，他內心深處總覺得沒有能力到中國去。

星期六便要納房租了，他應否為芬冶太太的緣故去求赫迪醫生發薪呢？但他這樣做，就等幹承認自己尚未適合當傳教士了。星期四和星期五晚，所有時間他差不多全用在禱告上，不斷地「與神角力」。到了星期六，他還在這樣的祈禱：「親愛的天父，請你指示我應否向赫迪醫生提及薪金的事情。

他好象聽到聲音，說：「等候吧，我有我的時間。」他感到神總會幫助他，所以他就安下心來。

星期六下午，大概五時左右，戴德生和赫迪醫生還在手術室中。醫生已經做完了出診、開藥方等事務，和往常一樣，躺在扶椅上，跟戴德生閒聊一會。

戴德生正在煎藥，背對著醫生。突然，赫迪醫生問：「是了，小戴，又到發薪的日期吧？」

戴德生一連咽了三口水，眼睛沒有離開煎藥的鍋子，裝作無動於衷地回答說：「已經過期了好一陣子！」

「噢，真對不起，為什麼不提醒我呢？你曉得我多忙！我如果早點想起便好了，因為今天下午我才把所有錢存進銀行，否則我現在就可以給你發薪。」

戴德生覺得有點暈眩。幸而鍋裡的藥水煮沸了，他便借此機會離開房間。醫生一點也不知道他在這時是多麼難過。

醫生離開了手術室後，戴德生傾心吐意地盡情向神禱告。過了一會，他才回復平靜，感到神不會使他失望。

整個星期六晚，他留在手術室，一邊讀聖經，一邊預備講章。到了十時左右，他穿上大衣準備離開，心想幸好自己有家裡大門的鑰匙。芬冶太太大概已經睡了吧！希望下個星期能儘快給她交付租錢。

正當他要關燈離開時，他聽到花園中傳來腳步聲和赫迪醫生爽朗的笑

「小戴，給我吧帳簿拿來，真是少見，一位有錢的病人要來付錢，而且付現金呢！」

戴德生也覺得奇怪，通常有錢的人不會晚上來付醫藥費，而且不用支票而用現金，更是罕見的事。他也隨著赫迪醫生笑起來。

醫生把數目寫到帳簿上，在準備離開之際，他轉過身來，遞給戴德生一大選鈔票，說「對了，小戴，你先把這些錢拿去！我沒有零錢，但你可以下星期才把余錢還給我！」

戴德生在回家的路上，不斷讚美神，並想道：我應該可以到中國去吧！

1852年5月的《海外佈道雜誌》報導說：中國學會已經組成了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目的不僅是支援協助在中國的傳教工作，而且自己差派傳教士赴華。羅存德牧師將會成為第一個由中國傳道會差派的教士。報導又說：如果要成功地把福音傳開，傳教士不能只耽在條約口岸區，要進入內地，住在中國人當中。「往中國傳道的時機成熟了。」《海外佈道雜誌》說：「我們相信神會悅納另一位懂醫藥的傳教士赴華事奉。」

至少有一位年輕的醫學院學生受到感動，他遷到倫敦來接受進一步的醫學訓練。當戴德生離開荷爾時，父親戴雅各很高興地把外甥約翰送到赫迪醫生那裡接替戴德生的工作。至於在倫敦的生活費用，戴德生還是靠著信心祈求。他覺得他需要進一步培養和考驗自己對神的信心，才可以到中國去。

另一個考驗的機會來了。

父親戴雅各表示願意支持戴德生在倫敦的生活費用，中國傳道會也答應支援。戴德生寫信給他們，請求給予他幾天時間去禱告和考慮，也讓雙方都知道有關資助的事情。

但禱告之後，戴德生決定婉拒兩方的支持，而又不令任何一方尷尬。中國傳道會不會知道他這樣做是要學習全然信靠神，他父親可能以為他已接受佈道會的支持吧。

戴德生訂了從荷爾到倫敦的船票。妹妹戴賀美到來送行，和他一度過在荷爾的最後幾天，還慶祝戴賀美的十七歲生日。

1852年9月24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戴德生站在螺旋槳推動的「倫敦號」甲板上，大力揮手，向站在荷爾碼頭上的戴賀美道別。船慢慢駛動，戴著帽子，穿著圓圓寬裙，淚流滿面的戴賀美，目送哥哥漸漸遠去。

第五章 從麵包與水到牛排和酒

清晨醒來，戴德生已身在倫敦的泰晤士河上。上到艙面眺望，海水如一面磨鏡，映照著滿天的霞彩。中午，船泊于倫敦南畔碼頭。戴德生從碼頭步行到蘇豪區教堂街（Church Street）的魯弗士宿舍（Mr Ruffles' Boarding House），那兒靠近沙特土伯裡街（Shaftesbury Avenue），赫治文舅舅也住在那裡。舅父在家中是很受歡迎的，人緣好，又聰明，而且最會講故事，可借有點「俗氣」。

舅父在宿舍門口迎接他，並且安頓他住在隔鄰的房間。他沒有閒情去聽戴德生「多祈禱求主引導」等話，只想著如何通過朋友的介紹，為戴德生找到一份醫務所的工作。

戴德生的表兄弟湯姆（即在赫迪醫生處工作的約翰表弟的兄弟），住在離魯弗士宿舍不遠的甸恩街（Dean Street）。為了減輕負擔，湯姆願意搬來與戴德生同住，戴德生當然欣然接納。湯姆並非基督徒，看見戴德生讀聖經和跪下祈禱，並且常常談論宗教問題，頗感奇怪。

安頓下來後，戴德生立刻到中國佈道會去，他們需要他的母親及赫迪醫生為他寫推薦信。

戴德生對母親說：「關於我得救與否，或有沒有誠意到中國去傳道，又或者是否適合作傳教士，都請您坦白直言。請您不要從母親的立場去寫，任何人在作出如此重要的決定時，都需要坦率的意見。」

兩封推薦信都收到了。兩星期後，中國傳道會的幹事柏德（Charles Bird）通知戴德生，從下週一開始，他可以在威乍浦（White Chapel）的倫敦醫院學習，費用由中國傳道會承擔。

由宿舍到醫院，戴德生每天需要步行四哩之遙，由蘇豪區開始，過何爾本（Holborn），經過晨早驅趕牛群到史密夫斐德（Smithfield）市集的人群，上勒蓋德山（Ludgate Hill），從聖保羅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的樹蔭影下走過，再沿齊賽街（Cheapside），過阿蓋德路（Aldgate Road），才到這位於威乍浦路（White Chapel Road）的倫敦醫院。他的四周是十九世紀中葉倫敦市的聲色氣息：石砌的街道上手推車輾轉的車聲、擾攘的人聲，街邊叫賣著熱騰騰的馬鈴薯，還有長著大鬍子的猶太人叫賣著舊衣，以及穿著大紅衣的街邊女郎……。

他在清晨的散步來到倫敦醫院的牌樓下便結束了。倫敦醫院相當大，可容納三百名病人。但這時生病並不好受，在一般情況下，只用火酒作為麻醉劑。做手術時，病人要不是被縛在床上，就是由助理人員緊緊地按著，戴德生時常聽到病人發出痛楚的呼叫。有時又聽到震栗人心的警鐘鳴聲。（如果病人掙扎得厲害，就會鳴鐘要求更多人來幫助。）

「我喜歡聽見病人的呼喊。」一位老醫生說。病人可能覺得恐怖，但對於醫生來說，病人的呼喊

正表示他們仍然生存。

戴德生的生活非常儉樸。每天晚上步行回家途中，他都買一大條麵包，分成兩半。一半作晚餐，留著另一半作早餐。每日清晨，他不用早餐便出門，走了一段路，需要停下來休息時，才吃麵包。午餐通常是幾個蘋果。雖然吃得不多，但戴德生仍告訴母親他身體很好，有時甚至說自己胖起來呢！當然，他也相信這樣說是「靠著豐富的想像力」。

在他搬來幾星期之後，戴德生以前的房東太太芬冶夫人寫信來請他幫助。她的丈夫芬冶是個船長，以往曾請求戴德生每月替他到船務公司領薪，再把一部分薪金寄給住在荷爾的芬冶夫人。現在芬冶夫人寫信請求戴德生尺速把薪金寄去，由於戴德生醫院裡的工作甚忙，晚上又得溫習功課，準備考試，所以他把自己的錢先寄給荷爾的芬冶太太，預算稍後才到船務公司去領取芬冶的工錢。然而，當他後來到船務公司時，船公司的書記卻告訴他一個壞消息。

「芬冶船長丟下他的船走了。我們相信他去了採金。」

「這便麻煩了。我已經把錢墊出來，我知道芬冶太太是無力償還的。」

「我也為你難過，」書記說：「但我只能按章辦事，恕我愛莫能助。」

戴德生一再提醒自己凡事倚靠神，只要信，不要怕。

當天晚上，他整理筆記，用針把一些活頁縫在一起，但一不小心，針刺傷了手指。不過戴德生很快就將此事置於腦後。

第二天，在醫院中作解剖實習時，由於死者是患猩紅熱致死的，病菌會從傷口傳染，因此大家都小心翼翼。戴德生也參與解剖的工作，但他忘記昨天晚上他的手指刺傷了。

早上還未過去，戴德生已經感到極其疲乏。在巡查病房時，他突然感到很不舒服，立刻跑出病房。他覺得昏暈，喝了一杯冷水後，才稍覺好轉。便繼續學習。然而身體愈來愈不舒服，下午上課時連鉛筆也拿不穩。到第二節課，他覺得整條右臂和右邊身子都極為疼痛。

他回到手術房，把自己在屍體上進行解剖的部分包紮好，放回儀器，對手術科的指導醫生說：「我不知道身子出了什麼毛病。」然後，他把各種症狀告知醫生。

醫生說：「事情明顯不過。你一定在解剖時弄傷了，因而染上熱毒。」

「不可能的，我很小心。沒有劃破和割傷皮膚。」

「但你一定是弄傷了。」

醫生仔細檢查戴德生的手，但毫無發現。突然間，戴德生記起昨晚被針刺傷手指的事。

他問：「昨天被針刺了一下，會不會有影響？」

「那就是了，快叫車送你回家後，打點你的後事吧！」醫生說：「你已經是個死人！」

「除非我弄錯了，我還要到中國工作哩！我不能死；但如果我真不能康復，我也欣然期望和我主在一起。」

「說得很好。但現在你立刻叫一輛車，儘快回家去。你的時間所餘無多，再過一陣你就不能處理你的事務了！」

戴德生還想步行回家，但不久即感乏力，不得不叫了一部馬車送自己回蘇豪區。回到屋裡，他吩咐僕人給地一點熱開水，同時苦口婆心地勸他信主，真真正正是臨死贈言了。之後，他用水洗頭，又

大力刺那受傷的手指，嘗試把一些毒血榨出來。但痛楚愈來愈強烈，他終於昏倒不省人事。

他醒轉時，已身在床上，赫治文舅舅在他身旁，他已派人去請醫生。

戴德生說：「我想我已病入膏肓，非藥物所能救的了，而且我也不願花這麼多的錢。」

「別胡說。」舅舅說：「醫藥費由我來付！」

赫治文舅舅的醫生替戴德生檢查後，說：「如果你平時沒有暴飲暴食，或許可以熬過去。但若你多喝啤酒及那類東西，你就沒有希望了。」

「還好」。戴德生說：「如果清苦的生活對此有幫助，我生還的機會遠勝他人。數月以來，我都只吃麵包和喝清水，我覺得這有助我讀書溫習。」

「但現在不同了，」醫生說：「你現在需要體力，因為還有一場艱苦的搏鬥。你應每天喝一瓶葡萄酒，儘量多吃牛排」

當然，戴德生不可能有錢買這些酒和肉，但赫治文舅父聽從醫生的吩咐，替他買來，並且監督著這個外甥的飲食，毫不放鬆。

有一天，醫生來到，看見戴德生坐在沙發椅上。他發現戴德生竟然不用幫扶，就可以獨自下樓，感到非常驚異。

他對戴德生說：「現在如果你能夠旅行的話，最好到郊外調養一下。儘量拋開事情，直至你恢復健康和體力。如果太早回復工作，後果會不堪設想。」

醫生離開之後，戴德生躺在沙發椅上，感到筋疲力竭。他開始祈禱：

「親愛的神，我一直刻意避免把自己的需要告訴別人，好使我的信心增長。現在叫我怎麼辦？我連回家的交通費也付不起。」

他好象感到神的靈叫他到船公司去查詢一下芬治船長的事。

「但親愛的父神，」他禱告說：「我連坐計程車或巴士的錢也沒有，而且錢是多半拿不回來的了。這種衝動難道是出於我自己的乞求，而不是你的帶引？」

禱告完畢，他仍是感到神在催促他到船公司去。但怎樣去呢？他只能自己下樓，走幾步路而已，而船公司則在二哩之外。他記述道：「屬靈的應許使我清楚知道，無論我借主的名向神求什麼，就必得著，因為父要子得榮耀。我雖然要步行，但我知用信心求力量，就一定辦得到。」

「親愛的天父，」他禱告說：「你若賜我力量，我樂意步行前往。奉主耶穌的名請求你現在就給我力量！」

他朝著齊賽街走，每走兩三步就停下來倚著店鋪的櫥窗休息一會，也順便流覽店內陳設的物品，然後繼續前行。他以前從來都不會對百貨店的櫥窗感到興趣。最後，他終於來到齊賽街，轉入船公司座落的街道，來到公司的樓下，已是筋疲力竭，只得坐在樓梯上休息。

上落的人對於這個蜷伏在樓梯一角的青年，都投以好奇的眼光。休息過後，再經過一次禱告，戴德生終於上到船公司裡。他很高興再次見到那一位書記。看到戴德生滿面病容，書記問：

「先生，你身體怎麼了！」

「我得了重病，」戴德生回答說：「醫生叫我到鄉下療養。我想到來看看那個棄船掘金的船長可有新消息。」

「我真高興見到你來，原來上次棄船而去的船長並非你的朋友，而是另外一個姓名相同的人。芬治船長仍在船上，他的船已經抵達貴利夫遜 (Gravesend)，不久就要來到這裡。我樂意把他的薪金交給你，因為這樣會更安全，芬治太太必定收到。不過，在我給你薪金之前，你可否和我一起用午膳？」

戴德生欣然接受書記的邀請。飯後，他領取了錢，叫了一輛馬車回蘇豪區。

戴德生要付錢給赫治文舅父的醫生，但醫生以他是醫學院學生為理由，拒絕收費。

「你可以讓我大膽地說幾句話嗎？」他問醫生。

「請說吧！」

「在神面前，」戴德生說：「我覺得我的性命是你救回來的。我真希望你能和我分享我對神的信仰，它是我所珍貴的。我在倫敦學醫，目的是到中國事奉神，在我起行之前。我一直學習完全相信他，所以我拒絕了父親及中國佈道會對我的供給。但我所有的需要都得著供應，昨天神又賜給我力量，使我認蘇豪步行到齊賽街。」

「不可能的，我離開你時，你象鬼多過象人！」

「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實實在在是步行的。因此我現在有足夠的錢回約克郡去療養了。」

「很好。我真願放棄世上所有，換取象你一般的信仰！」

他們兩人以後再沒有見面。

翌日，戴德生回到班上尼，回到母親慈愛的懷抱裡。他不但沐浴於母愛中，也時時刻刻聽到母親諄諄的告誡：不准再過那種荒唐的節儉生活。

戴德生以後的生活的確沒有那麼清苦。

第六章 中國傳來震動心弦的消息

戴德生和韋瑪莉訂婚了。韋瑪莉的父親很不願意女兒遠赴重洋到中國去，但還是答允了這門婚事。

可是訂婚之後的戴德生並個快樂。他很懷念從前韋瑪莉彈琴，他和戴賀美一齊唱歌的美好日子。但在訂婚之後，這些日子卻不可多得；每次他想約韋瑪莉好好談一會，她總是好象找藉口拒絕他的約會。她也常對他說，她的朋友都不贊成他倆的婚事。他覺得她已不如以前一般地愛他了！

1853年1月，戴德生回到倫敦。他的表弟湯姆其時正患熱病，戴德生好幾個晚上徹夜不眠地照顧他，弄得自己萎靡不振。（由於戴德生的影響，湯姆已經成為基督徒！）他的精神沮喪，禱告也好像達不到天上。在他寫信給妹妹戴賀美的信中，他表明地的孤單和失意，說道：我真願你在我的身旁，好給我捏一下你的臂膀。又說：你真是我親愛的妹妹！

除了失意，還有更壞的事，就是囊中苦拙，錢差不多用光了。他祈禱，神的回答是：到倫敦市主教門 (Bishopsgate) 的白朗醫生 (Dr. Brown) 處當他的助手。白朗醫生是外科手術醫生，當他的助理可免費享有住宿和膳食，同時早上還可以到倫敦醫院上課，工作時間只在下午和晚上。從白朗醫生處走到倫敦醫院也較近，每天只用走兩哩，省了一半的路程。所以，戴德生接受了這份工作。1853年3月底，他搬到白朗醫生的醫務所。

現在，他每天的例行公事是：早上八時到下午三時在倫敦醫院，然後回白朗醫生處用飯、配藥、巡視病人或者整理帳務；之後自修解剖學，以及做化學實驗，然後或許再巡視一下病人。對任何人來

說，這樣的編排可忙煞人了。

每個禮拜日，他都到托頓鹹的布洛克街教堂，那裡有一位以前是貴格會（Quaker）的老太太——史蒂絲（Stacey）小姐，很殷勤地招待他，以後成為他一生的摯友。教會裡的年輕人常到史小姐的家去，史小姐看到戴德生蒼白和疲乏的臉容，便對地關懷備至，由得他獨自休息一會。夏天時，戴德生常探望史小姐，有時在她的花園裡一坐就是數小時，有時甚至在史小姐的家留宿，星期一的大清早才打從她那兒往醫院上課。

戴德生這時正面對一個難題，使他猶豫不決，難以取捨。中國傳道會向他建議，由會資助他完成醫學學位，取得皇家外科手術醫生的資格，然後到中國開辦醫院但戴德生覺得如果接受了資助，他以後就難以拋開中國傳道會的醫務工作，按著自己的心意去中國內地傳教。因此，他不能取捨，便寫信給雙親，懇求他們為他代禱。

這當幾，他回到羅弗士（Ruffles）去見韋瑪莉。

戴德生說：「你知道我深愛著你，可是我不知道你對我的感情如何？」

韋瑪莉回答說：「我母親，患著重病，父親正在憂心如焚，怕她隨時死去！他擔心我會跟你遠赴中國。雖然他允准了我們的訂婚，但我知他極不高興。我真是左右為難啊！」

「那麼，讓我們寫信給他問個清楚，」戴德生說：「如果沒有他的同意，我們的婚約怎能維持下去呢？」

與此同時，從中國傳來的都是扣人心弦的消息。中國傳道會在其刊物上屢次呼籲火速派遣宣教士赴華，如再耽延。最令人振奮的是有關太平天國的報導叫《倫敦時報》（The Times）稱之為「世上從未有過的偉大革命」。許多信徒都認為這時正是對中國傳播福音的大好時機。

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人對滿清皇朝（1644 至 1911 年）不滿的反應。滿洲人入主中國，雖已有兩百餘年，但漢人還是把他們看作外族，而且到了十九世紀，滿人多耽於安逸，又常欺凌漢人，引起普遍的不滿。到處私自興黨結社，武裝起義也增多了。

太平天國的首領是洪秀全，他讀過梁發所寫的一些福音書及單張，受到了基督教的影響。1843 年，洪秀全和他的表兄弟互相為對方施洗，並且開始在其族人中傳講基督教的道理，稍後洪秀全遇到美國浸信會的宣教士羅孝全（Issachar Roberts），便跟從他學道。

後來，洪秀全在 1849 年成立拜上帝會，成為群眾的領袖。他和羅孝全仍有來往，羅氏在他寫給母會的報告中，對這個群眾運動極之樂觀。

但是拜上帝會其他一些領袖卻沒有受過很多教育，他們比洪秀全較為好兵默武，而且和秘密結社的三合會暗通往來，目的是要反抗滿清，重建明朝。

反抗滿清的運動於 1850 年在廣西金田爆發，洪秀全的徒眾推舉他為太平天王，建立了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有其成立之目的，也有其獨特的一套宗教制度及行為規範。他們要推翻清朝、拆毀偶像，以及掃除吸食鴉片的陋習。在太平天國的早期，徒眾皆尊重聖經，對十城尤其重視，常念主詩文，每天有崇拜的聚會，敬拜三一真神、背誦信條和聆聽講道。他們也為成人施洗。雖然他們容許娶妾，但道德戒律相當嚴謹，而且所到之處，必毀壞一切偶像。

這所有事情，當然引起英國、歐洲各地和美國的基督徒極大的興趣。一個掃除偶像和異教的基督

王朝在中國出現，似乎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而太平軍對外國人的友善態度，也帶給傳教士極大的鼓舞。一位太平天國的領袖說：「真神上帝，是普天之下眾人之父，中國亦在其治理與關懷之下，外洋各國也是一樣。天下眾生，皆為兄弟。」

1853年3月，太平軍抵達南京。在這個明朝的古代皇城，他們打敗了滿清的軍隊，佔領了這個位於南北要衝及運河通道的一代名都。

《海外佈道雜誌》對這一切報導甚詳，在戴德生心內引起了強烈的反應。他很想丟下醫學課程，立刻動身到中國去。

當時一般傳教士都在動身之前結婚了，然後夫婦二人共同展開新的生活和事奉。因此，韋瑪莉父親的覆信便是一個關鍵了。

韋漢（Vaughan）先生的信，是這樣寫的：

「……如果你留在英國，我極其樂意見到你和韋瑪莉兩人快樂地結合。可是，我雖不阻止你倆來往，但我覺得很難把她完全捨棄，或者想到她會離鄉去國……」

因此，戴德生和韋瑪莉的婚約就在「雙方互相同意與尊重之下。（戴德生語）告吹了。

戴德生與韋瑪莉的戀愛，維持了三年又三個月。戴德生一直祈禱，希望未婚妻會追隨自己到中國去。在他給妹妹戴賀美的信中，他說：「我想韋漢先生真是不對，既然容許我倆訂婚有這樣一段長時間，後來又不答應……我不能不愛她，並且相信她也愛我。」

對戴德生來說，這是一段傷心的日子。唯一伴著他的，是兩隻他養的小松鼠，但它們難以代替可愛的韋瑪莉和她的音樂。有時當他抱著白朗醫生夫婦的嬰兒在芬士伯裡廣場（Finsbury Square）上散步，他會渴望家庭之樂，並且默默禱求他也有享受這樂趣的一天。

與此同時，全地信徒對中國的興趣也與日俱增。《海外佈道雜誌》的編輯相信，北京不久也將落入太平軍之手：「在中國，黎明即將到來……我們準備不久之後遣派一些具有基督愛心的醫務人員赴華。」

六月，事情變化得如斯急劇。柏德（Charles Bird）緊急的找到戴德生，對他說：「如果你認為不需完成醫學課程，我們覺得你宜立刻到中國去。我們希望你成為本會的宣教士，最好在九月初起程，避免秋天的強風。」

柏德又繼續說：「如果神為你開路，差會對你在內地推行的傳教工作並無限制叫尚若事情的演變使你無法再為本會工作，我們並不會認為你的離開是背信或非基督徒的行為。請你為此事考慮和禱告；如果決定要去，請立刻填妥申請表格」

戴德生決定要去。

申請表格包括一份長長的問卷和一份信仰表白書。他花了兩個晚上，由凌晨一點到三點，才填好這份申請表。戴德生是完全誠實的，他甚至覺得在一些問題上，他非正統的答案可能使他的申請被拒絕。根據中國傳道會差派委員會的書記所記述，引起各審查委員尖銳討論的，是下列的一段話：

「我不相信教會中有聖職人員與平信徒之分，我相信所有基督徒都有權利去講道。施洗和主理聖餐。……」

眾委員的反應是可以想見的，他們大多數都是教牧人員，持不同的看法。

三個星期過去了，戴德生還未接到通知。雖然他的雙親都同意他即時赴華，他的母親卻對於他還

未收到委員會的回音便向白朗醫生提出辭呈感到有點憂心。事實上，白朗醫生很想戴德生留下來，他盡力勸他多耽一年，好完成外科手術的考試。但戴德生的意志已決：「如果我付出時間和代價去完成醫學學位或手術醫生資格期間，我能為神所用，帶領可憐的中國人來到耶穌跟前——那在那永恆的世代裡將更加可貴！」

之後，他接到柏德的信。差會已經決定儘早派遣他去中國，他應立即收拾行裝，準備上道。

八月，戴德生回到班士尼的家中，和家人共同度過一段愉快的日子。全家一起分享，一起唱詩。戴德生把他兩隻心愛的小松鼠，分別送給大妹戴賀美和十三歲的小妹妹露意莎。

月底，他又回到倫敦，趕著整理行裝，購買一些醫療用具和藥品，忙個不停。

九月，布洛克教會為他安排了一個聚會，由他主講。他記述這次的講道：「我的思想有點散漫，心不在焉。」但會眾的反應很熱烈。史蒂絲小姐還叫他去做一件厚厚的大衣，由她付錢。中國傳道會有遣送禮，他奉命立刻前往太平天國的首都——南京。

由中國傳道會的辦公室出來，戴德生就徑往倫敦的尤斯頓（Euston）火車站，搭夜車到利物浦。在利物浦，皮爾士（George Pearse）先生和他的母親正等著他。他的父親和姨母哈拿及其他家人隨後也都趕到他住宿的歐文旅店。由於戴德生所帶的藥品和儀器寄失了，他在利物浦多逗留了幾天父親不能離開店鋪太久，所以他四天后只得先行告別回班士尼去，全家都到火車站送他。離別依依，戴德生永不能忘記和父親分手時心中的淒苦。汽笛長鳴，黑煙升起，火車慢慢地移動了，戴德生抓著窗沿，又隨著火車向前奔跑。父親和兒子彼此對望，心中苦痛，直至火車的速度漸漸把他們之間的距離拉遠了！

戴德生乘搭的船，叫「敦費上」（Dumfries），定於9月19日啟碇。最後數天，戴德生趕著寫信給他心愛的妹妹戴賀美，還有在赫迪醫生處做事的表弟康約翰：「相信耶穌吧！把你的罪帶到他跟前來……我這樣寫是因為我愛你——然而神愛你更多。」康約翰在二十九歲時死了，但戴德生為他悔改歸主的懇切代禱，已經得蒙應允！

第七章 重重險阻赴中華

1853年9月19日，星期一，「敦費士號」準備起航了。她那一艘三桅貨船。1837年建造，重量不超過五百噸。當船員把最後的貨物送上艙時，有四個人正在船尾的小房間聚會。他們是戴德生和他的母親、一位叫戴安生（Arthur Taylor）的傳教士，以及一位在利物浦結識的老牧師。這個相當寬敞的艙房是戴德生的，還特別為這個遠赴重洋的二十一歲青年粉飾一新呢？戴德生建議一齊來唱約翰牛頓的聖詩：

「耶穌聖名，何等甜美，
屬主聖徒愛聽；
醫治病傷，安慰悲苦，
消除心中憂驚。」

唱詩完畢，大家一起祈禱。戴德生的語氣一直是堅強的，但在他把親愛的家人交托給神時，有一刻他還是說不出話來。靜默了好一會兒，他才將禱告轉向前面可以想到的種種困難，總結地說：「任何

困難都不會左右我，我也不會珍惜自己的生命，以致我能快樂地完成我主耶穌託付我的使命，宣講神恩典的福音。」

其他各人也輪流禱告，戴德生又念了一篇詩篇，然後戴母還為兒子整理一下床鋪，二人都不知道有否機會再相見。

當他們回到艙面時，船員已經把貨物安置妥當，預備起纜啟旋，其餘三人趕忙離船。

戴母坐在碼頭上，身子不停地顫抖。戴德生看見十分難過，便跳到碼頭上，把母親緊緊抱著。

「親愛的母親，不要再哭了，我們會再見面的。想想我所以要離開您去作的榮耀事情，不為名，也不為利，乃為使到中國人認識耶穌！」

船已經慢慢駛離碼頭了，戴德生從碼頭跳上甲板，沖進艙房裡，打開他那本小聖經，在前面的空白頁上很快的寫上：「神的愛超乎我們所想所知。」然後趕快回到甲板上，把聖經扔給他的母親。

這時，貨船的大副才趕到碼頭，他握著戴母的手，說：「存著勇敢的心，我會把好消息帶回來給您。」

由於大副來遲了，所以船又再次泊回碼頭，好讓他上船。因此。戴德生尚可以再一次握著母親的手。

「您珍重啊，神祝福您。」

碼頭上的三個人都揮著手，揚著巾，戴德生爬上船杆，搖著帽子，不停揮舞，直至碼頭上的影子逐漸變得細小、模糊，終於消失在他的眼前。

這當幾，在倫敦的聖經公會正通過一項決議，撥款刊印一百萬本中文聖經。

在「敦費士號」船上，共有二十三名船員，包括摩利士（Moms）船長和他的兩名副手、領班、廚子。木匠各一，還有水手，侍者和學徒等。除了一名來自澳門的中國小童外，戴德生便是唯一的乘客了。當然船上還有好些豬、雞、鴨和狗，以及兩隻貓。

在艙房中，戴德生把行李安頓好，又用繩子縛緊，然後拿起手風琴，邊彈邊唱。後來船因風浪顛簸得很厲害，他就吞了一粒「暈船丸」，倒頭便睡。當他醒來時，發覺艙中的燈左搖右擺，好象滿艙都是一片片的碎影。

「敦費士號」進入愛爾蘭海域時，微風已變成強勁的西風，三天來他們左顛右簸，船速極緩。

到了星期六，風突然停了，但氣壓計的水銀針整天往下跌。到了入黑時，風勢又轉強勁。

他們如搏鬥般南下威爾斯島西岸時，摩利士船長把一貫的禮拜日禱文也放下了，星期日中午，風浪更大，每個船員都幫著扯帆。戴德生有時出來看望船員，並且給他們一些福音單張，供他們閒時閱讀。

風浪正大，戴德生感到胸口發悶，趕忙回到房間。氣壓計仍在下降，強風已經升級成為暴風。

在下午兩三點之間，戴德生又掙扎著回到艙面，他看到的景象是他畢生難忘的：整個海面象吐著白沫，浪頭在船兩邊如高塔般壓下來，好象要把她吞噬。

「我從未見過這樣大的海浪，」船長大聲說。「除非有神幫助，否則我們這次一定大難臨頭。」

強風把船一直吹向海岸邊的防風堤。

戴德生問：「我們離開威爾斯海岸有多遠？」

船長說：「大概有十五到十六哩吧！我們能夠做的，是把所有帆扯起，否則隨風漂流得更快。我們的生死就系於這些帆上，希望神使我們的桅杆承受得起風力。」

「敦費士號」一會兒在高聳的海浪峰頂上，一會兒又象鑽到海底的深處，船身傾側得很，海水不斷向艙面的兩邊湧入來。

「吱啞」一聲，前面大帆的支柱斷裂了，幸好沒有倒下來。

戴德生望著眼前的落日，想道：「明天日頭還是一樣出來，但除非主在我們身上施行神跡，否則我們的船明天只怕剩下木塊殘桅了！」

太陽下沉之後，戴德生更感孤單和無可倚靠。他下到艙間，唱兩首詩歌，讀幾篇詩篇和一段約翰福音的經文，便上床睡覺。

一個鐘頭後，他醒來看看氣壓計，水銀針正在上升。他又回到艙面，船正向北駛，仍然離威爾斯海岸不遠。

戴德生問船長：「我們過得了聖頭礁（Holyhead）嗎？」

「如果直航無阻，我們應該可以。但如果風大把船吹離航線，我們便要神幫忙了。」

但船正在隨風漂流。

聖頭礁的燈塔本來是在前面的，現在卻在船旁的方向。船正朝著海岸直駛。

摩利士船長面容肅穆，但仍保持鎮靜，氣壓計還在上升，不過似乎太慢了。

戴德生想到家人和朋友，不禁而淚。船上的領班也是基督徒，他對戴德生說：「我一無所有，但基督卻是我一切。」

戴德生想起詩篇五十篇的話：「在患難之日求造我，我必搭救你。」所以，他便懇切祈禱，求主保守他們的性命。」

明月出來了，海岸也隱隱可見。氣壓計仍在上升，但風卻未稍停。戴德生回到艙間，拿起筆記簿，寫下自己的姓名和家裡的地址，以便死後可以通知家人。又把一些物品縛在一隻會浮的櫃子上，船沉時可以作為倚靠。然後再次祈禱，跟著回到甲板上。

「在這樣的狂風駭浪中，救生艇有用上？」

「沒有。」

「我們可否把那些木條和桅杆紮成一些筏子？」

「我們大概沒有這個時間了。」船長說：「我們只有半小時。現在你還因看上帝的呼召到中國去麼？」

「我仍然別無所求，我仍然希望到中國去。如果我的願望不能實現，至少主會對我說：『很好』，因為我遵行他的命令。」

他們看到岸邊的礁石愈來愈近，在月光下閃爍生光。

「我們得把船調轉方向，否則一切都完蛋了。」船長說。「船調頭時雖有反側的危險，但在只有拼命一試了。」

摩利士船長於是下令把船頭轉向海那邊。可惜屢試無效。

他們又把船轉向另外一邊，但船卻愈來愈接近岸邊的礁石。

正當這時，風向突然改變，在千鈞一髮之間，船沒有碰上礁石，在驚險一刻船竟在亂礁中駛過。

暴風逐漸平靜下來，戴德生又看到早晨的曙光。

在餘下的旅程中，摩利士船長及其他船員忙於把船上的損毀修好，有些水手受了傷，所以戴德生

也幫忙照顧。他還為那個瑞典籍木匠的眼角傷處縫了幾針哩！他們因此成了好朋友。戴德生發現這個瑞典人，還有領班和船長，都是循道會的會友。船長特別允許戴德生在船上舉行崇拜聚會，由領班負責安排。

10月6日，戴德生和領班在房間中一起禱告。戴德生說：「神啊，求你賜給我們平靜的風浪，因稱是主管風和浪的神。」

正當他們禱告時，突然船面傳來嘈雜的腳步聲，原來因為風向突然轉變，船員都在艙板上忙碌地調正帆桅。在這次航程裡，戴德生多次經歷到在他禱告之後，天氣便顯著的轉變了。

過了別士基海灣（Bay of Biscay）的強風後，「敦費士號」在東北信風的帶領下，朝著南美洲進發，然後由西風帶著它繞過好望角，從南面向澳大利亞直航。

旅程中戴德生有許多機會欣賞神創造的奇妙世界——斜陽夕照、黎明晨曦、海上飛魚、桅上海鷗，他還爬上桅杆看落日，更是瑰麗迷人。當船上的動物死了——一隻貓、一條海豚，兩隻信天翁——，他就把它們解剖，而且把一切詳細地記錄在筆記簿中。

戴德生也忙於為船上的人作各項醫療服務。船長的眼皮腫脹，廚子的臂上和腳上，以及一個船員的背上也長了膿瘡，戴德生為他們一一治理；又為另外一名水手割除扁桃腺，以及替領班拔掉最後一隻大牙。風平浪靜時，他就把各種藥品分類和標籤，又用蒸餾水和火酒來做化學分析及沖洗相片，他也自己製造攝影用的相紙，而且想用顯微鏡片去造一部照相機，可惜沒有成功。閒時摩利上船長和他一起溫習代數，他也教船長彈手風琴，又教二副吹笛子。

在一個大熱天，船員正在沖洗甲板，戴德生來到艙面，大家把五六桶的水向他倒頭淋下去。戴德生不以為怪，反倒大樂，船員自此也就和他玩在一起了。又有一天，船長和他劃了一隻筏子，環繞「敦費士號」察看船身的情况，然後跳進大海暢泳，當然要提高警覺，留意鯊魚的蹤跡。有時他會幫助船上的工作，學習張帆和其它的技能。

1853年的聖誕，大家為了慶祝，宰了船上一頭豬來做晚餐。後來的日子，航程很慢，因為海風極微，到了年底，他們才離開澳洲不過五百哩，距離中國尚有五千哩之遙。

1854年1月13日星期五。

凌晨二時，戴德生倏地驚醒，好象有一個影子站在他的床前。

「小戴，起來，跟我到甲板上去。」是船長的聲音。

戴德生爬起床，和船長來到艙面，站在一輪明月之下。船正在森巴（Sumba）群島東南的沙富海（Savu Sea）中。

「你看到那些島嶼嗎？」船長問，聲音中夾雜著緊張與興奮。「它們的位置和地圖上的記錄不符，如果從它們中間經過，將是極其危險的事。」

但他們還是成功地穿過這些島嶼，向東北駛去，經過安吉海峽（Ombay Straits）。峽旁兩岸滿是樹木和河流，景色很美。看見樹木和田野，戴德生不禁渴望能重踏陸地。

1月29日禮拜日。危險的威脅又迫近眉睫了。四周沒有一絲風，但一個強烈的海流把他們的船帶往新畿內亞的北岸，那是暗礁滿布之處，岸上住的是塗著花臉的獵頭族人。他們的船已經漂離航線四十餘哩，離海岸愈來愈近，他們感到完全無助，只得一面預備救生艇，一面盡力把船頭調轉，迎向海

流，以減輕撞擊時的震動力。

戴德生照平時一樣有早晨崇拜，摩利士船長也參加，但不停踱到船邊，焦慮地察看情勢如何。崇拜完畢，船長對戴德生說：「我們已盡力而為，現在只有等結果了。」

「不，我們還有一件事沒有做。」

「哪一件事？」船長問。

戴德生說：「我們船上有四個基督徒，讓我們各自退到自己的房間去，求主賜風給我們。他可以輕易辦到。」

於是，船長、領班、木匠和乘客，各歸各室，懇切祈禱。戴德生形容他的禱告「簡短而通暢」，並且感到禱告已蒙應允。因此，他又回到甲板上。

大副正在負責指揮。戴德生發現由於沒有風，而主帆有大半已收起。「把主帆張開，」他說。

「那有什麼用？」大副問。

「我們已祈禱求神賜給我們風，它立刻就會來到。快把帆張開，我們的船已經接近礁石，沒有多餘的時間了。」

大副向戴德生投了一個不信與增厭的眼神，說：「我希望我可以見到風而非聽到風。」

就在他說話之際，戴德生在意到大副的眼睛望向最高的帆。帆正在鼓起；對了，風已在動了！

「你看到風麼？望那杆上的帆！」戴德生說。

大副嗤道：「不過是微風罷了！」

「是不是微風都不要緊，把帆放下，總是有利的。」戴德生大聲說。

大副如言張帆。數分鐘後，船便以六到七海哩的時速，駛離岸邊的亂石礁，也把那些塗花了臉的上人遠遠拋諸於後了。

若順風而行，還有一星期便抵達上海了。戴德生開始整理行李、器具和書籍。

2月25日星期六。他們停泊在離上海十五哩外長江出口處的郭實措島（Gutzlarr Island）。六個月的航程終於結束了，船員們都圍著那個才上船的英籍領航員，問這問那，弄得他忙個不了。

他說：「太平叛軍已經佔領上海四個月了，他們正在向北京進發。」

1854年3月1日星期三，他們來到吳淞，戴德生轉乘一艘領航船直上黃浦江，到達上海。他看到碼頭上停泊著不少歐洲式的輪船，也停泊著中國式的木船和英法的炮艦。岸上一排十數間外國洋行，還有一座堂璜華麗，象中國廟宇的建築物，就是現時的海關大樓。沿江而上，他還可以看到一列古舊的城牆，那就是舊上海市了。城牆外豎著各種顏色的旗幟和清兵的營帳，他們正包圍著佔領城池的亂黨。

中國，在雜誌中讀到的中國，現在活生生的展現在戴德生眼前了！

第八章 追尋人生的意義

夕陽斜照著光禿的山巔；

奔雷驚起沃野上的草樹；

寧靜的夜色伴著河上山峰的孤塔；
古舊的城垣還保留著堅固的外廊；
遠處寺院的鐘聲在夜空中回蕩；
苦力在午後的暑熱中歌唱。

蜿蜒的長江，
半掩在竹林內的寺院，
剪裁有致的蘇州庭園，
還有帝王宮殿的金碧輝煌。

中國——世紀以來一直散發著她那迷人的眩惑。

然而戴德生並非為了欣賞湖光山色的瑰麗和探索這片土地的幽秘而來。他離鄉背井，經歷艱險的風浪，走過半個地球，是因為他相信中國人走迷了路，而且千千萬萬人正在毫無希望之中走向滅亡。據說中國有各種宗教，許多人士則喜談人生哲學和政經理論；他希望為他們帶來真理的信息。

在芸芸的中國學者之中，最著名的是孔子（主前 551 至 479 年）。他生於舊約以斯拉時代的中國。

孔子的時代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大概有四個特色。首先是天和神的觀念。孔子本人有著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認為上天賦予其使命，也會助他完成使命。中國古代典籍中也屢屢提及「上帝」，秉公義以治天下，也要求人重義輕利？

第二個特色是多神主義，有社稷之神、上地之神、廚灶之神、倉廩之神，而山川、星辰亦皆有神靈。

第三個特色是敬拜祖先，在中國人之中最為根深蒂固，幾乎每戶人家都有神位，象一個壁櫥，上面放有刻著家中各代祖宗姓名的木牌。有錢人家的神位都鑲著金邊或各種的裝飾。家人定時向著這些牌位跪拜，供奉香燭，和獻上食品祭牲。家長去世，長子便代表家人獻祭，在墳墓前跪下禱告說：「願骨和肉回歸塵土，願魂魄寄於牌位，與我們同住！」

中國人認為敬拜祖先是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責任。他們相信借此可與靈界契合，而死去的先人能否享福，也端賴後代的祭祀。相反而言，祖宗的魂魄也有賜福和降禍的能力。此外，祭祖的禮儀亦有凝聚宗族和維繫社會安定的功能。

中國古代宗教制度的第四個特徵，是由稱為天子的皇帝代表人民獻祭，即「封禪」之禮。天子在「皇天上帝」之神位前跪地叩首，代表國家人民向天答謝並示臣伏。

孔子非常重視這些宗教傳統。在他而言，神靈之事是理所當然，而人類的命運也由至高無上的神明所操縱和掌管。但他的興趣卻不在於宗教，他是一位倫理教師，具有政治理想。

孔子的學說被稱為一種「基於普通常識和家常品德的功利主義福音」。對他來說，學習是為了達到進德的目的，他的目標是以古代道德的標準來改革腐敗的周朝。他推崇「君子」，貶抑「小人」。「君子」就是追求道德修養，遵守社會規範的人。

孔子的學說以「仁」為最高的品德。「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的教訓和基督教的倫理觀也有相異之處。對於傷害別人或者殘害公理者，孔子不主張憐憫與饒恕，而是「以直報怨」。

孔子的學說主要是針對一部分來自統治階層的聽眾，一般人還是以拜神祭祖為主。而普遍影響他們的是道教。

道教源於道家，其創始人為老子，生於孔子時代，據說稍長於孔子。道家的哲學是探索自然，但後來的道教卻變成民間的宗教，與符咒、驅鬼、風水、占卜等混為一談，在以後的數世紀，與儒家爭竟。有幾個朝代，連皇帝及其它統治者都深受它的影響。

漢朝（主前 206 至主後 221 年）最後罷黜百家，獨尊儒學，按賢才取士，設立以儒家經典為主的官學，又立科舉，成為以後千百年來中國選拔人才的標準。

漢朝之後四個世紀，才有第一位宣教士赴華傳教。佛教在這時已由印度傳入中國，並且傳播甚速，很快成為一個勢力龐大的宗教。戴德生在中國時，常遇到那些穿著黃色僧衣、剃光了頭的和尚。然而佛教雖然流行，並沒有取代儒、道二教，中國的宗教往往是此三者的混合體。

最後，由於科舉制度的確立，成為大部分中國士人踏上仕途及獲得財富與社會地位的途徑。科舉考試的範圍，主要是儒家經典。當然，這種取人惟才的制度也有不少缺點，但大致上還算相當成功。儒家哲學在人倫關係上有極佳的理想和教訓，使中國有著安定的社會秩序，也帶來一定程度的興盛和繁榮。它推動各項文學活動，也極之推崇高雅的情操、舉止，以及禮儀和詩詞。

在清朝（1644 至 1911 年），中國文化開始影響及歐洲。羅馬天主教的傳教士把一部分儒家典籍翻譯成歐洲語文，他們所著關於中國的書籍，也受到普遍的歡迎。一般來說，傳教士的著作流露了對中國文化的欽慕，甚至感染許多歐洲人，因而興起了一降「中國熱」。當時歐洲的洛可哥式（Rococo）藝術就反映出中國的影響；有錢的歐洲人建造中國園林和庭台樓閣，在花園中種植各種中國花卉——牡丹、茶花、菊花、芍藥等等；中國轎子也很流行，還有中國的漆器、香燭、茶具、中國繪畫和中國式的牆紙等。

由於清朝時中西文化的交流，兩個世界的接觸日益頻密，中國的社會也就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更因為滿清統治者愈來愈腐敗無能，中國正面臨自古至今從未遇過的危機及劇變。太平天國的動亂正是一個例子。在這樣一個變動的大時代中，戴德生懷著興奮和希望來到中國。

第九章 初抵上海

踏入上海的碼頭，戴德生看到遠處飄揚著英國旗。他朝著國旗走去，來到上海的英國領事館。他希望在領事館內有他的家信，也盼望有差會給他的證明書。這樣他可以到本地分會領取一些錢。

「郵務處的辦公時間已過，你明天再來吧！」領事館的人員說。

戴德生惟有帶著推薦信到上海的倫敦會見麥都思教士（Dr, Walter Medhurst）。在英國向華傳教的宣教士中，麥都思可說是年資最深的了，他在上海也充當英國領事的顧問和翻譯。

領事館的職員把麥都思的住址告訴戴德生。他就沿著黃浦江的外灘走，然後往右轉，走過泥濘滿布的路，旁邊是很深的臭水溝。約走了一哩，便來到麥都思的住宅。開門的是個中國人，一句英文也不懂，但戴德生很快便從他那裡知道安都思夫婦不在家。

然而戴德生找到另外一位年輕的英國傳教士，名叫艾約瑟（JosePh Edkins）。他還把戴德生介紹給其他住在倫敦會宿舍的傳教士，包括在上海創辦了一所醫院的雒魏林醫生（Dr · William Lockhart）。

雒魏林說：「你不如暫時在我家住下來吧！」戴德生很感激，但也有點尷尬，因為身為中國傳道會的宣教士，卻需接受倫敦會的招待，實在說不過去。雒魏林也答應戴德生的要求，讓他分擔房子的支出。

同樣住在倫敦會宿舍裡的，有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包約翰（John Burdon）夫婦。當天晚上，他們邀請戴德生到家中晚餐。這對年輕的夫婦健談而好客，家中充滿溫馨，使戴德生有賓至如歸之感。後來包約翰成為聖公會第一位到北京傳教的教士，以後更成為香港聖公會的會督。

戴德生在中國的第一個晚上，就住在雒魏林醫生家中。從他的房間往窗外望，可以見到城外清兵與城內小刀會對峙之局。右面是滿清軍隊的營帳，左邊是上海縣城的城牆，上面掛著燈火，不時還可見到城上巡邏的守卒。雖然槍炮聲不住地響，但戴德生還可勉強地睡著了。黎明時一陣隆隆的炮聲，把窗戶也震得格格作響，但炮聲過後，卻是一陣晨鳥的清歌。戴德生走到窗沿，憑窗遠眺，清晨的玉米在田中搖曳起舞，園中的草木吐著新芽，樹叢中散發出來的花香，撲面而來，這是他在中國的第一個早晨啊！

早餐後，戴德生立刻前往領事館查看郵件，但只有一封信，是家中五個月之前寄出的，還有一份《海外雜誌》。至於中國傳道會則什麼消息都沒有。沒有錢，沒有郵匯，沒有指示，什麼也沒有。或許他們要等到他到達上海之後，才寄下指示和經費吧！果真如此，差會真是不懂為人設想，或者是太笨了！

那天下午，他到「敦費士號」取回行李，在碼頭上找來一批苦力幫忙搬運，成群結隊，行李在挑夫肩頭的竹杠上搖搖擺擺地在鬧市的街上走，由戴德生領著路，好不威風。

戴德生也參觀了倫敦會的醫院，聽麥都思教士用上海話對病人講道。麥都思熱烈地歡迎他，說：「你可以選擇學習上海話或者官話（國語）。上海話只用在本地，官話雖然在某些地方口音稍異，但全國通用。我勸你還是學官話好，我可以給你找個教師。」

戴德生回答說：「我想你的話很對，就勞煩你給我找個教師吧！」

接下來，戴德生要做很多事：找自己的房子，與中國傳道會取得聯絡，並向它支取費用，學習語言以及生活上的習慣，免得總是倚靠倫敦會和聖公會的朋友。

「沒有接到你的信，我十分失望，」他寫信給皮爾士先生，說：「但我盼望下次郵件到時，會收到差會的消息。上海現時十分不安寧，亂黨和官軍打個不停。……」很難租到屋子，連房間也不容易。空屋都給城中逃出來的商人住滿了……城中的傳教士也離開了，我現時暫在租界的友人家中棲身。如果不是雒魏林醫生的好意，我可能會一籌莫展。目前我真不知應做什麼。……」

第一個禮拜日下午，他和倫敦會的傳教士偉烈（Alexander Wylie）進城察看。偉烈知道中國人素來重視讀書人，所以他下過一番功夫研習中國經典，也寫過不少中文文章，試圖吸引中國人相信宇宙的創造主。跟他學習，戴德生覺得很興奮。

偉烈帶他去到縣城，指給他看城外的一排排破屋，告訴他中國人的生活有多苦。他又和守城的兵士說話。他們穿著滿是刺繡圖案的帽子，領上圍著紅巾，身上穿著顏色鮮豔的織錦，還有綠色的褲子和長靴。

他們進城後，偉烈有時會停在街上和行人交談，戴德生也幫忙分發單張，他們甚至走進寺廟跟和

尚談道。來到城內倫敦會的教堂，他們發覺裡面竟擠滿了人，原來麥都思正在內裡講道。之後，倫敦會的教士還分派白米給那些無家可歸的窮人。

在縣城北門外，他們看到一群人在歐鬥，一個死人被抬著進城。另一個的胸膛被槍轟開了一個大洞。戴德生替第三個人察看傷口。他的手臂被炮火打中，子彈穿過臂膀，連臂骨也折斷了。他痛苦地嚎叫，但除非把他帶回醫院去，否則戴德生也愛莫能助。

麥都思說：「如果我們在此為他調理，只怕有人會把我們的衣服都剝個乾淨！」

再行不遠，他們又見到兵士搶到一台大炮，另外一隊兵士則擄獲一批戰俘，拖看他們的辮子走。俘虜大聲地嚷著，向戴德生等求救，但他們也無能為力。

上海的其它傳教士多數來自聖公會或別的大差會，他們均受過高深的教育。只有戴德生的差會很小。它風聞太平之亂便倉猝地決定派遣教士來華，所以戴德生還來不及完成其醫學課程就接受差遣了。中國佈道會的樂觀及策略，在許多有經驗的傳教士看來，實在有點荒謬，有些甚至公開指責中國傳道會及其《海外佈道雜誌》。

戴德生也逐漸認識到中國傳道會的種種缺點，他本人亦因為差會辦事失效而受害。然而，他仍尊敬他的差會及其幹事，他敬重他們的靈性、他們對神的愛心，以及他們佈道和帶人歸主的熱心。

當時的上海還有不少歐洲人，他們發展工業和貿易，生活奢華。在戴德生眼中，部分傳教士也有「世俗化」的傾向，他們常和租界的官員和炮艦的長官往來，並且權充翻譯。這種社交應酬的風氣，令到這個在保守和嚴謹的循道會環境中長大的戴德生，時常感到驚訝。

雖然戴德生受過不少教育，人也聰明，但他並沒有大學文憑，而且還沒有拿到醫學學位。他希望從事醫療服務的工作，但他並非正式的醫生。他能講道和牧會，但他沒有受按立為牧師。雖然許多人硬要稱他為「牧師」，他卻一直拒絕接受這頭銜。從中國傳道會那裡，他每年的薪金只不過八十元，非常微薄。聖公會的單身教士每年薪俸是七百元，而且差會還替他們付房屋租金、醫藥費用，另外還有語言教師及書籍津貼。在這些同工之中，戴德生顯得頗有點寒酸。

當他整理行李時，發覺墨水瓶在旅途中打破了，把書籍和紙張都弄髒，而且海水也把鞋子和一些衣服弄壞了。「敦費士號」在回航中，於澎湖群島（Pescadores）附近觸礁而沉沒，船員則幸而獲救。

三月初，戴德生的中文教師抵達上海。他是北方人，每天教導戴德生官話，而戴德生則每天為他禱告，希望聖靈帶領他歸向耶穌。

四天后，師生兩人已經可以用最基本的中文對話。戴德生用中文與街上的士兵或店鋪的商人談話，他發覺自己已能勉強用中文跟人溝通。

當時負責圍攻上海縣城的清軍將領是吉爾杭阿（Koer hanger）。他下令封鎖城池，但城北接連租界，城內的人皆從租界的外國人那裡得到軍械和糧食的供應，所以封鎖是無濟於事的。而且有些外國商人更為城內叛黨提供經濟及各種援助，期望太平軍能取清朝而代之。傳教士則在城內分發白米和肉類，調濟貧苦大眾。

1854年4月4日，是上海史上有名的「泥城之戰」。戴德生早上就被槍聲吵醒了，他走出屋外，頭上飛過一枚炮彈，轟隆一聲，竟落在慕維廉牧師（William Muirhead）的屋牆上。慕維廉屬於蘇格蘭長老會，是戴德生來到上海後認識及仰慕的一位元教士。

清晨六時半，戴德生和慕維廉一起走過租界，來到黃浦江畔。滿清的兵船正在起碇，要沿江而下經過租界向南城進攻。英法兵艦齊起制止，但清朝水師並不理會，強要直駛蘇州河，引起一艘英艦發炮攻擊。

岸上英法領事也和滿清軍隊斡旋，要求他們的營寨和炮壘撤離租界。英國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並且派人送給吉爾杭阿一份最後通牒，說：「若果清兵在當日下午三時之前還不撤退，英國艦隊即派兵上岸；若到四時不撤，英兵便開始進擊，不再容情。」

下午三時，清兵還是沒有動靜。英美軍艦分別派兵士及水手上岸，搖旗擂鼓，並由阿禮國率領，一直操向清兵駐紮的跑馬場。

四時，戴德生聽到美國士兵那邊發出槍響，並且看到炮彈橫飛。果然，英美軍隊開始向清軍進攻。滿清士兵到處逃竄，然後戴德生又看到一片紅巾——原來城內的黨羽也趁機出擊，大殺清兵。

在此一役，英法軍隊大獲全勝，只損失了兩個兵士。當清兵匆忙逃竄之際，亂黨擁出城門，把清兵遺留下來的火藥槍炮，來個混水摸魚，搶掠一空。

可是，傳教士卻要承受後果。經此役後，清軍對外國人極表不滿，一直到秋天還不讓傳教士到城郊的村鎮傳教，也不准外國人在租界之外居住。因此，戴德生也不得不寄人籬下，在租界內倫敦會的宿舍裡繼續居住。

第十章 危險中的歌唱

正當戴德生執筆在信上向妹妹戴賀美傾吐時，他收到家中母親寄來的信。讀著，讀著，眼淚不禁流下來了。他多麼想念家中的親人啊；加上自己身體不適，雙眼紅腫，而且常有頭痛！人在異邦，真希望時時接到家書，但是父親卻從未給他片言隻字！

他又想：如果有個妻子，與自己分享人生，那會多麼好！他給戴賀美的信上說：「不知父親對史伊莉小姐的看法如何？……請代轉達我的愛意。」史伊莉（Elizabeth Sissons）小姐是戴賀美及韋瑪莉（戴德生從前的未婚妻）的朋友，在他姨母的一所學校教書。當戴德生探訪韋瑪莉時，她已對戴德生心動，常對朋友說暗戀著他。她也送給戴德生一些手繪的圖畫，彼此又互贈禮物。

她對中國甚表興趣。戴德生也曾盼望她有一天會嫁給他。他向她要了一束頭髮，並且小心地珍藏著。與此同時，他也向家人問及韋瑪莉的近況。他信上這樣說：「她也許會找到一個比我富有、比我英俊的丈夫，但能否如我一樣死心塌地愛她，則難說了。」

春天到了。上海的天氣逐漸轉暖，田野也脫下灰衣，換上綠裳。戴德生在日記寫著：「從屋子往外望，看見花園、玉米田、城垣、房舍，以及江上的船隻和帆桅，景致美極了！」數周過後，綠野上一片繁花，彩色繽紛，更是豔麗。

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城內的小刀會徒眾宣告：「他們會追隨太平軍，崇拜上帝，歸信基督。但小刀會的首領卻是吸食鴉片，而且不少領袖都是強橫無道。任意魚肉婦女，行為和基督教的教訓大相徑庭。他們回應太平軍，因為那時太平天國之聲勢正盛，謠傳他們正在揮軍北上，或者已經佔領北京。」

許多年後，中國傳道會的秘書長皮爾士也承認差會並不瞭解當時上海的情況，也不知道戴德生的

經濟窘境。戴德生總是把支出的項目詳細列明，說明他花用每一文錢之必要。他寫信給父母說：「差會應對傳教士有更多的供應，現在是入不敷出。我第一年的總支出大概在二百鎊之下。雖然如此，我相信在所有上海的傳教士中，每人每年的支出都在這數目之上。」

六月的上海，潮濕而炎熱。日間氣溫常在華氏百度過外，晚上也在八十度以上。在這炎夏裡，戴德生還是每天用五個小時來學習中文。他說：「我們都汗流如雨，象活在烤麵包房裡。……」

有時，他會跟包約翰與偉烈兩位牧師結伴到鄉間派福音單張和傳道。戴德生也帶備藥囊，在兩位牧師講道時，替人看病，甚至有時做一些輕微的手術。他在中國繼續讀他的醫學和做實驗，也念化學的書籍，又在醫院觀察病情，在旁留意醫生如何動手術。他的努力和研究終沒有白費，後來得到英國倫敦皇家外科手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承認，補發不足的學分。

戴德生的中文也有很大的進步。現在他已經可以自己到市場買東西，從容和店員對答，甚至討價還價。他見過中國的印刷工人怎樣工作，認為中國人頭腦靈活，做事簡單俐落。

戰事仍然持續，縣城內的土氣日漸低落。人們對以前信奉的偶像已失去信心，甚至把它們丟棄或送人。傳教士則受到尊敬，教堂也擠滿了人。看到這個情景，戴德生決意離開租界內雒魏林醫生舒適的家，到兩陣對壘之間的「無人地帶」尋找住所，好作傳教的工作。由於那個地區相當危險，而且受到戰火蹂躪，租金也較低廉。最後，戴德生找到一所合適的房子，每月租金八元。

那是一棟雙層的木屋，座落於上海的北門，共有十二個房間。戴德生打算住在二樓，把所有房間都洗刷一新，二樓用來做睡房、書房和飯廳，樓下則用作藥房、學校和教堂。

要把房子修葺、清潔和洗刷一新，真不是一件易事。他請了一些人來清潔，不過清潔工人來了，卻不工作，只觀看修理工人在砌牆。他把事情吩咐妥當，便離開一會，但回來只見他們有的在寫字，有的在抽煙，其餘的都在睡覺！最後，他決定搬來桌子和椅子，坐在房裡監督他們工作。

他對工人說：「把房子完完全全地清洗乾淨！」

他聽到一陣倒水聲和洗刷聲，跟著又靜下來了，他便起來看個究竟。

「為什麼只清洗外牆？」

「噢！原來你要內外全洗？」

「當然啦！」

於是，潑水聲、洗刷聲又再響起，直至出現一些瑣事，工作又停頓下來。如此這般，對戴德生來說，實在是學習忍耐的大好機會！

在 8 月 30 日，他終於搬進了新居。第一天早餐之後，他收到雒魏林醫生送來兩罐美味可口的辣果醬，稍後他又送來兩瓶甜酒。包約翰教他怎樣應付廚子，不叫他每天買菜時中飽私囊。

戴德生定了計畫，每天有兩次與傭人一起用中文禱告和讀聖經，也邀請鄰舍參加，而且人數愈來愈多。

不久之後，戴德生又辦了一所學校，開始時有十個男童和五個女童。初時主要由戴德生的中文老師負責教學；但數星期後，戴德生也參與督導學生的功課。每天他又替病人診病，逐漸學會用中文來交談，包括詢問病情和指導病人如何服藥。

他住的地方就在城外，和租界隔著一道城河，每天都是風聲鶴唳，相當危險。與租界相連的木橋，

晚上總是拉起，不讓行人通過。每晚，戴德生總不敢熄燈就寢，而且預備好一個浮水泡，隨時準備跳
水逃生。

九月中旬，戴德生、艾約瑟和另一位美國長老會的年輕傳教士郭達門（John Quarterman），一起沿
黃浦江坐船南下。他們帶了大袋的聖經及福音單張，發給碼頭和船上來往的旅客，希望這樣可以把福
音傳至一些傳教士去不到的地方。

當天傍晚，他們三人乘坐原船返回上海。途中要經過清朝的水師艦隊，難免有點擔心，因為夜間
水師怕有叛黨偷渡，時常不問皂白，便向夜渡的開炮攻擊。

艾約瑟建議說：「我們經過艦隊時，大聲唱詩，他們就知我們是外國人了！」

「好主意！」戴、郭二人同聲應道。

他們接近滿清水師時，便大聲高歌起來。經過了黑壓壓的一批船隻，相安無事，大家正預備彼此
道賀之際，船夫卻催著他們繼續大聲唱詩。原來剛才經過的船隊並非水師，現在才開始進入水師巡邏
的水域。

因此，他們繼續放吭高歌，唱的是「廣闊穹蒼歌」。但唱完最後一節，他們的船還是在水師附近。

「唱什麼？」，艾約瑟大聲喊著。「我們一秒鐘也不能停下來啊！」

說完，艾約瑟也來不及和二人商議，便獨自大聲高歌，是戴德生從未聽過的調子；那邊郭達門也
大聲唱出一首雄壯的美國歌，戴德生也惟有引吭高唱另外一首歌曲。三首不同的歌，加上船夫們大聲
喊叫，使戴德生禁不住笑起來。

「來人是誰？」水師船上有人大聲發問。

船夫大聲回答：「是白鬼！」

「大英國人！」戴德生和艾約瑟同聲應道。

「花旗國人！」郭達門也大聲喊著說。

水師沒有為難他們。艾約瑟和郭達門對於船夫以「白鬼」來稱呼他們，甚表不滿。船夫表示抱歉，說
「非常對不起，我們在惶恐中說錯了話。以後會小心一點，不再隨使用這些不禮貌的話冒犯你們了！」

第十一章 你的話是真理

中國傳道會終於答應給戴德生加薪了，從原來的年薪八十鎊，增加至每季六十鎊。可是，差會給
上海代辦的指示極為含糊，所以戴德生寫信向差會澄清一些問題，同時作出一些改革的建議。當然，
書信往返，需時數月。要做一個開荒的傳道者，沒有約伯的忍耐是不成的。在此期間，他發現他的第
二位中文教師江先生偷竊金錢，所以只有把他辭退。

是年秋天，霍亂侵襲上海，包約翰師母病在床，包約翰本人也感不適，所以戴德生常上包家幫忙，
好讓包約翰多些休息。終於，包師母在9月26日去世，喪事也由戴德生料理。包約翰陷在痛苦和孤單
之中，幸有戴德生時常陪他一起散步，儘量消解他的憂苦。

十月底，包約翰決定遷居，把屋子轉讓，便問戴德生要不要買。由於北門的住所愈來愈危險，每
天炮彈紛飛，不得安寧，再加上中國傳道會另外一位傳教士巴格爾醫生（Dr. William Parker）及其家眷
日內就要抵達上海，所以戴德生決定把房子買下來。

十一月，他搬進新的居所，但仍然在北門的房子與傭人及鄰舍定期舉行晚間聚會；他也在那兒用早餐，並且為病人贈醫施藥。

他不知道巴格爾醫生夫婦什麼時候才會抵達，但是只要居住問題解決了，就一切好辦。他更多得一位朋友和同工。他知道巴格爾乘搭的船「史維蘇裡號」(Swiftsure)已在途中，但卻毫無音訊。

清兵和城內亂黨的爭戰更加激烈，北門一帶也愈來愈危險，別無選擇之下，戴德生只好把學校關了，把家搬回租界的住宅。

十一月底，他有一天回到北門探訪舊鄰時，收到雒魏林醫生緊急的通知。便條說：「見字請即回租界來。」於是他立即打道往雒醫生家，發覺雒魏林正和巴格爾醫生一起午餐。巴格爾太太和孩子則尚在船上。

巴格爾醫生是蘇格蘭人，人挺精明。雖然他是由倫敦中國傳道會差派的傳教士，但他的薪俸完全由蘇格蘭格拉斯高(Glasgow)支會承擔。在這方面，可算完全獨立而不受差會管轄。他為人沉靜，卻有主見，他知道自己目標，並會儘量想辦法達成目的。當中國傳道會聽到太平天國的消息而大感興奮，趕著派他赴華，他當時就拒絕了，認為自己準備不夠。

戴德生和巴格爾在英國時素未謀面，雙方所知也不多，但兩人明顯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首先，巴格爾屬長老會，戴德生則認為自己不屬於任何宗派；其次，巴格爾是格拉斯高的執業醫師，有合格的資歷和文憑，而戴德生卻還未完成他的醫學訓練。但由於同受一個差會差派，又共同本著領人歸主的愛心而來到中國；因此他們縱然建立了同工的關係，但始終兩人不能成為深交摯友。

戴德生並沒有接到差會派遣巴格爾赴華的正式通知，也沒有收到差會寄來接待巴格爾一家的費用，巴格爾亦沒有給他寫信。正因如此，戴德生雖然預備了房間，卻沒有添置傢俱。由於巴格爾突然來到，房間還是空無一物，使他真有點不知所措。幸好麥都思夫婦樂意暫時讓巴格爾一家在他們的屋子棲身，才解決了居住的問題。但在其他傳教士看來，戴德生未為同工預備居所，顯然有點那個。這些責備和非議，令戴德生悶悶不樂。他讀到《海外佈道雜誌》中刊登倫敦會教士對他的批評時，憤然寫信給中國傳道會，說：「為了差會及《海外佈道雜誌》的聲譽，請勿刊登那些毫不負責的言論。……你們不應該責怪那些盡心接納和支持宣教士的人，卻不想想差派他們的，有否為他們設想。……」

耶誕節近了，戴德生寄給家人和朋友一大箱「禮物」其中包括一枚擊中他房子的炮彈。扇子、象牙珠子串成的項鍊、象棋、佛家、中國拼圖、掛鎖、茶盤、筷子、中國書籍、藥品、鍋子和圖畫等等。當然，他沒有忘記史伊莉小姐。他送給她一把摺扇和一個象牙雕制的算盤，還有新翻譯的書和聖經。禮物之外，當然更有款款深情，以及一紙充滿中國術語和幽默的信。信上寫道：「……汝化外之民，賴天子洪恩，在荒域、蕞爾之邦，得延殘喘。皇天上帝，超乎穹蒼，闔于海洋，助吾念汝，並獻禮品，願汝受之。……」戴德生日後縱在窘境之中，也從沒有失去他的幽默感。

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之後的十數年間，在五個條約口岸中看到外國人已是習以為常的事，而基督教的傳教工作也漸漸建立了基礎。然而中國內地各省對這一切仍感陌生。外國宣教士也很少敢到那些地方去。艾約瑟和戴德生則進入內陸一百哩，試試官吏士人有何反應，也看看那裡的中國人和軍隊是否敵視他們。

他們租了一只有篷的艇，又雇了三名船夫和一名侍役。英國聖經公會給他們準備了三千本新約聖

經，他們把聖經搬到船上，也攜帶一些藥物、醫療器具、食物、衣服和床單。

1854年12月的一個星期六清晨，他們便啟程出發，船上掛著英國的旗號。然而風向與水流使船寸步難行，所以他們吩咐船夫把船泊岸，然後二人提著裝滿聖經和單張的袋子，到沿江附近的小村落去傳道及分派單張。當風勢轉向，他們的船又再啟航。星期日早上，他們來到離上海三十哩的松江府下碇。

松江是個古老的城南。戴德生和艾約瑟上岸後，來到一座佛教的寺廟，那是人來人往、公眾聚集之地。由於來了兩個樣貌奇特的外國人，人們群起圍觀，興奮地跟著他們來到廟裡。艾約瑟用中文講道，戴德生則分派單張，而身穿黃袍的光頭和尚們則在旁觀望。

可是，當他們來到城中，有一群成人和男童開始擠迫並碰撞他們。艾約瑟帶著戴德生轉入一條橫街，朝著江邊的渡口走去，不料原來卻是私人碼頭。真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追來的人群看見兩個「番鬼」狼狽樣子，很是高興。他們更把碼頭的閘關閉，以免二人逃脫。江上有幾艘小船經過，戴、艾兩人大聲叫嚷，請求船夫載他們過江。可是無人理會，只逗得追來的人更大笑不已。但終於給戴德生跳上一隻沿江而過的小船，並把它強拉近岸，好讓艾約瑟上船。

船過對岸，兩人立刻沿江南下，趕回那泊在橋下的船去。但當他們走到橋畔，那些亂民已經追上來了。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戴德生看到以前被他解雇的中文教師江先生，他是城中頗受人尊敬的儒生，似乎對他的前任雇主並沒有懷恨在心。他看到這情形，就上前盤旋，一面使亂民冷靜下來，一面帶著二人離開險境。

戴德生和艾約瑟卻不因為這次經歷而氣餒。午飯之後，他們再次入城分發福音單張。

第二天，他們繼續行程，來到一個名叫嘉善的小鎮。他們發覺各府之間的聯絡與合作相當緊密。一個請求與他們同船的搭客，原來是松江府的差役，分明是監視他們的行蹤，同時他也要向嘉善縣丞報信。因此，兩位傳教士趕忙下船，希望在官府還未派人攔截之前，盡速分派單張。跟著他們的人如影隨形，用戴德生自己的話說：「一直在頸後噴氣。」

在嘉善鎮上，剛巧有一列人經過，他們看到兩個洋人迎面走來，便停下步伐。前面兩人拿著大銅鑼，後面跟著的人頭戴紅帽，手揮大旗。然後有人扛著一乘大轎，上面打著一頂大圓傘。

戴德生和艾約瑟來到轎前，轎上昂昂然坐著的竟是縣官大老爺。

「請問你們來此有問貴幹？」

他們把此行目的告知縣官。縣官說：「你們的東西我已讀過。但我想告知你們：要到嘉興府去實在是不智之舉。」

「但我們正是要到嘉興府去。」

「那麼，我會派人作你們的嚮導。」

嘉興是他們所到過最古老的城市，有近四千年歷史。他們的船來到太湖畔古時皇帝的一座行宮前停泊下來。戴德生替人診病，艾約瑟則宣講福音。人們乘船來看熱鬧，為船夫帶來不少生意。也有不少人，色括一些官吏、士人，也來和他們談論單張或書籍的內容，其中一人的帽於頂上有一顆晶瑩的珠子，看來是個高官。他壓低聲音說：「你們的書說得真對，裡面都是真理。」

兩天之內，他們返抵上海。雖然來回二百哩，但一切平安，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由於條

約所限，他們所到之處，最遠也只是離開上海三十哩。他們決定以後會更深入內地傳教。為此緣故，戴德中甚至用十二鎊買了一條連傢俱的舊木船。

前路看來充滿了希望！

第十二章 縣大老爺的款待

戴德生和巴格爾一家住在以前包約翰牧師的房子裡。晚上兩人常常剪燭夜談，直到深夜，商量中國傳道會在華事工的發展。兩人終於把計畫擬好，並寄給倫敦差會。他們的計劃很龐大，包括：一座醫院、一間學校、中國傳道會在華總部的辦公大樓、三四所鄉村學堂並附設診所、兩名中國傳道人，幫助戴德生巡迴佈道等。計畫書呈上後，循例是慢慢的等，然後英國總會多方辯論，再把結果郵寄到中國。

戴德生焦急地等著英國總會的音訊，也等待史伊莉小姐的回音。他從母親那裡得知她對他頗有好感，並且有共同的心志，所以他寫了兩封信，一封給史伊莉，另一封給她的父親，徵詢可否讓史伊莉前來中國與他一同事奉。他懇求她的父親允准，因為中國的婦女需要福音，戴德生自己也需要一個妻子。

1855年1月，中國傳道會的代表在倫敦會見了英國的外相卡靈頓爵士（Lord Clarendon）。他們說南京條約及其它條約雖保護英國商人，但並沒有給予傳教士同等的權利。然而1844年法國和中國簽訂的條約，則明言中國政府對傳教士和教民有保護之責；縱然英國政府通過最後的「最惠國條款」，取得其它中國給予別國的特權和利益，但在中英兩國互相簽訂之條約中，有關教士及教民的權益並未明載。中國傳道會要求英國政府與中國修約時，需將傳教士和中國信徒所有權利清楚列入條文之中，其他差會也對外交部作出同樣的要求。

卡靈頓爵士答應從詳考慮。他果然言出如山。在1858年的天津條約及1860年的北京條約中，他特別提出外國人可自由進入中國內地以及容許基督教傳播的要求，同時教士和教民皆得到官府的保護。

可是，在1855年之際，一般中國政府官員仍是依據南京條約，禁止或拘捕那些離開五口，進入內地的外國人。雖然如此，還是有不少洋商私運商品進入內地，也有傳教士到內地傳教。戴德生和巴格爾及其餘教士作過多次嘗試，發覺地方官吏和居民雖不表歡迎，但通常都相當容忍。不過有一件事仍然攔阻人們接受福音，那就是中國人常把英國人和鴉片販子混為一談。

現在上海縣城已被清兵及法國軍隊重重圍困。城內的小刀會徒眾議論紛紛，焦急如焚，大概不能再支撐一個月之久。其餘各地的情勢也相當不穩，太平軍頻傳敗績，但乘機起義的民眾還是很多，滿清腐敗無能，也無改革奮起之象。這時，戴德生對太平天國也改觀了。他給母親的信上說：「我恐怕他們（太平軍）得勝，會遭禍更大。他們錯謬得很，欺詐哄騙之事層出不窮。」

戴德生、偉烈和包約翰取得一個早期的准許證，又結伴到內地傳教。他們往西南而行。在1855年2月的一個星期日早上，來到一個山坡上，坐在一座殘破的塔前一邊休息，一邊唱詩和讀經。但當他們回頭一望，只見遠遠上海城那邊升起一陣濃煙，原來上海城已經失守，小刀會黨徒到處記憶亡命逃竄。

三人立即起程回去，到了南城，發現城門已被攻破，城內一片煙火和敗瓦殘垣。戴德生嘗試點數那些無頭屍體，但怎也算不清楚。平時熟悉的地方現在已面目全非，難再辨認。婦孺遭害前都被剝光

了衣服，死後赤條條的躺個滿地。有些民眾也趁機向小刀會黨羽及他們的家人展開報復，大開殺戒。現在上海一片寂靜--死亡的寂靜！

當上海人在灰燼與瓦礫中重建他們的家園之際，外國傳教士也重新整頓一切。雖然還未收到總會的回音，戴德生與巴格爾已著手物色地方，準備建築醫院和辦公大樓。中國傳道會管理不善，行政全無效率。有人對戴德生說：「年輕的差會總是把工人摔在工廠內，便不理他們的死活。」或許因為這樣，住在英國赫格萊（Hackney）的布迦先生（W T Berger）捐了十鎊給中國傳道會，但指定要寄給戴德生和巴格爾使用。他們用這些錢來幫助一名貧苦的中國學童，並希望由此開始，日後在上海開辦一所學校。

1855年4月，戴德生又和包約翰雇了兩艘船沿長江而上。他們進入長江水域後，就囑咐船夫靠岸，好讓他們到北岸山嶺的鄉村傳教。

村野非常肥沃，春風吹過，豆田上盛開的花朵隨風起舞，搖曳生姿。他們看見五座連綿起伏的山巒，最高的巔上有座粉飾一新的塔，在山麓處有座宏偉的佛教寺院，房舍庭樓，蜿蜒而上，頗有氣勢。

山坡上岩石嶙峋，中間有花木和野草點綴。在攀山的時候，戴德生發現樹色繽紛，深沉鬱鬱的柏樹和輕盈有致的楊柳，摻雜於橘樹、臘松之中。山徑的每個轉角處，則有寺院飛簷，或者庭台樓閣。

來到一所寺廟，他們看到一群工人正忙著替菩薩粉刷和鍍金，有過千穿戴整齊的信徒正在聚集獻祭。戴德生和包約翰看到幾百個粉飾一新的偶像，還有香火瀰漫，白煙繚繞。街道上到處是人，銅錢丟進罐子發出咚咚的響聲。人們的談話聲，還有幾百隻足踏在地上的嗒嗒聲，交織成一片。

最後，他們來到山巔的塔上，從塔頂俯視，風景美極了，戴德生想：「大自然正在崇拜那位造物主，但人們卻拒絕他。」

山頂上天朗氣清，他們在望遠鏡裡也十分清楚看見其它四個山峰的景物。山嵐下一片春雨後的青綠，一行行的桃樹、杏樹、梅子、蘋果及櫻桃樹，被一一列列的麥田圍繞著，麥子已長出了嫩芽。每塊田之間種著垂柳。農舍也用柳枝作籬笆，而柏蔭深處卻是幾處墳丘。村野之外，則是蜿蜒流過的長江，寬約十五至二十哩；長江對岸是佛教的聖山，佈滿了寺廟和僧舍，至於西北遠處就是通州。

從山頂下來，途中遇到一個和尚，他請戴德生到他廟中一行，並叫戴德生在菩薩前的圍團上跪下焚香和捐獻。戴德生立刻站在圍團上，用官話大聲指出拜偶像的愚拙。他也向圍著的人群述說神的大愛，然後包約翰則用上海話講道。兩人從和尚的眼神中，看出他們大概明白二人所講的道理。

「如果我們所言有違真理，請不妨直告！」包約翰說。但無人上前發言。

他們於是回到船上，決定明天往通州去。通州是有名的「魔鬼之城」，城內居住著各種不法之徒，對洋人尤其不友善。

翌晨，天氣悶熱而潮濕。兩位中國教師極力勸阻戴、包二人前往通州。

「你們留在船上吧，」兩人對惶恐不安的中國教師說：「如果晚上還不見我們回來，盡速調查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儘快把一條船開回上海，留下另一艘船在這裡。假如我們今晚不能回來，我們會稍後跟著你們回上海的。」

於是，戴德生和包約翰帶著一個僕人和許多的書冊，直奔通州。由於路極難走，他們便租了兩輛由苦力推動的單輪人力車。

走了不遠，僕人便央求他們放他回到船上去，因為他也聽到通州亂民的消息。兩人答應了他的懇求。就在這時，來了一個衣冠整整、道貌岸然的人，對他們說：

「請你們不要到城裡去，倘若不聽勸說，你們便會發現通州的人是怎樣，到時只怕後悔莫及。」

「謝謝你的好意，但我們已決定要去，你的好意只好心領了。」

過了不久，戴德生的車夫又說他不敢再向前走了，戴德生只好另亡命雇一人，多付了一筆不菲的費用。

當他們來到城外不遠，他們吩咐車夫暫停稍等，二人先步行進城看過究竟。人們看到他倆皆議論紛紛。由於他們一身黑衣服，人們背地裡都叫他們做「黑鬼子」，而非「白鬼子」。想來倒覺有趣！

他們來到西門時，一個彪形大漢迎面而來，他酒氣噴人，看來是喝醉了。他抓著包約翰的雙肩，使他掙也掙不開。這時圍攏了十餘人，個個橫眉怒目，把他們推推拉拉的擁進城裡。

「我們要見知縣大！」兩人大聲說。

「我們自然知道要帶你們到那兒去，並怎樣發落。」他們說。可能以為他們是「長毛」（即太平軍）吧。

那個剛才抓著包約翰的大漢，現在已經放開他，卻來對付戴德生，幾次把戴德生打跌在地，又拉他的頭髮，而且抓住他的衣領，幾乎使戴德生透不過氣來。他的手臂和肩膀，也給抓到又青又黑，煞是疼痛。

包約翰並不因此稍感氣餒，他還向前進，並試圖分發單張及小冊。這使那個為首的彪形大漢更為惱怒，喝令拿手銬來，幸好不曾帶備。但包約翰也只得暫時不再分派單張。

稍後，這些人又爭論起來了。

「帶他們去知縣老爺的衙門吧！」較為溫和的人說。

「宰了他們！」有人激動地大聲嚷著說。

當他們把兩人圍在一起時，戴德生對包約翰說：「我們要記得使徒因配為基督受苦而歡喜快樂。」

他把手伸進袋裡，拿出一張紅紙，上面寫著他的中文名字。這些人看見了，對他們的態度便稍為恭敬一些。

戴德生說：「把這份名帖送到本地的長官那裡，立刻帶我們去見他。」

他們被帶到一座官邸時，戴德生和包約翰都已身疲力竭，汗濕全身，上氣不接下氣了。戴德生倚著一堵牆，說：「請給我們兩張椅子吧！」

「等一等！」那些人說。

「那麼，請給我們拿點茶來！」

「等一等！」

圍攏的人愈來愈多，包約翰經過一陣子的休息，又再提起精神向他們講道。

他們的名帖及書冊都送到一位官員裡。這位官員讓他們等了好久後，才說要把這案子送交城內另一位長官辦理。

當戴德生及包爾騰聽到這消息，不禁板著臉說：「我們不會再多走一步了！給我們拿轎子來！」

經過商量，他們果然拿來兩乘轎子，並抬著他們走過市。

人們議論紛紛。戴德生聽到有人說：「他們不像是壞人哩！」戴德生在日記裡寫著：「他們好象相當同情我們。」

最後，他們來到本地縣官的衙門。穿過兩重大門，便看到一塊大匾，上面寫著「為民父母」四個大字。

他們再次把名帖送進去。之後，就被帶到一位叫做「陳大老爺」的面前。他穿著官服，頭上戴了朝帽，頂上鑲著一顆深藍色的珠子。侍從見到他，立刻雙膝下跪叩頭，並且示意兩名洋人跟著他們行禮。但戴德生和包約翰沒有照看做。幸而這位陳大老爺以前在上海做過官，知道條約和外交禮儀，所以對他們相當客氣。他和他們談話，又把他們帶進內廳，其它官員、侍從也魚貫跟進。

戴德生的官話說得比包約翰好，所以主要由他應對。他向各官吏解釋此行的目的，並請求容許他們分發書籍和單張。他也把一些書冊送給官員。陳大老爺接過一本新約聖經和一些單張，並向戴德生道謝。戴德生嘗試把基督教的道理簡單地向他們介紹，他也耐心而有禮貌地聆聽。之後，陳大老爺吩咐人準備點心，又和他們共席。

他們在陳大人的官邸逗留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然後，他們請求進城觀光，並分派剩下來的冊和單張。陳大人批准了他們的請求。

戴德生望著這位中國官員的雙眼，堅定而有禮的說：「我們進城時，受到無禮的對待，但我們也不追究，因為那些人不知所以。不過，我們並不希望再次發生這樣的事，所以請你傳令下去，免致我等再受凌辱。」

「自應如此。」陳大人答。

他親自把他們送到衙門的大門，並下令走卒替兩人開路。於是，戴德生和包約翰很快就把書冊分派完了。他們看見衙卒走在前面，當人們集攏，把路堵住的時候，他們就拿起掛在頭後的長鞭去驅趕人群，如同鞭子一樣，煞是有趣！其中一位官員更伴著他們來到河邊他們的船上，才告辭離去。進城前後，他們受到的待遇，簡直有天壤之別，身價也自是不同！

第十三章 在中國的遭遇

不久之後，戴德生又再計畫另一次內地旅行。英國聖經公會極為支援，不單願意提供大量的聖經，而且答應資助大部分的旅費。

這次旅程仍是乘船沿長江而上。船到了長江口張家市——它是從沒有外人到過的地方，戴德生便下船上岸。人們看到這個能講官話的洋人，很是震驚。當他拿出懷錶來看時間之際，大家便展開一場激烈的辯論。

「我從未看過這樣的眼鏡！」一個人說。

「廢話！」另一人說。「那不是眼鏡，其實是個千里鏡。洋人最擅長造這些東西。」

「不是的。」第三人說：「那是一個時鐘。每到一個鐘點，它就會響。這個洋鬼子鼻上架著的才是千里鏡，不是眼鏡！你們是多麼無知！」

但當戴德生來到市內一座舊官邸參觀時，他也覺得有許多可以學習之處。他看到客廳進口的地方，懸著一幅中國書法，寫著：「道德為快樂之進階」，想著頗有道理。

當戴德生把一些書冊送給一位老人時，他說：「我也有一些書回贈給你。」他送給戴德生一套包裝精美，共有十冊的叢書，內容豐富，包括天文、曆算、輿地等項目，可稱中華文化及智慧的寶藏。

老人坐在椅子上，倚著身向戴德生說：

「我有一個極妙的見解，很樂意告訴你。現在世界上的三個強國——英、俄、中。皆不知有此發現。所有哲人，包括孔夫子，也都不知。這項真理世上只有一人知道，那就是我。現在我已八十高齡，就讓我告訴你吧！」

戴德生等待著，渴望知道這位老人的智慧。

老人嚴肅地說：「太陽是不動的，地球則環繞著它轉動。」

戴德生忍俊不禁，但仍極力保持禮貌的笑容。

「我相信你是對的，」他說。二人因此成為好友。

翌日，戴德生又回到這位老者的家裡。

老人對戴德生說：「耶穌是你的聖人，孔夫子則是我們的聖人。」

戴德生說：「耶穌並非英國人，他生於一個名為猶太的民族中；但他不單是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所合為一的。」老人聽得有點愕然。

戴德生繼續用耶穌所行的神跡和復活的事情，說明耶穌的神性。老人也耐心地聽。

「數周後，我會到上海探望你，」他說：「現在這段時間，我會閱讀你送給我的書冊，請你也一定要讀我送你的書！」

1855年5月21日，戴德生在長江入口西面一個名叫青島沙（音譯）的小島上度過他的二十三歲生日。那裡的人講官話，所以戴德生在講道上無礙，而且他已經習慣用筷子吃飯，其他的西洋習慣也逐漸減除了。他的艇夫對於他能適應中國的一切，很覺高興。

他們說：「你應該把前額的頭髮剃掉，換上中國的衣服。」

但你卻不能改變眼睛和鼻子。」一個人沉吟地說。

到了傍晚，有人請他開方醫病。消息傳開了，他還來不及上船，已有百多人聚集等候，過半的人都得著診治。

在這次旅途中，戴德生買了一隻母貓及兩隻小貓。因為上海的老鼠實在厲害。偷吃他的蠟燭，又在夜間跳到他睡的床上來。有了這三隻貓，既可對付猖狂的老鼠，也可作個伴兒。

戴德生看見一些本地婦女，令他不禁時常想起妹妹戴賀美，也想念史伊莉。他想：差會的供應既如此不可靠，我怎可以結婚呢？我真希望能在倫敦修完醫學課程，如果拿到文憑，我便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份年薪三百鎊的工作，同時兼任傳教士。

1855年6月，戴德生、包約翰和巴格爾三人又結伴到寧波去。寧波是五口之一也是個傳教重鎮。這是戴德生首次訪問寧波，但他並不知道該地對他日後有著很大的影響。

寧波是個美麗的城市，有美輪美奐的寺廟和花園，又有宏偉的大宅，城的中心還有一個象月亮般的湖。街道清潔而寬敞，沿著海岸是蜿蜒有致的河流，從北到南，繞城而過，活象天然的護城河。城建在一個盤地上，外面群山環抱。城中還有一堵內牆，是用花崗石頭建的，作防衛之用，1841年英國的軍隊用炮火攻擊，也沒有把它損毀。城中的居民多數受過很好的教育，待人彬彬有禮。在這裡的

傳教士，許多後來都成為戴德生的好友。

最早在寧波傳教的外國教士是美國浸信會和長老會差派來的馬高雲醫生（Dr·Daniel Macgowan）和麥嘉諦醫生（Dr·David McCartee）。另外還有一位個性極強的英國婦人歐德絲女士（Mary Ann Aldersey），在 1843 年來中，建立了一所學校。她有兩位年輕可愛的女教師幫助她，就是戴雅姊妹，姐姐名寶麗娜（Burella Dyer），妹妹名瑪莉亞（Maria）。這兩姊妹的父親就是 1827 年到檳榔嶼傳教的戴雅牧師（Samuel Dyer），後人推崇他是「其中一應最有果效的宣教士……是神的人！」

寧波城中還有英行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的陸賜牧師（William A·Russell）（後來升任為首任的華北區主教），以及兩位翻譯聖經的能手：郭保德（R·H Cobbold）和高富（Frederlck Gough）。至於另外一位著名的美國長老會教士丁韋良（William A·P Martin），則在 1850 年抵達寧波。他在中國生活了五十七年。

馬高雲對戴德生、巴格爾和包約翰極表歡迎。翌日則由高富帶領他們到城中各處參觀遊覽。但數天之後，他問突然接到上海寄來的急情，說包約翰的兒子患了重病，戴德生便陪著他的老朋友，不分晝夜地趕回上海。然而過了兩三個星期包約翰的兒子終於不幸去世，戴德生再一次成了包約翰困苦中的安慰。

寧波的外國傳教士和商人正式邀請巴格爾到該地作他們的醫生。巴格爾和戴德生對於那裡的外國傳教士印象極深。雖然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差會，但相處得非常融洽。戴德生寫信給家裡說：「我當然希望有一位可以商量、可以傾訴，又可以彼此功勉的良伴。」然而巴格爾並非這樣的一位摯友。他雖然和其他人相處得不錯，但慣於我行我素，自己有自己的打算。他接受了寧波的邀請，在第二個月就南下，留下戴德生一個人在上海。

在七、八月間，戴德生每天都和三十至四十個教師、僕人和其他人一起用上海話聚會，但自從一位鄰居因霍亂去世之後，他就特別注重宣講悔改和救恩的道理。

「耶穌為你們死了，叫你們的罪得贖。你們中間誰曾經向神祈禱，要他赦免你的罪？」他停了一刻，沒有想到有人會回答他。

「我有，」貴華悅。貴華是廚子，很年輕，就是那位接受布迦先生資助，得以繼續學業之學童的兄弟。

在戴德生日後的信裡，提到貴華時，說道：「他雖然有不少缺點，但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後來貴華成為戴德生在華的第一個果子，由戴德生施洗入教。戴德生寫信給母親說：「如果一個靈魂勝於世界，我已得到了豐富的報酬，您不是也同樣受惠麼？」

麥都思向戴德生建議，他到內地和鄉間傳教時，最好改穿中國式的服裝。他在 1845 年到種茶的山區時，就換了中國式的衣服。許多天主教的教士也時常換上唐裝。

自從長江遊歷回來之後，戴德生也常常這樣想。他不是有意要隱瞞身分，他之所以想改穿中國服飾、說中國話及象中國人一樣地生活，是出於對中國人的敬重。但他知道外國商人會嘲笑這樣的服裝，認為那是「降格」，甚至不少傳教士也會有同樣的看法。

7 月 27 日，戴德生毅然作了一項重大決定。他要到鄉間租一座房子，開始他的醫療及傳教工作，並且穿中國式的服裝，還留了一條辮子。如果這個嘗試失敗，他會到寧波去和巴格爾會合。所以，他

先定造一套中國衣服。

九月，戴德生和巴格爾終於收到中國傳道會有關在上海建辦事處的回音。這時，兩人都已猜到結果。差會的信說：「我們的目的並非在條約口岸工作，而是進入內地，……我們不擬花這麼多錢在上海。」雖然差會的行政效率是如此差勁，但堅持這樣的政策是否對呢？許多在上海的人認為這樣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但戴德生願意嘗試一下。

在一個炎熱的夏日，巴格爾從上海寫信給差會的秘書長皮爾士，說：「差會的原意雖然很好，但似乎不明白一點：在這個時候到內地去傳教是不可能的事。」這位嚴峻的蘇格蘭人並沒有抨擊差會，但他說：「遠在千里之外的人怎可以瞭解這個國家當前的狀況，又或者知道那條才是最好的路徑？」

當巴格爾寫信向差會報告情況之際，戴德生正在樓下調混一些化學藥品，作染髮之用。他想待頭髮長了，便紮成辮子。他把一大瓶阿摩尼亞從壁櫥上拿下來，由於天氣很熱，室內氣溫很高，故此他小心地弄開瓶塞，但仍然稍一不慎，瓶子內的壓力實在太大，把瓶塞彈開了，瓶內的阿摩尼亞液體和氣體便噴出來。戴德生在忙亂中只有用手塞著瓶口，但阿摩尼亞液仍從他的指縫中噴出來，射得他滿頭滿臉，連眼睛、鼻孔、嘴巴、頭髮和衣服都

是，那些泡沫幾乎叫他窒息。

他亂跑亂撞，眼睛不能看見，但終於跑到廚房裡，把頭伸進一大缸清水中，水淹蓋了他的頭，甚至雙肩和臂膀。這樣才救了他的性命，他繼續把頭伸進水中，感到全身發燙。當他透過一口氣後，趕忙呼喚僕人。

「快叫巴格爾醫生來！」他大聲說。初時由於頭腦不清，他說的是英語，跟著鎮定下來，又用中文重複這句話。

然而，巴格爾已經聽到亂嘈嘈的，趕著跑下樓來。當他看見滿臉發腫的戴德生，幾乎認不出他來。他立刻用蔥麻油塗在戴德生眼上和臉上的患處，然後給戴德生一劑鴉片，作為麻醉藥。但戴德生感到甚難下嚥。之後，他把戴德生雙腳浸在熱水之中，又用冰敷在他臉上。最後，他又吩咐那些在旁焦急不安的僕人幫忙他，把戴德生移到床上躺下。第二天，巴格爾還是不斷地替戴德生敷用冰塊。戴德生痊癒之後，對此事印象極深，多次提起它。

第十四章 打破藩籬

阿摩尼亞意外事件發生後五天，戴德生又重新投入工作。可是他和巴格爾一家這時卻接到倫敦會的通知書，請他們早日遷出，因為倫敦會的一個新傳教士及其家人快將抵達。

巴格爾已經準備南下寧波，他也請戴德生同行至少一段路。戴德生亦想趁機試試他的中國式裝扮：他留了一個月的頭髮，已經可以結辮子，同時定造的中國衣服也已送來。他想知道中國人及歐洲人對他這樣的大膽行為會有何反應。

首先，他去租船。當他聽到上海縣城南門附近有一所中國式的四房大宅出租，便先付了六個月的租金，並獲准在十天之內遷進去。

那天晚上，他召來一個中國理髮師，而且雇用他隨船南下，每天好替他梳理那條不容易結的新辮子。

第一次剃頭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在大熱天皮膚都出了痱子。再加上五、六個小時的染髮，更加難受；最後由理髮師把後面的長髮結成辮子，這個痛苦的大工程才算完成了。

翌日，戴德生換上新裝。首先穿上厚底的粗棉布襪，毫無彈性。然後穿著那寬闊的褲子，大概比他的腰要寬兩尺多，但他把它折起，用堅韌的腰帶束在腰前；褲腿兒寬大，象兩個漲起來的大圓筒。他把褲角兒放進襪口內，然後用有色的襪帶紮好。之後，他穿上一件棉紗的衫，在外再加上一件相當重而鮮豔的絲袍，袖子寬而長，手指外還有十二至十五吋的布，戴德生好不容易才習慣把袖子折起來，好運用雙手。最後他穿上棉布鞋子，鞋尖上蹺，但總算夠大。

巴格爾上下打量著他，最後眼睛停在褲子上，微笑著說：「你可以把兩個星期的乾糧貯藏在褲腿兒內。」

兩人一齊來到碼頭。巴格爾象往常一樣地自信，戴德生則好象有點不自然，極力嘗試習慣這一身的打扮。舟子、理髮師和僕人都已經在船上等候，巴格爾一家的行李也已搬到船上。一個信差遞給巴格爾一張字條，上面寫著：「今代合信牧師（J Hobson）送給開辦寧波醫院使用。這筆款本是為了開辦上海醫院用的。——你們的一位朋友」其實，這位朋友就是合信本人，他是上海英行教會的牧師，他的贈款有一百大元。

他們啟碇，向南進發。經過四天，才抵達杭州灣，在沿岸的城鎮停了一會，派發聖經和福音單張；巴格爾則在船上診治病人。

到了甘浦（音譯），戴德生要在此和巴格爾一家告別。巴格爾想租另一艘船南下，船夫要先收租錢，大家爭持不下。戴德生怕船夫會欺騙巴格爾，故此大力爭論。

「我怎知道你們過海之後會否付錢給我？」船夫說。

巴格爾的僕人答：「我們三人都是耶穌的門徒，所以我們絕不欺騙和說謊。那位醫生說過就必定做到。」

巴格爾和戴德生不禁大樂，這是他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僕人對耶穌的信心。價錢講定後，巴格爾便乘船而去。

現在剩下戴德生孤身一人了。他還是穿著中國裝束，乘船返回上海。沿途他的船會經過幾個市鎮，戴德生到了第一個鎮時，便下船往城裡一逛。沒有人注意到他，直至他開始派發書冊和替人診病，人們才知道有一個洋人在他們中間。他們問他從何處來，消息很快傳開了。開始時有些人對他很不禮貌，但他的醫術很快改變了他們的態度。由於他的裝束，連婦孺也樂意前來接受他的診治。所以，他覺得如果要到內地傳教，穿上中國服裝絕對會有幫助。

回到上海後，他寫了一封信給母親，信上說到他內心的一點感想：「我一定要等候神，相信他，那便凡事順利。我想我比以前更加愛他，並希望按他旨意更多的服事他。雖然我是那麼不配，但最近我的靈性有多次更新而奇妙的經歷。」又在寫給妹妹戴賀美的信上說：「神的愛真是奇妙難測……巴格爾醫生已經到了寧波，但我卻不孤單。我確實感覺到神的同在，是我以前未曾經歷過的。這種祈禱和儆醒真是蒙福，也是必須的。」

當然，他的腦海中還有別的想法。郵差帶來文伊莉及她父親從英國寄來的信。史伊莉給戴德生的信已經不存，但據戴德生自己說：「一切令人滿意。」然而她的父親，就象韋瑪莉的父親一樣，首先支

支吾吾的講了一大段廢話，戴德生記述說：「然後他說，如果我在英國或附近工作，他就不會反對我和他的女兒來往。」可憐的戴德生！他只能把濃濃的感情向妹妹戴賀美傾訴：「你是我最親愛的妹妹！……實在沒有言語可以描寫這份濃厚的深情……」

他在南門租的新房子已經裝修好了。樓上兩個房間，樓下也有兩個房間，天井外是廚房。地板是硬泥和碎磚，有點兒潮濕；牆則用木板打成，有不少裂縫，風吹進來時會嗖嗖地響；天花板是薄薄的瓦片，毫無裝潢。但房子還好。以中國傳道會給他這樣的薪金來說，他最多也只能負擔這樣的房子吧了！

現在他每天都穿上中國服裝，而且留了一條長長的辮子。上海的洋人對他的反應，可以在伍喀克（George Woodcock）所著《遠東的英國人》（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一書中看出端倪，書上說：「有些人相信人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他們跟著字面的意思，便產生一些大英社會所不能接受的生活行為。大班及其它人都相信：白人的尊嚴跟他們的服飾和習慣是不可分割的。故此戴德生的舉動令人十分震驚，他竟然變成本地人，丟了英國人的臉，打破了白人的團結精神，把他稱為『賣國賊』也絕不為過。」

戴德生認為改換服飾是尊重華人和本地文化。雖然歷代以來也有不少前例，但一般洋人還是覺得此舉有點過分。

可是，戴德生也得著一點報償。英國的布迦先生寄來一封信，內中附了兩份禮物：其中一樣是十鎊的銀票，用來資助戴德生所收養的那位學童，而且答應每隔六個月定期寄來相同的款項；另外是四十鎊，任戴德生隨意使用。布迦先生時常地把錢匯給戴德生，這種習慣表明他及其他的人似乎對中國傳道會已經失去信心。

每天，戴德生都抽一段時間來教導三位慕道友。他們是貴華、小徐和阿錢。他也在屋內講道，有時到上海的街上佈道，小徐偶爾亦幫忙他傳講信息，而貴華和阿錢則請人受洗入教。然而，戴德生只是把上海看作立腳的基地，若有可能的話，他總想快點到內地植根。

十月，戴德生帶著貴華和阿錢到長江口的崇明島去傳教。他們在那裡租了店鋪樓上的兩層樓，來開始工作，裡面共有六個房間。他們先租一個月，房子看來很理想，可作宣教及診所之用。戴德生給母親的信上說：「我真希望您來此看看，我在這些人中有多舒服！」

當他們回到上海購買物品及增補藥物時，他們接到有好有壞的消息。好消息是布迦先生又再寄來五十鎊，壞消息是崇明縣衙門送來一份公文，控告戴德生及同人在島上租用民宅的。後來，英國領事阿禮國還因為這件事召見他們，想查明此事。

阿禮國說：「恐怕我要下令禁止你在崇明島上居住。如果你不聽從，則需罰款五百鎊。」

戴德生知道如果他不放棄租用的地方，一定會為他的中國友人帶來更多的麻煩，所以他只有依著領事的話去做，但是他覺得阿禮國的處事並不公平，因為法國的傳教士已經在島上建有一所天主教堂。依照南京條約及後來所附加的「最惠國待遇」條款，他也應該享有法國人一樣的待遇。

六個星期後，他不得已只得離開崇明島，鄰居都依依不捨，並說：「請再來，再來呀！愈早回來愈好，我們真捨不得這樣一位好醫生和天上的信息！」

戴德生回憶道：「我真捨不得離開他們。我一直希望在那裡建立良好的工作。種籽都已撒出了，書籍也已送到人們的手裡。現在只有求主作工，願他看顧他們！」

不如意事常發生。戴德生從崇明島回來，就接到史伊莉的信。她說她擔心自己不是真的愛他。戴德生回了一封長信，嘗試去證明她的憂慮是多餘的。他內心交戰，與自己分辯說：「如果她不愛我，她就不會擔心自己是不是真的愛我了。」

後來，戴德生又收到托頓咸的老朋友史蒂絲女士的信。她聽到戴德生被上海英國領事逐出崇明島的消息，很為戴德生抱不平。她認為他應該學象使徒一樣，不怕威脅，拼命堅持。但史蒂絲很支持戴德生的做法，她說：「聖經告訴我們，如果在這個城中有人逼迫你們，就逃到另一城去。所以你做得很對。」布魯街教會的這位老臣子也給戴德生帶來一些令他極為安慰和鼓勵的話：「親愛的弟兄，神叫你在托頓鹹教會做一個特別的位置，使我們不會忘記為你禱告。我們在代詩中最常提起你……在主裡與我們共用榮耀的弟兄……在他有極豐富的應許，可以勝過一切！」句句都是戴德生需要的說話！

在倫敦方面，中國傳道會也代戴德生向政府提出交涉。在《海外佈道雜誌》中有一篇文章，力責英國領事「違反法律，因為戴德生住在崇明，並不屬於英國領事所管；如果戴氏自己願意冒險，領事實在無權干涉……根據條約每個英國人應該有權象法國天主教士一樣。此事非同小可，英國政府應該有個明確的交待。」

雖然中國傳道會的辦事效率差，又不可靠，但還是有著很大的影響力。董事會的座上有卡繁侯爵（Earl of Cavan）和兩位國會議員，還有一位男爵及一位日後成為立本（Ripen）主教的，他們的名字都為外相卡靈頓爵士（Lord Clarendon）所素識。所以對中國傳道會的抗議，外交部不能置之不理。

第十五章 快樂的日子

「他是一位難得遇到的聖徒，全心全意尋求神的榮耀。他的秘訣是人所共知的：恒切禱告，再加上鐵般的身子和堅強的心志，使他朝著目標，毫不動搖。」戴德生在給母親的信裡說。

戴德生終於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是英國長老會差派赴華的首位傳教士賓惠廉（William Bums）。他比戴德生年長十七歲，基督徒對他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詳。1839年蘇格蘭的奮興運動，也是他充滿力量的講道所帶來的結果。他曾經在愛爾蘭和加拿大宣教，用他的幽默和智慧，在露天廣場中對許多人講道。

他在1847年來到中國，學會了一般老百姓所用的語言，並且編了一本通用的聖詩，也翻譯了《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在替英國長老會做了幾年開荒工作之後，他想到南京在太平軍當中傳道，但和其他人一樣，沒有顯著的成果。

1855年他來到上海後，就住在一隻船上。雖然他的頭髮已經灰白，但還象年輕人一樣精神飽滿，充滿傳道的熱情。他和戴德生一見如故，十分投契。戴德生時常到他的艇上探望他，他也經常到南門戴德生的住所講道。

從賓惠廉那裡，戴德生學到三樣功課。這些功課好象思想的種籽，對於他將來建立內地會極有幫助。第一，賓惠廉時時指出神給我們的試煉，是有其目的，為了使我們看見生命「新的一面和新的價值。」其次就是賓氏認為宣教是教會的大使命；最後是平信徒傳道的重要性。

兩人的友誼日漸增長，也開始一齊事奉。1855年12月，他們雇了兩條船作旅行佈道，帶同一位姓宋的中文教師。僕人和船夫等，貴華和阿錢後來也隨行。

戴德生的船相當寬敞舒適，他還可以住在一個相當大的艙房裡。房間有一個像是蠔殼造成的窗戶，容許光線透進來，但外面卻望不進去。艙內有一張小桌供戴德生書寫和吃飯之用；還有一個大木箱，晚上可把鋪蓋放在上面當作床用。又放有兩張椅子，以備客人到訪。另外一間艙房則由宋先生和另一僕人合用；船夫的艙房則用來置放書冊和兼做廚房。

到了太湖南面的南潯，他們聽到城外的禾場正在上演淫戲。當他們抵達時，只見千多人聚集在一個大帳棚中，鼓樂喧天。許多穿得妖豔的妓女在那裡招搖，對台附近還有不少臨時搭建的賭檔和妓寮。戴德生把這樣的場面稱作「撒但之地」和「浮華世界。」

賓惠廉毫不猶疑地跳上戲臺，喝停正在上演的淫戲。

他對那些戲子說：「你們所做的極之不對，這般的行為會令你們下到地獄。」

人們只把他和戴德生抓著帶走，也沒有用暴力對付他們。但第二天賓、戴兩人又回到廣場上來，這次他們沒有嘗試中止淫戲，不過他們帶來一架梯子，站在上面講道。初時有不少人圍觀，後來又把他們帶走了。戴德生述說：「這些中國人雖然行為敗壞，但我從心底裡愛著他們。啊，求神向他們顯明！無論如何，我真不忍離棄他們。」

在南潯一些名望之士也請求他們幫助遏止那些有傷風化的淫戲。二人禱告之後，決定由戴德生再試一次。戴德生穿著中國式的衣服，在無人發覺之下走過群眾，來到戲臺上。他命令戲子停止演出，並請觀眾聽他說話。在他發言時，賓惠廉已來到觀眾之中；當觀眾要湧上前阻止戴德生時，賓氏喝令他們坐下來。

戴德生大聲對戲子說：「可憐你們的靈魂吧！不要引誘別人進入永受咒詛之地。」

人們終幹把他拖下臺來。他們鬆開手後，他又來到另一處人群聚集的地方，有一個妓女正坐在中央的一把高凳上。當她站起時，戴德生立即坐在她的凳子上，大聲說：「你們周圍這一切都是傷風敗德的事。我說的話對嗎？」

許多人同意戴德生的話，但戴德生還是被拖走了。

「難道你們願意見到你們的女兒落在這些女人一般的田地上？」賓惠廉也大聲喊著問。他聽到好些人重複他的話，不少人都說他們絕對不會讓女兒幹此賤業。

「那麼，你們何以花錢幫助別人的女兒操此賤業呢？」賓氏又問。

最後，兩人回到船上，身體沒有受到傷害。二人又對沿河花艇上的妓女傳道。在戴德生的船上，兩人禱告說：「謝謝天父，當我們在這些人當中作此危險的工作時，你保護我們一毛不損。」

許多南潯的居民似乎都同意他們的行動。有一個人整天地跟著他們，又請他們到茶館去。他說：「你們所傳講的是真理，讓我請你們喝茶。」

賓惠廉從英國帶來一盞三面是鏡的大光燈。把燈點亮後，因為反射的緣故，分外光明。這種燈在英國很是普遍，但在中國則很少見，所以引起茶館中不少人圍觀。

「是不是所有偶像都是假的？」

「信耶穌有什麼好處？」

「如果耶穌在天上，我們在這裡如何敬拜他？」

「你帶我去見神和耶穌，我才可以相信他們。」

這個人一面替他倆倒茶，一邊發問，店小二在旁也放下手裡的熱水壺，交著雙臂，全神貫注地聆聽他們的對話。

「你相信不相信這些洋鬼子的道理？」戴德生聽到有人輕聲問他旁邊的朋友。

「我相信。」他答。

有一位來自北京的青年，聽不懂上海話。他對戴德生說：「我想我們非常相似，都是遠離家鄉，孤身在外，沒有朋友，又不通語言。你會覺得孤單嗎？或者你的神可使你不感孤單吧？」

戴德生答：「有些時候，我也有些感覺，尤其是在身體不適之時。我時常想著親愛的父母及家人。但當我跪下為他們祈禱時，神總會給我一點安慰。雖然我仍會想家，但已有足夠的力量，去等待與他們再次相會。」

「噢，那真好！」

又有其他的人對賓惠廉說：「你應該把頭髮剃掉，戴上中國帽子，象你的朋友一樣。那使你看來帥多了！」

賓惠廉點頭稱是，並且決定學習戴德生的樣式。在他寫給母親的信上，他說：「在過去數星期中，我一直和一位來自中國傳道會的年輕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先生一起。他住在他的船上，我則住在自己的船上，我們一齊經歷神的憐憫。有好幾次，我們的工作也得著他很大的幫助。。接著他又說：「四個星期前，即12月29日那天，我開始換上中國服飾。戴德生先生早在數月前便改換裝束了，而找……認為追隨他是我的責任。」

戴德生的船仍泊在南潯。

他的船艙來了幾位客人。

「崇拜偶像是愚蠢的，」戴德生說：「美好的禮物皆來自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你說的有點兒過於武斷了吧？有些偶像是毫無用處，但有些卻是很好的呢？」

「那麼請你告訴我哪些是好的偶象？」戴德生問。

「它們就在這裡。」那個說話的人一邊回答，一邊指向附近的一所廟宇。「許多年前，有兩個人帶著一船白米來到本市售賣。那時剛巧碰著饑荒，耕種失收，百姓都挨饑忍餓。那兩個人看到這個情景，就把白米周濟窮人。但這樣一來，他們便不能回返本鄉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把白米白白的送完了。」

「那些米不是他們自己的？」

「正是如此。白米是他們的主人所有，他們怕無法交待，就一起在此投河自盡。人們說他們是神，而且造了偶象代表他們，又在這裡為他們立廟，至今香火不絕。」

「這樣說來，你們的偶象不過是人罷了！他們偷了主人的白米，而且也不該投河自盡。」於是，戴德生把真神如何差遣他的獨生愛子來世界上，使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的道理，一一告知他的客人。

在他寫給妹妹戴賀美的信中，提及南潯的經歷，說：「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雖然主還沒有叫聖靈澆灌下來，但在這裡，許多人已經聽到救恩之道，而且有些人還跪下和我們一起禱告，承認並相信真

理的教訓。」

論到他的同工賓惠廉，戴德生說：「那段快樂的日子使我畢生難忘。他熱愛聖經，他的聖潔生活及對神一直的信靠，使那些與他交往的人，由心底獲得一種滿足的感覺。」

回到上海之後，賓惠廉和戴德生照往常的習慣，參加麥都恩教士每週一晚，在家中舉行的祈禱會。在一次聚會中，他們遇到一位名叫鮑華斯（Bowers）的船長，剛從汕頭回來，並請上海的教士為汕頭祈禱，因為汕頭是一個很有潛質的宣教工場。他說：「那兒各國商旅雲集，為什麼獨少傳教士？然而那裡的傳教士需要很好的準備，因為當地有著中國社會中種種的流弊。」

汕頭離上海南面八百哩，並非條約口岸，所以按法津是不容外國人居住的；但是許多外國商人都 在汕頭對開的鼓浪嶼住下來，中國政府也沒有干涉。這裡的道德風氣很差，最大的貿易是鴉片煙及買賣人口，包括苦力和婦女，動輒成千上萬的轉送出洋。

戴德生對鮑華斯船長所說的一番話，印象甚深，並且覺得神要呼召他到汕頭去。但要離開賓惠廉，對他來說是很大的犧牲。「我從來沒有一位象賓先生那樣的屬靈父親，我從未有過如此快樂的團契，我對神說：『要我們分離總不會是你的旨意吧！』」

以後數天，他一直鬱鬱不樂。有一天，他和賓惠廉一起到樓樂賓（Reuben Lowrie）牧師的家去，吃過晚飯後，他們圍著鋼琴聽樓師母彈琴唱詩。樓師母唱的一首詩是戴德生以前從未聽過的，稱為《傳道人的呼召》：

「我決定前往，
不再舍不下朋友和妄想，
以及纏著心靈的種種捆縛……
從此以後，不論
風雨或晴天，
甜杯或苦杯，
我只祈求，
啊，神！使我身體聖潔，
使我靈魂儆醒，
準備迎接生命中艱難的考驗。」

戴德生大受感動。樓師母唱完時，他幾乎泣不成聲。當天晚上，他請賓惠廉來到南城他的家裡，流著淚向他說：

「神呼召我到汕頭為他作工，但我一直抗拒，不願前往，因為我不能忍受與您分手，也不願見到我們共同工作的日於就此終結。」

賓惠廉一聽之下，露出既詫異又驚喜的表情，說道：「我也聽到主的呼召，要我到汕頭去，並且也 正在為著將要失去快樂的團契生活而難過呢！」

鮑華斯船長聽見兩人要到汕頭傳教的消息，非常高興，願意免費載送他們。1856年3月6日，他們離開上海，直赴汕頭。

第十六章 汕頭及長安的艱苦旅途

船程六天，到了汕頭。

汕頭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座落在群山環抱的穀中，梯田處處，林蔭鬱鬱。這裡有不少熱帶樹木，包括棕櫚、仙人掌和香蕉樹。但是這裡的居民與美麗的風景很不相配。

戴德生寫道：「這裡的人都很貧窮，既可憐又可惜。他們都橫蠻、放肆，文化水準遠比我所見過其它地方的中國人為低。」

戴德生和賓惠廉都不懂潮州話，但真惠廉可以說廣東話。他們遇到一個廣府人，恰巧是當地一位大官的親戚；他見到這位洋人竟然能用廣東話和他交談，非常高興，就運用他的影響力，幫助他們租到一間香燭店的閣樓，作為居所。

他們需要攀登一度梯子，鑽進閣樓樓板的洞口，才可以進入新居。他們又用布和木板，把地方隔分成三個房，戴德生的房間在南，賓惠廉的房間在北，還有另一個房間用作書房。業主答應在樓板洞上裝上可以起蓋的門。他們的床不過是幾塊硬木板，所謂書桌也只是把一個木箱蓋子平放在兩大袋書之上而已。

當鮑華斯船長到來探望他們時，不禁皺眉說：「賓先生，難道你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居住地方嗎？」

賓惠廉笑著回答：「我寧願住在中國人當中，而不願置身于舒適安逸的家裡。」

「他們每月收多少租金呢？」船長問。

「每月十元。」

「每月才十元！」船長情不自禁地大聲說：「我每月抽煙的錢還比它多呢！」

有一晚，戴德生聽到不遠傳來婦女的尖叫聲，他就追問原委。

有人告訴他說：「一定是那些被迫為娼的婦女發出的，就在不遠有一所妓院，時常用種酷刑去迫婦女順從命令。這些事在這裡很普遍！」

驚心動魄的尖叫持續了兩個小時，戴德生心想：汕頭是多麼需要基督！

三月底，他們雇用了一位老農夫，他能讀書寫字，不同於一般人。他主要的工作是教戴德生講潮州話和讀書，每天數小時。戴德生進步神速，到了四月中，可以自己練習了。

有一次，他帶著僕人來到山中的一個小村落。戴德生問：「村子裡可有教師和學校？」有一個剛從田裡工作回來的老農夫說：「沒有。去年還有一位，如今離開了。我們的村子很窮，連衣服也不足以蔽體呢！」他指著自己身上破爛的褲子說。

戴德生很少嘲諷別人，但他說：「如果你不吸鴉片煙，以及把金錢花在拜祭死人、天后和其他偶像上的話，你的生活絕對不會弄得如此倒楣。你拜神拜鬼，不過求平安富貴，但卻失意如此，試問你的偶像如果有眼，它們看到什麼？如果有耳，它們聽到你的求告嗎？如果有口，又說過什麼話？它們能保佑你免去被劫、爭吵、疾病和災難麼？」

這時，大概有三四十人及一些孩童圍攏過來，在大榕樹蔭下聚精會神地聽戴德生講話。

有些人應道：「說得對，說得對！我們的偶像真的不管用！」

「但是，有一位是你們應該拜的。」戴德生說：「他就是創造天地、男女和萬物的父神。如果你們歸向他，他就會因耶穌的緣故赦免你們的罪。相信這位寶貴的救主吧，不論生死，你們都會得著平安

和真正的滿足。」

戴德生最難忘的，就是炎夏的日子。在香燭店的閣樓裡，真是暑氣蒸人，連天花板上的瓦面也燙手。幸而戴德生想出一個妙法，把一面大扇吊在椽上，無論睡在床上或坐在椅上，只要把垂著的繩子拉動，扇子就會搖動，掀起陣陣涼風。

家裡的來信也可以稍減孤寂。老朋友海恩波（Belljamin Broomhall）寄來好消息：他和戴德生的妹妹戴賀美將要訂婚，並且計畫前來中國作傳教士！戴德生非常高興，連忙回信道喜，而且建議海恩波最好先見按為牧師，不然事事不便。這個看法和他原先申請作傳教士時，明顯地有了改變，現在英行教會也是他願意服務的機構。他說：「崇拜的形式並不重要，能力才是關鍵。我相信在英行教會中，比在那些反對它的組織中有更多自由。」

經過進一步的反省後，他在另一信中又建議海恩波接受倫敦會的遣派。倫敦會有許多關於中國的藏書，會更加適合學者型的海恩波，同時也不受主教的管轄。

戴賀美和史伊莉來信都不贊成他改換中國服式，令他有點失望。他回答說：「如果你們認為中國服裝是野蠻人穿的，中國人看英國的服裝也不遑多讓……如果沒有這身衣服，我們在這裡，連一天也呆不下去。」

史伊莉又寄來第二封令他失意的信。她的母親仍然反對他們的婚事，而她父親和她本人則左右為難。這段愛情煞是叫人費解！

差會有半年沒有給他匯錢了，大概知道布迦先生偶爾寄錢給他吧！差會的財政狀況其實也很差，以前的捐獻尚豐，現在卻入不敷支。戴德生給皮爾士的私人信中，也曾暗示他可能會辭職。這時，布迦又再寄給他五十鎊。

多年後，有一位在汕頭的外國基督徒醫生，回憶當日和戴德生相會的情形，說：「他整天在外工作，回到家裡，雙腿酸痛，身體疲乏，炎陽把他的臉燙傷，長出滿面水泡。他坐下來，好象筋疲力竭似的。數小時後，又起來迎接另一天的勞苦和熬煉。我知道他很受中國人的尊敬，在他們中間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他的影響就好比一朵花，在他們當中散發著基督的香氣。」

有一位官員病了，本地的醫生都束手無策，他聽聞戴德生能治病，便請人來召這位年輕的英國大夫。戴德生記述道：「神使用那些藥物，令那位官員康復過來，他甚為感激，提議我們租用一座房子作為醫院及藥房。由於他的批准，我們才能夠把全座房子租下來。以前我們只能租用裡面的一個房間。」

戴德生的藥品和手術器材，大部分還留在上海。幸好有另外一位基督徒船長，願意免費送他回去收拾和整理，於是戴德生便在 7 月 5 日乘搭「野花號」離開汕頭。賓惠廉送他到碼頭，揚巾作別，大家都對前面的工作抱著極大的希望。

「野花號」北上的航程需時十日，讓戴德生有機會稍作休息，對臉上熱瘡的調理也有幫助。回到上海，他直接返回倫敦會租下的房子。但一看之下，令他大為震驚，原來房子被一場大火燒毀了。他所有的藥品和儀器，以及三萬本新約聖經都燒光了。他想：如果要籌措藥物和器具，只能到寧波走一趟，請求巴格爾醫生幫助了。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戴德生更收到史伊莉寄來的一封信，決定拒絕他的求婚。

戴德生計畫沿運河上杭洲，然後到寧波去。他帶了兩隻表，並用一個大竹簍裝了他的照相機、相

片、昆蟲標本、僅餘的手術儀器、手風琴、一些貴重的書，以及不能缺少的鋪蓋。

他和僕人友西一起上路。走了十四日，來到一個叫石門灣的大鎮。河運到此為止，他惟有雇用挑夫把行李運到十八哩外的海寧。但走了六哩後，他發現挑夫全是吸食鴉片，一點氣力都沒有。友西說他要到石門灣鎮上探望一個朋友，但戴德生不贊成。他吩咐友西另雇數名挑夫，說完便先行上路。他預算在長安等他們，但苦候很久也不見他們來到。戴德生只有在在一間骯髒的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前往海寧，看看行李是否直接運到那裡，但海甯也全無挑夫及行李的蹤影。他找不到客店，晚上只得在一間寺廟門外的露天石階上度過一宵，差一點被劫。

翌日，還是全無消息，不得已只有折返。中午到了長安，到處打聽，仍是全無結果。在茶館吃過飯後，他洗了一個澡，用熱水浸一下酸痛不堪的雙腳，然後又睡了一會。休息過後，他回到兩天前和僕人及挑夫分手的石門縣。一路上，他省察自己，發覺昨晚忘記求神為他預備住宿之所，一直就為失去行李而耿耿於懷，沒有關懷周圍還未信主的靈魂；為此他感到愧疚不已。

「親愛的天父，我以罪人的身分來到你面前，求耶穌的寶血洗淨……」他一邊行一邊祈禱。「啊，主的愛何等偉大！」他記述說：「我為自己祈禱，為英國的朋友祈禱，也為同工祈禱。歡樂和憂傷混和在淚水之中，如泉湧出，使我忘記路途的辛苦，不知不覺間，已經抵達目的地了。」

來到石門縣的南門，他停下來喝一碗茶，並四處打聽，還是沒有結果。不過他仍把握一些機會，向人傳道。當他正預算再走六哩到石門灣時，便遇上原先的一名挑夫，知道友西帶著行李往杭州去了。現在他所能做的，只有是乘船回上海而已。

船行不久，就擱淺不能再動，戴德生只得在船上度過一晚。翌日黎明，他重新把一天交托給神，說：「若為了我的好處和你的榮耀，我知道你會助我找回行李；但若非如此，總有你美好的旨意。」

但不如意事正等著他，石門灣的船主說由於水淺，輪渡在一兩天內不能通航。

「那麼驛船呢？」

「它們已經離開了！」

就在此時，戴德生看到運河遠遠一哩外有一條驛船，可能因事阻延了，還未啟航，他立刻跑上前去，喘著氣說：「你們是到嘉興去的嗎？」

「不是的。」

「是否朝那個方向去？」

「不是。」

「你們能否免費載我一程？」

「不行。」

戴德生十分疲乏和失望，故不支暈倒在草地上。當他醒過來時，聽到人聲說：「他可以說純粹的上海話呢！」那是朝相反方向走的一艘大船上一位乘客說的。他們看見戴德生暈倒，也聽到他講上海話。由於他們是來自上海，便叫人搖了小艇過來把戴德生接上大船。

大船是從上海往南駛去，但暫時擱淺在淺水中。船上的人請他喝茶和用點心，又拿熱水給他洗腳，聽到他的遭遇，各人均表同情；凡遇到北上的船，他們便揚聲發問，但都不是往上海去的。

「我想我沒有力量行路到嘉興去。」戴德生對他們說：「也沒有錢乘搭驛船。我不知神如何幫助我，

但我知道他一定會幫助我；當他這樣做，你們便知道我及其他上海教士所宣講的宗教，是何等真確而實在的。我現在所能做的，只是隨時隨地的事奉他！」

隨後，他和船長一起上岸，預算到附近的一間廟去傳教。當他們朝著鎮走之際，船長突然說：「看，那邊有只驛船，或許是往上海的！」

「也許是吧，」戴德生應道：「不過，正如我先前所說，我沒有足夠的錢。」

船長還是把驛船叫停，它果然是前往上海附近的一個鎮。

「這位洋人是住在上海。」他大聲嚷著：「他被搶了，沒有錢回去，請你把他載到上海附近的鎮，然後雇一頂轎子送他回去，他會給你錢的。萬一他不給，回頭我會替他付。你看我的船在此擱淺，總會耽上好幾天。」

「好吧，我答應你的條件！」驛船的人回答，並請戴德生上船。

驛船的船身長而窄，由兩個人操縱，行駛甚速。由於艙內地方淺窄，而且恐怕翻船，船行時不能坐起，只能躺臥。但戴德生並不介意，他很高興能夠躺下靜靜休息，而且平安地回到上海。

第十七章 見死不救

明顯地，戴德生的僕人友西把他的行李拿走了，他應該怎樣處理這事情？首先，戴德生派了一個人去石門縣打聽，那人回來告訴他，友西原來是早有預謀的。

最令戴德生痛心的，是丟掉一些心愛的紀念品——戴賀美的相片、他的手風琴和聖詩、母親送的聖經，還有許多他收集的地圖和心愛的衣服。

如果要報告官府，追討失物，應該是不難的事；而且許多人也催促戴德生報官。但經過反復思想和祈禱，他覺得這樣做並不恰當。他一直以來都為友西信主的事祈禱，如果現在報官，友西一定會下獄，那麼他更不能接受基督教的道理了。

他決定寫一封信給友西，坦白地告訴他，說自己已知悉事情的真相，本想把他送官治罪，但記起基督以善報惡的教訓，便沒有這樣做。他還在信中寫道：「你才是真正蒙受損失的，我完全寬恕你，並希望你逃過將來的憤怒。」他繼續說他並不求友西把所有的物件歸還，但那些對他毫無用處的外文書籍，卻希望可以送還給他。

關於這次事件的經過，以及戴德生後來的行動，有部分刊登在中國傳道會出版的《海外佈道雜誌》之中。在布裡斯托（Bristol）的穆勒（George Muller）讀了，覺得這個青年真是難能可貴，身體力行地實踐登山寶訓中的道理。所以他不但為戴德生祈禱，還寫了一封信給他，內中附了四十鎊，相等于戴德生行李的損失。自此以後，穆勒還不時寄來禮物。

戴德生啟程到寧波去，找巴格爾醫生幫助補添大火燒掉的藥品和用具；這次旅程平安，一路無事。來到寧波後，他結識了祝恩賜牧師夫婦（John and Mary Jones），他們是中國傳道會派往寧波的。在接受中國傳道會的差派時，他們不計較任何條件，只完全地交托予神，依賴他的供給。戴德生和祝牧師談得十分投契，很快便成為好朋友，一同到寧波附近的鄉郊傳教。

兩個月來，戴德生一直在巴格爾醫生的診所中幫忙。每週巴格爾一家都會和歐德絲女及與她同工的兩位戴雅（Dyers）小姐，一同進餐。許多中國人把歐女士當作寧波英國人的領袖，就如維多利亞女

皇是英國的領袖樣。他們甚至認為連英領事也聽命於她。

當該地發生地震時，人們皆認為是歐女士弄的魔術，因為有人當天早上看到她爬到城牆上，並且打開一個瓶子的瓶塞，放出惡鬼來，震動了地的支柱。他們說的是實話，因為歐女士每天黎明五點都會到城牆上去散步，甚至冬天也不例外，不過有傭人打著燈籠走在前面而已。她也時常拿著一個瓶子，內裡其實是她用來消除頭痛和解除臭味的香精。我們當然知道這並不能引起地震。

她設立的學校，是第一所基督教在華興辦的女子學校。兩位戴雅姑娘——寶麗娜（Burella）和瑪莉亞（Maria）——均是她的助手。這兩位姑娘是寧波傳教士中唯一未婚的女性，為寧波的洋人帶來一點生氣。她們姊妹倆從小就學中文，並且能操寧波話。沒有資料清楚顯示戴德生對這兩位姑娘最初的印象如何，但我們知道十九歲的瑪莉亞一見戴德生，就被他吸引往，立刻把「事情放在禱告之中。」

1856年9月15日，戴德生又收到布迦先生寄來二十鎊，讓他可以向巴格爾醫生購置所需的藥物和儀器。三天之後，他又再收到布迦寄來四十鎊。戴德生感謝主恩，並拿出五十元奉獻給巴格爾作擴建醫院之用。

九月下旬，戴德生和祝恩賜父子離開寧波，連袂返回上海。祝恩賜的兒子湯姆正患痢疾，需要回滬調養。戴德生離開後，瑪莉亞竟覺得惘然若有所失。

返抵上海後，戴德生竟又收到布迦匯來的款項。在這一年中，布迦一共寄來三百鎊，但差會寄來的錢，則遠比原先答允的要少得多。

在戴德生正準備乘船回汕頭之際，他收到賓惠廉的信，不是在汕頭，而是由廣州寄出的。賓惠廉說他和汕頭的兩名中國同工已經被捕下獄。他們被關了六個星期，然後解送到廣州。在這種情形下，賓惠廉勸告戴德生不要此時回汕頭，說那是不智之舉。多年之後，戴德生記述說：「回汕頭的事就此阻延了，我還不知道這是神的手在為我的事情開路哩！」

事實上，戴德生是有許多理由可以在寧波長住下來的。首先，中國傳道會在寧波有工作，巴格爾醫生已打好基礎，預備建築一間醫院；而另外一位牧師祝恩賜也剛學會了寧波話，他需要一個有經驗的同工和良伴。或許還有其他理由吧，比如寶麗娜和瑪莉亞兩姊妹的出現。但無論如何，戴德生和祝恩賜父子還是決定回到寧波。

他們乘坐中國帆船出發，同行還有一個叫彼得的中國人。他尚未成為基督徒時，已在英國認識巴格爾醫生，和巴格爾同船返回中國，在船上教導巴格爾醫生學習中文和兼司雜役。（他的名字就是在英國居住時取的。）彼得在上海寫信給巴格爾，請求到寧波為他工作，巴格爾答應了，他便隨著戴德生和祝恩賜南下。

一天早上，戴德生在船艙裡整理福音單張和小冊，突然聽得「嘩啦」一聲，原來彼得掉在運河裡。彼得最喜歡在船艙兩旁窄窄的木板上來回走動，雖然多番警告，他還是聽不進去。這次一頭掉進水裡，雙腳朝天，沒有浮上來，好象水中有什麼東西絆著他，不能動彈，加上一陣大風把船吹向前，岸上又沒有任何指標，大家都不知道彼得在什麼地方墮海。船夫們只有對望，看是無能為力了！

戴德生很快把帆放下，然後跳入水中，游來遊去，拼命搜索。之後，他看到一艘有拖網和魚鉤的捕魚艇。

「快來，」他大聲喊著。「在這個地方打撈一下，有人要淹死了？」

「這不大方便哪！」漁夫應道。

「不要說方便與否，人快淹死了。」

「我們忙著打魚，不能來。」

「不要只想著打魚！我給你一天的魚錢，立刻過來救人吧！」

「你給我們多少錢？」

戴德生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們現在不要討論這個！快過來，不然太遲了。我給你們五塊錢。」

「我們才不撈哩。你給我們二十塊吧！」

「我沒有那麼多的錢，快來吧，我將身上所有都給你們。」

「那究竟是多少？」

「我也不清楚，大概十四元左右吧！」

最後，漁夫才慢慢搖櫓過來，把網撒下。一分鐘後，彼得才撈了上來。在這陣討價還價中，彼得一直在水底下。如今撈上來，已全無氣息了。戴德生立即施行人工呼吸，但漁夫還在旁邊大聲責備，嚷著要立刻付錢。

經過戴德生一番努力搶救，彼得還是返魂乏術。

戴德生知道中國人對死人的忌諱，以及對亡魂的恐懼，他亦知道事情並非就此完結。他帶著彼得的屍體乘船回上海，在炎熱的天氣下，屍體愈來愈臭。好不容易才抵達上海，他立刻尋找彼得的親屬。但彼得的寡母拒絕領取屍體，硬想向戴德生詐索金錢。經過一番爭吵，他們終於把屍體領走了。戴德生給他們五塊錢作殮葬費。

戴德生後來追述這事說：「對我而言，這是極其悲慘的事，但也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在它背後，隱藏著一個更令人悲哀的事實。那些漁夫是否應該為這人的死負責呢？他們有拯救他的工具，可是他們不用！當然他們都是難辭其咎。然而，在我們定他們的罪之前，先想想先知拿單的回答：你就是那人！不願去拯救人的身體，是否就是硬心和惡毒呢？那麼，若不顧靈魂的滅亡，罪豈不更大了嗎？凡象該隱般說：『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麼？』他將受極重的刑罰。耶穌基督命令你，命令我，去到地極，把福音傳給萬民聽。」

第十八章 禱告的果效

「從城東的鹽門進入寧波，沿著大街走，兩旁都是古老的塔，過了一座石橋，便來到運河的對岸。循著一條小徑往前走，便是日月潭，再過是一座宏偉巍峨的孔廟。」戴德生寫信給英國的友人，報導寧波的景況：「繼續沿著砌石的大街走，約有半哩之遙，便可以看到一個人在那裡敲著一口大銅鐘。當你走近，你會聽到他正在邀請行人入內聽道。走過天井，進入大客廳內，你便看見我們的聚會快要開始了。」

和祝恩賜父子回到寧波之後數周，戴德生搬到橋頭街巴格爾所辦的學校居住，學校下課後，禮堂便作教堂之用。

那年的冬天雖然不算極冷，但戴德生永不忘記他早上醒來，竟可在被褥上面的一層冰霜寫上自己

的名字。他記述說：「中國屋子頂上的瓦片，用來防雨還可以（如果瓦片還好的話），但用來擋雪則沒有什麼用了。冰霜從瓦縫和洞隙中鑽進來。」

這個象裂倉般的頂樓，用木板間成四、五個小房間。戴德生把牆粉刷一新，又用紙張把所有的縫口盡可能遮蓋起來。

巴格爾醫生和外國商船簽了合約，替商人和船員診病，收入很不錯。他也在鹽門之外的河畔附近開始動土興建醫院。城裡城外的人都聽聞他的醫術，許多病人慕名來求他醫治。

戴德生幫助巴格爾醫生發展醫療工作，而祝恩賜與英行教會的傳教士高富（Frederick Gough 譯者按：用寧波話稱作「岳牧師」）一起，常常在路旁的露天茶檔向人佈道，祝夫人和高夫人則時常一同探訪當地的中國婦女。有時戴德生會參與祝、高兩人的工作，同時學習寧波話。

祝恩賜一家在東門旺區租了一所房子，是美國長老會的物業。離開他的家往西走幾條街，就是歐德絲女士的學校和住所。

歐德絲女士邀請祝恩賜夫婦和戴德生，在她的家作客晚膳。對於戴德生這個沒有大差會支持，又有點自傲的青年，她實在不敢苟同，尤其令她震驚的，是他的一身中國服裝和打扮，他甚至把頭髮留長，結成一條長辮子。但她不知道她其中一位助手戴雅二姑娘，竟然被這「荒唐」的青年吸引住，暗中希望得到他的青睞。

戴德生的朋友，就是那位喪妻的包爾騰，則和戴雅大姑娘寶麗娜談得投契，不久之後宣告訂婚。另一位傳教士——四十歲的艾約瑟曾向瑪莉亞求婚，但只逗得她吃笑不已，令到艾約瑟羞慚無地，再也不敢向她示愛了。有些人認為包爾騰追求成功，或可鼓勵艾約瑟捲土重來。

在歐德絲女士的晚宴中，戴德生見到瑪莉亞，他對她的描述如下：「她是一個漂亮的女孩，雖然眸子過於淺色！」他也注意到她的中國話在寧波的洋人中，可算是數一數二了〔最好的可能是當地一位年輕的政府官員夏羅拔（Robert Hart）〕；她在父親臨死前，把自己奉獻到中國傳道，為人誠懇。熱心，其他人也認為她是個活潑。爽朗和聰慧的姑娘，有一頭淡棕色的長髮，身裁苗條。她也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父親年輕時，曾在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念法津，1827年獻身宣教，到馬來亞的檳榔嶼當傳教士。

有一天，瑪莉亞正在祝恩賜夫婦家中作客，戴德生也恰巧登門拜訪。他剛剛把橋頭街的房子清理、洗刷，身上的衣服骯髒不堪。

「你要預備迎見一位貴賓！」祝夫人一邊說著，一邊向她打了個眼色。

十九歲的瑪莉亞感到很難為情。哪個維多利亞時代的淑女不是如此呢？

祝夫人如真想要「做媒」，可還有很多工作做哩！

戴德生有點喪氣。縱使大多數在上海的傳教士對他相當熱情，但他發現由於自己未受按立為牧師，又未取得醫學學位，故總受到不同的對待。受封的牧師常被洋人及華人教會請去講道，但自己雖然打破了語言的隔膜，卻很少受到邀請。歐德絲女士的輕視和厭惡，更是明顯可見。有時他不禁想到：不如回英國念完醫學課程，結婚後才再來中國吧！有時甚至想連宣教工作也完全放下。史伊莉的父親不是說過嗎？如果他在英國居住，他不會反對女兒和他的婚事。

在耶誕節裡，他似乎忘記了這些煩惱。高富牧師夫婦舉行了一個晚會，邀請寧波市的十五位英國傳教士參加。晚餐有燒牛肉，餐後有梅子布丁蛋糕，真是美味極了。高富家中有一座很好的鋼琴，他

邀請寶麗娜和瑪莉亞姊妹高歌娛賓。她倆歌聲悅耳，令戴德生聽得如癡如醉。但也令他想起那個被偷掉的手風琴！

「美國的傳教士都有風琴……它是很美妙的樂器。」在戴德生第二天寫給母親的信中，他請她打聽一下是否可以在英國覓得一具價錢在十二至十五鎊左右的，買下來寄給他。或許他想到將來可以和妻子共譜琴瑟之章吧！當天，祝恩賜夫人帶著瑪莉亞探訪不同的中國家庭，回家用茶時，戴德生也在坐。然後，由他送瑪莉亞回學校，瑪莉亞心下暗喜。

對戴德生來說，祝恩賜夫婦好比他的兄嫂，感情甚篤。所以，戴德生把回國的念頭告知他們，令他們大感詫異。

祝夫人說：「我知道什麼可以使你安頓下來——就是一位好妻子！我會促成你和瑪莉亞的好事！」

「那真好，」戴德生應道：「不過中國傳道會所發的薪金，我一個人用也捉襟見肘，入不敷支！」

「你的需要主必會供給，」祝夫人提高嗓子道：「你的需要愈大，你的供應也就愈多！」

從這時起，戴德生為瑪莉亞禱告，求主引導兩人的感情發展。

此時，他和祝恩賜聽到倫敦中國傳道會的經濟陷入困境，靠賴借貸維持，兩人都感到很沮喪。戴德生記述道：「對我來說，神的教訓是清楚不過：『不要欠人的債。』借貸是和聖經的話相矛盾，好象承認神保留了一些好東西不給我們，所以要自己去爭取他沒有賜給我們的東西。」

寶麗娜和瑪莉亞的母親是在 1846 年去世，她死後姊妹兩人便離開檳城。她們的後父包森（Bausum）後來續弦，但過了數年也相繼去世。包森夫人在檳城繼續亡夫的工作，直至寧波的歐德絲女士來信，邀請包森夫人到寧波幫她料理學校事務。歐德絲女士的本意，是希望包森夫人以後能接替校長之職。她在 1856 年 10 月抵達寧波。

瑪莉亞覺得包森夫人慈祥而聰慧。1857 年 1 月，瑪莉亞把艾約瑟向她求婚的事告知包森夫人。包夫人板著臉對她說：「淑女是不會令君子難堪。他不該因為愛你而遭受嘲弄，或因仰慕你而受到輕視。你不應該沒有經過禱告，便輕率地決定要拒絕他或接受他」

「我從未想過接受他，」瑪莉亞答道。她向包森夫人訴說自己對戴德生的感情。

但包森夫人說：「我一點也看不出戴先生對你有意思。」

瑪莉亞的石榴裙下，不乏追求者。寧波英國領事館新來的翻譯官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是夏羅拔（Robert Hart），是位年輕有力的單身漢。

夏羅拔的工作極為忙碌，但他還是抽空約會這位能講流利中國話的英國姑娘。他終於在 1857 年初向瑪莉亞求婚，但瑪莉亞照樣拒絕了他，因她的心已早有所屬。

這個時候，戰火彌漫，中英兩國又要爆發另一場戰爭。衝突的起因不過是一件糊塗事——在 1856 年 10 月發生的亞羅事件。

「亞羅號」是一艘中國船，在香港註冊。凡香港註冊的船都可懸掛英國旗，避免海關人員及中國禁煙官吏的檢查。但廣洲的中國官員竟在 10 月 8 日登上「亞羅號」，搜出走私的鴉片煙，官吏於是把船上懸掛的英國旗扯下，並帶走船上人員。

英國領事向兩國總督提出抗議，要求立刻釋放船員和重新掛上英國旗幟，但為總督所拒絕。英國駐香港的總督包甯爵士（John Bowring）宣佈，如果中國政府不在二十四小時內釋放所扣押的人，並且

道歉，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情，英國炮艦將炮轟廣州。由於中國政府全無動靜，英艦到了時間便真的發動攻擊。

事實上，英國當局犯了一個錯誤：「亞羅號」的註冊牌照已經過期，按理是無權懸掛英國旗號的。中國官員的行動，以及總督拒絕道歉，都是依法辦事。

可是，整個事件由法理衝突變成體面之爭。英國人更希望借此使中國進一步開放門戶，讓他們在北京設立使館。

英國海軍艦隊在薛摩上將（Admiral Seymour）率領之下，攻破廣州，佔領總督衙門，導致仇英反外的情緒更加高漲。兩國總督貼出告示，懸賞捉拿和殺害洋人。一時間，在華洋人均風聲鶴唳，性命受到很大的威脅。

本來寧波一地的中國人，跟外國人關係頗佳。但來自外省的官員，很少和洋人來往，遑論保護他們了；而寧波的廣東人也為數不少，當廣東的消息傳來，氣氛便頓形緊張。雖然外國傳教士（包括戴德生）大多斥責英國政府用武的行為，但在華人眼中，又怎能分辨外國商人、軍隊和教士之間的關係？

1857年1月初，寧波的廣東人密謀殲滅居住在當地的外國人。他們探悉許多洋人——包括領事、商人和教士——每個禮拜日晚都會在英行教會陸賜牧師（Rev·William Russell）的家裡聚會和崇拜。

這些廣東人計畫包圍陸賜牧師的住宅，然後屠殺所有洋鬼子。在同一時間內，他們也攻擊城內其他洋人。他們把這個計畫呈報道台（即城中最高的長官），徵求他的同意。

幸而同謀之中有一個人，他的朋友在一位傳教士家中為僕，為了朋友的安全，他極力勸他辭職，並把計畫向他洩露了。這個僕人立刻通知他的雇主，然後趕緊通知其他傳教士。他們立即齊集祈禱，尋求主的帶領和保護在他們祈禱的時候，一位官位較低的官員正和道台商議。

他說：「大人，任由他們殺戮寧波的洋人，是極其愚蠢的事，萬一他們成功了，其他口岸的洋人定會引軍報復，把整個城市鏟為平地。」

「如果他們真的為此引軍，」道台答道：「我會否認一切，說自己全不知情。這樣，他們只會懷恨廣東人，向他們進行報復，殲滅他們。此所謂一石二鳥之計，可以消滅洋人和老廣。」

「否認知情和推卸責任是沒有用的。」那官員說：「事實上，我有理由相信洋人已經知道這個計畫和其中詳情，他們可能已早有準備。」

道台答應收回承命，並派人阻止廣東幫發動攻擊。

在不遠處，傳教士結束祈禱會後，各自回家，並不知道他們的禱告已蒙應允，得以逃過一場災難。

在仇外情緒高漲下，寧波的洋人還是時刻生活在危機中，有些外國商人和教士在他們的住宅四圍設置武裝警衛，也有計劃讓婦孺先行撤退到上海。歐德絲女士建議戴雅兩姊妹和其他婦女先走，自己則和包森夫人留下來。但寶麗娜和瑪莉亞都決定追隨她們。至於祝恩賜和戴德生，因為沒有不能抽身的理由，所以他們兩人便負責帶領婦孺到上海去，而且安頓他們，看來他倆會離開寧波一段頗長的日子。

瑪莉亞往碼頭送行。兩艘輪船泊在岸邊。「浪花號」船上兩個美國家庭的成員，而「日本號」船上則有丁韋良夫婦、祝恩賜夫婦和他們的孩子、高富夫人和孩子，以及戴德生。那時，戴德生抱著高富家的嬰兒，坐在甲板一張椅子上。

瑪莉亞站在碼頭上揮手，目送「日本號」漸漸遠去。戴德生手抱著嬰兒，也凝望著她的情影漸漸迷糊。他在筆記中說：「照顧那個小寶貝，可助我掩藏與瑪莉亞分手時心中的惆悵。」瑪莉亞在寫給她英國一位兄長的信中說：「戴德生先生本想留下來，但因為朋友託付他照顧家小，便去了上海。在他臨行之前，我有一點理由相信他可能對我有意思，不過我還是不要那麼樂觀……」這次分手之後，兩人都不知何時再見。

第十九章節 愛情道上

戴德生和祝恩賜在上海繼續他們的宣教工作。他們在城內及鄉郊四處佈道，派發福音單張。過了數周，他們仍不知道何時才可以返回寧波，又或者需要跟隨大隊離開中國，總得視戰局而定。他們聽聞中國傳道會又差遣了三名傳教士前來上海，但不知道差會何來足夠的經濟支持。

到了二月底，寧波的局勢似乎平靜下來了，巴格爾來信說官吏和居民都很友善。所以大部分家眷都返回寧波，只有戴德生、祝恩賜夫婦及高富夫人還留在上海。他記述道：「主把我們帶到這裡來，還沒有叫我們回去，所以我們只好留下，等候他的帶領。」

戴德生發覺自己愈來愈想念瑪莉亞。他寫道：「我真渴望與自己所愛、所信任的人毫無阻地互相溝通。」得到祝恩賜夫婦的鼓勵，他終於鼓起勇氣，在3月21日寫了一封信給瑪莉亞。這封信已經不存，但他在信中向瑪莉亞表露了愛意，請求瑪莉亞讓他有更多機會認識她，同時盼望日後可以與她成婚。他也懇求她不要立即拒絕，因這會使他難受和痛苦。最後他說如果她不能接受他的愛意，就請她把信燒掉。依照當時英國的社會習慣，戴德生也寫了一封信給他的長輩高富牧師，表白他對瑪莉亞的感情，並說他已向瑪莉亞求婚。

4月8日清晨，瑪莉亞正在寧波的學校裡忙碌工作，高富夫人推門而進，手上拿著一封信。信封上的筆跡很陌生，她猜不出是誰寄來的。她沒有立刻把信打開，預算稍後才讀。當她回到房中，拆開信封，才知是戴德生的來信。

她一邊讀，一邊有著不能置信的感覺，好象她的禱告已蒙應允。跟著，她立刻跑去告知姊姊寶麗娜。

姊姊說：「那真好極了，恭喜你！」

瑪莉亞又告訴歐德絲女士。

「我想你不會接受他的愛意吧？」歐女士板著臉說。

當瑪莉亞暗示這可能性時，歐女士說：「我們最好先寫信給譚恩（Tam）先生，請他查查戴先生的為人怎樣。」

住在倫敦的譚恩先生是瑪莉亞的姨父，也是她合法的監護人。

歐德絲女士繼續說道：「你一定要回信給戴德生，拒絕他的求婚，並且叫他以後不要再提這事了。你自己也要完全忘掉它。」

瑪莉亞實在左右為難。在法律上，她無需聽從歐德絲女士的意見，但她顯然也不願拂逆這位長者。雖然歐女士性格專橫，什麼事都要管，但她多年來照顧瑪莉亞，所以很受瑪莉亞的尊敬和愛戴。高富夫人十分同情她，不過仍是勸她服從歐女士。

「我覺得歐德絲女士待你如母親一般，雖然你有自己的想法，但你不能完全背逆她，否則你心裡總不是味兒。」

歐德絲女士還逕自寫信給譚恩先生，對戴德生極盡低毀。瑪莉亞也寫了一封信給姨父姨母，表白她對戴德生的感情，並希望他們同意她倆的婚事。但信還沒有寄出，歐女士已托寶麗娜轉達她的不滿，要她不要把信寄出。

瑪莉亞反復思想和祈禱，不知如何回復戴德生。按她本人的心意，當然希望說些鼓勵的話，但看來歐女士定會先把信過目。為了尊重她，她的覆信便得直截了當的拒絕他。

最後的定稿實在是一篇傑作。無論用字遣辭或說明立場和意向，都小心翼翼，字裡行間暗示了多重意思。

發信日期是 1857 年 4 月 16 日，內文如下：

親愛的戴先生：

高富夫人上周 4 月 8 日交來 3 月 21 日大禮。信中充滿基督的愛心，很是感謝。

你在信中提出之事，我懇切地放在禱告之中，誠摯地求詢主的旨意，並憑他意行。我絕不願意給你帶來痛苦，但我只能按著神的帶領覆信予你。我清楚覺得我有責任拒絕你的求婚。然而，請你不要以為我輕率從事，或者不體會你對我的愛意。其實我極之尊重你的一番好意（但責任所在，只能敬謝不敏），絕不想令你難堪。

我想我應該把此事告知歐德絲女士及妹妹，還有送信給我的高富夫人，除此之外，無人知情。我希望除了我的親人，以及你想告知的人外，不再向人提及此事。在我覆信後，我會按照尊意，把來信燒掉。

戴先生，我向來待你如主內的弟兄，門徒怎樣彼此相待，我希望也能照樣待你，但可不能要求更多。我請求你以後不要再提此事，因為我的回復仍是一樣。你可從信內的字裡行間，曉得我沒有輕率地拒絕你。對於其他非主內的人，我會乾脆回絕，不會這般委婉。願救主耶穌賜你豐富的恩惠，也使你成為別人的祝福；又願你作他榮耀的器皿，引領眾多靈魂得救，在基督再來之日得著快樂的冠冕。

主內

瑪莉亞·戴雅上

這樣的信能否通過檢查呢？信中說「門徒彼此相待」，意即彼此相愛。她是請求他不要再提此事，而非不准他提起，為戴德生留了餘地，讓他日後可以舊事重提。戴德生能明白這些暗示嗎？能否知道她是「責任所在」，必須服從歐德蘭女士呢？

這封信果然通過了歐女士的檢查，順利來到身在上海的戴德生手中。信寄出後，瑪莉亞的心情，如她所述：「我覺得我不能想望什麼，惟有把事情全交在神的手裡，求他按著他的心意而行。」

戴德生在五月初收到瑪莉亞的覆信。他反復閱讀，看出瑪莉亞模稜兩可的立場。不過從字面看，信中至少表明了不要再提此事，可見目前並不適宜。「他懷疑信中的隱晦及含糊，可能與歐德絲女士有關。」

這個曲折的愛情故事還未有何進展之前，有一件事尚待解決。1857 年 5 月 29 日，就在戴德生二十五歲生日過後一星期，他向中國傳道會請辭。他以前已多次暗示，因為差會常常不能如期發薪，而且

時有短缺。最使戴德生不滿的，是差會以借貸來維持會務，有違聖經的教訓。此外，差會也禁止屬下的傳教士在外工作來幫補收入，使戴德生更添一重障礙。

他在荷爾和倫敦時，已證驗了神必回答他的禱告，供應他一切所需，而且每以穆勒為榜樣，借此激勵自己。現在，他會再次根據這些原則過活。他對差會說：「若主賜福你們，帶領你們給我任何指引、金錢或其他東西，我盼望是從他那裡領受，使我向他感恩，並向你們致謝。」數天后，祝恩賜也向中國傳道會請辭。他們的辭職是在雙方協定和相當友好的氣氛下達成。

經過了很長時間的反省與禱告，戴德生和祝恩賜決定留在條約口岸一起工作。他們想先組織一個中國基督徒的團契，訓練有才幹的華人基督徒，鼓勵他們向同胞傳道。於是他們把資源集合起來，住在一起，共用金錢，就象一個家庭一樣。他們預備回到寧波去，一方面和巴格爾醫生同工，一方面建立華人教會，訓練工人。

6月7日，他們接到消息：三位中國傳道會的傳教士——侯爾（Charles Hall）。侯爾太太和麥麗芙（Magrath）小姐——經過了六個月的航程，現已抵達黃浦江口。戴德生和祝恩賜立刻趕到碼頭迎接他們。經過一周的準備，一行人便齊赴寧波。到達目的地後，侯爾夫婦和麥麗芙小姐暫時住在巴格爾醫生座落于租界旁的家中，而祝恩賜全家和戴德生則搬進陸賜牧師在鹽門附近的舊房子。

由於瑪莉亞信上的話印象猶新，戴德生儘量避免和她見面。而瑪莉亞也儘量不去探望她的老朋友祝恩賜夫人，恐怕會碰到和祝家同住的那位青年。戴德生和祝恩賜跟隨神的呼召，埋首于佈道工作中，預備離開寧波數天，到附近的鄉村傳教。

一切尚算平靜，但當雙恩賜夫人請瑪莉亞在戴德生和她丈夫離家期間，搬去幫助她做探訪工作，而且陪伴她時，麻煩便產生了。瑪莉亞一定在歐德絲女士面前提到戴德生和祝家同住，所以歐德絲聽見祝夫人的邀請，便怒不可遏，立刻跑去跟她理論。

「我不想瑪莉亞陪你探訪。」她蠻不講理地說道：「而且，讓我告訴你，我知道戴德生先生曾向她示愛，我卻強烈反對。我請你不要為這兩個青年人製造機會。最後，請你答應不把我今天說的話告知戴德生。」

好一個祝恩賜夫人。她雖然勉為其難地答應不去蓄意撮合兩人，因為恐怕歐德絲女士會完全禁止瑪莉亞和她來往；但鼓起勇氣向這位強橫的女士說：「你說的話，我不能不告知戴先生。同時，我也要告訴你，你這樣干涉兩個年輕人的戀愛，實在太過分了。」

之後，祝夫人把事情的始末——告訴戴德生。他才確實知道瑪莉亞拒絕他，並非她的本意。

歐德絲小姐更探望高富太太，要求她答允不為他們兩人撮合。

戴德生決定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親自拜訪歐德絲小姐，跟她傾談一下。

第二十章 好事多磨

歐德絲女士近來把學校交給包森夫人管理，自己則搬到寧波北門附近與陸賜牧師一家同住。1857年7月7日那天，她聽到戴德生想要見她。或許由於她頗佩服這位青年單刀直入的勇氣，她很有禮貌地接待他。

「我來是想問問我在什麼地方開罪了你？」戴德生說：「是否因為我寫信給戴雅姑娘時，只附寄一

信給高富先生，而沒有給你寫信？」

「不是的，問題在於你事先沒有徵求我的同意，就給戴雅姑娘寫信。」

「噢！我很抱歉，但你還是戴雅姑娘的監護人嗎？」

「不，嚴格來說，我不是她的監護人，但至少她的家人委託我照顧她。我認為你和瑪莉亞的訂婚，不會得到她的合法監護人譚恩先生和夫人的同意，我已經把此事通知他們。我不想受人責怪，所以我不能批准你們來往。」

「我明白你處境的困難，你已盡力而為了。但既然你把戴雅姑娘交托包森夫人照顧，我不明白你為何還大力反對此事呢？」

「按禮貌你應該事先徵求我的意見。」

「但我覺得至少應先瞭解戴雅姑娘對我的感情怎樣。當她表明態度後，仍有很多時間徵求其他人的意見。你還有別的反對理由嗎？」

「我想我無需告訴你！」

「但我極想知道，相信你應該告訴我。」

「那我便略提兩點。首先，你是否普利茅茨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的成員？」她說到弟兄會時，聲音哽塞，充滿了不屑。「還有，你是否在禮拜日趕路到寧波，不守安息日？」

「我想我可以回答這些問題。如果你說的普利茅茨弟兄會是指達比牧師（J·N·Darby）的信徒的話，那麼我從未是他們的成員。我自小便屬循道會。我在荷爾及托頓鹹參加的都是獨立教會，皆以新約道理為準則。至於安息日，我喜歡稱為主日，我對這一日當盡的義務都很珍視和尊重。是的，去年十月，我和祝恩賜父子的確在主日趕路回寧波，因為那時祝氏父子極需趕回城裡求醫診治。你大概被謠言誤導，所以才會這樣反對我向戴雅姑娘求婚。你還有其他理由嗎？」

「我說的話到此為止。」歐德絲女士和戴德生的談話便到此結束。

戴德生反復思想，並用了很長時間為此事祈禱。一個壘期後，他有了決定，想先見瑪莉亞，徵求她的允許，讓他可以寫信給她在倫敦的監護人。

7月15日，他乘坐一頂轎子來到瑪莉亞的學校，在天井等候她。那兒全是婦女。包森夫人、寶麗娜和瑪莉亞正要離開。一個機靈的傭人把戴德生帶到熨衣房裡，戴德生交給傭人一張紙條，是他花了一整天去寫給瑪莉亞的信。聽見戴德生的聲音，瑪莉亞立即躲開，但傭人仍是把便條遞給她。

「那位外國先生要我把這個交給你，他在等待回音。」

瑪莉亞捧著信讀，雙手不住顫抖。信上這樣寫道：

親愛的瑪莉亞小姐：

上周我和歐德絲女士會談，得悉她曾去信給你在英國的監護人，提及我在上海寫信給你之事，在未得到回復之前，她仍會反對我們來往（理由她不願說）。經過禱告後，我覺得應該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這並不是我個人的意見。當然在有所行動之前，我希望能先和你面談。我誠懇地請求你抽幾分鐘時間，與我見面。——讓我附帶地說：那些為我祈禱，給我意見的人，都認為與你面談是重要而必須的。

瑪莉亞把字條拿給包森夫人及姊姊看。

「你不該見他。」寶麗娜說：「歐德蘭女士不會批准的。」

包森夫人也同意。於是，戴雅姊妹兩人便溜出門，到高富牧師的家去了。由包森夫人接待戴德生。「上樓來，到客廳坐坐。」她說。

包森夫人是個聰明人，又有經驗。雖然她由歐德絲女士那裡接管了學校，但她不至於凡事都要看歐德絲女士的臉色。戴德生把上周和歐德絲女士會面的情況一一告訴她。

「在我寫信給瑪莉亞的監護人之前，」戴德生總結地說：「我想知道瑪莉亞對我的感情是否一樣？」包森夫人猶疑一下，然後說：「是的。」

第二天，即是7月16日，瑪莉亞寫了一封長信給她的姨父母，告訴他們她於四月寫了一信，但歐德蘭女士不准寄出。在信中她又告知她的監護人，她對戴德生已萌愛意一年多了，也時常為他禱告。當她接到戴德生求愛的信時，她感到自己的禱告蒙主答允，同時覺得歐德絲女士的反對有點不近人情。她說：「我覺得戴德生先生在整件事情中，表現出基督徒應有的態度。」她繼續說：「自從兩周前戴德生回來寧波後，我們未曾交換過片言隻字……雖然我有時覺得世上最大的快樂就是能夠愛他，和他在屬靈上及其它方面有親蜜的交通，但我並不期望他成為我的至愛，因為萬人中只有耶穌是我的至寶，是完全可愛的。……」

在七月的一個酷暑天裡，瑪莉亞和包森夫人談起戴德生。她們一起讀著詩篇六十九篇的話：「不要掩面不顧你的僕人，我是在急難之中，求你速速的應允我。……」之後，瑪莉亞祈禱說：「親愛的天父，如果沒有不對之處，求你准許我和戴德生見面。」她記述道：「安排大家見面是很容易的事，但我希望是主的旨意，而非出於自己的意思。」

那天下午。婦女祈禱會在祝恩賜夫婦及戴德生所住的房子裡舉行。瑪莉亞也隨著包森夫人赴會。戴德生覺得那天晚上不宜留在家裡，所以打算到城外探望一位經商的朋友，並且看看幾箱剛從上海運來給他的新約聖經。但黃昏前下了一陣大雨，不宜拿著書走來走去。

所以，他只得留在家裡。他拿了筆和紙跑到頂樓，準備呆在樓上，直至晚飯的時間。突然間，一個意念湧上心頭：我一直祈禱能與瑪莉亞面談，難道這是主安排的及時雨，使我不能外出嗎？

「親愛的主，」他求告說：「請給我一個清楚的啟示，使我知道應否在瑪莉亞離開之前下樓去！」

就在禱告之後不久，他聽到敲門聲。僕人進來說：「有一個傳教士來訪，請戴先生下樓和他見面。」於是他下樓去，和訪客談了沒有幾分鐘，他便告辭了。這時包森夫人和瑪莉亞還未離開，可能因為下雨的緣故，她們的轎子來遲了。

戴德生相信這是神的引導。他對祝恩賜說：「可否請你轉告瑪莉亞，我想和她談一談。」

祝恩賜進入房間時，瑪莉亞正在低頭禱告。她抬頭一看，祝牧師正向她招手。

「戴德生先生請求與你一見。」他說。

「正是求之不得，」瑪莉亞說：「不知是否只有我們兩人，或是容許有第三者同在？」

「聽憑尊意。」

「那麼，我希望包森夫人也在場。」

祝恩賜領兩位女士到樓上的書房，數分鐘後，戴德生便推門進來。這是回到寧波之後，戴德生和瑪莉亞第一次面對面相見。

戴德生看到瑪莉亞面龐上的蒼白和焦慮。

他說：「我很抱歉，帶給你這許多的煩惱。我之所以想見你，是要徵求你的同意，使我可以寫信給譚恩先生夫人。」

「我同意，」瑪莉亞說：「我已經寫信給他們，並打算再次去信。我要告訴你，我拒絕你的求婚，是受歐絲小姐所迫。自此之後，我一直痛苦難過。現在我想大家最好一起為此禱告。」對於這一個提議，戴德生囊衷心贊成。於是，三人便一齊跪下祈禱。

第二十一章 額上的玉手

戴德生立刻提筆給譚恩夫婦寫信。他在信末寫道：「因此我愉快地把這件事交托給帶領一切的主，並且求他引導你們作出止確的決定。。希望你們批准我倆的結合，或是由得戴雅小姐跟隨主的帶領而自行作出決定……」他也把一些朋友的姓名列在信中，作為他的諮詢人，包括中國傳道會在內。他把信的副本寄給瑪莉亞，並附有一張便條，上款稱呼是「最親愛的瑪莉亞。」也許沒有人知道包森夫人也寫了一封信給譚恩夫婦，幫助兩人說好話。

信寄出後，需等待回音，在這之前，一切如常。戴德生又在橋頭街租了一所房子，作為他和祝恩賜共用的佈道所，也兼作診療所，幫助一些抽鴉片煙的癮君子戒煙。

在與瑪莉亞會面之後約一星期，戴德生收到歐德絲女士寄來的一封信。她聽聞二人會面，不禁雷霆大怒。她在信上說：

先生：當你來見我時，你說過……不曉得戴雅小姐還未足法定年齡……但當你從我那裡知悉戴雅小姐的情況後，竟然趁機利用她年少無知，引誘她做出越軌的事……在我和她姊妹均不在場的時候，出現在一個純粹宗教聚會中，向戴雅小姐提出那禁忌的問題。我對你這種無禮的行為極其錯愕，使我不得不清楚地表明態度。我得告訴你：如果你不等候戴雅小姐的姨父母同意，仍繼續跟她往來的話，我將被迫採取一些嚴厲的行動，你得好自為之。……一個自稱傳教士的人，卻如此熱心地「引領」已故宣教士的女兒，那真不是一件名譽的事。那位宣教士死而有知，一定極之不悅！

戴德生把信給祝恩賜夫婦看。祝夫人讀後，覺得信上的言辭和態度都非基督徒所為，令人噁心。戴德生也把信給瑪莉亞看，好讓她有心理準備。可憐的瑪莉亞！多年後，包森夫人的孩子還記得：那時的瑪莉亞常常生活在愁苦之中，每日以淚洗面。

這時，歐德絲女士到處對人說戴德生配不上瑪莉亞，因為他「沒有學位，沒有地位」。瑪莉亞寫信給弟弟，為戴德生辯護，指出歐女士這種勢利的指責是不盡不實的：「戴先生受過五年的醫學訓練，還差六個月就可以取得文憑，但差會認為中國的呼召更加緊急和重要……我們的父親也不是還差一個學期便取得獎學金嗎？但他認為傳道更為重要，所以放棄他的法津學位……我覺得戴先生就好象我們親愛的父親，如果他還在生，他一定會同意我們。……」

那年夏天真是酷熱難當；但戴德生覺得稍比過去兩年容易忍受，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時不時喝一口淡酒」。

消息傳來，以前曾和戴德生一起到內地傳教的郭達門（John Quarterman）患了重病。據巴格爾醫生的診斷，他是染上天花症。戴德生聽到消息，便自告奮勇要去幫忙照顧他。他說自己並無家小，而且最近種過牛痘，可以預防傳染。

郭達門已經病入膏肓，戴德生只能盡量減輕他的痛苦，幫助他去準備「迎接前面的喜樂。」

「這終能朽壞的，一定會被那不能朽壞的取代。」他作這樣勸慰說。

「這取死的身體一定會換上那水恆的身體，」郭達門同樣回答。

四天之後，郭達門終於與世長辭。戴德生寫給妹妹戴賀美說：「他有甜蜜的結局。」

過了不久，戴德生卻發起高熱來。可能是他過於辛勤照顧病人，也可能是感染了病毒。總之，他發起高熱，臥病在床。10月20日晚及21日凌晨，他有一個奇怪的經歷。他自己卻相信那是在神智不清下的一種幻覺。

凌晨三點鐘時，他好象聽到外邊街道上傳來一些聲音。他正發高熱，連放在房內另一邊的表發出的「的嗒」聲也忍受不了，所以用布把表包起來。街上的聲音更使他不能入睡，於是起來讀聖經，好一會才再躺下來。但他心還是心緒不寧，如他自己所記：「心跳得象驚弓之鳥」，精神「興奮得難以入睡」。

突然間，「我好象感到瑪莉亞無聲無息，就如空氣般來到我面前。平安與寧靜好象悄然臨到，我確知她就在那裡。有好一陣子，我好象被魔術定住，我閉著眼睛伸出手來，她用她柔軟的手輕輕握著我的手，我不禁睜開眼來，感激地望看她。

「她示意我不要作聲，又將另一隻手放在我的額上。我覺得頭痛正在消滅，熱也退去，好象沉到枕頭下。

『不要害怕，不用不安。我是你的瑪莉亞，你是我的戴郎。保持平靜，好好安睡吧。』她微聲地說。

「就這樣，我便睡著了。」戴德生記述說。

翌晨八時醒來，熱已全退，但身子仍然軟弱無力。戴德生憶述道：「那是個甜蜜的夢（但我當時和現在一般清醒，我親眼看見她，又觸摸到她，就如我現在看見桌上的紙、摸著手中的鉛筆一樣。）……如果不是神保守，使我事先種了牛瘟，那一場天花病，可真不堪設想。」

不知甚麼原因，瑪莉亞的姊姊寶麗娜現在卻反過來反對戴德生和妹妹的婚事。她本人在不久之後將要下嫁包爾騰，並且計畫把妹妹接到上海和他們同往。可能她想兩地相隔，交通不便，或許會令妹妹漸漸冷卻對戴德生的愛。戴德生很擔心，決定請包森夫人勸瑪莉亞不要到上海去。他知道瑪莉亞正在陸賜牧師夫婦家裡幫忙姊姊籌備婚禮，不會住在包森夫人家中，所以他放心拜包色森女人，不用擔心別人說閒話。

但當他抵達包森夫人府上時，卻有意外的驚喜。

「我想我可以無所顧忌地和你談談吧？」他對包森夫人說。

「並不如此，瑪莉亞小姐正在屋裡。今天早上歐德絲女士把她帶回家來。不過，你還是可以進來坐坐。」

她把戴德生引進客廳。

「你在這裡等一會，我叫瑪莉亞不要下樓。」

對於戴德生而言，這就如禱告蒙允一樣，是一個最佳的良機，可以告訴瑪莉亞不要跟姊姊到上海去。

「啊，請讓我跟她談談吧！」他懇求說。

「不，恐怕這又惹爭端。」包森夫人說。

但當她剛離開，瑪莉亞卻從另一扇門進到客廳來。她看見戴德生，很是驚訝；當然他的反應也是一樣。然後，包森夫人回來了，在她面前，戴德生把他的疑慮一一告知瑪莉亞。

瑪莉亞說：「我知道姊姊的計畫，我已經決定不隨她到上海。」

包森夫人說：「我想為了避免麻煩，最好還是把今天戴德生到訪的事報告歐德絲女士吧。我們都不希望不盡不實的消息傳到她耳中。我會告訴她今天的見面完全是巧合的。」

原來寶麗娜希望妹妹和美國傳教士艾志信（William Aitchison）來往。戴德生聽聞這位他在主裡尊敬和愛戴的艾志信，為了瑪莉亞而茶飯不思，心神恍惚。

他想：如果我可以公開和瑪莉亞來往，可憐的艾志信便不會自作多情了，因為他註定是失望的。他決定把情況解釋清楚：

「事實上，我們正在等待瑪莉亞監護人的回音。在這期間，我們認為我倆已經訂婚了。」

這時候的瑪莉亞一定是充滿魅力，叫人神魂顛倒。是否她苗條的身裁？還是她淡棕色的頭髮？又或者是她淡淡的眼神，倍增她的嫵媚？

有一個叫姬勒德（Gallard）的荷蘭人來到寧波，戴德生邀請他在橋頭街的佈道所暫住。一天晚上，兩人正在閒談之際，姬勒德側過頭來，輕聲地耳語戴德生，好家是關於一件重要的秘密似的。

「我寫了兩封信，分別向德國和荷蘭的兩位女士求婚。但我現在卻被可愛的瑪莉亞深深吸引了，我願選擇追求她！」

戴德生心內「極其憤怒」。

他冷冷地說：「如果她們三人都答應你的求婚，你怎麼辦？」

戴德生聽到瑪莉亞還是要跟著姊姊寶麗娜前往上海。他想：我真盼望早日收到譚恩先生和夫人的信！於是他決定再與瑪莉亞會談。

11月14日，他探望美國浸信會的一對傳教士——勞爾敦（Knowlton）夫婦。他們的住所離瑪莉亞家不遠。勞氏夫婦也將要到上海去，勞夫人答應替戴德生寫信給瑪莉亞：

親愛的瑪莉亞小姐：

我知道你可能會到上海去，我們也準備於下週一赴滬。我想請你來捨下一敘，跟你商談一件小事情。如果方便，見字請即前來——

勞爾敦夫人敬啟

又：如果現在沒空，請通知何時前來！

瑪莉亞看到字條，立即往勞爾敦夫婦的家裡去。勞夫人把她帶進戴德生的房間內，便先行走開了。這次是這對愛侶第一次兩人單獨相會，他們並肩坐在沙發上，戴德生用手輕抱瑪莉亞的纖腰，另一隻手緊握著她的玉手。他事後記述說：「她給我一個香吻……比數瓶奎寧水、鉢酒或其他補藥更為有效。我從未感到如此雀躍和健康……她是那麼可愛、尊貴、純潔和虔誠的一位女孩子。現在我知道她所經歷的一切，我比從前更愛她，更仰慕她。」

他們共度了六個小時，並且毅然決定：無論譚恩夫婦是否批准，他們也必訂婚。

從戴德生給他妹妹戴賀美的信看來，瑪莉亞可能不止給他一個「香吻」而已，信上說：「我盡可能讓她

補償我過去數月來應得的吻！」

第二十二章 她是我的珍寶

為了對歐德絲女士表示敬意，戴德生和瑪莉亞打算第一個通知她有關他倆訂婚的消息。在一個星期一的傍晚，戴德生拜訪歐女士，告知她發生的事情。歐女士沉默不語，戴德生心想她可能已對她自己的影響力失去信心。

但第二天，瑪莉亞卻收到歐女士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作為你的監護人，我吩咐你立刻前來見我，不得遲延。」

瑪莉亞也回字說：

「我不能視你為我的監護人，但作為一個尊重你的朋友，我樂意隨時上門拜候。」

之後，瑪莉亞又接到歐女士另一張字條，指出瑪莉亞是「沉迷了」，而且她很高興地引用陸賜牧師的意見，認為戴德生「應受處罰」，陸賜又說如果是他主領聖餐，他不會容許戴德生一同領受。

然而，終於也有好的消息！

瑪莉亞接到等待已久的信，是姨母譚恩夫人寫來的。當她打開一看，不禁雀躍萬分，趕忙寫信通知戴德生：

我親愛的：

我接到姨母的信，說他們兩人都沒有聽到任何應該反對我倆來往的理由。見字請即前來。

你所愛的瑪莉亞

在倫敦的譚恩夫婦，得到皮爾士（George Pearse）一再保證戴德生是個有為的青年。皮爾士是譚家的老朋友，他對戴德生請辭離開中國傳道會，並沒有懷恨在心；而且他認為歐德絲女士之所以反對瑪莉亞與戴德生的婚事，原因是不願意她離開她的學校。皮爾士也分別去見戴德生和瑪莉亞，向他們問好及祝賀。

譚恩夫婦對瑪莉亞說：「我們完全贊同你的選擇。」又在另外一封寫給戴德生的信中說：「我們完全同意你的提親。」

現在，戴德生和瑪莉亞正式宣佈訂婚了。他們每天都在一起，但歐德絲女士出奇的沉默。譚恩夫婦唯一的意見是瑪莉亞應該等到成年才可結婚。那就是說1858年1月16日，即是再過一個月罷了！

那年的耶誕節，是戴德生平生最愉快的一個聖誕。他倆參加了不少聚會。其中一個是在美國長老會的倪維思（John Nevius）家裡舉行的，邀請寧波的年輕西教士參加。戴德生和瑪莉亞一起赴會，會中還遇上夏羅拔先生（後來是夏羅拔爵士（Sir Robert Hart），他曾經追求瑪莉亞。

他們圍著桌子玩遊戲，大家把手放在桌底。瑪莉亞心裡想著風度翩翩的未婚夫婿，忍不住在桌底下用力緊握他的手，表示自己的心意。但她不知所握的手，卻是倪維思的。倪維思有點意外，但隨即猜想是有人弄錯了，他握著那隻手，開玩笑地用力回敬一下。瑪莉亞這時才知道自己弄錯了，想立即縮手，卻被倪維思緊緊握在。她滿面通紅，眼眶含淚，羞得不敢抬頭。倪維思怕玩笑開得過分，立即鬆手放人。

從英國寄來一封信，是寫給戴德生的。

發信地點是布裡斯托 (Bristol)，日期是 1857 年 12 月 9 日。內文如下：

親愛的弟兄：

我很高興可以奉上四十鎊，那完全是主垂聽禱告，為你預備的，希望使你更得激勵，知道主時刻聽我們的祈求。你若有需要，切要求告他。

我聽到你專心一意地仰賴主供應你生活所需，很感快慰。我自己在過去二十七年多，也證驗了他的信實，每次我把我的需要交托他，他都供應……我真想多寫，不過還有千萬信件和其他工作需要處理，謹此擱筆。

主內愛你的弟兄

穆勒

穆勒雖然忙碌，但還是時常給戴德生寫信，並在信內附有一些金錢。每次都使戴德生得著很大的鼓舞。

戴德生和瑪莉亞開始籌備婚禮。瑪莉亞希望他穿上英國式的禮服，所以戴德生開始把前額的頭髮留長，同時打算剪掉辮子。但瑪莉亞隨後又改變主意，因為戴德生前額的頭髮來不及留長，而且她已經不習慣看見他穿上英國服裝。他們請高富牧師主持婚禮。

在戴德生給母親的信中，他如此描述他的准新娘：「我真希望您認識我可愛的瑪莉亞。她是我的珍寶，是我渴望的一切……願神賜下他豐富的福分，並使我們不致以彼此為偶像。」

1858 年 1 月 20 日清晨，陽光普照，一個大喜日子來臨了。

剛滿二十一歲的瑪莉亞，身穿灰色絲裙，頭上披著婚紗，極美麗動人；戴德生穿著一件中國式的長袍，背上掛著長長的辮子。高富牧師主持婚禮，會眾齊唱「遠離偶像」。可借歐德絲女士和陸陽夫婦都沒有出席。連「媒人」祝恩賜夫人也不能參加婚禮，因為她剛接到母親逝世的消息。

之後，他倆還在英國領事館舉行結婚儀式。美國領事借出私人的轎子——那是寧波市內最寬敞、最漂亮的轎子——供他們乘坐。共有二十四位朋友參加婚禮，包括英艦上的一些官員。結婚證書由副領事麥道時 (Thomas Meadows) 簽署，他的助理夏羅拔則負責把證書交予新人。夏羅拔因而獲得新娘子的一個香吻——可算是給他的一點安慰吧！

隨後他們回去參加郭達門的妹妹為他倆預備的茶會。婚禮過後，戴德生要把結婚的手續費付予英國領事館，但麥道時堅決不收，說：「你時常替我翻譯，也是分文不收啊！」

他們在寧波郊外一所寺院度過三星期的蜜月，遠離鬧市的繁囂和夏天的酷熱。他們帶著廚子、僕人和挑行李的苦力，先從運河乘船出發，然後坐轎進入山中。但這只能算是一邊工作，一邊度蜜月，因為祝恩賜患病，他門每個週末還得回到寧波主領聚會。

在深山寺院中，戴德生這樣寫道：「我們真快樂！……他答允了我們所有的祈求，排除一切障礙和反對，堅固我們對他的信心。」

「啊，得與你深愛的人共諧連理，真是好得無比，這份福氣非筆墨所能形容，也非想像力所能意會！這裡沒有失望。每一天對你的愛人多一點認識，就令你多一分驕傲，多一點快樂，也多一點向賜福者謙卑和感謝。她是主賜給我的珍寶，是世界上最好的禮物。」

在離寧波九哩外東湖邊的一個村落中，戴德生和瑪莉亞租了一間房子。蜜月結束前，他們邀請朋

友來作「家庭會議」，商量平時在此進行佈道，週末則回寧波工作。

但不如意事不久便臨到。瑪莉亞感染了腸熱病（傷寒）。戴德生把她帶回寧波，和祝恩賜夫人一起悉心照料她，但數周後仍全無起色。到了她稍為好轉時，戴德生卻病倒了。直到四月，兩人才逐漸痊癒，在包森夫人家中調養，享受家居的寧靜和她花園中的玫瑰。在同月寫給母親的信中，戴德生除了報告他身體康復的消息外，也給母親帶來另一喜訊：她快要升祖母了！他當然請求母親為他們代禱，他說：「我不知如何告訴您，我多麼愛我的妻子！我對她極其滿意……她的完美超過我所想所求……。」

他們把橋頭街的學校和教堂（就是戴德生婚前住的地方）大事裝修，把頂樓擴建，加建了幾個房間，並添置一些中國式的傢俱。祝恩賜夫人開玩笑地說戴德生已作好準備，招待來訪的客人。

戴德生的藥房又再開業，他也恢復醫治那些「癮君子」。他發現病人信主後可靠著信仰戒鴉片煙，效果遠比藥物治療好得多。瑪莉亞也辦了一所女校，共有九至十名女童，由她以前一位學生幫助打理。雖然捐款數目不大，卻足夠開支。瑪莉亞自己的薪金勉強夠她個人衣食開銷。

在橋頭街聽戴德生講道的人當中，有一個人名叫倪永發，他是寧波的棉花商人，也是一派改革佛教的領袖，他那一派佛教徒只追求真理，不拜偶像。在聽完戴德生講道後，他站出來對會眾說：「我父親和我多年來不斷追尋真理，並四處遊歷，仍無法獲致。在儒家、佛教和道教之中，我未能找到安息，但今晚我卻找到了！從此以後，我要相信耶穌。」

倪永發把戴德生帶到他的佛教徒當中，向他們解釋自己的轉變。他說話清楚有力，使戴德生印象難忘。另有一位佛教徒也悔改歸主，和倪永發同時接受洗禮。

倪永發問：「英國人認識福音多久？」

「大概幾百年吧！」戴德生緬腆地回答。

「甚麼？」倪永發大聲歎道：「為何你直到現在才把它告訴我們。先父尋求真理二十多年，可惜志未籌而身先；為何君不早來？」

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

1858年6月，英法聯軍與中國的戰爭宣告結束。英、俄、美、法與中國簽訂天津條約，增加十個條約口岸，開放長江內河的通航權，容許各國公使駐于北京，外國人可以在條約口岸之外旅行和貿易，基督教也得到政府的明文保護，不論外國傳教士或是華人信徒，其宗教信仰皆在條約保護之列。當然，執行時的寬嚴程度，則全憑當事的官員了。

基督教團體的熱烈反應，可以中國傳道會為代表《海外佈道雜誌》報導說：「感謝神！誠心的感謝他！全中國都開放了！半個世紀的禱告已應驗！……中國的佈道工作進入一個新紀元。新的疆土、新的省分，地大人眾，有些省的人口比歐洲國家還要多……」

現在，歐德絲女士和陸賜牧師夫婦的態度已經比較友善；寶麗娜在上海也常來信，再無怨言。從英國寄來的手風琴雖然在途中弄濕，並損壞了，但戴德生終於把它修理妥當，夫婦二人閒時互相彈琴唱和。

不過，不幸的事在是年秋天接踵而來。八月底，他們收到上海包爾騰的短柬，傳來寶麗娜死亡的噩耗。她是患霍亂死的，才二十三歲。三十二歲的包爾騰，已經歷過一次喪妻之痛，現在又再遭受打擊。他以後還是回到佈道的崗位，與艾志信一同工作，但今年後提起他深愛的寶麗娜，還是滿眶淚水。

此外，瑪莉亞的胎兒在十月日早產了，懷胎只有七個月，生後不久就夭折了。瑪莉亞寫信給戴德生的母親說：「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把肚子裡的胎兒奉獻給神，我想他一定接納我們的心意。」

十二月下旬，寧波的外國基督徒及中國基督徒均慶祝另一個嬰孩的生辰，他是在一千八百多年前誕生的。在 1858 年，戴德生的教會增加了五位中國信徒。慶祝聖誕那天，有許多節目和遊戲，也有唱詩，並由戴德生、祝恩賜兩人短講，充滿一片歡愉。加上有一位中國信徒奉獻成為傳道人，使這一季的聯禱會分外與別不同。

那裡有死亡，那裡也有生命！

戴德生還是用很多時間幫助那些「癮君子」，在他治理下，不少人能夠成功地戒除此惡習，他的聲名也日漸響亮。

一個星期日的晚上，有人把一個吞鴉片煙的病人帶到戴德生面前，這人企圖尋死，所以吞食了過量的鴉片。雖然經過一天的講道及其他忙碌的工作，戴德生還是盡力替病人診治。他嘗試令那病人嘔吐，但他三番四次地掙脫眾人的束縛，到處亂跑，卻每次都被捉回來。這樣一直擾攘到凌晨二時，戴德生才能睡覺。第二天早上，戴德生記述說：「他今晨前來多謝我救回他的性命。」

1859 年 7 月 31 日，禮拜日的清晨。寒暑表上的溫度是一百零四度。

早晨的主日崇拜只有祝恩賜一人負責。戴德生和瑪莉亞在樓上的一個房間裡，還有權充醫生及「接生」的祝恩賜太太。瑪莉亞順利產下一個女嬰，取名戴恩惠（Grace Dyer Taylor）。戴德生寫信報告榮升祖父母的雙親說：「我一直希望得到一個小瑪莉亞！」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或許是因為酷熱，使人的性子變得暴躁，寧波城中又煽起一股仇外的情緒，巴格爾勸瑪莉亞暫時離開城市，到城外河畔的醫院住，以策安全。瑪莉亞到了醫院後，寄信給戴德生，上面寫道：

我最親愛的良人：

巴格爾醫生及夫人已經親切地收容你飄泊的妻子……我在途中所見的群眾並不怎麼激動，不過鹽門卻關了。在我來到城門之前，我遇到祝恩賜先生。他轉頭看我時，閘門已開了，讓我通過，沒受到任何攔阻……不知什麼時候再能夠吻你，感覺你有力的臂膀環抱著我？我親愛的德生、親愛的丈夫，願神賜福你，保守你不受任何的傷害……

八月時，巴格爾夫人患上霍亂，戴德生便負起管理醫院及診所之責。三十六小時之後，巴格爾夫人去世，留下巴格爾醫生及五個孩子。對巴格爾來說，這是極大的打擊。

自從 1807 年馬禮遜（Morrison）來華始，已有二百多位傳教士步其後塵。其中四十人喪失了性命，五十一人的妻子去世。然而，祝恩賜卻如此

說：「如果讓我們重新選擇，我們還是選上這個地方做同樣的工作！」他的態度可說是傳教士的表表者。

目前，巴格爾別無選擇，他決定帶著五個孩於回到蘇格蘭的故鄉去。很多人心想：這豈不意味著不能再靠他一流的醫術賺錢，支援醫院的工作，醫院甚至可能因此結束。

戴德生可不同意。他說：「一座剛走上軌道的醫院怎能空置不用。如果神容許它繼續開辦，他定會有足夠的供應。」

九月中旬，戴德生正式接替了巴格爾的工作。他和瑪莉亞搬進醫院隔鄰巴格爾的房子裡。「為了應

付這項工作的龐大開支，」他說：「我必須仰望主。以後數星期，到來醫院求診的病人減少了，直至戴德生建立自己的聲譽後，他們才逐漸回來。然而這些新的責任和繁重的工作，也帶來沉重的壓力，令到他的健康受損。瑪莉亞說戴德生這時的臉孔「又瘦又長」。

終有一天，戴德生的老朋友兼廚子來對他說：「我們只有最後一袋米了。」

戴德生回答說：「那麼主的供應也必然近了。」

說得對。就在此時，他收到布迦（William Berger）先生的一封信。「我承受了父親的遺產，」信上寫著：「但我不會改變我的生活。信中附上五十鎊，請隨意使用。倘有需要，也請來信告知……」

戴德生和瑪莉亞把他們的中國助手召集一起，把信譯成中文讀給他們聽。

[哈利路亞！]連平日不太表露感情的中國人都同聲喊出讚美主的話，然後跑到各個病房，把這好消息告訴所有病人。

到了1860年3月，橋頭街的教會已經有二十一名會友。除了那位棉花商人倪永發外，還有一位姓丘的教師和他的母親，一位姓馮的織籃工人，一位姓王的農夫和另一位姓王的畫師。戴德生按著衛斯理·約翰的模式，委任兩位元中國信徒負責查經班，讓他們從責任中得著經驗。來醫院就診的人也逐漸增加，戴德生說：「我的工作超過了我的時間與能力所能承擔。」

他寫信給母親道：「……我應該告訴您，我最近的健康情況不佳，愈來愈感到力不從心。所謂『能醫不自醫』，……我對自己的診斷結果應有幾分的保留。不過，我想……我可能感染了肺病……瘧疾又或多或少損及我的肝和脾……或許我可能會被遣回家休養一些時日。」

到了四月，他的病情使他不得不懷疑自己能否活過這個夏季。另一方面，他寫信給父親說：「回英國一趟，或許能使我的身體康復，又或者可以激勵其它人來華，負起我無法繼續的工作。……」另外一位醫生的意見也是一樣：戴德生早該離開中國了。因此，他們在六月終於決定返回英國。據戴德生和瑪莉亞所知，此去可能永不重回。

第二十三章 取得資格

戴德生邀請了一位中國信徒跟他一起回國，這個人的名字是王立群。他會幫助戴德生把聖詩和書籍翻譯成寧波話，也幫忙修改寧波語版本的新約聖經，以及教導准傳教士學習中文。當然戴德生盼望留英的經驗對王立群會有助益。

他們訂購了「銀禧號」的船票。「銀禧號」是一條新的三桅杆帆船，船長名叫鐘斯（Jones）。他給戴德生的第一個印象是個脾氣暴躁的人，看來航程中可能會遇到許多不愉快的事。

在還未啟程之前，戴德生收到英國的妹妹露薏莎的信，帶來一個大好消息：她已經悔改歸主。戴家的人相當獨立自主，雖然家裡向她施壓力，但她等到二十年後的今日才作出決定，相信她會持守所信的。

「效忠于主，」戴德生立刻回信道：「我親愛的妹妹（現在也是親愛的主內姊妹），憑著心裡真正的相信，你一定會得到滿足的喜樂。」

1860年7月18日，他們的船從上海來到長江口下泊，預備明早起航。戴德生來華已有六年，瑪莉亞則有七年半。他二十八歲，而她則二十三歲。兩人向中國揮手道別，在19日的黎明，船就啟碇，揚

帆直出中國海。

戴德生對鐘斯船長的第一個印象不大好，以後更證明他的看法不錯。鐘斯船長不但脾氣暴躁，而且不可理喻。戴德生的小女幾恩惠才滿周歲，由於出牙的關係，整天在啼哭。

「我不准許你們的嬰兒這樣哭。」船長說。世界上恐怕很少看見這樣無理的要求！

戴德生的反應如何，並沒有特別記載。但在7月22日，他卻鼓起勇氣請求船長讓他在船上舉行崇拜聚會。船長的回復令他感到很高興：他竟然答應了，可能是希望唱詩的聲音蓋過小恩惠的哭聲吧！總之，此後每個星期日戴德生都在船上講道。

航程並非風平浪靜。船上許多搭客，包括戴德生在內，都患上了痢疾，瑪莉亞又染上腸胃炎，他們艙房的床鋪更滿是跳蚤。戴德生因為拒絕在星期日替船長做翻譯和幫助他跟商人討價，使船長極之不滿。

幸好旅程不長，只花了四個月零三天，比一般舊船需六個月要快得多了。11月20日他們清晨醒來，船已經抵達貴利夫遜（Gravesend）。

當他們仍在行程中，中國傳道會經過十年的不善經營，並缺乏對遠東國家的知識，終於宣告解散。

上岸之後，一行四人乘火車到倫敦。王立群從未見過火車，更談不上乘車旅行了，所以感到極為新奇有趣。戴德生還是穿著中國服裝，瑪莉亞則打扮得非常漂亮，但衣服的款式就顯得不合潮流，十六個月大的小恩惠穿著白色內褲，腿兒長至腳跟。

他們來到倫敦庇士威特區（Bayswater）偉士本叢林街（Wesbourne Grove）63號，那是戴德生妹妹戴賀美和妹夫海恩波的住宅，他們在數月前才結婚。令他驚喜的是，小妹妹露惹莎也在那裡。姊妹兩人正議論著瑪莉亞「過時」的服裝。露惹莎於是幫瑪莉亞換過一件合時的黑色絲裙，配上襯色的外套，也勸戴德生改變裝扮，重新穿上英國服裝。他們在庇士威特住了五個月，在偉士本叢林街的浸信會聚會，跟該會的牧師勞易士（W·G·Lewis）結成好友。

勞易士對戴德生說：「你應該讓人稱呼你為『牧師』。」

以前也有許多人作此建議，但戴德生都不以為然，此次他卻同意了。

12月8日，戴德生全家和王立群向妹妹及妹夫道別，回到闊別多年的班士尼老家。那一年，每個人都度過一個愉快的耶誕節，戴賀美和海恩波從倫敦回來，戴德生親愛的姨母哈拿及姨丈理察也從荷爾（Hull）回來。大家一同歡聚，戴德生覺得他的精神和體力都恢復過來。

可是，他在新年時到倫敦醫院，從前的一位老師吉拉克醫生（Dr·Andrew Clarke）處檢查，結果是不如人意。醫生說：「幾年之內，你不要再出國遠行，連想也不要，否則你性命難保。你的肝臟、消化系統和神經系統都嚴重受損了！」

戴德生還是在忙碌，不讓壞消息使他意志消沉。他有許多翻譯工作，以及推動中國佈道的計畫要去肩擔，就算不能再返中國，也夠他忙一輩子了。他把一本寧波話的聖詩付樣，其他書籍也準備出版。他又在各種雜誌撰寫一些有關中國的文章。在他勸說下，英國聖經公會答應重印羅馬拼音的寧波話新約聖經，由他自己負責編輯和修正，高富則協助他。

他還作出一個重要的決定，就是把家搬到倫敦醫院附近，繼續其未完成的醫學課程。由於沒有拿到學位，使他碰上不少困難。他被推薦到皇家外科學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就讀，大概需時一

年至三年便可取得文憑。

4月3日，瑪莉亞生了一個兒子，取名戴赫拔（Herbert HudsonTaylor）。4月9日，戴氏一家和王立群從庇士威特區搬到保蒙街（Beaumont Street）一號，那兒鄰近倫敦醫院，步行只需數分鐘便可到達。戴德生現在把時間平均分配，一半用在醫學課程上，另一半則用來修改寧波話的聖經。

還在中國的時候，戴德生曾經寫信給父母，請他們代禱，尋找五位年輕的傳教士前來寧波工作。他父親告訴他諾福克（Norfolk）有一位很好的年輕基督徒，名叫宓道生（James Meadows）。十月，戴德生請宓道生來倫敦保蒙街的家中小住，看看這位青年對傳道的心志和能力，以及有否學習中文的悟性。他們一起禱告，尋求神在宓道生及其未婚妻瑪花（Maria）身上的旨意。經過數星期，戴德生極其滿意。宓道生將是五位傳教士的先鋒，要儘早赴華。在這之前，宓道生先回家過聖誕，並與瑪花共諧連理。

元旦前夕，戴德生聽到一艘頭等快船「挑戰號」正準備遠赴中國，他便立刻和船長取得連絡，安排宓道生夫婦的航程。布迦先生送來一百鎊，作為這對年輕夫婦的旅費。1862年1月8日清晨，宓道生和瑪花便沿泰晤士河緩緩出海，向著中國進發。四天以前，另一艘船也載著巴格爾醫生（Dr. William Parker）夫婦，從格拉斯高（Glasgow）朝著同一目的地出發。

1862年7月，戴德生順利通過了考試，正式成為合格的外科醫生，是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會員（MRCS, England）。現在他可以集中投入修訂聖經的工作，此外還有一個好消息：宓道生夫婦和巴格爾醫生夫婦都平安抵達中國。

是年夏天，戴德生一家在富有的布迦先生府上作客一星期。布迦是一家麵粉廠的東主，住在東格蘭士特（East Grinstead）的聖山（Saint Hill）上。房子華麗，綠草如茵，座落在一湖碧水與塞薩斯（Sussex）起伏的山巒中。布迦先生精明的生意頭腦，配合戴德生高貴的屬靈品質，真是天生一對——但這不是說他們沒有其他長處。

1861年，戴德生參加了在巴納（Barnet）基督教會舉行的一連串聚會，主任牧師賓法特（William Pennefather），是位著名的佈道家，著有「耶穌帶著復活的能力與我們同在」（Jesus Stand among Us in Thy Risen Power）一詩，人稱他為「英國教會的穆勒，一個與神同行的人」。來聽賓牧師講道的，還有著名的聖詩作家般納（Horatius Bonar）、前中國傳道會秘書長皮爾士，以及托頓鹹（Tottenham）弟兄會的會友，其中包括戴德生的老朋友史蒂絲小姐。1862年7月，戴德生和瑪莉亞再次參加基督教會舉辦的聚會。這是稱為邁德美大會（Mildmay Conference）的前身。1864年戴德生也參加了第一次的邁德美大會。

邁德美大會繼續發展成為「凱錫克培靈會」（Keswick Convention），以「在耶穌基督裡合一」為口號。戴德生非常欣賞這種超越宗派的開明態度。在這段期間，他高興地接受邀請，到不同教會裡講道，包括聖公會、浸信會、循道會、長老會、弟兄會及其他的教會。他也以同樣的態度跟許多不同的宣教團體一同工作。

1862年秋天，他又成功地考取皇家外科學院的助產資格證書，成為皇家醫學院產科會員。所以，當瑪莉亞在11月23日誕下第二個男嬰存義（Frederick）時，她便有一位合格的產科醫生隨侍在側了。

不幸的消息從遠在重洋之外的中國接踵而來。一向頗為成功的醫生傳教士巴格爾由於過橋墮馬，跌下河中受傷致死；數月後宓道生的年輕太太又因霍亂而喪生，宓道生寫信給瑪花的母親說：「早死早得冠冕，您的孩子已經在天國裡了！」接著是祝恩賜因為健康欠佳，被迫和家人乘船回國，在途中亦

不治逝世，葬在聖海倫那島（St·Helena）。這一連串的消息，使戴德生盼望及早重回中國，支援當地的同工。

1863年夏天，戴德生一家和王立群在布裡斯托的穆勒家中作客，度過難忘的一周。穆勒現在是三間大型孤兒院的總裁，也是本地極其興旺的伯賽大教堂（Bethesda Chapel）牧師。戴德生被邀在教會中講道，也到孤兒院中向兒童訓勉。

1864年5月，瑪莉亞和王立群到新建的大都會基督會堂（Metropolitan Tabernacle），去聽當時倫敦最受歡迎的司布真牧師（Charles H·Spurgeon）講道。他們一見如故，司布真牧師也請戴德生領會。他們互相仰慕，成為莫逆之交。戴德生在倫敦的中國內地會辦公室中，牆上多年來都掛著司牧師的畫象。

王立群準備回中國，因他實在離開妻兒太久了！為了感謝他協助翻譯及修訂寧波話聖經，戴德生希望王立群在英國的最後數周能過得愉快，便帶他參觀蓋氏醫院博物館、皇家地理學會、國會大樓，以及西敏寺的崇拜。王立群在不同的聚會上發言和道別，然後大家送他到貴利夫遜上船。在同一艘船上，還有兩名傳教士和他們的家人。他們是侵信會的金敦（Edwin Kingdon）和循道會的富勒（W R·Fuller）’兩人都曾受過戴德生的訓練，到中國傳道。

六月，戴氏一家在約克郡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他們或悠閒地垂釣、或是在沙灘上戲耍。6月24日，他們第三個兒子森姆（Samuel）出生了。

這時，英國將領戈登將軍（Charles George Gordon）率領著「常勝軍」，幫助清朝政府剿滅太平軍。在1864年夏天，清兵終於攻克了南京，結束了十六年太平天國的統治。許多基督徒原本對太平軍運動充滿希望，現在已經變為互相仇殺的政治鬥爭，且給基督教帶來誤解和醜譽。約有二千萬人因戰爭、饑荒、疾病而喪生。

在寧波工作的宓道生，逐漸建立了很好的名聲，包森夫人〔當時已嫁給美國浸信會牧師羅爾梯（E.C.Lord）寫信給瑪莉亞說：「年輕的宓道生愈來愈聰明了，他已經可以在翻譯及佈道計畫上作出改善的建議，連工廠上的資深教士也自愧不如。……他給羅爾梯提供了許多資料，對中國的風俗和習慣言之甚詳。羅爾梯在旁傾聽，就如小孩子一樣，……我相信他是一個絕佳的傳教士，配受大家的稱讚。」保蒙街一號的房子細小，現在已經不大夠用。於是戴德生一家便搬到柯本街（Coborn Street）三十號，離開原來的住址東面不到一哩。這裡是住宅區，房子甚大。此時戴德生一家本來還不需要一所偌大的房子，但高富願意替他們負擔其餘的租金，所以他們便在1864年10月6日搬進去。在這時候，戴德生正在作出一個決定，一個使他名留後世的重要決定。

第二十四章 伯萊墩的奇事

「中國人會成為世上最好的基督徒——他們用心鑽研聖經，象他們研讀古代經書一樣。」

戴德生聽過這樣的話，但他知道如果沒有大量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中國人又怎能成為基督徒呢？

他盡力向各差會進行遊說，鼓勵他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內地還沒有福音傳到的十一個省去。他寫信給英國各大教會，又拜訪他們。他們每次都細心聽他講述，並且表示同情，但答案總是：「我們的經費不多，連目前的工作也應付不來，討論增加新的負擔！最好還是等候神把中國完全開放再說吧！」

然而，戴德生這樣想：「如果使徒等到情況轉好的時候才傳福音，哪裡還有歐洲的基督教？如果現存的佈道組織和教會團體不能傳福音，或者不願承擔此責，那麼誰會去做呢？」

當他和高富一起修訂寧波話聖經的時候，他們常常舉目望著掛在牆上的中國大地圖，想起未曾聽過福音的千萬生靈。戴德生想：「今日，又有三萬三千個中國人在沒有神、沒有希望之中死去。」

1864 年底，戴德生開始計畫重返中國，但時機還未來到。他揀選的五位傳教士中，第二位已在 12 月 20 日離英赴華。她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小姐，名叫金樂曼（Jean Notman）。戴德生送她到南安普敦（Southampton）上船。她的船票和行李都是戴德生的支持者捐助的，包括布迦、穆勒和托頓咸的朋友們。戴德生對金小姐的衣物行李，都有詳細的記錄：一件冬天大衣、二條裙子、一襲傘型大裙、三套印花裙、三條內襯裙、六套睡袍、三件背心、十二條長筒睡褲、九件襯衫、一條絲質圍裙、兩打（二十四條）手帕、九對襪子。記錄中還有許多雜項，包括由牙刷到書桌，以及一切零星物件。

1865 年春，他完成了一部小冊，書名是《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要求》（China: Its Spiritual Needs Claims），引起很大的影響。事實上，這本書是戴氏夫婦合作的成果。戴德生在書房中來回踱著方步，把意思說出來，由瑪莉亞手錄成書，就如多年前他的父親口述講章，由母親筆錄時的情況一樣。他為書的每一段祈禱，最後寫成一本很好的書。例如他描述中國地大人眾，用了一個傳神的比喻：「如果中國人排隊經過你面前，以每日走三十哩的速度計算，他們不斷地走，日復日，年復年，也需要走上十七年又三個月，這條人龍才走得完！」

但書中的話並不叫人讀著會感到心安理得：「英國的基督徒能否袖手，坐視不救，眼見這千萬人走向滅亡？他們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不知道福音。但英國卻充充足足的得到這個知識；使英國有今日，也使我們有今天，全賴這福音。我們的主怎樣教訓我們？是否一百隻羊之中不見一隻，也要放下九十九隻去尋找失掉的那一隻？現今的比例幾乎可說是相反的，我們在家守著那一隻羊，卻不理會那九十九隻正走向滅亡！基督裡的弟兄們，想一想我們偉大的救主和領袖賜給我們的重要使命——到世界各地，把福音傳給萬民聽！想一想貧窮愚昧的中國裡有千千萬萬人，竟沒有一個主的門徒願意帶給他們『大喜的信息』，或者告訴他們救恩的福音！……」

這部小書或許使很多讀者難過不已，且它的銷路極佳，多次重印，到 1887 年已經印了七版。戴德生寫成這部書，似乎也經歷不少痛苦。在研究和思想中，戴德生得著更深一層的異象，使他明白要到中國內地傳教，必須有一個**特別的組織**。當然他可以設立這樣一個組織，但應該採用怎樣的體制？會不會引起其他宣教團體的不滿？會否象中國傳道會一般，遭遇同樣的不幸和危機？

雖然有這種種顧慮，但他還是清楚知道設立這樣一個組織是必須的。它將會是一個海外佈道團體，由不同宗派背景，但對宣教、植堂和教會培訓很有負擔的男女信徒組織而成。他們需要借著祈禱，單單信靠神的引導和供給，進入中國內地，向十一省未得之民傳道。這個組織至少需要二十二名傳教士。

他反復地想：是否應該立刻按照計畫去做，還是開始時不要動用太多的資源？他和瑪莉亞、布迦、皮爾士及托頓咸的友人們多次懇切的討論和祈禱，又坦誠地切實商量各種策略和可行性。由於不停思想和考慮，以致他數月來不能好好安睡，每次只睡得兩個小時，有時甚至完全不能入眠。他是否願意跟隨主的呼召呢？他相信在他思考的當兒，每月就有一百萬中國人走向滅亡。

「我想我不該再用理智考慮了，」他寫道：「但我不願降服！最後我病倒了。瑪莉亞對我的心事略

知一二，但我不能對任何人傾吐一切；我不願把這樣一個重擔壓在她的頭上。」

看到戴德生這個情形，皮爾士認為他應該稍作休息。他邀請戴德生在6月24至26日到伯萊墩度週末。星期日早上聚會時，他聽到長老會的牧師鄧尼頓（J M·Denniston）講道，很受感動。之後，據他自己說：「看見一千多基督徒在那裡喜樂地聚會，千萬人卻因不知道福音而失喪，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在沙灘上漫步，靈裡極其痛苦；這時，救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完全降服在他面前，獻上自己，為他所用。我把一切困難和後果交托給他，我和我的同工只能作他的僕人，服從他，跟隨他——由他引導，由他看顧，由他帶領。」

「不用說，平安立刻湧進我煩惱的心裡。在此時此處，我要求他差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國去，十一省每省二人，另加上兩人往蒙古。我把這個請求寫在聖經的頁邊上。回家時滿心喜悅和平安，是多月來沒有嘗過的，同時還有主的應許：他會賜福他的工作，我也必分享他的賜福。我以前曾經祈禱，也懇求別人代禱，求主興起工人到那十一個福音未傳到的省分去，求主使他們奮勇向前，靠賴他的供應，卻從不肯屈服下來，叫自己成為他們的領袖。」

戴德生提字在旁的那本聖經，至今尚存；數天前；我還把它捧在手裡。打開聖經，在約伯記第十八章上面，有戴德生親筆寫下的一行字：「為二十四位甘心而能幹的工人祈禱。——伯萊墩，1865年6月25日」。再往後看，又見幾行字：「爭戰已經結束——只有平安、喜樂。仿佛要立刻振翅高飛，越過車站旁的高山，直朝皮爾士先生的家飛去……那晚睡得真香甜！戴太太以為神在伯萊墩行了奇事！但確是如此。」

他把握時機，立即和皮爾士到倫敦郡立銀行，用「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名義，開了一個戶口，存入十鎊，雖然數目不多，但正如戴德生後來所說，它是「十鎊另加神所有的應許。」

接著下來是一段極為忙碌的日子，主要向著兩個目標努力：一是鼓勵他的家人和朋友為這二十四名傳教士祈禱；另外是馬不停蹄地到英國各處講道。在這些聚會中，戴德生無意強調新成立的內地會，也沒有懇求捐助，而是論述中國的情況，以及神如何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有一位聽過戴德生講道的商人，如此描述戴氏：他說話的聲音很輕，用字謹慎。最使他印象深刻的，是當戴德生談到中國時，他聲音充滿深情，對各差會正在進行的宣教工作報導得很詳盡，但也指出內地還有許多需要。他沒有咬文嚼字，也沒有呼籲捐獻，他的講道只專注在屬靈的影響和能力上。

戴德生在挑選二十四位傳教士的標準上，似乎和一般宣教團體不一樣。英行教會（CMS）及倫敦會派遣的人都先要按立為牧師，最好是大學畢業。所以戴德生不在這些教會裡尋找人選。他要找聰明的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不論男女，但最重要是其屬靈質素。因此，一些少受正式教育的人，還是有機會被選上的。戴德生認為最重要的屬靈質素是——對神的信實絕不疑惑，加上有能力地和甘願地去相信他。

其它差會很少差遣女傳教士，而少數被差的婦女多半是在學校當教師的。從內地會創立始，大門即向適合的婦女開放，愈是年輕愈合適，因為她們會很快學懂當地的語言。內地會的女傳道在中國婦女當中工作，扮演著不可缺的角色。

新加入的人都得接納戴德生和瑪莉亞為領袖：因為只有他們具備在華生活及傳教的經驗。相對而言，戴德生會提供他們基本的訓練，以及為他們預備制服。

戴德生原定中國內地會有六樣特色：第一，它的傳教士並非來自一個宗派，而是從許多教會來的一一只要他們簽署一份簡單的信仰宣言即可。事實上，當內地會不斷發展，它的傳教士還會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

第二，內地會的傳教士並無固定的薪金，只信靠主的供應；所有收入大家分用，不能向外借貸。

第三，內地會不會進行募捐，也不設收捐站；捐獻者的名單亦不公佈。但捐獻者將收到一份注明日期和編號的收據，可與列出之奉獻數目參照比較，然後再對照每年印行之收支報告表。

第四，由於避免重蹈中國傳道會的覆轍，戴德生決定國外的傳道工作不得由國內的委員會管理，應由在中國工廠裡工作的人自行負責，將來也應由在中國的傳教士繼續領導。

第五，內地會的活動必須有系統，並切合實際。要福音傳遍中國，需要有詳盡的計畫，知道如何在一些重要之地建立據點，目的並非增加內地會的人數，而是儘快使福音傳遍整個中華。誰是收害的人，只是次要的問題而已。

第六，為了對中國人民表示尊重，內地會的傳教士均穿著中國服裝，在中國式的房子內崇拜一一而非象寧波一樣的西式教室。

到了 1866 年，戴德生的身體已經完全康復。春天時，他在英國西岸巡迴訪問，分別到過依薩他（Exeter）、托爾庇（Torbay）、普利茅茨（Plymouth）及幹沃爾（Cornwall）的柯靈頓（Callington）。他在托爾庇收到弟兄會一位虔誠而備受尊敬的牧者翟文（Robert Chapman）寄來的信，懇求他到班士得堡（Barnstaple）教會講道。他依約前往；翟文在六、七年後告訴他：「自從你到了中國，我每天都探望你。」意思是每天為他禱告。

五月，戴德生又接受普杰上校（Colonel John Puget）的邀請，到巴納附近的托特烈治（Totteridge）講道。象往常一樣，他預先聲明會中不收捐獻。但普杰上校提出抗議，說從來沒有這樣的規定，不過他最後還是答應了戴德生。

在那次聚會中，戴德生掛起中國的大地圖，告訴會眾關於中國的地理、人口，以及屬靈的需要。普杰上校看到會眾深受感動，因此在戴德生講道後起來發言：「戴德生先生請求我們宣佈在聚會中不收捐獻，但是我覺得如果不給你們一個機會，為中國的傳道工作盡一點力的話，你們必定耿耿於懷。我現在所作的提議，完全是我個人的意見，但我相信也代表了會眾中多人的心願。我希望戴先生不會反、對我們在會中收捐吧。」

然而，戴德生立刻跳起來，說：「主席先生，我請求你還是遵守先前的諾言。雖然我聽過不少贊成收捐的理由，而你提出的理由尤其叫人無可推搪。但我不想會眾現在因為受到情感的影響而進行收捐，乃是希望每一位會友在回家之後，心裡對中國有負擔。並求神指示他們當作的事。」

「反省及禱告後，如果他們認為需要捐獻金錢，那麼他們大可捐給任何差派傳道人往中國去的宣教團體，或者寄給我們內地會的倫敦辦事處。」

「但很多時，神所要的並非金錢的奉獻，而是擺上自己為主到海外工作，又或者把兒女獻上，為主事奉。這種奉獻更勝於金與銀。我認為收捐予人的印象是金錢最重要，但其實沒有一個金額可以叫一個人悔改歸主。我們需要的，就是受聖靈充滿的弟兄姊妹，獻身為主工作。我們絕不會缺少金錢去支持他們。」

當天晚飯時，普杰上校對戴德生說：「我想你可能犯了錯誤。縱使有少數人把些微捐獻交給我，但我仍是認為我們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

第二天甲早餐時，郵差送來一封信，是給戴德生的。它帶來了一個好消息：一艘叫「蘭茂爾號」的船正在倫敦下碇，將於5月20日啟航赴華。整個船艙已經包下來，載送內地會的傳教士到中國去，請戴德生立即到船上視察，看看是否合用。

普杰上校這時才從樓上下來，看來昨晚沒睡得好。他說：「我整晚沒有好睡。」早餐之後，他請戴德生到書房中，說：「這裡是昨晚收到的奉獻，用來支持你的工作。我昨晚以為你不收捐是錯誤的，現在才知道你說得對。昨晚我想起那些中國人一隊隊的走向黑暗，禁不住流起淚來。我問主說：你要我做些什麼？我想我已經得著他的引導，這是我的奉獻。」說著，普杰上校便遞給戴德生一張五百鎊的支票。他說：「如果昨晚收捐，我大概只會拿出幾鎊而已！」當時的五百鎊，價值高於現在的一萬鎊，是個相當大的數目了。

第二十五章 穩渡風浪

雖然有人認為他這樣做是近乎瘋狂，但戴德生還是毅然訂了「蘭茂爾號」的所有船，載著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前往中國。他們甚至把柯本街的風琴也運上船，放在底艙裡。

1866年5月26日，一個風和日麗的清晨，內地會的男女教士和他們的親朋戚友，從各方而來送行，齊集在倫敦的東印度公司碼頭。他們是從跳板踏進這艘兩年船齡的快船上，除了戴德生夫婦和他們四個孩子外，還有十六名年輕傳教士。這包括從蘇格蘭來的鐵匠倪義來（Lewis Nichol）和他的妻子伊莉莎（Eliza）、木匠衛養生（James Williamson）、石匠童跟福（George Duncan）和「女傳道」麥克蓮（Jane McLean），她是賓法特牧師的查經班栽培出來的。來自倫敦的，有兩位大學畢業的姑娘，一位是當書秘的白安美（Emily Blatchley），另一位是福珍妮（Jennie Faulding）。還有女教師包瑪莉（Mary Bowyer），她曾就讀賓法特所辦的聖經學院；另外是木匠蔡文才（Josiah Jackson）和史洪道（John Sel）。此外，尚有愛爾蘭籍的女教師班蘇珊（Susan Barnes）、鐵匠和機器修理師路惠理（William Rudland），包森夫人的女兒瑪麗，戴德生孩子的保姆貝瑪麗（Mary Bell）和瑞士籍家庭教師夥樂義（Louise Desgraz）。最後是一位沒有受過很多教育，但是極其聰慧的勞莉莎（Elizabeth Rose）小姐，她是傳教士宓生的未婚妻。

其時，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有宓道生（James Meadows）、巴克敵（Stephen Barchet）、來自鴨巴甸的農夫甘比治（George Crombie）、蘇格蘭地主的兒子范約翰（John Stevenson），以及金樂曼（Jean Notman）姑娘。神垂聽禱告，多賜給內地會五個工人！

在「蘭茂爾號」船上的人，只有戴德生和瑪莉亞曾經去過中國。他們是沒有得到經濟的支持而到中國傳教。這批教士中有九名未婚婦女，都是預備進入內地傳教的。當時除了條約口岸之外，其他地方均沒有外國婦女踏足。

「蘭茂爾號」是一艘新型的三桅杆帆船，船的外殼是鐵制的。船長貝爾（Captain Bell）在兩年前信主，所以對這批乘客非常愛護。來送船的人有布迦先生夫婦、托頓咸的侯活夫婦、福珍妮的父母、戴德生的母親、以及戴賀美和赫治文。這些人與宣教士齊集在船的餐廳祈禱。之後，「蘭茂爾號」被拖出船塢，大家便開始唱：

「是的，我們分離；
但不是永不聚首。」

「噢，有得瞧的了！」船上的大副白蘭頓（Mr Brunton）先生埋怨說：「我們整船的人都是傳教士，他們整天不停地唱詩，我真希望不在船上！」

許多送行的人隨船到了貴利夫遜，就在那兒揮手作別，互道珍重，始行返回倫敦。

布迦先生離船前，還引用聖經勸勉他們：「不要偏離真道！」

從瑪莉亞的記載中，知道戴德生這時非常興奮。他希望每個人能很快地擔起多樣的工作，所以上船不久，他就開始教授中文和很多其他的事情。他草草做了一個書架，並鼓勵每個人把艙房弄得象家一樣，又把風琴移到船尾艙。閒暇時，他就閱讀威拿氏（Winer）的《新約希臘文法》（Greek Grammar of the New Testament）及華沃夫主教（Bishop Wordsworth）的《利未記注釋》。路惠理描述戴德生說：「他年輕而活躍，和團裡的青年很合得來。」他又描寫瑪莉亞說：「她很安靜，比較成熟，能作出很好的判斷；她的容貌秀美，予人一種安詳的感覺……她把許多時間都放在孩子身上。」

貝爾船長的下屬，包括海員和見習生，共有三十四人。除了船長外，至少還有兩人是虔誠的基督徒。船上有大群豬、羊、犬、鵝、雞、鴨。船長給予這批傳教士很大的自由，任由他們在船上走動。但當船長發號施令吩咐船員工作時，傳教士都知所自律，不到處亂逛。有時還幫忙呢！例如船上需要燒焊，鐵匠倪義來就有用武之地；當船上的水喉出了毛病，機械工路惠理。倪義來和木匠衛養生，便能幫忙把它修好。

船上的膳食很豐富，戴德生真怕他們會被寵壞。初時，晚餐的第一道菜是兔肉湯或雞湯，然後是羊肉、兔肉鬆、雞、火腿、加上馬鈴薯和甘薯。再來的是甜品，可以選擇梅子布甸蛋糕。蘋果餡餅、李子餡餅、黑提子餡餅或大黃餡餅；之後還有乾酪（芝士）。餅乾、乾果、杏仁、葡萄乾和無花果等。吃一頓晚餐需要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

護士貝瑪麗沒有把所有時間用來照顧孩子，她時常和船上的水手一起，成為他們最仰慕的人物。她為他們開設一個聖經班，水手們爭先恐後要來參加。她在六月的報告裡說：「有一兩個人在耶穌裡尋得喜樂。」

船到了赤道附近。「我們差不多都睡在甲板上。」福珍妮記述道：「啊，今天真愉快！海洋真可愛，空氣清新極了……船長待孩子象寵物一般。黃昏的景致真迷人，我從沒有見過如此皎潔的月亮。在月光下我可以引線穿針和閱讀蠅頭小字……我從未想過船上生活竟是這麼愉快。我不能努力工作，我花太多時間去觀看海浪……船上沒有一個難以相處的人……那些年輕男士絕不來麻煩我……我和安美時常一起漫步、並肩談天……戴德生先生有一個錫制的浴盆和吊桶，可以從艙房拋出窗外取水，所以我有時可以享受一下海水浴……」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還是有的。七月，蔡文才請戴德生到船尾艙去和童跟福、倪義來傾談。

「我們的衣物都預備好了嗎？」蔡文才問。

「據我所知都準備好了，」戴德生答：「還差襪子。我怕他們把數目弄錯了。」

由於倫敦方面的出錯，準備的襪子和原定的數目不符。

「我們的物資供應不如布迦夫婦原先所說的一樣，」童跟福說。

戴德生說：「你們最好每人給我一張清單，把不足的物件列出來。」

三人點頭答應。

「我看過一份長老會給傳教士的行李清單，他們和我們很不同呢？」蔡文才說。

「我們從未打算跟他們一樣，」戴德生說：「他們的社會地位不同，他們在中國所穿戴的和我們也不一樣。我已盡力使你們穿得舒適一點，但我很抱歉不能為你們預備其他的衣物，至於襪子的事也很對不起。但你們的衣服都很實用和稱身，為此你們應該存感謝的心。」

在旅途中，戴德生和同工時常聚集開會。他們發現船上水手的態度有所改變，以前喜歡玩撲克的，現在卻讀聖經；以前口中唱的是靡靡之音，現在卻唱聖詩。有一次，他們在船頭的水手艙中聚會，乘客和船員都坐在木板上、箱子上、椅子上，以及船上各處，只有幾個緬甸地躲在統盤後或站在門檻上。

水手都有點害怕白蘭頓大副，他脾氣暴躁、口出粗言，又時常欺負別人。路惠理有時甚至認為他是魔鬼附身的。但是在七月，他突然地改變過來，整個人象溫純了。他懇求史洪道和他一起禱告，又聽戴德生向他讀羅馬書開首數章的經文。他好象明白其中道理，但卻無法應用於自己身上。

八月初，船遇到強風，白蘭頓只是咒詛，而傳教士和悔改歸主的船員卻一起為他代禱。然後，在一個八月的清晨，白蘭頓請戴德生給他讀聖經。戴德生讀到出埃及記逾越節的故事時，就向他解釋神信息的意義——「當我看到血，我就越過這門。」

突然之間，白蘭頓大聲喊叫：「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我以前為什麼瞎了眼？」

他的改變相當戲劇化。戴德生很高興，他記下道：「他開始感謝神，不單為自己祈禱，也為其他船員和貝爾船長祈禱，為他的妻子、孩子和這個宣教團體代禱。」

第二天，白蘭頓的面容似乎也改變了。路惠理記述說：「他把他的下屬都召集在一起，向他們承認以前的不是和無理，同時在基督面前悔改認罪。」

白蘭頓並不孤單。由於在船上舉行聚會和崇拜，以及貝瑪莉和其他人所開設的查經班，水手當中成為基督徒的已經有二十四人了。

9月10日星期一，他們還有幾天就將抵達上海。天色漸暗，好象暴風雨快要來臨。但水手正忙著清洗甲板，希望船泊碼頭時會潔淨如新。但此時，氣壓計不斷下降，海面也愈來愈不平靜。

星期二，狂風已經來到。風勢極強，所有的帆都扯下來了；甲板上滿是水，海浪和大雨把雞、犬、豬、羊、鵝、鴨都打濕了；海水湧上尾艙甲板，直湧進餐廳。船上的人已有兩晚不能入眠，而救生艇也給大浪沖走了。

星期三，風勢減弱，他們可以望到臺灣海岸。

然而到了下個週末，他們知道有另一個狂風會吹來。更糟的是，貝爾船長又患上重病，半邊臉孔都癱瘓了。

他們永不會忘記9月21日星期五這一夜。「蘭茂爾號」甲板四周的船舷都沖走了，大浪毫無攔阻地湧上艙板，聲勢驚人。

星期六凌晨，船上的三角帆和前帆都折斷了。由於波濤洶湧，無人敢採取什麼行動。但是，還在病中的貝爾船長和大副白蘭頓卻不顧一切地走到船頭的水手艙。白蘭頓從那裡爬到前面的帆樓，其他人也跟著攀上去。但船開始猛烈地上下顛簸，不得已只好爬下來。

接著船後的上舷也跟著塌下，海水從側面湧進；兩條桅杆也跟著松掉，之後三面大帆（包括了主帆）都鬆開了，掛在幾條繩索之間，隨著船身的顛簸而猛烈擺動，隨時都可能掉在艙板上。甲板上滿是水，上面飄著木塊、盆子、罐、桶，到處碰撞，有傷人的危險。

生存看起來像是不可能的事了。水手都驚栗非常，放棄了救船的打算。傳教士則同心禱告。戴德生把每個孩子都親吻一遍，路惠理在旁看著，發覺戴德生非常鎮靜。

船長走進餐廳，大聲喊說：「穿上救生衣，船大概不能再維持多過兩個鐘點了。」

傳教士齊唱「萬古磐石歌」(Rock of Ages)。

貝爾船長摸索著回到船頭水手艙中，船員都覺得很絕望，只是蹲著不動。船長拿著他的棒，神情冷酷，驅趕他們回到崗位上去。

戴德生跑到他的跟前。

「不要用暴力對待他們，我們還沒有用盡一切的方法。」說著，他鑽進水手艙中，和船員冷靜地談話。

「我現在還是相信神會平安帶領我們經過這場風浪，但也需要你們小心駕駛，我們才可保存性命——這就要靠你們了。我們會盡力協助，我們也和你們一樣性命危在旦夕哩！」

水手還是觀望不動，但戴德生和其他男教士已經動員起來，把一些飄浮的東西緊緊紮穩。他們工作時，常有大浪打在他們身上，而水則往往浸到膝上，但他們還是在那里弄繩索、搬木板、用泵抽水。終於有些水手也被勸服上前幫忙。他們艱辛地把搖擺不定的帆桅固定。大浪澎湃的響聲、鐵鍊的碰撞聲、船桅打裂船帆的聲音、風吹著破裂的帆幟聲，種種聲響夾雜在狂風怒嚎之中，使大家無法遵著指示工作。

儲水桶已經沖走了，再也不能煮食。他們只有拿著一些餅乾，夾著乾酪或牛油來充饑。

狂風最猛烈的時刻終於過去了，氣壓計再次回升。但風浪依然很大，數小時後才慢慢平伏下來。

9月25日星期五，耀目的太陽終於出來了，海面回復平靜。水手盡力把帆桅及其它鬆散或破裂的地方修補，重新張起新帆，向前邁進。他們又修理水泵，把船上的積水抽掉。在明亮的月色下，「蘭茂爾號」朝著上海航進。

星期三的黃昏，船上來了一個領航員，引導「蘭茂爾號」入港。星期日，一隻拖船把「蘭茂爾號」拖進上海。這艘滿身傷痕、破口處處的船頓成為大眾的話題，引起談論的興趣。

戴德生一夥人感謝神的保守，雖然許多乘客和船員都滿身瘀傷，但沒有喪失一條生命，或者折斷一根骨頭。

在寫給布邊夫人的信中，瑪莉亞這樣寫著：「如果不是因為我們這一班人在船上的話，『蘭茂爾號』絕不可能平安抵達上海。」在極端的困境中，戴德生能夠保持清醒和鎮靜，而周圍比他有經驗的人卻惶恐不知所措。

第二十六章 杭州工作的開展

「在這外國地方，竟然有濃厚的英國風味！」這是福珍妮初到上海所得的印象。但她覺得中國的住屋很家監獄，四面是高牆，圍著天井和房子。店鋪還好，內裡寬敞，但街道卻狹窄得很。

童跟福則對中國人的禮貌印象深刻。他說：「他們都很文靜，對我們極有禮貌，態度遠比我們任何一個英國人對他們為佳。」狄樂義姑娘觀察中國人的喪禮，說他們用「爆竹驅逐邪魔惡鬼」，又燒紙錢給死人在冥界使用，而點燈籠則讓他可以照明道路。「當時聲音嘈雜，火光熊熊，情景煞是怕人……我真高興能夠溜開。」她覺得這樣一個情景，正是中國人受著撒但奴役的明顯寫照。

「蘭茂爾號」的同人帶來了印刷機器和零件，也帶來大批藥物和儀器，準備設立一所醫院和藥房。然而，在還未建立內地的基地前，這些東西如何放置？旅途中，他們不住為這事情祈禱，在他們抵達上海當晚，就看到神應允他們的禱告。

美國長老會在上海設立的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的負責人姜保（William Gamble）前來接船，並提供美華書館的大貨倉給他們寄存物品，又供給所有人在上海居留期間的食宿。戴德生跟著薑保察看貨倉和宿舍，一切都很理想。

一個月後，福珍妮在信中這樣寫道：「我真高興我們要離開上海了！這裡的中國人都貪錢……而英國人則很俗氣和愛打扮，每個人都知道大家在幹什麼。我想他們一定常在背地裡議論我們。」當然，福珍妮說的確是實情，尤其令人喋喋不休、議論最多的，是他們的衣著。男士把前額的頭髮剃掉。後頭則裝上一條假辮子，穿得完全象個中國人。但女士當中只有瑪莉亞穿著中國式衣裙，其他婦女的衣裝還未齊備。上海報章拿他們作笑柄，說這是個「豬尾佈道團」（Pigtail Mission）。

路惠理後來回憶舊事，說：「初時我不喜歡那些中國式衣服，但我現在喜歡多了！」蔡文才說：「對我們來說，那試煉可不算小呢！尤其是剃髮……初時我想不透為何要穿著這些衣服，但現在我明白了。」

他們本想早一點離開上海，不過英領事認為他們不宜到杭州去，所以令他們猶豫不決，加上徵求中國官員簽證時，也發生一點困難，以致耽延了一段日子。直到十一月才一切就緒，預備起程。

美麗的杭州佇立在西子湖畔已有兩千多年了。城牆之外，南門不遠，就是錢塘江與杭州灣的匯合處，流水經過寬約二三哩的江口，再流入杭州灣，景致壯麗。西湖被綠樹群山環抱著，樹叢之中點綴了許多寺廟、寶塔和古墓。湖上躺著許多小島，水面有成千上萬的水鴨和天鵝，叫得嘎嘎地響。漫山都是木蘭、杜鵑和山茶花，還有密密麻麻的桑林，幾世紀以來靠著它們支撐興盛的絲業。杭州有超過一百萬的人口，包括全國有名的詩人和畫家，以及往在巍峨大院裡的富商巨賈。

戴德生一行人最初來到杭州城中時，太平天國之亂的殘餘痕跡還到處可見。西門仍然有清兵駐守，巡撫和其它大官住在剛重新修復的官邸中。雖然在他們之前已經有數位傳教士來到這裡，但杭州是個比寧波還要大的城市，當中還有許多工作等著更多的傳道人去承擔。

戴德生和丘先生很快在杭州城中找到一處地方，用作中國內地會的基址。（丘先生是戴德生早年在寧波傳教時帶領信主的。）那是新技一號，座落在住宅區的邊沿。那兒是一些舊房子，在太平天國之亂時損毀不堪，大官富賈部遷出，很多房子便空置了。新巷一號是一間大屋，外面圍著粉牆。在此之前，是一位有錢官員的物業。屋內約有三十個房間，都很寬敞，如有必要，每個房間又可間開，一分为二。

第一次來到新巷的房子，戴德生和丘先生已發覺這個地方可作多種用途，心中不往地盤算。進到大門，便是一幢大樓，最適宜改成教堂；在寬敞的半蔽式天井四周，是一排十數間的房間；接近教堂的房間，可以用作診所及藥房，那麼，病人在候診時可以聽福音。他們更想到用什麼地方作會客室，

什麼地方作飯廳、辦公室、印刷房，什麼地方作僕役的居所及儲物室。樓上分作兩個部分，分別認不同的樓梯而上，最宜用作單身男女宿舍。後面是個幽靜的蘇州庭園，充滿平靜安詳的感覺。

當然，這所大宅還需要裝修和清理，當白安美第一次進到這房子，她高興地說：「這裡地方極之寬敞，使門窗看來顯得不足。」

戴德生用合理的價錢把房子租下，整隊人便搬進去，開始修理和各樣改裝的工作。他們買了木條、鐵釘和大量的粗草紙後，木匠和泥水匠便打木造牆，又用草紙張貼內牆和天花板。戴德生的房間裡，有一個九尺高六尺寬大洞，他用一塊布把它蓋住。他們把帶來的相架掛在牆上作裝飾，地上則鋪上草席；有些傢俱是買來的，也有些是自己動手製造。他們一邊工作，一邊燒著火發取暖，幸好那年的冬天還不算大冷。

過年的時候，他們才找到木板和灰泥，用來取代牆上的草紙和遮蓋破洞的布。

杭州城這一區的居民，這一批外國人已見怪不怪了。路惠理記述說：「我們之所以能夠平安無事，大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的中國裝扮，我們常到外面去，但很少引人注目。」

1866 年底，當寧波的宓道生和甘比治前來杭州的時候，他們路經蕭山。那是離開杭州十哩的一個重要城鎮，距紹興約五十哩。紹興城也有兩位內地會的傳教士在那兒工作，他們是範約翰夫婦。宓道生和甘比治兩人爭論是否應在蕭山設立據點，因此戴德生便陪同他們往蕭山察看。在街頭佈道之後，他們終於找到一所合適的小房子作佈道所。房東答應把屋租給他們，條件是這些外國人要穿著中國服裝。他們決定蕭山的開荒工作由倪義來夫婦負責。

其時已經在杭州傳教的有慕稼裂牧師 (George Moule)。他是英行教會 (CMS) 的傳教士，1858 年來華，先在寧波工作，1864 年才來到杭州。慕氏一家在教會史上頗負盛名。在倫敦時，戴德生曾經和慕稼裂的父親慕亨利牧師 (Rev Henry Moule) 有書信往來，討論羅馬拼音版之寧波話新約聖經的翻譯及出版事宜。慕亨利的三個兒子都畢業于劍橋大學，而且三人都追隨父親成為聖公會的牧師。除了大兒子慕稼裂外，二兒子慕雅德 (Arrhur Moule) 也在華傳教。(譯者按：慕雅德于 1861 年來華，在寧波傳教，1876 年調杭州。) 幼兒慕僅理 (Handley Moule) 是位聖詩作者，後來成為杜林區 (Durham) 主教。在戴德生一行人眾初抵杭州時，慕稼裂很熱情歡迎他們，但現在他們的關係卻鬧得很不愉快。

主要原因是慕稼裂和戴德生兩人傳教的風格和方法都迥然不同。寧波的英行教會有歐洲歌德式建築的教堂，衣著和生活都和其他洋人一樣；到了杭州之後，慕稼裂夫婦還是維持其西方的生活方式，對於內地會的年輕傳教士穿著中國衣服招搖過市，很是不滿。

慕氏夫婦時常邀請一些內地會教士到他們家中用膳，倪義來便是其中的一個常客。他常發怨言，認為新巷一號裡有許多不當之事。他不滿戴德生處事的辦法，甚至有時歪曲事實，隨意捏造，慕稼裂夫婦則在旁傾聽。當倪義來、史洪道及蔡文才一起到訪，慕稼裂向他們發表意見，反對洋人穿著華服。他還表示兩種顧慮：第一這樣多的未婚男女同住在新巷，是相當危險的事；其次，戴德生和那些年輕婦女表現得大過熟識和親蜜。他覺得有責任去維護傳教士的形象，避免受到非議和損害。

1 月 2 日，倪義來和巴克敵從杭州前往蕭山辦妥租房子的手續。不久，倪義來師母 (Eliza Nicol) 和一位中國同伴也離開杭州到蕭山去。得到衛養生的幫忙，倪義來把蕭山房子的樓下改裝成禮拜堂及

會賓廳。1月25日，倪義來趕回杭州，請求丘先生同往蕭山，並為新堂揭幕。

倪義來返抵杭州時，大家都很驚異，因為他沒有穿看中國服裝。他改穿西裝已經有一個星期了！雖然內地會曾經答應蕭山房子的業主，房客都會穿著中式服裝，但倪義來卻不肯依從；他這樣做，也違反當初在倫敦時和戴德生的協議。然而戴德生沒有立刻採取行動，他不願被情緒左右，而可能作出錯誤的決定。第二天，倪義來和丘先生就離開杭州，前在蕭山去了。

禮拜日，有很多人前來蕭山的禮拜堂聽道。星期一，倪義來和丘先生又到街頭佈道。倪義來一直穿著英國服裝。當天傍晚八時三十分，倪氏夫婦和衛養生則在樓上寫作，而丘先生和一個中國僕人正在樓下。丘先生突然看見外面燈火通紅，來了很多的人，還有縣官大老爺的轎子。丘先生立即上樓通知倪義來。當倪義來來到樓梯，縣大老爺已在樓下了，另有五十多名官差侍立在禮拜堂中。倪氏向縣官鞠躬，但這位官員卻執著他的雙肩，很粗魯地對待他。

過了一會，他似乎氣平了，態度較為有禮。他坐下來，也示意倪義來坐下。倪氏聽到有人細聲說縣官的古怪行徑是因為喝醉了酒，倪義來於是吩咐僕人倒茶。

「我不要喝」，縣官說：「你以為我會喝洋鬼子的茶麼？把另外那個英國人抓來！」

衛養生把他和倪義來的英國護照拿出來，但縣官看也不看，眼睛卻不懷好意在倪太太伊莉莎的身上瞟來瞟去，口中說著風言風語。然後他要親自檢查屋內每一個房間，走動時還得靠人兩邊扶攙。到了樓上，他又坐下來問了一連串關於英國的問題，又大聲說基督教是邪教，為官方所禁止。

這時，房東慌張地來到，並把一張字條是給縣官，可是縣官擺出不屑一顧的樣子。

最後，縣官下到樓下，指著丘先生，不由分說便吩咐衙卒：「給我打！」

兩名官差把丘先生按著，一個抓著他的辮子，另一個則抓著他的雙腳。其他兩個人則拿著藤鞭，猛力向丘先生的雙腿抽打。倪義來夫婦和衛養生在旁看著，驚惶無措。官差打了六百藤，把丘先生雙腿打得皮開肉綻，血肉模糊，跟著在他兩邊臉上再打一百藤。

然後，縣官對倪義來和衛養生說：「你們是否明天便搬出這房子？」

倪義來點頭答應。戴德生曾經指示他：遇到麻煩時，千萬不可跟官府爭論，應呈遞當地英國領事處理。

縣官臨走時，對倪義來夫婦、衛養生、丘先生等人說：「如果你們明天還留在這裡，一概斬頭。」

黎明之前，丘先生與僕人匆匆離開蕭山，先行返回杭州。他結結巴巴，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經過向戴德生說個明白。然後倪義來抵達，留下衛養生和伊莉莎在碼頭船中看守行李。

倪義來複述時，氣氛有點緊張。倪氏的語氣，好象這件事與別人無關，應由他自行處理。但他最後還是問：「我應否到寧波去把事情報告領事？」

戴德生說：「當然應該立刻通知領事，但報告書由我來寫，因為我是內地會的監督。不過，在我還未以中國內地會的領袖身分參與這事之前，我得問你幾句話：你是否承認我是你的領袖和主管？你是否是內地會的一員？內地會的其中一個基本原則，是否在不違背良心的情況下，一切由我作主？你為什麼未跟我商量，便丟掉中國服裝？為什麼不遵守租約上的規定？」

「這宗事件對於本會實在有很重大的影響，雖然我此刻應該向你表示同情，但我必須得到你的答覆，才報告領事。誰是這宗事件的受害者——一個人或是整個差會？」

「我承認你有權領導本會，。倪義來回答說：「但我想到很多事情，並在這事件中運用我的判斷力。如果我的中國話講得流利，我會改穿中國服裝。但此刻我覺得穿著這些衣服很不舒服，而且全無安全感，外國服裝卻使我得到保護和尊敬。」

蕭山事件清楚地顯示出：外國服裝並無保護作用。

他們去到碼頭，把伊莉莎及行李帶回新巷大宅。戴德生也不催促倪義來，只等著他那「舒服感覺」引導他改換裝束。

當戴德生感到倪義來已經完全明白過來後，他就寫信給寧波的英國領事，把這事件作一個詳細的報告。他在信上說：「為了恢復我們國家的聲譽，為了保障天津條約給予我們的權利，我極希望鈞座發出公報，使我們的國人及護照受到尊重，令那些提供我們合理服務的本地人也回復信心。」

戴德生在信裡提到挽救國家聲譽等等。但在一些通情達理的領事官員與中國官吏斡旋之後，他的經驗告訴他，為了傳教的好處，還是少用那種盛氣凌人的態度為佳。因此，他以後再沒有重提挽救國家聲譽的事了。

第二十七章 新巷回復生氣

丘先生被中國官員鞭打的消息傳到英國，內地會的基督徒紛紛寫信給他，表示同情和支持。在丘先生的回信中，他談到被拷打時的感受：「這不是一種羞辱，雖然非常痛楚，但苦中有喜樂。當你的小兄弟被打，他就想起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說的話——『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聖經又說：『看哪，神管教的人滿有喜樂。所以，不要藐視全能者的責罰，因為受壓的，他必包裹；受傷的，他的手必使他完全。』

1867年2月初，戴德生請倪義來（Nicol）改換中國服裝，但他卻沒有把留在蕭山的衛養生因為穿成中國人的樣子而被孤立的事說出來。

「你在蕭山穿著英國服裝的理由，在杭州可用不上。」戴德生說。

「不，我不要穿中國服裝，」倪義來回答說：「我不要自頸至腳受著束縛。」

「如果你堅持要穿著英國服裝，那很可能會對差會造成影響，甚至帶來危險。」

「這樣，我想我還是儘快離開此地到自由港去好了！」

「我不知道哪樣做對你才是最好的，」戴德生說。但倪義來還是穿著英國服裝，繼續在杭州到處走動。

二月中，內地會有一批新來的傳教士抵達杭州。第一眼看見新巷，麥卡悌（John McCarthy）便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時是農曆新年，聚集在內地會診所外的群眾比平時還多。當麥卡悌一家來到屋前，便看見戴德生正在向群眾講道。他向安卡悌揮手示意，簡單地說了句歡迎話，便繼續講道。

新巷充滿生氣。戴德生每天替超過兩百名的病人診病。在中國人看來，成功的眼角膜手術，就好比神跡一樣。一乘乘的轎子把病人抬到門口，又排列等待需要乘轎回去的人雇用。擺賣食物和飲品的販子都挑著擔子來到新巷，生意也很不錯。丘先生負責向這些等候的人傳講福音。戴德生有時會讓他休息一下，由自己講道和唱詩；他也時常彈手風琴，令群眾很覺有趣。

有一天，瑪莉亞對一個中國助手說：「這麼多的人來求診，我想他們不再相信外國人挖他們的眼睛

了！」

「是的，但有一個婦人看見倪義來先生時，還是驚惶萬分，不待醫生診斷便跑掉了！」助手回答說。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史洪道竟也以倪義來為榜樣，穿起英國服裝。而女教士麥克蓮亦很同情她們。

從布迦先生的來信中，戴德生獲悉倪義來寫了不少信批評和攻擊他。布迦向戴德生建議：「是否要把他遣返英國？你可自行決定。」

在這些壓力之中，也發生了一件快樂的事：2月3日，戴德生生了一個小女兒，名叫小瑪莉亞（Maria Hudson Taylor），母女平安。

麥卡梯和新巷各人相處融洽，毫無齟齬。他已經三十歲了，年齡比其他人稍長，所以也較成熟。一開始他就高高興興地穿上中國衣服，中文也進步得很快。倪義來多次想灌輸一些反面的思想給他，他都置之不理。戴德生開始感到沒有那麼孤立了。他把所有的教士召集一起，提醒他們在倫敦時定下的原則和策略，以及他們加入內地會時的承諾。然後，他逐一問他們：「你明白當初對布迦先生和我作出的承諾嗎？」

「我認為在未學懂中文之前，我們為安全起見，應穿著英國服裝。倪義來回答說。

「我不同意，」衛養生說：「我明白你所說的是關於開支和衣著等問題。」

「我同意衛養生所說的，」路惠理插嘴道：「我們承認你是本會的主管，有權處理一切財務。」

童跟福也說：「我心中一直被此困擾，但我對中國一無所知。所以在許多事情上，應由你來帶領。」

會議結束時，大家都表示支援戴德生，只有倪義來和史洪道例外。

三月，慕稼裂（Geofge Moule）來到新巷，寫了一封信給戴德生。信上說：「我之所以反對你，主要理由是……你把這麼多的未婚姑娘留在自己家中，這種行為就是在英國也會惹人懷疑和令人不滿；現在更給中國人作話柄，使歐洲基督徒的道德聲譽受到極大的損害。……

「由於你的居處是較隱蔽，作為女士們的醫生，你和她們的關係自然少受社會禮儀所限制；又作為她們屬靈的牧者，她們對你是相當信賴；又因為她們遠離其它差會，所以你就是她們可依靠的朋友和長者了。除非你是個聖人，否則總不免受到一些引誘。……

「你應該知道自己並非聖人，所以我以過來人的身分——二十多年來常是心猿意馬——，並且知道許多基督徒也曾站立不穩，加上我的年紀比你長，傳道經驗也比你豐富。所以我想嚴正地勸你……不要過於自信，要和那些值得你信賴的傳教士商議，以他們的虔誠和智慧，謀求一個最佳的辦法，儘快結束你現時的教會，免致產生危機。……」

慕稼穀又稱內地會的新技大宅為「流言和醜聞」的中心，比「天主教修道院更為差勁」。一年後，慕稼穀對新巷內地會的批評更多，也更尖刻。他指責宅裡的人常有親吻的行為，甚至男女「夜半過訪」。

從當時所拍攝的內地會照片看來，戴德生身旁的人有時的確會把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例如在一張公開刊登的照片中，白安美把她的手放在戴德生的肩膀上，而福珍妮則似乎是挽著他的手臂。如果她們在晚上道晚安時給戴德生一吻，那也是極平常的事，不足稱怪。而對白安美表示特別的關懷，更是必要，因為她是個孤兒，她所有的親人都去世了。

戴德生讀完慕稼穀的信後，就想和慕牧師見面，澄清事實。他請衛養生陪他一同前往，而新巷宅

內每一位姑娘，都被要求寫一封信，說明戴德生對她們的態度怎樣，交給衛養生一起帶去。

他們來到慕稼穀的家。慕氏問：「你來是否有事要辦？」

戴德生回答說：「是的，我來要和你討論一下你寫給我的信。」

慕稼穀說：「我在信中已說得很清楚，沒有什麼補充的了！」

「但我卻要得到一個解釋，」戴德生說：「我想知道你為什麼要指摘我的道德品格？」

「我沒有指摘你的道德品格！」

「我從未聽過象你這樣的行為，這實在是假道學，自以為是！」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情緒激動地爭論，但得不到什麼結果。

二月底，倪義來寫了一張字條給戴德生，申辯他是誤會了。戴德生給他回信，一開始便以「我親愛的弟兄」稱呼他，然後說他極願意跟他重修舊好，但這樣做是需要雙方坦誠相對。他建議倪義來再寫信給他，把不滿的事情實實在在地說個明白。倪氏的回信足足有三頁紙，所講的都是關於衣著的問題。

所有婦女（除了倪義來的妻子和麥克蓮姑娘外）都聯合草擬了一份聲明，說道：「（杭州新巷）家庭紀律非常嚴謹，也嚴格遵守『社會禮儀的規定』，比在英國的老家尤佳；所有內地會的婦女時常都得到一個人的關心和輔導，那就是戴德生夫人（但好象沒有人知道她的存在似的！）……我們絕不認同那些搬弄是非。攻擊戴德生先生品格的人；在我們與戴先生的接觸中，他一直是一個君子、一個基督徒：他尤其是一個在基督裡的傳教士。……」

三月間，倪義來又寫了一封信投訴他的妻子每月所領的薪金，比其他婦女少五元，並問戴德生對他有什麼不滿。

戴德生回答道：「這是我極不樂意去做的事……我所不滿的，是你要求我待你真誠，然而我發現在我坦白地糾正你以後，你還是（我相信是無意的）不夠坦誠。我也不滿你的所謂忠實、開放和爽直——你的嫉妒、驕傲和自信不但給你自己帶來痛苦，也令你身邊的人感到痛苦。我不滿你不斷挑剔別人，並埋怨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最後，就是你不服從，堅持要走自己的路。……你的問題是在於你自己，而不是周圍的環境。你無論在何處——蘇格蘭也好，英格蘭也好，『蘭茂爾號』船上也好，這裡也好——，這種性格總給你和別人帶來麻煩。……我在布迦先生面前曾清楚地向你表示過，……如果你順服我的引導，我一定會盡力幫助你……如果你仍然希望我給你幫助的話，那麼我想請你寫一份聲明書，表明你承認神賦予我主管內地會之權力，願意服從我對會中事務的引導……」

到了五月，戴德生仍未收到倪氏的回信，當被問及時，他答說：「回信需時，我沒有多餘的時間……」他請戴德生到蕭山面談。

戴德生和瑪莉亞認為這事最好趁大家齊集時，開會解決。他們把此事告訴新巷各人，大家都同意在翌日早上為此禁食祈禱。就在這時，倪義來出乎意料之外的從蕭山回來。戴德生知道這是神應允禱告的明證。倪氏把最近的不滿，並好些不盡不實的指控說出來。最後經過大家辯明事實的真相後，他就在大家勸說下簽了一份對事實的同意書。

六月，倪義來再從蕭山回來，帶來太太患病的消息。戴德生於是和他同往蕭山，檢查及照顧懷孕的伊莉莎（Eliza）。以後他多次為著倪義來而來回奔走，仿佛他們兩人之間從來沒有隔膜和分歧。接著，

倪氏夫婦需要搬家，戴德生又替他們找房子。因他認為這是信徒應有的表現，也希望借此令倪義來改變他的態度。

這時，倪義來對戴德生的批評和指控，以及慕稼穀的質疑，已傳到倫敦。在還未收到詳細的事實報告之前，布迦先生夫婦只有憑著信心支持戴德生和瑪莉亞。此外，還有高富夫婦、賓法特牧師、穆勒。侯活夫婦，以及拿土托爵士和他的家人等，均對戴德生和新巷內地會的同工保持堅定不移的信心。但是聖公會的總幹事范亨利（Henry Venn）則受到那些報告的影響，使布迦先生極為不安。

為了謹慎起見，布迦寫了一封信給戴德生，信上說：「我相信你會格外小心，不讓慕稼谷牧師有指責你不够謹慎，並與女士們過分親蜜的口實。」

布迦又寫信給倪義來，勸他改變他的態度。他寫道：「我相信神把榮耀給予親愛的戴德生先生，如同他把榮耀給予布裡斯托的穆勒先生一樣。」

第二十八章 擷取了玫瑰

1867年6月，戴德生帶著麥卡悌、童跟福、丘先生和兩名僕役到杭州的西南面佈道，他們乘船沿錢塘江而下。船是平底，中間是半圓形用竹片織成的篷蓋，這種有篷的船在中國很普遍。竹篷看似簡陋，但用來避雨卻相當有效。

麥卡悌環顧船上其他乘客，看見有些躺著，有些坐著，有人在吃東西，有人在抽煙——差不多所有人都在閒聊，談論著這些跟他們服飾一樣的外國人。他們第一個晚上就在船上度過，清風明月，又沒有蚊子，令人倍覺舒暢。

他們醒來時，風已靜止，船由五、六個人用繩纜拉著前進。他們賞了拿熱水給他們洗臉的船夫幾個銅錢，然後舉行一個短短的崇拜聚會。戴德生讀聖經和講道時，船上的人均專注地聽。

傍晚時分，船就在一個小鎮的渡頭停泊，離杭州大概有四十哩。他們上岸後，沿著一條彎曲的石徑向鎮上走去，鋪在路上的石塊本來是一堆舊城牆。

麥卡對第二晚船上的情景，有很細膩的描寫：「躺在童跟福旁邊的可憐蟲，雙腳鎖看鐵煉……好象是個殺人的重犯，他本來是要殺頭的，現在改為緩刑。在他對面的則是一對癮君子，當所有人就寢後，他們就拿出煙燈，側身躺著，開始猛吸鴉片。另外一邊有五、六個衙差，幾個兵丁及其他的人擠在一起；再加上我們幾個，整條船都載滿了！」

第二天，船駛至東籬，戴德生等人上岸，到河邊山丘上參觀一座寺廟和寶塔。其中一個和尚對他們所講的道理，特別是關於敬拜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大感興趣和信服。

他說：「如果我們離棄假神，我們就沒有錢修理寺廟了。」

翌日，他們來到一個村子，那裡飽受太平軍戰火的踐踏，村裡還可住人的房屋只剩下三間。村民都很好客，拿李子給他們吃，又請他們吃茶，都不取分文。他們把基督的道理解釋給村民聽，又送給他們一本中文聖經。

他們繼續往山上走，在一條村子裡買了一些糧食便回去。在返回船上的路程中，麥卡悌真希望英國的親友能夠看見他們現在的情況：童跟福在前面領路，頭上戴著一頂大草帽，一隻手拿著葵扇，另一隻手則拿著一隻不停叫嚷的大公雞。無論怎樣，它都逃不過變成晚餐的命運。戴德生象童跟福一樣，

頭上也戴著一頂巨帽，手裡拿著從村中買來的貨糧；跟著的是麥卡悌，頸上掛著一串一元的銅錢（合共一千銅板）。他們的衣服本來是白色的，但經過一個星期的船上生活，已經變得骯髒不堪。回到船上，他們盡情地喝著熱茶，又用熱水洗臉。

然後，戴德生、童跟福和丘先生帶著老廚子一起前往蘭溪，而麥卡悌和另一個僕人則留下來。他們在蘭溪住的地方極其簡陋，屋頂漏水，地板骯髒；地上只有幾塊卷著的草席，下雨時可以釘在牆上，擋著從夾縫吹進來的風雨。屋子沒有煙囪，所以在房內煮食時，大家都薰得滿眼淚水。床是用竹子和木板造的，他們在上面鋪了一張氈子，使坐臥舒服些；然後再在上面放一張席子，使睡時涼快一點；最後就是掛上蚊帳。房子裡還有一張桌子、一張凳、一塊由兩個支架托著的木板，以及一個燒飯用的活動火爐。童跟福為了「自我享受」，花了六角錢買了一張椅子！

他們為童跟福雇了一應很好的中文老師，使童跟福很快掌握到一些本地話的基本用語。戴德生回杭州後，童跟福每天下午都到寺廟及茶館去賣聖經和單張，並向人傳道。

回杭州時，戴德生發覺他所乘坐的船是被另外一艘船拖著前進，晚上停泊時也用繩索系在一起。這是絕好良機，不容錯過，於是戴德生便起來向兩條船上的乘客講道；當他講到疲倦時他想，聽的人大概也很累了，便以一個簡短的禱告作結；去沒有人願意離開，大家都想多聽一些道理，所以戴德生繼續講了一段頗長的時間。但他講完後，大家仍沒有去意。他們開始提出問題，戴德生也詳細地逐一回答，直至聲嘶力竭及感到寒冷。「原來已經是凌晨一時，」他述道：「在勸告他們歸向救主之後，我提醒他們時又已夜深，應該就寢休息了。」

翌晨，他專程到蕭山探望倪義來夫婦，然後才返回杭州

麥卡悌對這次錢塘江之旅，有下面一段的記述：「整個旅程中，無論是在船上或在陸上，無論是在茶館或在寺廟裡，凡是有人聚集的地方，他們都聽到神救贖之愛。……主的僕人生命中的真正動力，顯然來自他心內所充滿神的愛；並且他對中國人有一份真正的愛，能夠欣賞中國人性格中的一些美德，使他們和其它外邦人完全不一樣。……」

象她當律師的爸爸一樣，瑪莉亞有著一副很精密的頭腦。她仔細地分析穿著中國服裝的好處和壞處，以及女性在內地會中能發揮的作用，然後把這些想法寫信告訴迦達夫人，信表達得既清楚具體，文筆又優雅典麗。她說：「我肯定我們穿中國服裝對工作有利。在未離開英國之前，我也不贊成我們改穿中國服裝，因為中國人尊敬外國婦女，去輕視自己的同胞。初時我擔心改裝後，他們會否同樣尊敬我們？地位會否不一樣？然而這些憂慮是不必要的。後之，只有道德、品格、教育和基督教原則，才使我們在中國人中受到尊敬。所以，穿著西式服裝不一定多一分尊敬，而穿著中國衣服也不一定叫我們少受一分的尊重。就我而言，穿著中國服裝會更得到他們的敬重。而喜歡穿西服的人認為這樣才會受人尊敬的看法，我是絕不能同意……」

「我從沒有聽到有中國人誹謗我們當中的姊妹，雖然我們所做的許多事情，在他們看來都非常奇怪。我們遠道而來已是怪事，更奇怪的是當中有這麼多未婚的成年婦女，因為在中國要找一個年到二十而仍未出嫁的女子可謂絕無僅有……福姑娘今天下午對說：她真希望可以變成很多個人，但依然是一個『我』。這樣就可換來許多時間了。」

至於戴德生穿著中國衣服，表明他對中國文化的敬重，以及他對傳教士擔當的角色具有敏銳的透

視，這種看法在當時而言是很前衛的。

他說：「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古老的民族，他們對千百年來的風俗和習慣有特別的偏愛。這種偏愛並非無因的，因為誰都會對所認識的人和事有更多的認同，並且認定他們的風俗習慣是必須的，這都是氣候、物產及社會形態的產品。」

「世界上也許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能容忍宗教了；平民百姓或皇孫貴族反對基督教的唯一理由，是因為它是外來的，它可能會使信徒崇洋。」

「有人認為（或許在某程度上受了他們的信徒或學生的影響）：傳教士的洋服、洋車、教堂的歐式建築，或者種種與基督教有關的外國事物，對於在華人當中傳播真理產生很大的攔阻，我並不儘然同意這樣的見解。但為什麼基督徒給予人洋教的感覺呢？神的話其實沒有中外之分，我不明白為何會有這樣的分界。我們不是要中國信徒除去他們的國家觀念，而是希望他們成為基督徒！」

「我們盼望見到成為基督徒的中國人——既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是地道的中國人。我們盼望看到中國人擔當教牧，管理中國教會和中國的基督徒，在他們鄉土的中國式建築物內，穿著本土的衣服，又用本地的言語，敬拜真神上帝。」

「在不違反真理的大前提下，讓我們把自己中國化，盡我們所能去拯救靈魂。我們換上他們的服裝，學習他們的語言，效法他們的習慣，甚至在健康及體質許可的情形下吃用他們的飲食。我們住在他們的房子裡，不需改換房子的外觀；除非是為了健康及工作效能的需要，屋內的陳設也保持下來。」

「現在的經驗證明我們這樣做是有利的，正在影響著周圍的中國人，而這種影響不是別的方法可以達致。我們每天和他們接觸，不住在一處，而是在多處的地方；我們看到他們或多或少地受到聖靈的引領，並因著在他們當中工作的人虔誠和懇切的態度，而受到感染。當然難免引起不便和麻煩，例如在飲食習慣上，便要不用刀叉、杯碟，而改用筷於、湯匙和大碗。……」

「外國人穿上中國服裝，雖然還是被人認出來，但至少不會到處被人群圍觀；在街頭講道時，雖然衣服不吸引，但話語卻吸引了很多的人；他又可以隨處購買衣服，清洗補髮毫無困難，花費也極微。」

就是這種想法和異象，鼓舞戴德生和瑪莉亞以此方式工作。在內地會，戴德生盡可能避免擬定規章和條文。但他相信若要使中國人歸主。西教士一定要瞭解和尊重他們悠久的文化。在工作時，他盼望同工能愉快地合作。這是他們當初許下的諾言，包括倪義來在內。如果他們都靠著主耶穌的愛去遵行，他們必會得到很大的賞賜。

付出的當然也大。

戴德生一直都想有一個「小瑪莉亞」，所以 1859 年他的女兒戴恩惠在寧波出生時，他是多麼的高興！後來戴氏夫婦乘「蘭茂爾號」回華時恩惠已懂得單純地信靠耶穌。現在她已經不再是一個嬰孩，而是八歲的女孩了。在新巷的宅子裡，她最喜歡在屋後的花園玩耍。那兒有一叢矮樹和一個水池，還有兩三株枝葉繁茂成蔭的大樹。

八月初，小恩惠食欲不振，體重減輕，而且常說頭痛。到了 8 月 8 日，她開始發高熱。第二天，她躺在路惠理的露營折床上，想呼吸些新鮮空氣，卻開始神智不清。戴德生剛巧不在家，因此童跟福把她抱進屋內，放在瑪莉亞的床上。福珍妮記載了這件事，她寫道：「我永不能忘記她的樣子……安詳地躺在他（童跟福）的臂彎裡，美麗的長髮不經意地散落在肩上。真是漂亮極了！」

接到消息，戴德生立即趕回新巷。他很快檢查出她是染上腦膜炎！

「把她的頭髮剪掉，然後敷上冰袋！」

瑪莉亞小心地跟著指示做。

「希望她平安度過危險，然後讓頭髮慢慢再長出來，」她說。

貝瑪麗幫忙護理，她記述戴德生那時是「心碎至極，整天哭泣。」

戴德生想和瑪莉亞單獨談話，他帶她來到僻靜的小溪旁，對她說：「小恩惠沒有康復的希望了。」

他們把她交托給神，請他按著他的美意引領他們。

回到家裡，戴德生對女兒說：「我想耶穌會來接你到他那裡去的，你把自己交托給他，不會害怕吧？」

「不會的，爸爸！」她微聲回答。

第二天，戴德生寫信給布迦先生：

親愛的弟兄：

我不知道怎樣下筆，也不知怎樣控制自己。我好象是從那萬王之王的內室給你寫信——這是神聖之地。此刻我坐在長椅旁邊，竭力想給你寫幾句話，而椅上躺著我親愛的小恩惠，她正在死亡的邊緣。……親愛的弟兄，我的心靈和肉體都軟弱不堪，但神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永遠的山寨。到中國宣教不是枉然，也不是不智的行動。縱然知道這裡的環境、人事和氣候，我還是把我摯愛的妻子、親愛的兒女和我自己，奉獻在祭壇上，為神作工。

四天后，小恩惠有肺炎的跡象。

8月23日星期五晚上，戴德生全家及好友齊集在小恩惠的床前。戴德生不停地唱著聖詩，雖然有時嗚咽、泣不成聲。而瑪莉亞卻坐著，俯身靜靜地望著已經昏迷的女兒。晚上八時四十分，小恩惠的呼吸終於停止了。

包瑪莉這樣寫道：「我從未見過象小恩惠剛去世時那樣美麗的臉龐，世上絕難看到如此甜蜜可愛的神情。」

戴德生也如此寫道：「我們親愛的小恩惠，我多麼想念她清晨時悅耳的聲音，每天早上一醒來就聽到她的呼喚——在白天、在聚會時，總少不了這個甜美的聲音。我每天散步，總記起她蹦蹦跳跳地跟在我旁邊。每次想起她，心裡就非常難過。是不是我永遠無法再感到她那只小手緊握住我？是不是從此不再看見她那閃爍明亮的眼神？她不能再回來了。但又不是真的『失去』她！……只是園主來，把玫瑰拾取了。」

第二十九章 誰言要安息

1867年的耶誕節早晨，新巷大宅舉行一個盛大的慶典——路惠理和貝瑪麗共諧連理，結成夫婦。他們乘船在河上度蜜月後，就回到工廠。路惠理負責監督印刷部門的工人，貝瑪麗則繼續幫忙照顧戴德生的孩子。

1867年底，中國內地會把新巷一號旁邊的房子也租過來。原先的大宅留給已婚的傳教士和未婚的姑娘，麥卡梯一家和未婚的男士則搬進新租來的二號。這樣安排，叫外人看來才算合體統。

現在的戴德生年近四十，體重也略有增加，更能擔負長期的體力勞動。1868年初，他攀山越嶺的

徒步前往蔡文才（Josiah Jackson）正在工作的泰州。在路途中，他不斷地想：每隔兩三哩就有一個鄉村或市鎮，許多還是相當大的城鎮呢！千萬人在這些鄉鎮裡出生、長大、老死，從來沒有離開家鄉半步。令人一想到這裡，就感到非常痛苦。由此鄉到彼鄉，從此鎮到彼鎮，每次回頭遙望，都教人心情沉重不已。這些可憐的靈魂何時及怎樣才可聽到福音呢？

雖然戴德生的身體較以前強壯，但壓力卻令他透不過氣來。他的神經性頭痛愈來愈厲害，一切日常事務皆交由瑪莉亞處理。福珍妮認為戴氏的頭痛完全是由於焦慮與勞累過度所致。現時的內地會在組織和人數上，已經接近當時中國最大的差會——倫敦會。

在英國方面，布迦先生也百務纏身，終日為內地會晤以及挑選傳教士。戴德生給他寫信，說：「我們與其他差會不同。當我們的教士來到這裡，差不多都會問：『為什麼美國的傳教士可以這樣做，聖公會的傳教士可以那樣做，而我們就不可以？』……其他差會的教士都有較好的房子，好的傢俱，住在歐洲式建築物裡。然而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會在內地定居，住在民眾當中。除非有人願意特立獨行——和其地差會的人分別出來——，否則他們就不應該加入我們的行列。……應該事先給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是真心的、忠心的內地會會員，他們將會受到嘲笑和譏諷，甚至敬神的人也起來反對他們。」

他在信中繼續對布迦清楚地說：「我所需要的是那些充分準備好進入內地的人，他們須穿著本地的服裝，盡可能連生活也象本地人一樣。那些不願意如此工作的人，我不會再輔助他們。中國是開放給任何人的，但我的時間和力量有限，工作卻極多，所以我不再嘗試和那些不能同心合意，而且不贊成我工作方針的人一起工作。……

「要中華歸主，我們不能靠那些安靜、溫柔和可愛的男女，……我們需要的是在任問時間，都把耶穌、中國和靈魂放在首位的人——他們甚至認為生命也是次要的……這樣的弟兄姊妹，儘管差來，愈多愈好，他們比寶石還要珍貴！」

現在是繼續向內地發展的時候了。戴德生打算減少杭州內地會的人手，向內地開展新工作。目前浙江南部地區的大小城鎮中，已有一批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在工作，聖公會、長老會及浸信會也都認寧波向外發展。戴氏以為最佳策略是讓麥卡悌夫婦和福珍妮留在杭州，因為他們和本地信徒感情最好。其餘的將繼續向內地發展。童跟福已經開始在未有福音傳到的地方進行開荒工作，現在是其它人支持他，步他後塵的時候了。

不是所有人都贊成這個策略。布迦先生請求戴德生先在現時的工廠上加強訓練，穩固基礎。但是大部分在華的傳教士都支援戴氏的異象，贊成他主張的擴展工作。戴德生把他的想法寫成一首詩：

誰言要安息？安息在天家。
地上無安息，只因工作多。
天父差我來，時日不我待。
惟有勤工作，未敢有輕疏。
不論忙或苦，恩典必夠用。
勿言要安息，安息在天家。

其它事情帶來的壓力，尤其是關於衣著的問題，仍然存在。另外一兩位女教士也支持倪義來。布迦寫信給戴德生，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他正在考慮是否應該容許倪義來留在會中，因為倪氏說他已不能信任戴、布兩人。戴氏反復思想，為了排除倪義來可能引致的困擾，他還是希望倪氏能改變初衷。

1868年6月1日是內地會擴展事工的一個大日子。一艘大船從杭州沿著運河北上，經過三哩寬的長江，入運河再向北駛十二哩，來到江北的大城市揚州。船上載著戴德生夫婦和四個孩子、戴氏的秘書白安美、孩子的看護路惠理太太，以及四個來自杭州的中國基督徒。此外，還有十一年前為戴德生所收養的年輕人天喜，以及內地會印刷主管李蘭豐的未婚妻安馨。

在十三世紀元朝忽必烈統治中國時，馬可勃羅曾經在揚州當過官。運河蜿蜒自城的東南穿過架在上面的許多美麗拱橋。揚州除了以富饒和美女著名外，還有一座人所皆知的八角寶塔，以及許多大古雅的寺廟和美麗的花園。但是，揚州也有些人以好鬥而惡名昭著。

揚州城很少有路經的外國傳教士，這裡只有一間天主教教會辦的孤兒院，而主管是一位中國人。

由於聽過揚州流氓的惡名，所以戴德生在初來時特別小心從事。他們留在船上，避免引人注意，只吩咐同來的中國基督促到市內找房子。但數天之後，下起大雨來，船篷不住地漏水，再也不能久住，他們惟有人揚州城裡，尋找瑪莉亞所譽為揚州「第一流旅店」。

到了7月20日，他們才能夠搬進一間破落不堪的房子裡住，這就是他們以後在揚州的家了。這間房子和幾家鄰舍共用一個約有一百碼長的進口通道，在通道的北邊有兩個閘門，接連著天井、花園、岩石、假山和一些規格不一的房屋。每間屋子不大，只有幾個房間，但對於他們大夥兒來說，卻是相當理想了。主屋有一間客廳通往天井，樓梯的兩邊各有兩個房間，盡頭有一扇門，把上下兩層樓完全分開。戴德生叫來了木匠，為新屋裝修，改裝至適合大夥兒居住，整整忙了一個月。

當戴德生和內地會的傳教士離開海岸，進入外國人罕至的地方時，他們遇到更多的麻煩。人們之所以反對他們，往往是受到村鎮的士紳煽動。

這些士紳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精英，其中多是知識份子。他們真誠地遵行儒家的法則，尋求明白中國歷史文化的精萃。他們也欣賞及愛護中國藝術和雕飾，對於無價的陶瓷、絲、漆和雕刻，極之珍愛。一位真正的儒者往往是有高雅、自律的君子，對人（即使是從荒郊海域遠道而來的蠻夷）總有體恤之心。

然而這個階級之中有不少高官大吏，以維持中國傳統制度為己任，他們認為儒家思想有維持社會安定的作用。雖然有些人認識並接受西方的知識和文化，但大多數士紳都抱著拒絕和敵對的態度。

基督教強調個人，跟中國倫理把家庭放在個人之上，顯然有所不同。一個人的信主和改變會否影響整個社會的結構？對中國士紳而言，講道常被視為一種羞辱，因為講道者的地位如同教師；誰有資格為士紳之師呢？此外，基督教的傳道人會否批評中國人拜祭祖先的習俗？會否認為儒、釋、道沒有真理，毫不可信？

在內地會全不知悉的情況下，揚州城內的士紳和一些軍士將領召開了一次會議。他們決定鼓動民眾，散播有關傳教士的謠言，希望把他們逐出揚州。

從那時開始，常常有人用石子投擲戴德生屋子的窗戶，又在街道上張貼了許多匿名海報，指控他們許多荒謬的罪名。他們稱傳教士為「耶穌教之匪眾」，借行醫為名把人挖眼取心，以童為食，又音剖

開孕婦肚腹，制煉丹藥等等。

不久之後，就有一大群憤怒的民眾結集在內地會的房子外面。傳教士和他們理論了一整天，否認那些硬加諸他們身上的罪名。戴德生於是致函當地的知府孫大人，並附上一份攻擊他們的海報，請他制止這種行為。但孫知府的答覆只是含糊其辭，不置可否。

8月15日星期六，內地會聽到謠言，說民眾要發起暴動，所以他們在房子出入口要搭防禦圍障，以防萬一。不久，即有一二百名群眾聚集屋外。當天晚上，童跟福恰巧由別的地方回來，他好不容易才擠過群眾，得以進入宅門。本來他只打算停留一會，就趕返自己的工廠。但見到這種情況，便決定留下來幫忙。所以，屋內有四名男教士〔戴德生、童跟福、路惠理和李德(Reid)〕、五名婦女、四個孩子和十九名華人。

戴德生為安全起見，想先把婦孺遣走，但眾婦女都請求留下。星期日，暴民有好幾次想破門而入，可是都沒有成功。他們傳發一張可怕的海報，說要放火燒屋，把屋內眾人燒死。

星期一，情況稍為平靜下來，教士也分發一些傳單，說其中的指責乃屬無稽之談，又說房子修理完竣後，將會邀請民眾入內參觀，讓他們親自看個究竟。這樣才暫時將事情緩和下來。

星期三，戴德生再次修函給孫知府，提醒他條約內寫明「英國人民可以在內地買地建屋，而且任其隨處走動，不得拘留、侮辱或攔阻。如有需要，可隨時請求保護和幫助。」

孫知府回函說：「那些煽動群眾和書寫匿名海報的人都是在暗中行事，既沒有名，也沒有姓，短期內是很難把他們捉拿歸案的。」

8月22日星期六，一名美國政府派駐浙江的官員辛德士上校(Captain Sands)和另一位外國人剛巧來到揚州，參觀此地的寺院和古剎。他們都穿著洋服，發覺全城寂靜。有人開始在茶館和街道中散佈謠言，說有更多的洋人到揚州，拐走了二十四名小童。群眾又結集在內地會的房子外，並且衝破兩度閘門，來到天井和花園中。戴德生把守著通道的進口處，同時叫木匠立即修補那破壞了的閘門。可是，群情洶湧，情勢愈來愈危急了。

第三十章 揚州教案

8月22日星期六，傍晚時分，揚州內地會外結集的群眾已有八千至一萬人。有些人拿著刀、茅和木棒，同時不斷投擲磚塊。站在最前的則用力捶著大門，試圖闖入。

「那些洋鬼子已經吃掉了二十四個小孩！」他們大聲喊著。

童跟福和戴德生派人送信給知府，但他總不答覆。所以他們決定留下其他人，由他倆去見知府。未動身前，他們先用木板把一扇被磚塊擲破的窗牢封住。

〔親愛的神，〕他們禱告說：「保護留在這裡的人，又在我們面對那些暴徒時，與我們同在。」

他們從隔鄰的房子出去，果然避開了那些暴徒，但很快被他們發現了。

「洋鬼子正逃走呢！」有人大聲喊著。跟著展開追逐。

幸而戴德生認得一條田間的小徑，而且當時天色已晚。不過，他們要到知府衙門去，所以不得不回到大街中。人們又向他倆投擲磚頭和石塊。他們來到知府衙門的時候，門丁正要把閘門關上，但還沒有下鎖。這時尾隨的人眾已經追上戴德生和童跟福，把他們兩人抓著，推開閘門，進到衙門的大堂

裡。他們把兩人推倒在地，但兩人趕忙爬起，沖進會審的公堂中，不斷大喊：「救命，救命！」

不論白天或黑夜，這兩個字總可以引起中國官員的注意。

他們被帶進文版處，在那裡等候。戴德生依稀可以聽到一哩外包圍著他家的暴徒仍在叫喊。他們是否正搗毀他的家——抑或是傷害他的家人？

直等了四十五分鐘，知府才召見他們。

「你究竟把那些嬰孩拿去幹什麼？」知府問道：「你們是否真的把他們買去了？這次暴亂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我會告訴你這次暴動的主要原因，」戴德生暴跳如雷，大聲地答：「這是你的疏忽！情況還可控制的時候，你沒有採取適當的措施。現在我請你立刻鎮壓這些暴徒，盡速拯救我們的家人和朋友，目前他們可能還是活著的。之後，你可以任意盤問。否則，一切後果我概不負責。」

「噢，說得對，說得對！」知府說：「先行安撫百姓，然後追查盤問。請坐下，我去看看事情該怎麼辦。務請你留在這裡，如果他們看到你，那麼我就毫無辦法了。」

戴德生和童跟福於是留在衙門，等了兩個小時，知府才回來。

「現在一切已經平靜下來，城內的都統和部將，以及兩位縣丞均親到現場，把數名搶劫的人逮捕，依法懲辦。現在讓我吩咐轎子把你們送回去吧。」

戴德生和童跟福在回家途中，聽到有人說：「所有留在房子裡的外國人都被殺了！」不禁驚惶萬分，憂心如焚。他們只有求神支持他們，在絕境中仍希望那個消息是言過其實的，但當他們將近家門，一股燒焦的味道又似乎確證傳聞無誤。

那兒有一堆燒了一半的葦草，證明有人企圖放火燒屋。一垛牆已經倒塌，破爛的傢俱和箱子散落一地，到處都是紙張、信件、損毀的工具箱、書桌、衣櫃、醫藥器材和熏壞了的書本殘頁。但戴德生的家人和其他傳教士則全無蹤影。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聽到的消息或許確實吧！

當戴德生和童跟福離開後，剩下的兩個男人路惠理和李德便竭力守著通道入口和大門，但暴徒仍破門而入，沖進屋內。所有女士和小孩都把自己關在瑪莉亞的房間裡，懇求神施恩保護他們。

終於，路惠理走進房來，全身乏力，幾乎不能站起，衣服都沾滿了泥土。他們知道暴徒隨時會沖上樓來，進入房間。此時，他們又聽到天井傳來李德的叫聲，聲音空洞而嘶啞。

「戴夫人，請盡速下樓，他們正在放火燒房子，我不能救你們了！」

他們只有窗的一條生路。有一個頭腦清醒的，先把床墊和枕頭拋出窗外，減輕跌在地上時受傷的機會。路惠理先爬到窗外的簷篷，說明他的妻子從視窗爬下來，跟著便是安馨。

本來跟著是存義，但當他們把他扶出窗櫺時，他說：「讓哥哥赫拔先下去吧，他怕得發抖呢！」

所以，他們讓赫拔先行，然後才是存義。

李德趕緊把他們藏在水井旁的小屋裡。這時候，暴徒已來到樓上。一個赤著胸膛的彪形大漢走進瑪莉亞的房中。當他打開房門，他們可以看到好幾個人抬著箱杠，從別的房間搬出去。瑪莉亞首先開口說話：

「我們都是婦孺，你們如此欺負我們，不感到羞恥嗎？」

那大漢一言不答。

瑪莉亞繼續說了數分鐘。那大漢子開始搜查各人身上的財物，在他們薄薄的夏裳上亂摸。白安美的裙子內系著一個小錢袋，內中約有七、八塊錢。那漢子發現了，一下子就搶了過去。

「還有錢嗎？」他咬牙切齒地說：「快快交出來，否則割下你的頭！」

之後，他又撕破狄樂義姑娘的衣袋，拿走她頭髮上的飾針。當他看見瑪莉亞手上的結婚戒指在燭光下閃閃生輝，他就從她指上強奪下來。然後，他開始搜查所有抽屜和箱子。布安妮（Annie Bohannon）趁這機會抱著小瑪莉亞跑下樓去，一名扛著一個大箱的漢子緊跟在後面。這樣，嬰兒可免被到處亂飛的石塊擲傷。她抱著小瑪莉亞沖過了火場，安全地來到井旁的小屋。

李德護送小孩到達安全之地後，回來幫助其它人逃生。濃煙已經嗆得他們透不過氣來，牆壁也倒塌了，暴徒大聲亂叫。狄樂義姑娘沿著用床單縛成的繩子從視窗爬下來，但她一逃出，暴徒便把火炭堆在窗下，叫樓上的人再也不能循此路徑逃生。

還留在樓上的，只有瑪莉亞、路惠理和白安美。那個彪形大漢一把抓著路惠理的頭髮，把他拖到屋脊上，企圖解下他的手錶。路惠理把表丟到黑暗處，希望那漢子放過他，轉去尋找手錶，怎料那漢子老羞成怒，想把路惠理從屋頂摔下去，幸好瑪莉亞和白安美把他拖回來。那漢子又在牆上拿了一塊大磚頭，朝著路惠理的頭頂直砸下來。瑪莉亞立刻伸手架住，那人便想向瑪莉亞下手。

「你會向手無寸鐵的女人下手嗎？」瑪莉亞問。

那漢子呆了一會，放下手中的磚塊，爬出屋頂，大聲向下麵的人說：「上來，上來吧！」

此時，李德已經把窗下的火炭移走了。他朝上面大聲嚷：「不要再耽延了，快跳下來，我會把你接著。」

瑪莉亞來到屋脊邊沿，離地面大約有十二至十五尺高。她已有六個月身孕，雖然跳下去會有很大的危險，但除此別無他法。於是她迫不得已便往下跳。李德無法把她接住，只把她的跌勢阻緩了一點。瑪莉亞側著身跌下，扭傷了右腿，但還能勉強站起來。

當白安美準備跳下去之際，李德在下面也預備去接，但一塊磚頭飛過來，打在李德的一邊臉上。這一擊弄得李德兩眼昏花，失去知覺。由於沒有人幫助緩和她的跌勢，白安美背先著地，重重的摔下來，跌得她頭昏背痛，幸好頭上梳了一個中國髻，保護腦部不致受到猛烈的震盪。

路惠理也從屋頂爬到地下，沒有任何損傷，便趕忙過來扶起瑪莉亞。有人拿著大木棒打他，幸而躲避得快，只受了一點瘀傷，不過後來成了疖。白安美扶著半昏迷的李德，而瑪莉亞的傷口正汨汨地流著血，但她扭傷的腿更痛楚難當。

路惠理集合所有人，帶著他們經過一道門，來到隔鄰的房子。他們很快被引進屋內一間小室，一邊坐著等候，一邊擔心戴德生和童跟福的安危。李德躺在那裡，痛苦地呻吟著；瑪莉亞則因為失血過多而差點暈厥；白安美發現她的左臂淌著血，不能動彈——後來才知道左臂骨有多處折斷了。

「媽媽，他們把我們的床燒了，今天晚上我們睡在那裡？」其中一個孩子問。

「神會為我們預備睡覺的地方。」

一個中國教師來報告最新的消息：「知府和他的兵了來了，正在把暴徒驅散。縣官親自守衛房子，保護我們；但不曾聽到戴先生和童先生的消息。」

終於，房外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門開了，進來的是戴德生，他唯一的傷處是在膝蓋上，是往衙

門時被石塊擲傷的，以致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但現在他們都幸保性命，平安相聚，為此他們再次感謝神。戴德生又叫縣官進來察看李德的傷勢。

他們回到屋裡時，已是午夜過後了。屋子沒有燒毀，鄰居及時把火撲滅了。戴德生和瑪莉亞發覺暴徒搜掠後，他們的房間一片零亂，衣服和雜物滿地都是。瑪莉亞的聖經一頁頁地散落在全屋之中，把它們拾回來後，竟然一頁也沒有遺失。

暴徒把所有房間搜刮一空，奇怪的是他們竟沒有碰白安美的房間。而最重要的文件和大量金錢，都存放在這個房間裡。

當天晚上，傳教士在屋內睡覺時，屋外有兵丁和一些官員巡邏看守。暴徒又逐漸結集起來，李德的情況仍未穩定，而每個人的身子均又僵又痛。他們只有同心禱告。群眾愈聚愈多。戴德生派了一個中國僕人趕往鎮江，把有關事情報告英國領事。他又和木匠一起把門上和牆上的破洞用木板封起來。

一大清早，戴德生又到知府那裡請求援助。這次途中沒有受到襲擊。

「知府大人已經傳令縣老爺，跟你一起回去。」

於是，戴德生、縣官和一些兵丁一同回去，兵丁把集結的人群驅散。

縣官告訴戴德生說：「為著安全，你們現在任何人都不要離開本城。我想請你立刻修函知府，但措辭小心，不要把此事說成『暴亂』，應說是『騷動』而已，否則人民會火上加油，更難收拾。你要求知府懲罰那些被捕的人，同時發出公告安撫百姓。這樣，入夜前就可以恢復平靜，你們也不必離開本城。」

戴德生便寫信給知府，語氣儘量溫和。但那封信還是被人截住打開了。縣官把它還給戴德生，說是不能送去。

「一定要說明白事情的真相，」戴德生道。

「如果你堅持把這封信送給知府，」縣官說：「那麼我就離開，撒手不管此事。你可以盡力保護自己，但我警告你，你們所有人的性命可能就此丟掉哩！」

縣官似乎極想取得一封信件，證明此地沒有暴亂發生。戴德生不得已只有坐下來再寫一封，差不多是照著縣官的口示，完全沒有提到放火和搶劫的事情。

信寫好後，縣官說：「為了安全，目前最好把你們送到鎮江去。」

當天下午，縣官雇來轎子和苦力，把傳教士護送出揚州城的南門。在同一天，即 1868 年 8 月 23 日星期日，孫知府和縣官聯名發佈了一份公告：

禁令公告

揚州府縣接到英國教士戴德生送來照會如下：「民眾謠傳傳教士私藏小孩，暗地烹而食之，此因群眾不明真相，事實並非如此。昨晚有無數群眾集結我家四周，引起騷動。謹此懇求大人嚴懲滋事分子，並出示文告安撫百姓。」知府及縣官認為在教士住所外滋事的群眾，過於無禮，行為失檢，特此出示禁令曉諭民眾，以後務得再在戴宅引起騷動，違者重治不饒，不得有違。所出告示得張貼所有街巷中。

在赴鎮江途中，戴德生一行人一直得到兵丁的保護。他們途中碰上前往揚州查察的英國、法國和美國副領事，他們所看到的，其實只是暴徒留下的頹垣敗瓦，暴徒早已四散一空。

在鎮江，中國內地會的成員受到熱烈的接待

第三十一章 炮艦下的基督教

英國政府決定針對揚州事件，作出強烈的抗議，並採取適當的行動。領事麥華達（Walter Medhurst，譯者注：是麥都思牧師的兒子）決定親自到揚州去，請孫知府往南京向兩江總督解釋他何故沒有從速處理此事。

9月8日星期二，麥華達在海軍保護下，乘船直赴揚州。同行還有英國副領事阿倫（Alien）及法國領事。一艘法國軍艦停在大運河的人口，等待他們回航。戴德生因為傷口發炎，不能夠與麥華達共往，便由童跟福和蔡文才（Joslahjackson）代表前去。

孫知府已經事先得知麥華達領事到訪的消息，他帶了自己的隨從在城的側門候駕，希望把洋人從後街引到衙門去，免致惹人注意。但麥領事一行人眾卻從大門進城，浩浩蕩蕩地經過最繁盛的街道，儘量引人注目，他們來到衙門，把地方佔用，又派人守著各處門口，要求與孫知府會談。

當孫知府返抵衙門，發現英國兵士在門口駐守，不由大驚。他極力爭辯，說8月22日晚發生的事只是小小的騷動而已。麥華達沒有接受他的解釋，只是提出一連串的要求。但孫知府說那是他權力範圍以外，不能答應。麥華達堅持要孫知府和他同往南京，使他能在兩江總督面前提出以上的要求。孫知府答應同去，但要乘搭自己的船，不願象犯人般被英艦押解。

之後，麥華達和他的隨員跟著孫知府到劫後的內地會會址視察。雖然一些狡猾的官員曾作了緊急的修補工作，但那些殘垣敗瓦仍可以顯示出暴徒的破壞。

麥華達和戴德生會面，詳細瞭解各傳教士所受的傷害，之後徑往南京。在那裡，他受到兩江總督曾國藩盛情的接待，但對於麥華達的投訴，卻沒有認真處理。在接到詳細的報告前，曾氏一直拖延。

孫知府到達後，麥華達繼續提出他的要求，但曾氏還是拖延下去。

後來，護衛麥華達的海軍將領因患病疾而先行把船駛回上海醫治，留下麥華達和一艘小船。由於沒有槍炮作後盾，中國官員開始對麥華達冷言冷語，曾國藩的口吻也改變了，不再考慮他的各樣要求，只命令孫知府就那件事情發表公告而已。

麥華達對於這樣的反應大為不滿，要求公告發出前，先由他審核，並且聲明所有關於揚州事件的檔，必須送交北京的英國公使。

1868年9月，戴德生撤除倪義來在內地會的職務。在給倪義來的信中，他提到這是幾經考慮，並與會內所有成員開會商議後的結果。他繼續說：「我撤除你的職務，並不是由於宗派上的不同意見……或是由於你對英國服裝的偏愛，或是其他理由，而是因為你習慣和蓄意去顛倒是非。」倪義來一直以來都對內地會的成員及其它差會散播有關內地會的謊言。

戴德生把信寫好，請麥卡悌過目和修飾文辭，然後送交倪義來。麥卡悌對戴德生說：「在未發生這次暴亂之前，我們不大知道我們是多麼愛戴你。希望為主的緣故，也為著這片需要福音的土地，……我們更緊密地互相扶持。親愛的弟兄，願神賜給你剛強的勇氣，因為我相信你在寫這封信給倪義來時，心裡一定極其難過。」麥卡悌也寫了一封信給布迦先生，稱讚戴德生的高尚品格，並且為他極力辯護。他認為戴德生唯一的「過失」，就是嘗試一個人做十個人的工作。

布迦寄了十鎊給倪義來作為日常生活費用，又願意提供倪氏夫婦從華近英的船票。可是，倪義來

選擇留在蕭山。稍後他在寧波的一間醫院工作了一段很短的日子，此後再沒有他的音訊了。

十月，三位同情倪義來的女教士——班蘇珊（Susan Barnes）及安氏姊妹（Margaret and Jane McLean）連袂向內地會辭職。而麥克蓮以後和戴德生仍有往來，瑪嘉烈（Margaret McLean）和班蘇珊則有一陣子參加了倫敦會的工作。

這些事對戴德生的健康打擊很大，瑪莉亞極之盼望他能夠有幾天休息的時間。

自從揚州教案後，內地會不斷受到英國報章的批評，甚至基督徒也非議他們，奉獻顯著減少了。許多人誤會戴德生，認為他尋找英國領事幫助，利用堅船利炮來對抗中國官府。事實上，在事發之初戴德生是向中國官吏求助的，只是事後才把事情發生的經過通知英國領事。英國領事的行動完全是自發的。

1868年11月18日，戴德生和他的家人再次回到揚州故居。在搬進去之前，有一個天主教神甫這樣記述說：「人們恭敬地領著麥華達和戴德生經過大街，來到一座可容四百人的寶塔中。穿著整齊的士紳走在官吏前面，魚貫進入，那兩名罪魁禍首已經被捕，其他人為了滿足洋人的要求，都來參加遊行。兩名官差在遊行隊伍前面開路，向人大聲宣告說：傳諭百姓：務得傷害洋人，或稱之『洋鬼子』，要尊稱其為『大人』。戴德生被送回原來的住所，該宅已由官方斥資重修，完美如新。就在這所揚州大屋裡，瑪莉亞在1868年11月29日再生下一名男孩，取名戴查理（Charles Edward Taylor）。

1869年3月，英國上議院對揚州教案及其影響展開辯論。明顯地，反對中國內地會的有森馬錫公爵（Duke of Somerset）。他說在聽見中國內地會的名稱後，他對以後發生的種種麻煩一點也不感到奇怪。「現在，我想問一問：我們有什麼權利派遣人到中國內地傳教？我們有什麼權利到中國內地去改變中國人的信仰？……我絕對不贊成支援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事實上，我們只是靠著堅船利炮來傳揚基督。當地官員清楚知道，如果他們給傳教士麻煩的話，炮艦便跟著來到……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召回內地的這些傳教士。……誠然，傳教士一定是個宗教狂，否則就可能是個無賴。如果不是宗教狂的話，他們不會沿江而上，進到內地傳播基督教；但若然是宗教狂，便更加危險。……」

可是，外相向他的貴族朋友指出：「在削減傳教士人數方面，可不是政府的責任。傳教士選擇或去或留，我們都無權過問，要把他們逐出中國，恐怕我們無能為力了。」但他也建議傳教士跟在商人後面，因為人們看到貿易帶來的利益後，自然會開放更多地方，為傳教工作提供更多機會。

新上任的彼得堡（Peterborough）主教麥基博士（Dr. Magee）聽了這番話後，實在按捺不住了。在他上任以來的第一次演說中，他極力為傳教士辯護。他的辭鋒犀利，辯才橫溢，是個極出色的辯論家。首先他答覆森馬錫公爵，認為他的意見沒有任何傳教士會接納——那就是留下一些地方不去傳教或不准傳教，因為恐怕傳教工作可能影響英國和這些地方的貿易。連最年輕最不熱心的傳教士都會認為：「英國的貿易利益雖然很重要，但有一些事情是比神聖的鴉片貿易更要神聖。英國為著神聖的鴉片，不惜發動了戰爭；但有一些事情比這更加神聖——就是服從主的誡命，到世界的地極去，不論安危，把福音傳給萬民聽。……如果一個基督教國家願意大力保護其國人從事不道德的貿易；但傳教士若得罪中國人，令到他們不快，便需聽天由命，甚至幾為暴徒所害，國家也袖手旁觀，她還配稱為基督教國家麼？」

麥基博士繼續指出公爵對傳教士的要求過於苛刻。他又說若不是有人把福音廣傳，他本人和公爵

也不會有機會成為基督徒。再者，他說：「外相提議傳教士最直跟隨貿易商人的腳步，不知他是指何種貿易？那種商人？……是否追隨鴉片商？……或者應等到英國商人把他們各種各樣的罪惡灌輸給華人後，才開始傳播福音？傳教士不會等待，因為他神聖的職責是上主託付他的，那就是——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上議院為這事作了意味深長而又激烈的辯論，森馬錫公爵提出召回中國內地傳教士的要求，終於沒有通過。

在內地會受到嚴厲批評的時候，穆勒（George Muller）是為內地會辯護的主要中堅分子之一。他一直都直接匯錢給個別的內地會傳教士，但把金錢平均分配，實在是很困難。布迦把此事提出來與穆勒商量，他立刻接受了布迦的建議。在揚州教案發生後不久，外面的傳聞和誹謗還未稍減之時，戴德生收到布迦先生的一封信。

穆勒先主經過情重考慮後，希望有一份內地會全體弟兄姊妹的名單。除非有什麼障礙，否則他想盡力幫助每位成員……當然，主知道我們的基金減少，所以感動他尊貴的僕人予以援手。

穆勒把支票寄給每一位傳教士，而一封致全體內地會同工的信也同時收到了。信上說：

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告訴你們：我在主裡掛念你們。我對主在中國的工作極有興趣，並且每日為你們禱告。當你們在困難、試煉、痛苦和失望之中，知道有人在主裡紀念你們、支持你們，或許會帶給你們一點鼓勵……

1870年代，穆勒大概每年給中國內地會傳教士寄上二千鎊，在當時來說，已是很大的數目。

賓法特（William Pennefather）也是內地會的支持者，他在倫敦舉行的邁德美大會（Mildmay Conference）中為戴德生及內地會辯護。在內地會風雨飄搖的日子裡，對內地會仍信心不移者計有韋士托伯爵（Lord Radstock）、湯姆爵士（Sir Thomas）、寶參夫人（Lady Beauchamp），以及高富牧師夫婦等。

1869年5月底至6月初期間，戴德生一家終於獲得期待已久的假期。他們和白安美一起到杭州附近一個叫普陀的小島度假，那裡風景怡人，杜鵑盛放，有長長的白沙灣和寧靜肅穆的廟宇，是寧波及上海市民常到的度假勝地。

假期很快結束了，戴德生又恢復繁忙的工作。他現在要負責十八位傳教士並其家人，以及六位中國同工。他記述此時的景況：

「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收到同工的信，要我指示他們——在目前的情況下，發展工作非常困難，是應該離開工作崗位，還是留下來呢？我也不知如何決定。只有象希西家一樣，把每一個人的信心都展露在上主面前，相信他會指教我怎樣回答他們。」

第三十二章 喜樂能力之路

1869年整個夏天，戴德生的情緒非常低落，脾氣暴躁是他「每天每時的失敗」。有時，他甚至懷疑這麼一個容易失敗的人，到底是否真的基督徒。長久和瑪莉亞分離，更加重他內心的壓力。終於他在八月病倒了，可能是肺炎。

這一切使他產生疲乏和渴求的感覺。他看見自己和內地會都需要更多的聖潔、生命和能力。他看到自己的需要愈來愈大：「當我不與神一起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充滿危機和罪惡，而且忘恩負義。」

他禱告、禁食，痛苦地掙扎，嘗試努力做得更好，而且下決心仔細研讀聖經。他強迫自己撥出更多時間來休息和默想；但這一切都好像沒有果效！「每一天，每一小時，罪的重擔都緊緊地壓迫著我。我知道我若住在基督裡，一切便迎刃而解，然而我卻不能。每天早上，我以祈禱開始，盡力把精神集中在主身上；但工作壓力使我精疲力竭，以致常常忘記他。再加上難受的氣候，更使人脾氣容易暴躁，剛硬的思想，不善的言語更是難以控制。我每天都在罪和失敗的轄制下，缺乏力量。真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卻由不得我。」

戴德生問自己一連串的問題：**是否無藥可救了？難道就這樣長此下去——不斷掙扎，失敗代替了得勝嗎？我怎能向那些接受耶穌基督的人誠懇地傳講「他就給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就是象神一樣），而自己卻一點也不象他呢？**

他的靈性不但沒有愈來愈剛強，反而愈來愈軟弱，更容易犯罪。他討厭自己，恨惡自己所犯的罪。「我覺得我實在是神的兒子，神的靈在我心中呼喚，但我不知道怎樣享受兒子的權利，我完全沒有能力……我想神或者不讓我感到在地若天，因此天堂才顯得更為美好。我不靠自己的力量追求成聖，因我知道自己實在沒有力量，我也這樣求主給我幫助和能力。有時我想主是保守我，支援我的。但每當我晚上回想和省察的時候，啊！又是失敗和罪過，只好在主前認罪，求他赦免。」

當然，戴德生的靈性光景並非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如此。但在整個夏天裡，正如他所說，「靈性時常落於這樣的境況，一切掙扎往往以失望告終。但基督卻從沒有象現在那麼寶貴——一位能夠和願意拯救這樣一個罪人的救主！……有時他也會享受到主裡的喜樂和平安，不過都是短暫的，大部分時間卻感到軟弱無力。」

在那段時期裡，他回憶說：「我非常肯定我只需要基督，但實際的問題是如何向他支取。」他的腦海中展現了一幅基督是葡萄樹（約十五）的圖畫，他這樣寫道：「他是富足、信實的，我卻貧窮；他是剛強的，我卻軟弱。我完全明白那樹根和樹幹都有充分的養料；但問題是如何把它吸取到我這瘦弱的枝子裡。」

在這段日子中，他漸漸得到一些亮光。首先，他明白信心是他獲得一切的先決條件——那是「伸出手來握著他全備的供應，以豐富自己的生命。」但他沒有這信心，他為此掙扎、力求，卻得不著。他嘗試應用，卻是徒然；「愈看主耶穌豐盛的恩典，愈覺得自己的無能和罪過。若將我所犯的罪，與不信的罪相比，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不信主的話，就是把他當作說謊者。因此，我覺得『不信』是世上最大的罪，而我卻屢犯這罪；我求信心，卻得不到。我該怎麼辦呢？」

第二個亮光來自麥卡悌的來信。戴德生常和麥卡悌講到他的困擾，他們也常論及如何追求聖潔的生活。麥卡悌的信來到時，戴德生正在鎮江。麥卡悌的掙扎和戴德生的窘境正好互相對照。

我真希望能與你見面詳談關於如何追求聖潔的問題。你向我說及這事時，我腦海中正想著同一件事——不是因讀書，或是看了弟兄的信而想起，乃是從失敗而產生的感覺；我不斷渴望追求靈裡與主合一，有時那種契合好象很真實，但很多時卻象幻覺一樣，是那麼的遙遠！……

親愛的弟兄，我想這種種掙扎、努力、渴求，希望能更好的過基督生活，都不是真正得到快樂、聖潔的途徑，也不是為主所用的人應持的態度。當然，這比滿足於現況好得多，但絕不是最佳的態度。我讀到你留在這裡的一本書，書名是（基督就是一切）（Christ is All），裡面有這樣的話：

「為主耶穌接受，就是聖潔的開始；為主耶穌所愛，就是邁向聖潔；為主耶穌所信賴，就能達致聖潔。

「這（信心的恩典）是把我們的靈魂與基督，把救主和罪人系在一起的鎖鏈……又好象一條流通的管子，從基督的豐富裡滿滿地流下來。那不結果子的枝子，就變得結果累累……一個生命管理著所有部分。

「那些深感到與基督同死，在他裡面付上了罪的代價的人，將達到敬虔生活的最高層次。誰愈多在基督裡，誰就愈聖潔，可享受大工告成後的喜樂。而有瑕疵的信心，則會絆倒許多人。

我非常贊同最後一句話。讓愛我的主憑他的旨意在我裡面作工，借著他的恩典使我過成聖的生活。與主同行，不靠自己的努力和掙扎；只仰望他，信靠他加給我力量克制內裡的私欲；在大能的救主裡得到安息，在完全的救恩中得到赦罪的喜樂（這是主的應許）；更願意以他的旨意居首位——這些都不是新鮮的話，但對我來說，卻是新鮮的經驗。我覺得好象處身在第一個榮耀的早晨中，不禁帶著顫抖，也帶著信心地發出歡呼。我好象來到無垠無際的大海邊沿，但只啜飲一日，就得到完全的滿足。現在，基督就是我的力量，是我唯一的工作動力，是喜樂的根基。願他帶領我們進入他那深不可測的豐富裡！

怎樣增加我們的信心呢？只要思想主耶穌為我們所作的一切：他的生命、他的死、他的工作。）他向我們顯明了他就是道，是我們常常思想的主題。不是掙扎去得著信心，或增加信心。我們只需要仰望那位信實的主，安息在愛我們的主裡，從今直至永永遠遠。

戴德生放下麥卡梯的信，說道：「我一面讀信，一面恍然大悟，全都明白了！『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我仰望耶穌，看見他說：『我永不離開你。』喜樂便如泉湧流在心裡。啊！安息就在這裡！我想起自己曾經努力掙扎，要安息在主裡面，卻是徒然！他豈不已經應許要住在我裡面，永不離開我，永不撇下我嗎？」

當日，戴德生將麥卡梯的來信與鎮江內地會的其他弟兄姊妹分享。白安美在她的日記中寫道：「現在他也得到靈裡的安息，象主耶穌前些日子賜給我的一樣。」

在以後幾天裡，戴德生繼續思考這個問題。神又給他新的亮光，使他對屬靈的進深又有進一步的瞭解。他記述說：「當我想到葡萄樹和枝子的時候，靈魂如同得著聖靈的光照！我一直想從樹根吸取汁液，向他支取豐富，那真是大錯特錯！現在我才知道主耶穌不但永不離開我，我更是他的肢體，他的骨肉。現在我才明白到葡萄樹不只是根，而是整棵樹——樹根、樹幹。枝子、嫩枝、樹葉、花和果子。耶穌不僅是這些，他也是土壤、陽光、空氣和雨露，是超乎我們所想、所求。所需的千倍萬倍。啊！能明白這真理是何等喜樂！

「……能夠與復活並被高舉的主成為一體，是基督身體的一員，真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試想這裡面所包涵的一切……事，因為我知道他必能成就他的旨意，而他的心意也是我的心意。

「……我不能說自從我看見那亮光後，再沒有犯罪；但我已不再需要靠自己掙扎來成聖。而且在光明中行，使我的良知更敏銳；連微小的罪也能立刻察覺出來，連忙認罪，得蒙主赦免；平安和喜樂也隨即臨到。」

「現在我明白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不是影兒。它不是難以看見，而是超乎我們所能看見的。我們只看得見事物的外表；信心卻能透視事物的本質。你只可在本質中得到安息，得到飽足。基督因

信住在我們心裡（他應許的話語得到應驗），那就是能力，就是生命。基督和罪不能並存；我們也不能既愛他，又愛世界，或者為許多事情思慮煩擾。」

戴德生來到揚州時，先探訪祝名揚（Charles Judd）。祝氏是去年由巴納道博士（Dr· Barnardo）推薦加入中國內地會。他患了病，現正在康復中。

「啊！祝先生，」戴德生一邊說，一邊在房間踱來踱去，雙手放在背後。「神已經使我成為新造的人，是新造的人了！我沒有令自己成為枝子，是主耶穌告訴我，我就是枝子。我是他的一部分，我只需要相信他。假如我到我在上海的銀行戶口支取五十塊錢，出納員不能拒絕我伸出來的手，說那些金錢是屬於戴先生的。他所有東西，我的手都可以拿取，因它是我身體的一部分。作為基督的肢體，我也可認他豐盛的恩典中支取我所需要的一切。以前我只是從聖經中知道這些事，現在我相信它是真實無比的。」

「他是一個充滿喜樂的人，」祝名揚記述說：「是一個快樂的基督徒。他以前是勞苦擔重擔，靈裡得不著安息的人。現今他在耶穌裡找到安息，由他作工——這個分別實在太大了。無論他在任何聚會中講話，總好象有股新的力量從他裡面湧出來。在日常生活中，他充滿新的平安，煩惱一點也不能獲從前那樣困擾他。」

自從 1868 年起，在英國出版的一份稱為《復興》（Revival）的雜誌裡，發表了史密夫（Pearsall Smith）牧師一連串關於聖潔的文章。由於他的影響，後來創辦了凱錫克培靈會（Keswick Convention）。1869 年，中國內地會各人都收到這份雜誌。白安美對戴氏的評語，以及戴氏時常提到「新造的人」和「與主合一」等觀念都可能受這幾篇文章的影響。

布迦夫婦也非常熟悉《復興》的文章，但他們認為其中所說的追求聖潔，是過於被動。布迦強調積極抵擋罪惡和努力服從神的重要。後來賴爾主教（BISHOP Ryle）在其著作中，也嘗試為凱錫克培靈會的不平衡教義作出修正。可是，沒有跡象顯示在中國內地的戴德生及其同工在積極工作和努力事奉上有任何不足之處

第三十三章 在天家相聚

從 1869 年 3 月起，戴德生的兒子戴森姆（Samuel Taylor）感染了腸結核，無論戴德生和瑪莉亞到那裡去，都帶著他，把赫拔、存義、小瑪莉亞和查理留下給白安美和看護照顧。這種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使孩子生活不調，感染各種的疾病。

雖然心裡是捨不得，但經過長時間的考慮和禱告後，戴德生與瑪莉亞終於決定把年紀較大的四個小孩子送回英國，只留下一歲的查理在身邊。白安美也患上肺病，這時病情日漸加深，實在經不起江浙地區夏季潮濕炎熱的氣候與環境，便答應護送孩子返英。戴德生形容自己快要跟孩子分離時的心情，說：「我們的前路是黑雲滿布。」但森姆卻沒有機會離開中國，因他的病情惡化，在 1870 年 2 月便去世了，離世時才不到六歲。

瑪莉亞也從森姆身上感染了同樣的病。當時，她已懷孕。嬰孩子 1870 年 7 月 7 日在鎮江出生。瑪莉亞為他取名諾爾（Noel），意即「平安」諾爾出生後不久，戴德生為瑪莉亞診脈，察覺有些不大對勁。當路惠理夫人（Mary Rudland）拿著蠟燭進來，照在瑪莉亞蒼白的唇和臉上時，戴德生斷定她是嚴重內

出血。他徹夜不眠地陪著瑪莉亞和諾爾。過了一個星期，瑪莉亞愈來愈虛弱，而諾爾的情況好象還不錯；可是不久之後，他口部發炎，加上腹瀉，在7月20日便夭折了，只得十三天的壽命。瑪莉亞為他選了兩首詩歌。

不久收到白安美的信，知道小孩安全抵英。瑪莉亞想到小孩和祖父母相處的融洽情景，心裡便得著一點安慰。在一個淒冷的黃昏，戴德生把諾爾葬在他哥哥森姆旁邊，那是位於鎮江河畔，四面有牆垣圍住的一處墓地。但瑪莉亞因病不能參加葬禮。

「我相信以後不會再麻煩你了。」葬禮過後，戴德生對那掘墓的人說。

「我想在主的工作上，我們極需要她（瑪莉亞）。」他對去年才加入內地會工作的費查理（Charles Fisher）這樣說：「我對她的病情還抱有希望，可使我感到舒服一點。」

葬禮完畢，大概是晚上八時，戴德生回家對瑪莉亞說：「我們不如搬到近郊高地的房子住，因那裡比較涼快。」

「我在那裡可不可以舒舒服服地洗澡呢？」

戴德生點頭，跟著很快就睡著了。

瑪莉亞叫狄樂義姑娘來為他蓋上被子，以免著涼。

一個小時後，戴氏醒來問瑪莉亞：「你有什麼需要沒有？」

「沒有，你去用點茶吧，路惠理太太泡了茶在等著你。」

戴德生便到鄰房與路惠理夫婦閒談。突然聽到一個微聲的呼喚：「德生！」戴德生趕快走到瑪莉亞那裡，發現她站在床邊，非常虛弱，不能說話，也不能行動。他把她抱回床上，在四周放上枕頭和墊枕，給她注射了一些興奮劑，心裡卻擔心著最壞的事情將會臨到。

「求神使我冷靜，引導我作適當的判斷。」他對路惠理說。

瑪莉亞心跳加速，戴德生恐怕她的肺部已不能正常運作。他給她喂吃一點食物和藥。到了午夜十二時三十分，他勸路氏夫婦和李德（Henry Reid）先行休息。

「我的頭燙得很，」瑪莉亞稍為恢復氣力後說道。

「讓我把你的頭髮剪薄一些。」

戴德生發現瑪莉亞的頭髮已打了結，所以他索性把她所有頭髮都剪掉。

他剪完後，瑪莉亞摸著她光禿的頭，微笑道：「這就是你所謂剪薄一點嗎？好了，我現在舒服多了，但觀瞻則由你負責！」

她伸出那瘦弱的手抱著他親吻。

之後，她睡著了。戴德生讓狄樂義姑娘陪伴她，自己則到隔壁的房間和路惠理夫婦一齊祈禱。他們都盡上心力祈求瑪莉亞能康復。

凌晨二時，他再給瑪莉亞吃了些食物和藥，陪伴她至三時。狄樂人不肯離去，所以他吩咐她到了四時便喚醒他。曙光初露，瑪莉亞已到了彌留之間。那天是7月23日。

「親愛的，」戴德生說：「你快要離開我了，你知道嗎？」

「要離開你？」她回答說：「你這樣想嗎？什麼令你這樣想呢？」

「是我看出來的，親愛的。你已不能支持了。」

「是嗎？我不覺得痛苦，只感到疲倦。」

「是的，你要回天家了，你很快便可與主耶穌在一起。」

「親愛的，我很難過。」

說到這裡，瑪莉亞頓了一下，似乎想要控制難過的情緒。

「親愛的，你與耶穌同在，不會感到難過吧？」戴德生問。

他永遠不會忘記她回答時的眼神，她說：「啊，不，不是的。親愛的，你知道在過去十年中，主與我的靈沒有隔閡。我決不會因往他那裡去而難過；只是在這時候離開你，留下你孑然一身，我才覺得難過。然而，他會與你同在，供給你一切的需要。」

每一個人都聚在瑪莉亞的床前，包括從鎮江另一間內地會佈道所趕來的夏維（Thomas Harvey）和韋特（Robert White）。

有些對瑪莉亞十分敬重的中國僕人和中文教師都來到房間裡。她跟每個人說了幾句話。

「信靠主耶穌，我們日後便可在天堂相會了。」她對還未信主的僕人說。

她給戴德生幾個親吻，要他分給在英國的兒子和女兒，也給他們每人留下幾句話。之後，她再不能說話了。她將一隻手抱著戴德生的頸，另一隻手則摸他的頭，示意他要仰望天家。他看到她的臉上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愛和信靠」。她的唇在動，但發不出任何聲音來。

之後，她便睡著了。大家看著她的呼吸愈來愈微弱，但都不敢肯定她是什麼時候去世的，因她沒有一絲痛苦的神色。

戴德生跪在床邊禱告，說：「親愛的神，謝謝你將瑪莉亞賜給我；謝謝你給了我們十二年半在一起的快樂時光；謝謝你把她接到你的身邊。我在此重新將自己獻上，為你工作。阿們。」

他給杭州的美國長老會寫了一封短函（這份函件到現在還存留下來），上面寫道：

可否麻煩杜德（Dodd）先生把這消息告訴福小姐和麥卡悌夫婦？……戴德生夫人因感染腸結核去世；嬰孩也死於腹瀉。他們都是蒙福的！我也是一樣。為了他們能親近主，獲得難以言喻的福樂，我心充滿喜樂和感謝。我們的主耶穌「叫萬事都互相效力」。

主內
戴德生上

他把瑪莉亞一縷柔軟而淺棕色，幾近乎金色的頭髮寄給他的父母，也給每個孩子一縷。他在信封上寫著：「這裡只是一半。我不敢冒險把全部一次都寄上。小心保存它。戴德生字。」

7月28日星期四，費查理和夏維穿著中國傳統的白色喪服，走在瑪莉亞靈柩前面，靈柩是由八個中國人抬著。戴德生和其他傳教士穿著白色喪服走在後面。他們之後還有英國和美國的領事、海關的外國官員，以及差不多所有居住在本省的英國人和美國人。這些人想為她立一個墓碑，但給戴德生婉拒了，因為他想由自己來辦。

戴德生親自在墓旁主理葬禮。他宣述瑪莉亞的家庭背景、得救經過、在寧波的生活，以及揚州暴亂和以後所發生的事情。

三天后，他寫了一封感情真摯的信給英國的三個孩子。他寫道：「諾爾有一對柔和、美麗的小眼睛、長而閃亮的睫毛，一張小嘴，象極了恩。」他並且複述瑪莉亞臨終時留給他們的話。之後，他說：「或

許神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把你們親愛的爸爸接去。但神永遠是你們的天父。」其時他已患上瘧疾。這種病在當時是隨時可奪去人的性命，所以他才寫了這樣一封令孩子看得心急的信。

關於瑪莉亞的去世，布迦有這樣的描述：「她的人生真是寶貴而有意義。對於我們、對於她親愛的丈夫、對於她的孩子，以及她的工作，是何等需要她的生命延長下去，但神自有他不同的心意。她對中國的知識、風俗習慣、言語和思想模式，皆有深厚的認識。即使在最後生病的日子當中，她還從事寫作和修改等文字工作。她現已離開了，在勞苦中得到安息，睡在主的懷裡。她在光輝璀璨的時候，倏然消逝，以致這地上的人不再認識她。但對我們來說，她是一個榮耀的見證，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韋特的家在鎮江一座山丘上，可以看到長江壯麗的景色。戴德生獨坐那裡，思潮起伏。他寫道：「幾個月前，我的房子是多麼熱鬧，所有人都在我身邊。但現在何其孤寂——森姆、諾爾和我寶貝的瑪莉亞都回到主耶穌那裡；年紀較大的孩子又離我這麼遠，連小查理也在揚州。從前，我也曾離家出外工作；但每次回家時，總受到熱烈的歡迎。但現在只有我獨自一人。難道這次沒有歸程了，也沒有回家團聚的盼望？我親愛的躺在冰冷的草地地下。這是噩夢還是事實呢？啊！這是真的。但我還有回家團聚的盼望，而這次團聚後，便再也不分離……『我去原是為了你們預備地方去。天家有沒有一處地方，是預備我和親愛的家人團聚呢？』

他寫信給福珍妮，感謝她來信安慰，他寫道：「當我為她哀傷的時候，我就感到無助無用。但當我以她的喜樂為樂時，往往可稍減愁苦。不過，我有時不禁感到困乏……若不是我懂得倚靠主的全備和同在，我心早已碎了……我離開我所愛的並不遙遠，她與我也相近。不久，我們將可相會。……晚安。」之後，他忽然記起珍妮還是獨身的，所以他又寫道：「耶穌是你的福分，你的良人。……主內，戴德生上。」

瑪莉亞去世後十天，戴德生寫信給他的母親說：「在我靈的深處，我深切知道神准許所有事情發生，自有他的美意，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到益處。

「他——亦只有他——知道我的愛妻對我是何等重要。他知道我眼裡的光彩和心中的喜樂，都在乎他。但他認為把她召回是好的；我也相信這對她確是好的……她在神的慈愛中安然離去，沒有痛苦；對於獨自勞苦的我來說，亦未嘗不好——我與神比從前更加親近，所以也不覺孤單。」

第三十四章 愛是不嫉妒

內地會的工作進展甚佳。杭州新巷的教會有十五名華人受洗，現在，教會人數已達到六十七人。王立群在四周的鄉鎮開設了四間佈道所，有定期的聚會，也有七位全時間的中國傳道人和聖經分發者，都歸他監督。麥卡梯則不斷開辦查經班和佈道訓練班，幫助培訓中國工人。這些中國同工常到華人家中探訪，或在茶館裡與人談道，傳講福音，有時是麥卡梯陪著他們，有時只有他們自己。

杭州的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在辦學方面別出心裁，也很成功。戴德生到來訪問時，福姑娘便帶他參觀學生宿舍。一間長長的房間，有七個窗戶，一邊排著一行六張的床，供學生躺臥，另一角則是老師的床。每個學生有兩個小櫃子和一顆牆釘用來掛物。

「這些孩子自己清理房間，」福姑娘告訴戴德生說：「也自己洗衣服。我特別雇了個老媽子替他們修補衣服，有時也幫忙洗髮。她為人很好，叫做楊媽。我每天給她四角錢和半個銅板，食物自己負責，

由早上工作至下午五時。昨晚一個學童要求受洗，其它幾個也希望成為基督徒。」

據王立群估計，杭州教會的會友中，至少有五十人以上是受了福姑娘的影響而信主。除了繁忙的校務，珍妮也常常到城中各處做探訪的工作。

在 1871 年初，戴德生認真地考慮回英國一行。布迦夫婦不斷寫信催促他回去會談差會的各樣問題，並與支持的人會面，順道看看在英國「三個強壯活潑的孩子」。

其它內地會同工也到了休假的時候。福珍妮的父母不斷寫信提醒她在起初的時候，只是答應到中國工作五年。所以戴德生和她打算連袂返英，同行還有宓道生夫婦；因為宓道生健康甚差，恐怕受不住炎熱潮濕的夏季氣候。（後來宓道生康復了，四十年後才在華去世。）

由於要負責接生，戴德生遲遲不能動身。他在五月替美國領事夫人接生後，到了七月又要為祝名揚夫婦的初生嬰孩祝康寧（Frederick Judd）接生。祝康寧長大後，成為內地會的領袖之一。

戴德生寫信給他的孩子說：「我已經把風琴賣掉，錢用來完成建校的工作，以紀念你親愛的媽媽……今天是我最後一次彈這風琴，我彈了一些你媽媽喜歡的調子。」

麥卡梯和福珍妮從杭州到鎮江，和戴德生商定計劃。麥卡梯將負起福珍妮在杭州的工作，而福姑娘則會到上海和密道生一家會合，與他們同船回國。中國內地會的幹事則由費查理（Charles Fisher）擔任。原定是戴德生隨時能夠抽身，便隨時先行返國，但最後卻是一起同行，還加上負責印刷工作的中國基督徒李蘭豐。

戴德生和兩歲半的兒子小查理一起乘船沿長江往上海，同船還有天主教神甫石清格（Pere Sechinger），他是在揚州教案之後認識的。戴德生對石神甫的印象是「誠懇而虔敬」，又說：「他對中國信徒的觀感正合我心。」天主教在華的工作比基督教開始得早，他們的方法和戴德生一樣，深入中國內地，與商人團體完全劃分，而且穿著中國服飾。

在航程中，宓道生的身體不適，而宓太太則需照顧孩於，不能分神。結果戴德生和福珍妮有很多時間共對。他們一起談話，一起禱告，不再苦於中國事工的壓力，一起享受輕鬆愉快的旅程。戴德生發現自己愛上了珍妮，並且向她求婚。這時瑪莉亞死後已逾一年，在當時而言，這樣的感情發展不算過於急促，因為那時的死亡率甚高，配偶死後及早再婚是極普遍的事，尤其是有小孩需要照顧者。當時戴德生三十九歲，福珍妮二十八歲。

船經過紅海時，戴德生寫信給珍妮的父母：「我不是……請您們捨棄女兒，而是請您們……從心底裡也接納我。」他又說他很快樂，因為他的愛得到「完全的回報。」

戴德生和福珍妮無拘無束地談到瑪莉亞，戴德生永不能忘記她。珍妮也敬愛瑪莉亞。兩人以後常常談起她，一點也不感到尷尬。

「瑪莉亞向我表示她最後的願望，」戴德生寫著：「就是如果她被神接去，我應及早再婚……我知道我對她的愛不會改變和減少，我是絕不能在三五年間忘記她的。你不知我愛她有多深，很多時候，她的影子縈繞在我腦際……親愛的珍妮也不會要我把她忘掉。她在我心裡有她的地位，因為她的愛沒有嫉妒。」

1871 年 9 月 21 日，船抵達法國馬賽。他們先乘火車到巴黎，四天之後便到達倫敦。

福珍妮的父母對戴德生說：「我們可以答允你倆的婚事，但得在珍妮回家一年之後才成婚。」

當然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他們要遵從這樣的吩咐。但他們不願違逆雙親，珍妮流淚央求，戴德生也希望能說服他們。

福太太說：「我之所以反對你們過早結婚，是因為你們兩人現在的健康都不甚佳。」

終於福太太不再堅持兩人要一年後才結婚，福先生原本也不是強烈反對，所以婚禮便順利於 11 月 28 日在麗晶教堂 (Regent' s Park ChaPel) 舉行。婚後他們沒有度蜜月，就回到倫敦邁德美公園路 (Mildmay Park) 64 號和孩子們同住。

布迦夫婦的健康都不大好，而且布迦先生受到別的困擾。他接受了一種神學見解已有一段日子，認為有些非基督徒死後不至於受永遠的刑罰。聖公會、浸信會及弟兄會都把傳揚這種觀念的人驅逐出會，如果大家知道布迦是贊同這種見解，那麼支援內地會的正統派信徒一定表示不滿，甚至以後不再援助內地會。

布迦為內地會鞠躬盡瘁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他在公共關係方面一直做得不好。他編輯《不定期報》(The Journal)，刊登內地會傳教士的消息，寄給內地會的支持者。他的編排有序，但風格呆板乏味。他也知道自己不是這方面的專才，所以請戴德生找人接替他的工作。

1872 年 1 月初，戴德生在培蘭路 (Pyrland Road) 六號租了一座新房子，離開紐惠敦格林 (Newington Green) 不遠，旁邊是田野和一個鴨子池塘。他們全家在 1 月 15 日搬進新居，此後培蘭路六號便成了倫敦內地會的中心。戴德生帶著李蘭豐到處參加聚會，也和他參觀倫敦的名勝；此外，戴氏又接見和指導傳教士，而且盡可能親自向捐獻者回信道謝。

他又到西部一趟，在班士德堡 (Barnstaple) 見過翟文 (Robert Chapman) 牧師，又在布裡斯托的伯賽大教會 (Bethesda ChaPel) 中講道，晚上在穆勒家裡度宿。

回到倫敦後，戴德生被邀在邁德美大會中講道，而另一位講員是美國著名佈道家慕迪 (D.L. Moody)。赴會的人數極多，他們大聲唱著「飄送，飄送，福音隨風飄送」這首詩歌，然後坐下來聽戴德生講道。戴氏站起來，眨一眨眼睛，但相當嚴肅地說話。

「親愛的朋友們，」他說：「風永不能將這個愛的故事飄送到地極的黑暗之處，一定要有象我們一樣，……希望遵行宣教大使命的人把它帶去。」

會議期間，一對來自德文郡 (Devonshire) 的小姐住在培蘭路六號戴家。她們是蘇爾陶 (Soltau) 津師的千金：漢莉達 (Henrietta) 和露絲 (Lily) 姊妹。一天午餐後，戴德生、珍妮、自安美和蘇爾陶姊妹一起來客廳，站在一張中國大地圖之前，上面注明了九個還沒有內地會工人去到的省分。

戴德生問她們：「現在你們有沒有信心和我一起向神呼求，請他給我們十八個人，一對對進入這九個未有福音傳到的中國省分去？」

漢莉達和露絲向戴德生承諾，每天為此事祈禱，直到實現；然後所有人手牽著手，由戴德生帶領，為那十八位生力軍祈禱。

在戴德生的生日那天，五歲的女兒小瑪莉亞送給他一份禮物，是她自己製造的。他把她抱在膝上，看看她究竟送他什麼。那是一塊小木板，上面插著一隻夾子，夾上掛著半個貝殼。戴德生不明所以，便想試問女兒那是什麼。女兒說：「我想這是你最喜歡的船，可以帶你回中國去。」

戴德生十分快樂。他記述說：「我從來沒有收到一份禮物使我這麼高興，或是如此值得我珍惜和懷

念的。」

小瑪莉亞說得對。戴德生和珍妮準備行裝，重回中國去的時候到了。這次他們留下一個全面的小隊，在英國負責「內務」：由安美接替布迦先生的工作，蘇亨利（Henry Soltau，即漢達和露絲的兄弟）和另一位建築及土木工程師何理察（Richard Hill）同時擔任新成立的中國內地會管理委員會[即後來簡稱為倫敦委員會（London Council）]的義務秘書。其它委員包括司庫查約翰（John Challice），他是一家公司的總裁；賀威廉（William Hall），他是白蘭斯頓教會（Bryanston Hall）的執事；還有侯爾道（Theodore Howard）、韋約瑟（Joseph Weatherley）和蘇喬治（George Soltau，亨利的兄弟）。蘇喬治負責訓練准傳教士。

戴德生也說服了一大批人出任中國內地會的顧問，包括巴納道先生（Thomas Barnardo）、班主德堡的翟文先生（Robert Chapman）、金尼斯先生（Grattan Guinness）、穆勒先生（GeoTge Muller）、賓法特牧師（William Pennefather）和韋士托爵士（Lord Radstock）。

1872年10月，戴德生夫婦回到中國。他們先在杭州停留，珍妮接替麥卡悌監督教會，而戴德生則計畫在耶誕節過後，到杭州以南各城鎮探訪。

1873年4月，珍妮流產，一對嬰兒胎死腹中。她很快恢復過來，在她給母親的信中說道：「這段日子是戴德生最焦慮的時刻。」現在她盼望五月中搬到揚州，以那裡為根據地。

戴德生向來希望杭州的中國信徒能夠負起教會大部分工作。這一直是他全盤計畫中的主要策略。他希望內地會的工作能夠本土化和內地化，盡可能減少外國同工。他的最終目的是每一省只設一位監督和兩位助理，由外國教士擔任；而每個重要城南皆有中國同工，一些不大重要的地方則設專人分發聖經，也由華人擔任。同時，他希望在1873年底之前，能夠開辦一所聖經學院，訓練中國工人。

看到中國信徒增多，而且在傳道及植堂的工作上效率增高，戴德生很感高興。他相信中國教會的將來是寄望在這批中國同工上。他寫道：「我看我們外國傳教士如建屋時搭的台架，屋子建成後愈早拆掉愈好；或者愈早搬到別的地方愈好，以便在別處做同樣的工作。愈早建立，愈快遷拆，愈對未有福音傳到的地方有更多好處。」這種策略一直是內地會發展傳道工作的方針。

杭州及浙江一帶等地，工作發展甚速。最令人鼓舞的是，不單內地會在此地區工作，其它差會也陸續而至。自1864年太平軍敗北之後，浙江省的中國傳道人數目，在十年來已由十五或二十人增至一百人，信徒人數也由四百增至一千四百人，其中有百人以上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士。中國教會逐漸壯大，開始裝備自己，為將福音傳遍全國而努力。

第三十五章 百般的試煉

戴德生一直渴望中國內地會能有一位監督，負責行政的工作，而他自己則致力於開荒、傳教和植堂的事情。1873年5月，他寫了一封信給蘇亨利。

如果這裡有一位能幹的同工，完全可信賴，能感染他們，而且對神滿有信心，又曉得如何與其它傳教士相處，那麼，我們的工作三年內將會加倍發展，提高果效。不過，我在這裡找不到一位無論在學問上、智慧上和靈性上，都可以勝任的人。

我親愛的弟兄，你現在能否和我一起同工呢？……

難道這是沒有價值的事情，不值得你去犧牲，使它實現嗎？難道我們的主不值得我們全時間、全心、全意、全力去事奉嗎？……

我不是一時衝動才寫這一封信。我知道要達到我所提出的，實在很困難。我也知道你若踏上這一步，要作多大的犧牲。但從永恆的角度來看，我們該如何衡量呢？這裡一個省分，已象歐洲的國家一樣大。當我們認真地想一想：每個省分有一千五百萬、二千萬、二千五百萬人口的時候，我們能忍心看著他們走向滅亡之路嗎？

戴德生又寫信給白安美說：「我盼望蘇亨利先生有信心將自己交托給神，我也希望你有時間與他商談此事，並為他禱告。」但戴德生不知道白安美此時已因患肺癆而奄奄一息。從倫敦發出的信形容她的情形是「危在旦夕」，「準備回天家」。

蘇亨利還在考慮的時候，戴德生仍要面對各樣難題。當泰州工作進行順利，路惠理夫婦就開始有點自滿。他們在《不定期報》(Occasional Papers)中發表報告，述說成功的經過，語氣顯出驕傲和自負。之後，泰州掀起了反洋和反基督教的情緒。路惠理立即換回外國服裝，表示他有領事和戰艦作後盾。此外，路惠理夫人說她看到一個年輕的中國教士親吻另一個中國信徒的妻子。她把這事宣揚出去後，兩個男人都怒氣衝衝地撇下工作，離開泰州。路惠理也向中國內地會提出辭職。

在寧海內地會的中國同工又開始嚷著要加薪。「啊，只有聖靈的洗禮……是唯一解決些問題的方法。」戴德生在寫給珍妮的一封短函中說道。

1873年11月，祝名揚和他的妻子伊莉莎白從英國返回中國。跟他們一起的，有包瑪莉·戴亨利(Henry Taylor)(與戴德生沒有親屬關係)和一位活力充沛的內地會新任傳教士鮑康寧(Frederick Baller)。他有一雙敏銳的眼睛，觀察力極強，他不知道戴德生要面對那麼多問題，第一次見戴德生，便覺得他是「我所見的人中最古怪的一個」。但不久之後，他就發現戴德生除了聖潔嚴肅的一面，還有令人輕鬆愉快的幽默感。

11月7日，戴德生把戴亨利和鮑康寧帶到南京。用整整十天的時間訓練他們，向他們介紹既複雜卻又有趣的中國習俗。有一件事令鮑康寧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戴德生討價還價的能耐。中國人時常在戴德生租賃船隻、簽約買地或房子時提高價錢。於是，戴德生不慌不忙地與他們討價還價，他從容的態度是他議價時的最大力量。他深知道中國人喜歡繞圈子——慢慢斟酌和集中討論細節。

鮑康寧相信戴德生這種做生意的技巧，毫無疑問為內地會節省了不少金錢。他說：「他如果從商，他的才幹是以使他成為商界奇才。」

1873年10月，戴德生長途跋涉到各分會探訪後，便返抵泰州，渴望與珍妮相見。珍妮因有好幾天沒有聽到戴德生的消息，很是掛念。心想他也許在途中生病。所以在路惠理的陪同下，出發找他。

「戴夫人今天早上離開這裡往寧海去了。」戴德生返抵泰州時，他們告訴他。

「回來發現你今早已離開了，試想我是多麼失望，」他寫信給珍妮道：「昨晚我一直想念你，今天大部分時間也是這樣。」最後，他們在寧海相聚了，接著的十二月，他們留在泰州過耶誕節。

1874年頭幾個月，中國內地會的經濟出現拮据。戴德生寫信給英國內地會的義務秘書何理察說：「雖然經費不足，但我從沒有象現今這樣快樂，這樣的無憂無慮。……請不要為經費一事作出任何呼籲。」事實上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不久之後，穆勒寄來了一封信，裡面附著有三百鎊(在當時來說，這是

一個很大的數目)。

「啊！我親愛的弟兄，」戴德生寫信給英國內地會的司庫查約翰說：「能確知神是活著，我們可將憂慮卸給他，實在是何等喜樂的事！……我只是他的代理人；是他為了自己的榮耀，從他自己豐富的恩典裡供應我們一切所需。你們可以做的，就是禱告，並靠著信心和愛心作工。」

雖然有這麼大筆捐款，但也不能維持很久。內地會大概需要一百鎊來維持每週的工作。它有超過五十間建築物，包括房屋、教堂和學校等，需要維修，其中五分之四要付房租。內地會的工作已伸展到五省以上，旅費自然也跟著上升。

雖然內地會的行政工作占了戴氏大部分時間，但他還是喜歡出外走動，探訪各處的中國人。在往太平的船上，他就主動與一位七十二歲的老者搭訕。

「請問貴姓？」

「我姓陳，有一件事常常困擾我：世界萬物皆虛浮，我們應該怎樣對付常犯的過錯呢？」

「是的，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這群傳教士才特地來到中國。」

「我們的學者說人是沒有來生的，人死後，靈魂也消滅了——但我不相信是這樣。」

他那中國式的懷疑論很自然地把他帶到真理去。

在戴德生婚後的第一個生日，珍妮送他一本新出版的巴斯達串珠聖經 (Baxrer Polyglot Bible)。把書看完一遍後，他慣常記下日期。在最後的空白頁上，他用鉛筆寫著：

1874年1月27日。為了開發浙江省四府四十八縣未有福音傳到之地，求神加派五十或一百名中國傳道人及一些外國監督到這裡來；也求神派人打開那九省的福音之門。

五月下旬，戴德生和祝名揚計畫從長江出發到武漢去，打開華西佈道之門。他們在6月1日乘坐小汽船「漢陽號」出發。

三天后便到達武漢。下船時，戴德生不慎從梯子第二、三級摔下去，腳跟最先著地，脊骨和腳踝都非常疼痛。那一瞬間，他感到呼吸困難，不能動彈。他被抬到旅店的一張床上，幾小時後，呼吸才稍覺暢順。

武漢一位衛斯理會傳教士郭修理 (Josiah Cox)，堅持要戴德生搬到他家中。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戴德生的背痛減輕了，但還得用拐杖走路。他認為這次的受傷並不嚴重。

戴德生和珍妮計畫回國探望小孩，同時處理一些緊急的事情。他們在八月底出發。船到了法國的馬賽 (Marseilles)，就傳來噩耗：白安美因肺病已在七月離世。旅途中，戴德生的背傷開始惡化。抵達倫敦時，他甚至扶著拐杖也寸步難移。

1874年12月，戴德生躺在培蘭路六號的床上，背脊和兩腿差不多完全癱瘓。床頭上面垂著一條繩子，給他抓著來左右轉動。在內地會這個歷史時刻，他只能在床上指揮一切工作。他的睡房變成差會的總辦事處。范約翰和其他義工常到戴德生的床邊，花數小時做筆錄的工作。倫敦內地會的委員會也在那裡開會。珍妮致函在烈定 (Reading) 臥病中的路惠理，信上說：「看來我們和你們一樣，很難重返中國了！」它不像是珍妮的語氣——由此可見戴德生當時的病情應該是很嚴重的。

後來，戴氏又染上嚴重痢疾。他立了一份新的遺囑，將一切留給珍妮。當時，珍妮正懷孕。所以孩子都暫時由侯爾道 (Howard)、金尼斯 (Gumness) 和戴賢美三個家庭分別照顧。戴德生的妹妹阿美

妮已有九個小孩，其時將有第十個哩！

到了耶誕節，戴德生開始康復。他在床的末端掛著一幅中國地圖，這樣，便可以看到那九個省分，並更迫切地為那「十八位」傳教士祈禱。他口述了一篇題為「請為超過一億五千萬中國人代禱」的文章，同時在幾份刊物上發表。那篇文章的結語是：「可否請各位基督徒讀者把你們的心交給神，然後用一分鐘時間迫切地向神禱求，求他今年差派十八位適合的工人到中國去，專心為主工作。無論是熱心的青年、商人、文員或是店務員，凡有與公眾接觸的經驗，知道怎樣符合買賣雙方要求的，都適合做這份工作。他們要有很大的信心、虔誠的奉獻和火般的熱心；同時要有樂意為主生活、作工和受苦的心志，甚至在有必要時，為主而死。」

1875年1月7日早餐後，除了珍妮外，每一個在培蘭路住的人都圍在戴德生床邊，為他禱告。珍妮在另外一個房間待產，沒有告訴任何人她正在分娩。一個小孩探頭看見她，便連忙將情形告訴祈禱會中的人。

「請問狄樂義姑娘可立刻來嗎？」

狄樂義來到時，珍妮的嬰孩已經出世了。她趕緊跑到戴德生的房間，推一張沙發椅到他床邊，讓他滾臥上去。然後把這臨時製造的手推車推至珍妮的房間。他很困難地坐起來，進行產後必需的手術。當一切完畢，他已筋疲力竭地倒在沙發上。他們為孩子取名安納（Ernest），將來也是到中國去的一位傳教士。

1875年3月，蘇亨利終於答應戴德生的邀請，到中國出任內地會的監督。他和範約翰在三月底同往中國，並設法從緬甸找通道進入中國的西部。

還有更多好消息。經過廣泛的宣傳後，有二十位青年人對「十八名傳道者」的呼召作出回應，其中有幾位頗適合。戴德生給他們回信時，都附上這樣的一段話：「如果你要作苦工，而不求人的紀念；要討神的喜悅，而不害怕得罪人；並有充分的準備，甚至在有需要時，願意為主流血作見證；很多時候，又樂於接受財物的損失；……但在救人靈魂的事工上，你肯定可以得到極大的收穫，有不朽壞的冠冕為你存留，還會得到主人的讚賞。」

揚州教案之後七年，有損內地會名聲的傳言已經不勝而走。到了1875年，一般人都很支持內地會。對戴德生來說，好消息和高聲望猶如一服滋補的藥品，使他的健康日漸好轉。到了四月，他已經能夠自己上下樓梯，而且在花園散步。然而，他能否回到他摯愛的土地上呢？

第三十六章 沒有缺乏

中國內地會出版的《不定期報》是一份袖珍冊於，每本由十頁至三十頁不等。戴德生希望這份出版物能有一個吸引人的標題，也打算改變它的形式。珍妮建議用「中國億兆和我們的工作」為題。這個口號後來成為內地會工作的重心，一直沿用到1875年底。之後，再簡稱為（中國億兆）（China's MillionS）。到了現在，這份刊物還是一本受人注目、內容豐富的宣教雜誌，不過名稱已改為《東亞億兆》（East Asia's MillionS）。

1875年5月，戴德生計算那個月的奉獻，只有六十八鎊，還差二百三十五鎊才可供給中國內地會三個星期的開銷。培蘭路六號每天都定下時間為中國代禱，戴德生把經濟情況告訴他們，說：「讓我們在

禱告中提醒主。」

那天傍晚，郵差帶來一封信，裡面附有一張支票，數額剛超過二百三十五鎊。由此可知神悅納戴氏所作的工。

六月，戴德生把拐杖換了手柄，他在伯萊墩（Brighton）舉行培靈會，主題是「信靠神」。當要乘火車離開伯萊墩時，在車站碰到俄國貴族卜林基伯爵（Count Bobrlnsky）。

卜林基是前俄國政府的大臣，也有參加這次大會。

「我們一起坐吧。」伯爵說。

「但我持的是三等票，」戴德生回答說。

「我的票可以坐三等，不成問題。」

在路途中，卜林基從袋篋裡拿出一張銀行匯票給戴德生，數額是五十鎊，相等於現在的一千五百鎊至二千鎊左右。

「你有沒有弄錯呢？」戴德生問。

「我本意是只給你五鎊，但看來神定意給你五十鎊了。」

回到培蘭路，戴德生發現全家正為中國事工所需的費用舉行祈禱會。他們所欠的款項是四十九鎊。卜林基的捐獻來得正合時，他們歡喜地領受了。諸如此類的事件，令他們的信心更加堅固。

一位神學講師穆亞（C·G·Moore），時常到培蘭路探訪戴德生，他形容戴德生的書房滿盒子，四壁卻是粗糙的書架。離窗口不遠的書桌上則堆滿信件和紙張。火爐前面，有一張小地毯，上面放著一張又低又窄的鐵架床，把地毯差點完全遮蓋了。

戴德生就躺在那張鐵架床上，和穆亞談話。穆亞形容那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時間」。戴德生不象他想像中的偉人。他一點「傲氣」也沒有——就象基督所說那種要承受地土的人一樣。

另一位到過培蘭路的訪客，則記得六歲半的戴查理，一直問他父親一些很難回答的問題，而赫拔和存義則在桌子下角力。

列夫人（Mrs Rich）常常捐助內地會。她寫信給戴德生，說她聽聞內地會傳教士很多時候因經濟困難而放棄聖工，轉去從事世俗的工作。

戴德生立即回信，要求她指出消息的來源。「這完全是誤傳，……雖然供應常在需要關頭才突然臨到，但我不相信有任何傳教士的兒女，或任何一位家庭成員，會出現缺乏食物和衣服的情形。

「就我所知，沒有一個人因欠缺金錢而工作受阻；沒有一個人因這原因而健康受損；也沒有一個人因這緣故而離開工廠，或是因此而忿忿不平。……」他承認「有些時候，銀根很緊」，但這正好鼓勵中國信徒盡力奉獻資助傳福音的工作，而不會認為宣教只是富裕的社會和國家應該全力負責的。他又解釋有些會員離開或被解雇，是完全與經濟無關的。列夫人接受了戴氏的解釋，繼續支持內地會。

現在，戴德生認為自己已完全康復，可以回中國去工作。但誰來負責選新教士？誰來負責《中國億兆》的出版工作？又誰來安排和寄發所收的獻金呢？他以前曾經嘗試說服他的妹妹戴賀美和妹夫海恩波（Benjamin Broomhall）參加內地會或其他宣教團體，前往中國工作。他到高達明（Godalming）探訪他們。

「你們可否來培蘭路一住，協助我的工作？就把它當作試驗吧！我需要人手幫忙出版和發行《中國

億兆》，並且接待候選的教士。」他願意從珍妮在澳洲的叔叔留給她的遺產中，拿錢出來，給他們買一間房子，而且支付他們的薪金。

戴賀美和海恩波終於答應八月搬到培蘭路二號。他們在那裡一直住了四十年——那座房子在中國內地會中，頗負盛名。戴德生和珍妮住在六號，而中間四號的房子，就充作辦公室和接待候選教士之用。

自從發出「十八位傳教士」的呼籲後，應徵信件象潮水般湧至。六位在傳教事工上已素有經驗的同工，也自願請纓。八月，在司布真牧師的大都會基督會堂（Metropoliran Tabernacle）裡，舉行了一次聚會，與會者達一千五百人，再次歡送三位傳教士到中國內地去。而另外九位則在 1876 年 2 月加入宣教行列。珍妮寫道：「這便組成了十八位傳教士。」她沒有把他們的姓名一一列出。但一計之下，那時候好象已有二十位傳教士了，而且更有陸續而來的。在 1876 年，至少有六名女教士也被差派赴華。

戴德生很想離英近華，因為這些傳教「新丁」需要人指導，認識有關中國生活的良風及惡習。但他首先要委任一位全職的幹事，負責在英事務，以代替辭職的問理察（Richard Hill）。何理察舉薦蘇威廉（William Soltau）代替他。戴德生一面開始訓練蘇威廉，一面把更多責任交托他的妹夫海恩波。

戴德生的摯友史蒂絲（Miss Stacey）小姐，在 1876 年 5 月去世，這個打擊使他病了一個星期，不能工作。但他很快從憂傷中回復過來，九月便乘船到中國去。預算這次只離開十個月，所以珍妮留在家裡照顧六個孩子（包括她自己生的兩個），並全時間的參與培蘭路的行政工作。

船到巴黎後，戴氏把文件箱遺在岸上。箱中有很多他預備在旅途上要做的的工作，因此，他除了在旅途中勤於寫信外（他給珍妮寫了很多信，也寫得很親蜜），差不多是被迫在船上度過一個長長的假期。

戴德生於十月底到達上海後，又在前往鎮江的途中患上痢疾——這個病是他一生中常常復發的。1876 年 9 月 14 日，就是他離開英國後的一個星期，中、英兩國簽署了煙臺條約。消息傳來，使他對前途感到十分興奮。現在，持有護照的外國人，可在中國內地旅行，並明文規定受到安全的保障。在條約簽訂後的四個月裡，內地會的傳教士已先後進入六個新的省分，來到那些從未有洋人踏足的中國內地。這些年輕的傳教士受到各種不同的對待；有些人很友善，但也有些人很兇惡。戴德生把他往湖南途中的遭遇記下來，他提到湖南的婦女時，說道：「她們全心全意崇拜偶像，但都得不到滿足，她們的心靈仍是一片迷惘。」

約一個月後，戴德生遺落在巴黎的文件箱竟然寄到鎮江。他的工作計畫才可完全展開。「我的工作量是我所能承擔的四倍，」他訴苦說。書記費查理已回國休假，又找不到人接替他的工作，只有由戴德生偏勞了，另外，還有《中國億兆》的編輯工作。

每日工作至凌晨二、三時，戴德生便坐在他的簧風琴旁邊，彈他心愛的詩歌。以下一首就是他時常彈奏的：

耶穌，我在安息，
安息在你的喜樂中。
你的愛是何等偉大。

記得有一次他和倪義來一起讀各地傳教士寄來的信件，有些報導他們遇到的各種危險和困難。戴德生倚著書桌，一邊讀信，一邊哼著「耶穌，我在安息」這首詩歌。

倪義來問：「我們的朋友正遭遇危難，你還能哼著歌嗎？」

「就算我生在這裡，為這些事情憂慮，也是無濟於事，而且使我不能做我所當做的事情，所以我只好將一切重擔交卸給主。」

1877年5月，在中國的各差會於上海召開一個聯合會議。這個會議看來會惹起不少爭論。自從七十年前馬禮遜來華傳教開始，中國的傳教工作已有多倍的增長。來自不同宗派的五百多位傳教士，對於宣教工作各有不同的觀點。有些差會（例如內地會）著重直接佈道和植堂的工作；有些則著重教育和培訓方面。會議中有些人批評內地會，說他們派遣年輕而沒有經驗的傳教士，長途跋涉到中國內地去。「名詞問題」也是一個引起激辯的焦點。所謂「名詞之爭」，就是用哪一個中國詞語來翻譯經文中的「上帝」。

戴德生擔心這些問題所引起的紛爭。除非會議中有聖靈的充滿，否則難免出現分歧。所以他先邀約了大約三十位來自四個不同差會的傳教士在武漢會面，一起祈禱，作屬靈的裝備。在這個會議結束時，倫敦會的楊格非（Griffith John）說：「我為戴德生感謝神；我為中國內地會感謝神；我為我的年輕弟兄感謝神。」

三個星期後，大約一百四十多位來自十八個差會和三間聖經公會的男女牧師、教士和傳道，舉行會議。引起爭論的「名詞問題」，雖然在一次演講中提了出來，掀起一場爭辯，但沒有列在議程內。戴德生為內地會到偏遠地方傳福音的宗旨辯護，認為這是建立教會的必備工作。有兩位講員認為西方的世俗文學和科學知識，比宗教更能有效地驅除迷信，但他們不為大多數人所支持。大部分人接納戴德生和楊格非的路線，就是傳道的主要目的是宣揚神，指出罪惡和救恩，但也不抹煞文學和科學的價值。

總而言之，在此次會議中，協議多於爭辯，而內地會也普受人接納。戴德生認為這次會議是中國傳教事工最重要的一步。

上海會議之後，戴德生的坐骨神經痛又告復發。之後，戴德生出發到浙江的佈道所去，與他同行的有韋裡信（Elizabeth Wilson）女士。韋裡信女士從小就想獻身宣教，終於在踏入中年後，才能實現她多年的夢想。她中年白髮，在中國人當中很受敬重。途中他們不只一次被華人請到廟宇裡聚會。而廟宇中的偶像已被清除，改作基督徒崇拜的地方。

韋裡信女士永遠不能忘記戴德生的白色檔箱，以及他每天為內地會禱告三次，並逐一為他的同工提名代禱的習慣。

戴德生留在中國的時間，已超出他預期的十個月。但他想在回英之前，再做一件大事，就是在寧波召開一個與英、美差會有關的全浙中國牧師及傳道人大會。會中他極力讚揚他們所作的貢獻，而且希望以後中國每省都能舉行同樣的會議。

之後，是應該回國的時候了。珍妮所生的兩個孩子，尚在學步階段，對於在聖誕歸家的父親，他們是完全陌生的，但戴德生卻很歡喜看到他們。同時還有十六歲的赫拔、十五歲的存義、十歲的小瑪莉亞和九歲的查理，再加上和他們同住的童美莉（Millie Duncan），她是童跟福遺下的孤女。這真是一個熱鬧的耶誕節！

華北各省，特別是山西省，正發生最嚴重的饑荒。由於長期乾旱，小麥等糧食欠收，武漢和寧波兩處的內地會區會，都遵照戴德生的建議，捐錢援災。

戴德生回到英國，在許多聚會中報告災情，並在報章上發表。結果，收到的援災捐款，比佈道捐獻還多。因此，他傳令在災區和難民當中工作的傳教士收容二百名貧苦兒童，並優先照顧孤兒。但他還想做更多的事，所以他和珍妮長期分離後，雖然只短暫地一起生活了四個多月，但他不得不再作一個使人傷感的決定。

「你知道我現在還不能離開英國。你是否可以先跟一班新選的傳教士前往中國，督導收容孤兒的工作？待我能抽身時，再來中國跟你一起生活吧。」

珍妮那時三十五歲，除了照顧親生的兩個孩子，一個兩歲，另一個三歲；還要照顧瑪莉亞留下的四個孩子。她把戴德生的提議放在禱告中。兩周後，她決定先去中國。

戴賀美這時已有十個孩子，當知道嫂子的決定，就說：「如果珍妮蒙召到中國，那麼我就蒙召照顧她的孩子。」

一位元朋友聽到這消息，便對珍妮說：「你離開你的孩子和丈夫到中國去，雖然是難能可貴，但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珍妮走進臥房，心裡明白是要付出代價的。

她禱告說：「親愛的神哪！請你給我一點證明，使我知道去中國是對的。現在對我來說，五十鎊比任何東西更為寶貴。這保證我其他需要都可得著供應。」

為了堅固自己的信心和給其他人一個有力的答覆。她也象基甸一樣拿出「兩堆羊毛」來。她第一個禱告是祈求足夠的旅費；另一個禱告則是求五十鎊，以供她和戴德生的生活需用。在當時來說，這算是個相當大的數目。如果神應允她的禱告，就是給她一個應許：她的離開會比留下更令親人蒙福而且知道神與她同在，常幫助她。

第二天早晨，她在家庭祈禱會中對孩子說：「我要你們替我為兩件事禱告。是什麼事我現在不能讓你們知道，等禱告蒙應允後，我一定告訴你們。」

那天下午，有一位夏裡士先生（Mr Harris）來到培蘭路。他問：

「聞說你要到中國去，是真的嗎？」

「是的，我正在準備行裝！」

夏裡士先生交給她一張十鎊的支票——這數目剛好是內地會規定的傳教士治裝費數額。

四天以後，戴德生的父母寫信給珍妮，信裡附了五十鎊。她正想拿這張鈔票給戴德生看，但因為他在會客，所以把鈔票放下，就走開了。

她回來時，戴德生說：「我正在考慮，主要我如何使用這筆錢哩！」

「哦！這錢是我的。」珍妮說：「你知道嗎？這筆錢我有權使用！」

十天後，珍妮帶著七名年輕的教士到中國去。一位倫敦內地會的新任委員見到戴德生夫妻分離，便對戴德生說：「看到你們分離，我感到像是自己與妻子分離一樣難受。……然而，如果真是神要我們分離的話，他一定也會使我們象你倆昨天分別時般平靜。」

珍妮到達上海後，便與兩位年輕的女傳道一起趕赴正鬧饑荒的山西，陪行的有英國語言學家鮑康

寧。她們是第一批深入中國內地的外國婦女。抵步後，珍妮展開救助孤兒的工作。在回到上海時，工作則由一隊內地會人員繼續下去。

戴德生感到孤寂時，就把十七歲的赫拔帶到他的書房或臥房，跟他傾談。後來，他又攜同三歲的安納到住在巴納（Barnet）的岳父母家裡，讓安納的百日咳得以調理。戴德生回憶當時的生活，說：「孩子生活得極快活。我很愛那裡的寧靜和乾草堆。晚上，看著孩子睡覺；早晨，跟他一起禱告，幫他穿衣服。這孩子乖巧地依偎著我。」

珍妮離開後，戴德生便致力重組布迦先生辭職後英國的內地會工作。他探訪倫敦內地會委員會的各個成員。整年下來，許多問題日益嚴重。蘇喬治因工作壓力太大而辭職。委員會建議由戴德生的妹夫海恩波及蘇威廉共同擔任副總幹事之職。戴德生認為這提議不太恰當，因為蘇威廉並沒有專心於神的工作上；而妹夫海恩波的辦事效率不大理想，而且不擅於精打細算。此外，《中國憶兆》仍未找到合適的編者。

1878年夏天，戴德生的瘧疾痊癒後，有人邀請他往瑞士度假。龐翠辛（Pontresina）的冰河引起他的興趣，他花了三天時間在山脈探險，衣袋裡只帶幾塊餅乾、聖經和太陽傘。他認為那裡的空氣對身體的康復會很有幫助。

他寫信告訴珍妮說：「親愛的，我一直在想：我身體的康復及我所受的一切恩惠，都是神聽了你的禱告而賜給我的。我一想到這裡，便樂上加樂。」戴德生回到英國後，感到「精神百倍」，但是內地會的問題仍待解決。

增加海恩波的工作量，只解決了編輯《中國憶兆》一書的部分問題，但仍需有人去全職負責。在新的年裡，戴德生開始跟侯爾道（Theodore Howard）接觸。侯氏是托頓鹹一家化學藥品製造商，一直是內地會的老朋友和資助者。侯爾道答應戴德生，如果一旦戴氏去世，他願意承擔內地會監督的職務；又當戴德生出國，他也願意擔任英國內地會委員會主席。海恩波則受派擔任內地會總部的總幹事，請麥卡梯和蘇威廉充任他的副手。

1878年12月31日，培蘭路的辦事處舉行內地會的禱告日。那時流行一種傳染病，許多小孩都死於「喉頭痙攣」。那天晚上，當大家一起禱告，有一位護士抱著一個女孩進來，她以為女孩已經死了。他們趕忙把戴德生叫來。戴德生立刻跑過來，有一個婦人建議他該先為這孩子禱告。他回答說：「是的，要禱告，我要邊搶救邊禱告。」

戴德生發現這小女孩的臉發青，全無血色。他用幾種方法叫她蘇醒，都不成功。後來，他就作口對口人工呼吸。幾分鐘後，女孩的臉色改變了，而且開始呼吸。當天夜裡，她雖然還偶有抽搐，但已經活過來，並且沒有任何損傷。這女孩後來長大，成為內地會一位女傳教士。幾年後，戴德生的兒子戴存義（Howard）對此事有以下記述：「他為所有的事祈禱，好象每一件事都得倚靠禱告；……但另一方面，他也作工，好象每一件事都得拼命去做。」

1879年2月，戴德生離英返華，又跟妻子團聚。半路上，他到滿塘（Mentone）拜訪穆勒和司布真。穆勒正在作巡迴佈道，司布真卻應倫敦大都會基督會堂（London Metropolitan Tabernacle）要求，暫作休息。司布真的記錄中說：「戴德生完全不像是一位元大規模組織的領導人，因他又跛又矮。在司布真看來，戴德生是一個剛柔兼具的人。一方面，他不會堅持己見；但另一方面，他卻堅定地信靠神。凡事

依照計畫去做，不畏困難，因他堅信只要有神同在和幫助，沒有難成的事。戴德生離開後，司布真說在戴德生的談話中、常提到中國、中國、中國。這兩個字象音樂般在他耳中回蕩著。司布真還發現，戴德生已經讓頭髮長起來，束成一條辮子。

在行至印度洋時，戴德生病得很厲害，船上一位新加坡醫生甚至懷疑他能否到得香港。船到達新加坡時，已有一大堆信在等著他，其中一封是珍妮寫的。信上說：「我已經在禱告中紀念你要面對的困難，想到這些，我有時會感到高興。因為這些困難可讓神有機會作工和得勝。現在已很清楚，我們即將看到他的手施行奇事。……有主人同在，僕人的責任只是順服，而這亦是他最大的喜樂。我們的信心會為我們的弟兄姊妹帶來勝利。」

戴德生終於抵達上海，珍妮看到他時，他是那麼疲憊、虛弱。還沒來得及處理信件，他又再次染上痢疾。一位倫敦會的朋友勸他們在炎夏來到之前，先到北面的煙臺避暑。在那裡，戴德生和珍妮住在包納德（Frederick Ballsrd）家中。他是一位年輕的海關官員，娶了一位女傳道人。他們的房子座落在群山環抱的海灣旁。戴德生在那裡調養時，常坐在露臺呼吸海邊新鮮的空氣，看著海上的帆船和汽船，愉快地嗅聞海草的氣味。他們隔鄰的房子裡，住著祝名揚夫婦及其家人，他倆也因為健康問題前來這裡休養。

因此，一個夢想便在戴德生腦海中浮現——在這理想的海岸邊建立內地會的休養所。戴德生和祝名揚並肩在海灣旁的山丘上漫步，來到一塊種豆的田，有一道清澈的溪水潺潺流下，是蓋房子的理想地方！但他們買得起嗎？ 旁邊一個農夫，問他們說：「你們想買地嗎？」

戴德生和祝名揚瞭解中國人若知道你有興趣，便會立刻把土地的價錢提高，因此，他們只向農夫表示略有一點興趣。

「你們要買我的地嗎？」

農夫指著這塊豆田，並且提出一個非常合理的價錢，其他農夫方爭相表示他們想賣地。戴德生於是定出計畫，打算建造一座有十個房間，還有露臺的大房子。兩人雇了一隊建築工人、磚瓦工人、石匠和木匠，讓他們支搭帳篷住在工地上。在建築過程中，有些工人信了基督。許多材料是從兩隻因觸礁而漂到岸邊的船上取來的——櫟木橫樑。挪威松木，以及鋪地板用的柚木。

房子建好後，祝名揚報告說：「這房子雖然造得不太好，但以我們這樣缺乏經驗的人來說，已經很好了。建築費實在便宜。而建屋速度之快，使租界裡的歐洲人大感驚奇。竣工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的眼睛。」事實上，這房子還相當耐用，直到 1915 年才重建成一所較現代化的醫院。

這是內地會的第一處休養所，有一段時期稱為「祝名揚之家」。後來，內地會又在此建了一所老人療養院、一間為內地會教士子女而設的學校，還有一所醫院和一間藥房。它們都建造得比以前的好，既舒適又方便。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國威爾斯浸信會的傳教士，年輕有為，極具影響力。他原想申請加入中國內地會。但後來被人勸說加入侵信會，成為該會的傳教士。他於 1870 年抵達中國，當時二十五歲。李提摩太一開始就強調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國度，並盡力保護貧窮受欺壓的人。他住在山東省的北部，看見山西發生大饑荒，心裡難過不已。他希望中國因接觸西方的優良文化和技術而有重大的改變，避免重曆這樣的自然災害。李提摩太認為神也會透過別的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等作工。他

說，我們如果能夠指出這些宗教和基督教相同之處，它們的信眾就會很容易接受基督，整個中國社會因而完全改變過來，變成基督教國家。他又非常仰慕中國文化的精萃，於是花了許多時間研究中國經典和宗教作品。他又專去接近學識之士，後來更運用他的影響力，在山西建立了一所大學，教授西方思想和中國歷史文化。

戴德生認為李提摩太「把好的道理引到死胡同裡」，因為李提摩太不講道，只喜歡派發倫理道德的小冊，內中也提到神，卻不傳揚基督，他還以為這種溫和的態度可以為福音鋪路哩！

李提摩太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人。一些內地會的成員，尤其是住在山西地區的，開始被他說服了。所謂「山西精神。」就是指受了李提摩太的思想影響，失去傳福音的熱誠。有一位內地會教士團完全失去信心而不得被召回；另外一人則離開了內地會，到一個有固定薪金的團體中工作；有三、四位傳教士受了李提摩太的影響而向內地會辭職，但後來又回轉，並恢復當初的信心。至於李提摩太本人，當他的思想變得更加開放，他也向浸信會請辭，但他仍繼續在中國工作近五十年之久。

戴德生並不認為一些人退出內地會，是歸咎于李提摩太，他相信那只是「意志薄弱的人，受到強大外力的影響而產生的結果」。開始就強調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國度，並盡力保護貧窮受欺壓的人。他住在山東省的北部，看見山西發生大饑荒。心裡難過不已。他希望中國因接觸西方的優良文化和技術而有重大的改變，避免重曆這樣的自然災害。李提摩太認為神也會透過別的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等作工。他說，我們如果能夠指出這些宗教和基督教相同之處，它們的信眾就會很容易接受基督，整個中國社會因而完全改變過來，變成基督教國家。他又非常仰慕中國文化的精萃，於是花了許多時間研究中國經典和宗教作品。他又專去接近學識之士，後來更運用他的影響力，在山西建立了一所大學，教授西方思想和中國歷史文化。

戴德生認為李提摩太「把好的道理引到死胡同裡」，因為李提摩太不講道，只喜歡派發倫理道德的小冊，內中也提到神，卻不傳揚基督，他還以為這種溫和的態度可以為福音鋪路哩！

李提摩太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人。一些內地會的成員，尤其是住在山西地區的，開始被他說服了。所謂「山西精神。」就是指受了李提摩太的思想影響，失去傳福音的熱誠。有一位內地會教士因完全失去信心而不得被召回；另外一人則離開了內地會，到一個有固定薪金的團體中工作；有三、四位傳教士受了李提摩太的影響而向內地會辭職，但後來又回轉，並恢復當初的信心。至於李提摩太本人，當他的思想變得更加開放，他也向浸信會請辭，但他仍繼續在中國工作近五十年之久。

戴德生並不認為一些人退出內地會，是歸咎于李提摩太，他相信那只是「意志薄弱的人，受到強大外力的影響而產生的結果」。

第三十八章 已是家傳戶曉

戴德生認為，中國婦女在道德上及宗教態度上對下一代的影響，遠勝於中國的男人。而把福音帶給中國婦女的最佳人選，應該是和她們性別相同的基督徒。1879年，他在《中國億兆》裡寫著：「主在中國加添了十倍女同工」同年，珍妮成為首批深入華北的外國婦女之一把基督的愛帶給山西遭受饑荒的人。

武漢座落在漢江和長江匯合之處。多年來，戴德生計畫以這地區為基地，向中國深入的內地進軍。

1880年2月，他在那裡組織了一批外國婦女，包括一些未婚婦女，作為先鋒，向西部各省挺進。其它差會都不贊成用未婚婦女來做開荒佈道的工作，認為這是極不明智。所以在戴氏實行這個計畫的初期，是相當保密的。

其中有兩位未婚的婦女，看來好象特別符合他的要求：第一位是祈德姑娘（Jane Kidd）。用戴德生的話來形容，她象「小貓一樣頑皮。」她在中國只有一年，但中國話已能講得很流利。他們決定派她和守寡的麥卡悌太太（Ellen McCarthy）一起前往貴州，加入在貴陽工作的蓋拉克（George Clarke）夫婦行列。她倆由鮑康寧陪同前往。第二位是傅斯德（Fausset）小姐。她要上漢江，與漢中的甘喬治夫婦（George and Emily King）一起工作。戴德生花了一周，和這些女教士一起查經，一起禱告，告訴她們與中國人打交道的一些常識，好讓她們準備應付前面的道路。

臨別前，他告訴她們：「以後你們惟有靠著至高的神親自眷顧你們了。」

祈德、麥卡悌夫人和鮑康寧同乘一艘住家船出發，船主是一位中國基督徒。他們在洞庭湖口停泊時，許多人湧上船來觀看。有一個中國婦女摸著兩位外國女教士的雙手和面頰，說：「你們長得真漂亮！」

船主和他的妻子就向他們傳講耶穌的救恩。

船行了八個星期。1880年4月，她們到了貴陽。祈德幾乎可說是歷史上進入中國西南地區的第一位單身外國女士。

在武漢的戴德生這時正考慮：傅斯德小姐應由誰來護送呢？韋裡信女士是一位已在中國住了四年的五十歲婦人，而她灰白的頭髮，還意味著她會受到中國人的尊重；她有意要與傅小姐作伴。可是戴德生認為最好由一位弟兄護送。當時所有外國教士和中國基督徒都正忙於分內的事，只有患麻瘋病的黃克中可擔此任，他是祝名揚所結的果子。

黃克中和戴德生一起去租船，當夜他倆就睡在同一船艙中。早晨，戴德生正在整理路上的食品，兩位女教士來到，傅姑娘並指出她兩件不滿的事情。

她說：「第一，老黃的被褥有一股氣味；其次，菜油變了質，鮮肉的味道也給弄壞了。」

戴德生替黃克中換了新的鋪蓋，便跟著他們一起乘船而下約數小時，然後上岸去了一會。

他回到船上時，帶回一籃子蕃薯、雞蛋——還有豬油，替換那變了味的菜油。當他們正在一起禱告時，戴德生悄悄地溜到自己的小船上，回武漢去了。

傅斯德小姐、韋裡信女士和黃克中弟兄沿漢江口上游航行了一千哩，經過急流，歷時近三個月，終於到達漢中。路上黃克中表現得很好，確是最佳的護送員。同時，他還召來許多婦女和女孩，讓她們聽這兩位女教士傳講福音。黃弟兄為基督作了有力的見證。

除了遇到幾件無關痛癢的小事情外，這幾位內地會的女傳教士——祈德、麥卡悌太太、傅斯德、韋裡信——在這次深入中國內地作開荒佈道工作中，完全沒有遇到傷害。

她們勇往直前的膽量當然可嘉，但她們的經歷也在說明了中國人的性格。事實上，正如一些人所聲稱的，婦女在中國要比在紐約或倫敦安全得多。

1881年7月，戴德生的母親去世。八月，珍妮的母親也去世了。珍妮得趕回英國照料後事。在她回國途中，戴德生的父親也相繼過世。戴德生夫婦又開始悠長而痛苦的分離，只得靠著情意綿綿的書信聯繫了。

十一月，戴德生參加武漢一群內地會傳教士舉辦的禱告和查經聚會，同時討論關於中國佈道工作的進展問題。他和不久之後成為他秘書的巴羅德（A·G.Parrott）一起往市鎮外的山上散步，商談有關擴大佈道工作的需要。這時內地會已經有九十六位傳教士（包括傳教士的妻子在內），以及約一百位中國同工，在七十個佈道所工作；內地會辦的學校也收養了一百多名中國兒童。戴德生認為擴大工作仍是必要的。

戴德生和巴羅德當時考慮內地會究竟需要加添多少人？五十麼？六十麼？若把流失的也計算在內，肯定不夠。就在這時，路加福音十章 1 節的話在戴德生的腦海中浮現：「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七十人！七十人肯定是太多了，不能這樣求，因今年所收的獻金並不多。他倆正在散步時，巴羅德一腳踩著了草地上的甚麼東西。

「瞧，」他說，同時撿起一串一百個的銅，「你看見嗎？如果我們到這山上禱告，神必賜給我們一切所需用的。」

星期日，他們跟另外兩位傳教士提及此事，四個人答應要不斷禱告，直至有七十人來到中國為止。星期一晚上，所有會集在武漢的傳教士有一個集體禱告會，戴德生特別為這七十人禱告。巴羅德記述說：「我完全相信他今夜的禱告是信心的禱告，其中流露出一股非常強烈的期望。」戴德生把計畫寫在紙上，為四十二男二十八女詳細地擬好了所分配的各個省市。

會中有人建議：「我們是否可以再舉行一次大會，當這七十人全到達中國時，我們來一個聯合感恩大會吧！」

「那時我們一定是分散各處，不如現在就舉行感恩大會，提前為這七十人獻上感謝。」

感恩會結束，傳教士都趕回自己的佈道所，把差遣七十人的信息傳遍了整個內地會。在十二月初的聯合大會裡，所有到會的成員都一致贊成天天為這七十人祈禱。戴德生向他們答應，如果在中國的同工都恒切為這事祈禱，他就拍電報回英國培蘭路，要他們接納並派遣六十位新的傳教士。

1882 年 1 月，戴德生草擬了一份呼籲信，寄給英國各教會。這份呼籲信由七十七名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聯名簽署。上面寫著：「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因不認識救恩而滅亡，每小時有超過一千多人進入死亡和黑暗……我們如果仍置之不理，豈不與流人血者同罪嗎？」

這份呼籲信首先提到各個海外宣教團體的需要，然後詳述內地會的需要。它請求各基督徒把神的國放在首位，不要擔心經費的來源。但呼籲信還加了一句，特別提醒那些想要成為傳教士的人：「單是浪漫熱情，會很快因辛勤的勞苦、長年的困境和內地工作的諸多試煉而冷卻。特別當你患上嚴重的疾病，身邊的錢又用光了，那股浪漫熱情更顯得毫無價值。只有全然信靠神，才能在種種境況中得到喜樂和安息。」接著是勉勵的話：「在我們身上已經見證神是信實的，依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他供應我們，仍不斷供給我們一切所需……他又使我們在他的事奉中充滿喜樂。我們當中為人父母的，如果你的子女蒙召作同樣的事工，得同樣的喜樂，那真是最美好的事了。」

1882 年快過去了，「差遣七十人」的禱告尚未蒙允，捐款也沒有增加，到中國來的只有十一位傳道人，八女三男。這年間內地會也有同工退休，好幾處佈道所的工作不但沒有興旺，反而走下坡。在年初的數個月，戴德生感到很失意和沮喪。到了夏天，他告訴珍妮他的身體好得多了，要她跟他同心禱告，求神在內地會中興起有屬靈能力，又有領袖才幹的人來侍奉。

六月，戴德生在長江北岸安慶的內地會區會會議上講道，內容是雅歌。在二十五年前，當他尚未跟瑪莉亞結婚時，已在困苦處境中愛上這卷舊約聖經中的詩歌。凡參加這次安慶會議的人，都難忘他這次的講道。它帶來聖靈的充滿，有些代表連續數晚不斷地禱告，所有人也用一整天時間禁食祈禱。戴德生記述說：「今早聖靈大大充滿我們，以致我們當中有些人感到好象承受不了！」

到了1882年12月，他和珍妮分隔兩地已有十四個月。他寫信對珍妮說，希望很快可與她重聚，不再經受這種長期的分離。他又從上海寫信告訴她，很多人因他那次在安慶會議上的講道而得著益處——但他懷疑他們究竟是否知道，他和她已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價！他又問：「在事奉基督上，那有代價多少之分呢？」

1882年的最後數月，內地會出現經濟拮据，幾乎不夠應付龐大的開支。1883年2月1日在煙臺的一個祈禱會中，有人作出這樣的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曉得你喜歡叫你的兒子女歡喜，求你引導國內一位富裕的管家，慷慨捐款，以激勵國內其它小信的人。」

幾天後，戴德生乘船回國。船到達葉門的亞丁（Aden）時，他就得悉那個禱告也蒙應允了2月2日，在培蘭路負責內地會內務工作的海恩波，收到一筆為中國事工而奉獻的三千鎊捐款！

戴德生夫婦已分別了十七個月。1883年的復活節，珍妮急不可待地趕到巴黎迎接她的丈夫。在春景滿園的巴黎裡，戴德生記述說：「我們並肩坐在馬車裡。儘管有很多話要說，但我只是緊握著她的手，靜默良久，因為心中那深深的喜樂是難以言喻的。」

在英國，戴德生發現內地會的工作現頗受人關注。部分原因是由於海恩波擅于建立公共關係；而內地會事工的成就，也是美好的見證——英勇的開荒工人，包括女傳教士，如今已差不多遍佈中國內地各個省分裡。很明顯地，他們都信靠神，不倚賴金錢。麥卡悌曾經徒步橫過中國，東從武漢出發，西至緬甸為終點。范約翰和蘇亨利則走相反的路，徒步從緬甸到達武漢，然後又步行至上海在八十六天內行完一千九百哩，成為第一對自西向東橫貫中國的外國人。

他們令人敬佩的長途跋涉，標誌著內地會對中國展開的普查。隨著日子的過去，內地會傳教士有系統地探訪了中國每個重要的城鎮，同時收集和記錄將來事工發展所必需的資料。一路上，他們分發聖經和音單張，並隨時向聚集的聽眾傳講福音。

戴德生收到英國各地寄來的邀請信，請他報告內地會的情況及其成員開荒傳教的經過。從這時候開始，戴德生的名字在英國已是家傳戶曉了。

一個小孩寫信給他說：「如果你現在還活著，我想把所有儲蓄用來幫助中國的孩子去愛耶穌。」

有一位在南安普敦的信徒衛伯科（Canon Wilberforce）寫信給他說：「有六十人在我家聚會，是否可以請你惠臨，為我們主領一次查經聚會……晚上也請你留宿一宵。請你為主的名准允所請是荷！」

司布真也寫信給他：「請你來我們教會證道。」

布迦先生則從法國南部寫信給他，信內附了一張五百鎊的支票，說：「我的心依然專注在榮耀的事工上。我由衷地願意與你們同心，為增添七十名工人禱告。但希望不只是七十人而已。」

1883年6月，一個炎熱的傍晚，告羅斯特（Gloucester）一間教室裡，有十二位年輕人圍集在戴德生旁邊。他就開始概括地告訴他們自己學醫的經過，以及他到中國之前的各樣準備。後來其中一位記述說：「那時我感到，我至今似乎還沒有為基督撇下什麼，至今也還沒有學過怎樣信靠主。……我極之

感動，甚至叫戴德生先生不要再說下去，因為我的心都碎了。」這十二個人中，有三個決定前往中國。

籌辦聚會人的妻子，因為職責所在，也來聽戴德生的見證，她以為這一定是沉悶的聚會，後來她這樣記載：「戴德生先生開始講話時，我的心就感到平靜安詳，一個從神而來的新啟示臨到，滿足人的需要。我裡面的活泉開啟了……我也開始對奉獻的真諦領會一點，當我開始把自己降服在神面前時，新的希望、亮光和喜樂便進到我的生命之中。」

從戴德生的分享裡，大家都注意到他不但從來不暗示要求資助，而且很喜歡表揚其它宣教差會的長處。在沙裡土伯裡（Salisbury）的一個聚會上，杜維德（Thwaites）牧師發現戴德生的講道有一個特色，就是結合了謙卑和能力，使他留下極深的印象。戴德生說：「聖靈的能力很大，甚至令人敬畏。」這次聚會以感恩會作結束。在感恩會上，儘管沒有提到內地會，卻有很多人願意為中國事工獻身；儘管沒有募捐，卻有許多人慷慨解囊，「拿出珠寶、手錶、項鍊和戒指等貴重物品」。

戴德生除了應付頻繁緊密的講道聚會外，也忙於寫信。在 1883 年至 1884 年間的十個月內，他至少處理了兩千八百封信。他有兩本筆記簿，上面列明何時收信、何時回信，以及信的內容提要。有些不重要的信件便不會記錄下來。他後來聘任一位私人秘書，但他很快感到工作不勝負荷了。

中國內地會的行政管理問題，也極需他去關顧。所以戴德生全心全意地為此禱告，同時跟倫敦委員會的成員討論可行的方案。終於在 1883 年 8 月，他給內地會每個成員發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議中國內地會的組織，應該象英國一樣。在英國，布倫敦委員會協助監督，所以在中國也應成立一個委員會，輔助那位監督或將來繼任他作監督。中國內地會委員會的成員也是各地區的監督，他們得到地區教士組成的理事會協助工作。戴德生認為這樣的組織可使當地的事情得以及時處理，也能使他和地區裡有經驗的傳教士可定期接觸和聯絡；並確保更有效地督導和擴展福音事工。在信的結尾他這樣說：「對於這個建議，你們有何感受和回應？你們覺得這意見能否接納？我很希望知道大家意下如何。」1883 年，又有二十位新傳教士前往中國。1884 年赴華的新傳教士人數是四十六名。為差遣七十人所作的禱告，不但蒙允，而且超過所求的數目。

第三十九章 比板球更好的事

戴德生和珍妮面臨另一次離別之苦，1885 年 1 月，戴德生需要回到中國去。戴德生跟珍妮和孩子道別後，就乘計程車離開培蘭路的家。戴賀美回到家中，安慰珍妮一會後，又重新投入工作。她要為一群很有恩賜、蒙神選召的年輕人，作最後的準備，以便前往中國。

「劍橋七傑」已經在英格蘭和蘇格蘭主領了一連串的聚會。2 月 2 日，他們要到劍橋領會。學生和市民擁擠在校友會禮堂（Guildhall）中。首先起來分享見證的，是英俊的劍橋畢業生，前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划艇隊隊長司安仁（Stanley Smith）。

他說：「基督的愛催迫我們，要向普世宣揚。我們要往海外傳揚真光，否則，黑暗的權勢將會在英國向我們誇勝。」

接著是高大、強壯的划船選手，男爵之子章必成（Montague Beauchamp）起來分享。隨後是兩位士兵，一位是出身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將軍之子何斯德（Dixon Hoste）。另一位是畢業于伊頓書院（Eton College），隸屬第二騎兵衛隊的寶耀庭（Cecil Polhill-Turner）中尉。跟著又是一位伊

頓書院的畢業生施達德 (C·T·Studd)，他是他們當中最著名的一位，也是英國最好的全能板球員，1883年跟隨雅殊士隊 (Ashes) 從澳洲回來。

施達德說：「我要向你們介紹我的主。在過去的年日中，我有過很多歡樂時光，也嘗過世上諸般樂趣，但我可以告訴你們，這一切都不能與我現今經歷的喜樂相比。從前我比任何人更熱愛板球，但自從主耶穌進入我的心後，我找到一件比它寶貴得多的事，我的心不再迷於球賽：我要去搶救靈魂，事奉他，討他喜悅。」

寶耀庭的兄弟亞瑟 (Arthur) 早已悔改，他和施達德的父親一樣，是聽了英國的佈道家慕迪講道後歸主的。早在 1882 年，亞瑟已是七傑中第一位倡議要去中國的。第七位是蓋全利 (William Cassels)，他本已按立，計畫參加英行教會 (CMS)。但他發現英行教會並無進入中國內地的計畫，於是轉而參加中國內地會。那時，他的母親曾試圖阻止他。

她對戴德生說：「他六個兄弟都到海外去了，請你不要再帶走他。」

戴德生回答：「我十分尊重父母親的意願。既然你不同意，我一定不會鼓勵他這樣做的。」

但這位母親後來回心轉意，寫信給戴德生，告訴他不想成為一個好兒子的「壞母親」。

七傑之中，除了何斯德外，都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一位元報刊 (TheRecord) 的記者報導了中國內地會為何能吸引這批傑出人士，願意放棄一切。他說：「這宣教計畫表現出毫不妥協的屬靈精神和超越世俗的原則，得到一群真正奉獻一切在主腳前的人回應。」

此外，還有一連串為劍橋七傑安排的送別會，其中一次是在倫敦舉行，人數眾多，使中國內地會的名聲也響起來了。當時他們崇高的地位，與揚州暴亂後一落千丈的情況，真有天壤之別。

七傑於 1885 年 2 月 5 日離開倫敦，在 3 月 18 日到達上海。有一位酷肖中國人的紳士前來迎接，他們當時還認不出他就是戴德生哩！他們主要的工作是努力學好中文；不久，他們就要穿上中國服飾，往內陸進發。他們慢慢沿漢江而上，要往位於陝西省西南隅的漢中去。

施達德和寶耀庭兄弟都覺得學習中文是十分困難和沉悶。所以，他們求神賜給他們說中國話的恩賜。他們到達漢中以後，也鼓勵兩位年輕的女宣教士跟他們一起祈求。戴德生並不同意這樣做，他寫道：「撒但十分狡猾，會用盡方法使中國人無法認識福音。他對這批新來的傳教士說：「即使我一揮手，就可以使你們腦子裡載滿中文，我也不會這樣做。」結果，他們跟隨一位中國學者學習，並且觀察和聆聽其它資深傳教士的一言一行，慢慢的除了學習中文外，也學習他們在工作上的智慧。

1885 年底，戴德生希望回英國一行，因為有很多事務等著他處理。不過，他先要儘快成立中國內地會的委員會，委任各區的監督和一位副主任。他還要設立一些學習中文的訓練中心。他更加希望看見福音工作在內地的成果，特別是在山西省。

但困難接踵而至，他認為這是撒但的攻擊，使他明顯看見在那時候返回英國是不可能的。他建議在組織上作出改變，但反應不夠理想。早期是各宣教士直接與戴德生聯繫，大家有一種身處於大家庭的感受。而戴德生的計畫是分立各區監督，分區管理，結果引起不少反對和誤解。

不過，戴德生的計畫也有一點進展。他委派了顧正道 (William Cooper) 擔任安慶的監督，並牧養當地教會。他也委派很有語言恩賜的鮑康寧，負責安慶的傳教士語言訓練中心。此外，戴德生在二十三年前招募的第一位宣教士必道生 (James Meadows)，擔任上海以南浙江省的監督。最重要的，他委任範

約翰為副總主任，作他的副手。

範約翰是雲飛郡（Renfrewshire）快活林（Thriepwood）地主之子，他在「蘭茂爾號」的一批傳教士來到中國前，已於1886年2月到達寧波。範約翰是蘇格蘭人，儀錶出眾，身裁高大。初加入差會時，顯得有點羞怯，他的信念是「努力工作，不可浪費光陰」。他曾在寧波、紹興和緬甸辛勤工作。在1880年，他更徒步橫過全中國。戴德生寫信給差會的每一位成員，告訴他們範約翰會協助他探訪一些他不能親自去的地方，並且在他離開中國時，代表他處理各區監督提出的迫切問題。範約翰擔任副主任之職，直到1916年。

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一直都想在上海購置中國內地會的新基址，他們在吳淞路看到一個適合的地方。在1886年夏天的一個午禱會上，戴德生求神及時賜下他們需要的金錢，使他們可以購下那個地方。就在同一個下午，一位二十八歲的商人伊榮（Archibald Ewing）從英國格拉斯高來到，他是範約翰的朋友，奉獻了一千五百鎊予中國內地會，作為購置房產的費用。戴德生簽了合約，用大約二千五百鎊購下差不多兩畝的土地。中國內地會的工作使伊榮大受感動，也正式加入內地會，並且結束了他在蘇格蘭的生意，他不僅付清了地價，也支付了日後建築樓宇的一切費用。

雖然珍妮在山西北部地區開展了中國內地會的救助孤兒工作，戴德生卻從未有機會探訪災區。那個省分在1876年的大饑荒中，慘遭蹂躪。山西省的面積，幾乎相等於英格蘭和威爾斯。儘管遭受饑荒，估計仍有九百萬人口。在那裡事奉神的人當中，有劍橋七傑的蓋士利戴德生也希望在中國西南面的四川設立內地會的教區。

在1886年6月的酷熱天氣下，戴德生開始出發往山西去。隨行還有他二十五歲的長子赫拔，以及葉華德（Dr Edwards）醫生。食物十分難尋，那些年輕人都習慣接受戴德生興致勃勃的邀請，在晚上筋疲力盡地睡熟以後，跟他一起品嚐「午夜滑雞」。山西省大部分傳教士，包括劍橋七傑中的五位，都聚集在首府太原，迎接戴德生。他們舉行了一個星期的聚會，章必成把戴德生的信息編集成書，稱為《蒙福的日子》（Days of Blessing）。

「神的恩典在我生命裡得勝時，」戴德生在山西的聚會中說：「我可以望著一個中國人的臉，說：『無論你是怎樣，神可以拯救你。』否則，你怎能幫助一個上了鴉片煙癮的人？只想追求成功，常使我們沒有全心倚靠神的恩典。我們若專心倚靠他，便一定可以看到成果……」

「我們應相信一切人為的事，以及一切在基督豐盛恩典以外的事，必須能幫助我們領人歸主，才有益處。如果我們的醫療工作可以吸引人到我們這裡來，讓我們把他們呈獻在基督面前，那麼，這醫療工作就有益處。但醫療工作若取代了傳講福音，便犯了極大的錯誤。我們若以學校或教育代替了改變人心的屬靈能力，也是極大的錯誤。如果我們以為人可以借著教育過程，而不用經過重生，就能悔改歸正，更是大錯特錯。我們不要本末倒置，那些途徑只是輔助而已，讓人能夠接觸基督，如此，我們才可以真的為這些途徑感謝神……我們的心應高舉榮耀的福音，相信它是神的能力，使人得救。讓我們把其他一切都放在福音之下……如果我們確知基督是我們的倚靠，我們就永不灰心。」

戴德生下一站是洪洞，主領一個較大型的聚會，有近三百位中國基督徒及宣教士參加。範約翰比戴德生較早到達，有機會跟一位著名的中國基督徒見面。這位基督徒在中國內地會的歷史中，十分著名。

席勝魔從前是一位儒家學者，他在 1879 年，因為聽見英國循道會（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的見證而歸主。從前他是吸鴉片的，信主後就靠著主戒掉了。他也設立了一些戒煙館（天招局），使吸鴉片的人可以借著信心和禱告，也靠著藥物，戒掉毒癮。

範約翰用了五、六個星期，跟席勝魔一起到各處探訪他的家和戒煙館，聆聽他的講道，也看他怎樣牧養中國的基督徒。「我受到極大的感動，」範約翰憶述說：「他的靈性和熱心，他的禱告和禁食，他專心致志地工作，還有他的領導能力，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從沒有見過具有如此影響力的人。他十分堅強，似乎沒有人能抗拒他，但他又是那麼謙卑。我看見別人到他那裡求教，尤使我感動不已；他承擔每一個人的重擔，隨時指引他們，並為需要幫助的人祈禱。」

「他對聖經的認識和應用，也使我印象難忘。他傳講一篇關於基督受試探的信息，十分震撼人心。熟悉的經文經過他仔細分析，又加上屬靈經歷的印證，似乎帶出了新的意義。對於他來說，神是極之真實，他經常與神交往。同樣，撒但對他來說，也是十分真實。他常與那惡者爭戰，有時一連數日禁食和禱告。即使在旅途中，我也知道他曾整天禁食，安靜等候神帶領他解決一些難題。禁食和禱告常是他得力之源。」

終於，戴德生也到了洪洞，他也和範約翰一樣，對席勝魔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席氏特殊的恩賜，戴德生計畫特別委任他負責山西南部地區的牧養工作，主理該區的教會。席勝魔最初不願意接受。後來終於答允，並禁食禱告三天，完全沒有進食，直至完成按立社。戴德生邀請那地區所有傳教士一同參與按手，並祈求神分派他看顧和餵養他的羊。

章必成跟隨戴德生遠赴西邊的漢中，距四川省的邊境很近。戴德生騎了一匹驢子，另一匹則馱著他們的行李；章必成卻寧願步行。由於天氣炎熱，便利用晚上大部分時間趕路，因此他們常在黑暗中迷路。有時，章必成由於太過疲倦，竟在行走時睡著了。醒來時，發現戴德生為他弄了一個蚊帳，使蒼蠅不能騷擾他。

有好多次，高大健壯的章必成，把戴德生背在肩上，渡過深及腰際的急湍河流，一些中國人則在兩旁幫助戴德生著下地來。在經過一條河流時，他們發覺河邊的一些居民，靠著把人馱過河而發了大財。

「這條河今天是過不了的，」他們對戴德生和章必成說。但他們有一套古怪的邏輯：「如果你們肯付一千塊錢，我們就可以帶你們過去。」

「豈有此理！」章必成說著，就涉足過去。由於暴雨的緣故，河水迅速上漲。那些人看見這兩個外國人沒有受到嚇阻，就走過來幫忙，希望得到一點好處。河水漲得很快，兩位傳教士發覺再過半小時，就真的沒法渡河了。

河的另一邊是一條小村子，村內沒有客店。他們沒法在暴雨中前行，只好找到一處豬舍歇宿。他們沒有其它選擇，惟有把原來的一位住客趕走，借了一些長凳，又把門板拆下來放在凳上作床，用毛氈包著自己，盡可能使自己睡得舒服。但過了不久，那些豬怒氣衝衝地奔進來，衝破籬笆，然後躺在地上，與一位龐大差會的會長，以及一位日後承繼父親爵位的紳士，一同分享那簡陋的豬舍。

有一次，章必成聽見戴德生唱歌，部分的歌詞是：「主啊！感謝你賜食物。」

「食物在哪裡呢？」章必成問。

「不遠了，」戴德生微笑著回答：「我們的天父知道我們饑餓，不久會送早餐來。不過，你要等食

物到了，才謝恩用飯；我卻馬上開始謝恩了。」

真的，一兩分鐘後，他們就遇見一個售飯食的人。

章必成記得每天清早喂騾子的時候，總看見戴德生在燭光下讀聖經。在漫長的旅途中，戴德生慣常躺著祈禱。他已經五十多歲，跪著祈禱實在太疲累了。有時，在靈修禱告之後，他會再睡一會。

經過了二十四天的旅程，他們終於抵達漢中。戴德生看到魏醫生（DrWilson）四年前在此開展的醫療工作。又視察了由六位獨身的女傳教士開辦的學校。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商討進入四川的策略，好使蓋士利和其它中國內地會中有聖公會背景的傳教士，可以在那裡成立英國教會的一個教區。他們禁食禱告了一天，年底前，第一批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就開始在川東工作。

戴德生在漢中最後的一個聚會，是仲夏的一個晚上，在魏醫生家中的後院舉行。燈光從大廳的屋簷下透出，上面是遼闊的天空和無數的星星。

「我們一起讀腓立比書第三章，」戴德生開始讀著。他讀這章經文的時候，似乎特別著重第七節和第八節：「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我們為基督所丟棄的，就是我們所得著的，」戴德生說：「但我們若不肯捨棄，就真的失落了……」

「我到這裡來時，」他說：「一路上經過無數城鎮，但竟然沒有一個基督徒在當中！」

「我們似乎看不見講員，」魏醫生憶述說：「只聽見聖靈的聲音。每個人都在神面前謙卑認罪，每個人都粉碎自我……我們在那裡安然居住，自以為已經遵行主耶穌的使命，忘記了漢中並不代表全世界，忘記我們附近的村落，也可能從未聽聞福音，除非我們到他們中間去。」

第四十章 作美好的工

戴德生作出成立中國內地會委員會的建議，已有三年。在 1886 年 11 月中，中國委員會第一次在安慶召開會議。戴德生、範約翰和各區區監督一同聚集，詳細檢討已孕育多年的內地會《原則與實踐》（Principles and Practice），使各傳教士和日後加入的人獲益不淺。他們在開會以前，先一同禁食禱告了一個星期。

委員會事後把他們的決議刊印成一本小灰皮書，稱為《協議書》（Book of Arrangements）。戴德生後來把這本小冊寄給內地會各佈道所的傳教士。書上說明中國委員會在有關中國事務上與戴德生的關係，就如倫敦委員會在有關英國事務上與他的關係一樣。書中也列明對試用期中傳教士、司庫、幹事、各區監督、資深和新來的傳教士、女教士等的具體指示，並提到服裝。中國習俗、怎樣避免與中國人發生衝突，以及怎樣與滿清政府爭取權利等等。書中也選錄了由范約翰和鮑康寧編輯，曾在安慶訓練學院中使用的一套中文課程。

戴德生在書中談到領袖時，說道：「敬虔的原則最重要，它對我們每個人都同樣要緊。這原則就是：設法幫助人，不是管治人；領人離開歧途，走上正路；為神的榮耀，以及被帶領者的好處而作工，不是為了討領袖的喜悅。這原則經常指引作領袖的來到十字架前，使被帶領的人因領袖所付上的代價而得著幫助……心靈正直的必喜愛敬虔的原則，在順服中找到自由。」

範約翰憶述說：「當時我們都看見異象，那些日子真是在地若天，似乎什麼困難都沒有了。」另一

個中國內地會歷史上的重要發展，也在中國委員會第一次的會議中萌芽了。這意見好象是範約翰提出來的。在 1886 年 9 月，他寫了一封信給珍妮，說：「我們滿心期望至少有一百位新同工，於 1887 年往中國去」起初，戴德生跟委員會其他成員商議，他們都認為範約翰的提議太急進了。但在離開安慶以前，他帶領其他委員一同向神祈禱，求他在 1887 年預備一百位新傳教士。

會議結束後，戴德生和範約翰花了數天時間，把《協議書》的初稿整理成書。戴德生習慣性地一邊踱著方步，一邊向他的秘書讀著信函。在寫給珍妮的信中，他有這樣一句話：「1887 年需要一百位元新傳教士。」他的秘書看著他，眼中充滿疑惑。範約翰永不會忘記那位秘書臉上的表情。戴德生也發現了，就接著說：「或許你可以把這一百人在中國拍的照片寄給我看，但我現在已經確信了。」

範約翰寄了一封短簡給中國內地會每一位成員，說：「你是否願意簽署，為這一百位傳教士祈禱？」他又發電報到倫敦，說：「為 1887 年的一百位新傳教士祈禱。」

戴德生對珍妮說：「接納和差遣這一百位傳教士，要花極大的工夫，但主必定賜下力量；這工作也需要極大的智慧，但主必定引導。在主裡有足夠的恩典，不是嗎？」

每天飯前，戴德生都和他的朋友一起唱出下列的詩文：

主啊！求你賜下一百位工人，
都合乎你心意，是你揀選的，
把你的愛傳揚到遠方——
使我們喜樂地讚美你：
主必紀念這事情，
我的耶穌必成就萬事。

有一位退休的傳教士在上海對戴德生說：「我很歡喜聽見你們正為著更多的生力軍祈禱。當然，在一年之內，你們不會得到一百人，但祈禱之後，你們必定得著更多的同工。」

戴德生回答：「謝謝你的關心，我們已滿有喜樂，也確知我們的祈禱已蒙垂聽。我十分肯定，如有機會的話，你將與我們一起分享迎接一百位新傳教士的喜樂。」

戴德生在 1887 年 1 月 6 日乘船離開上海，甲板上都蓋著雪。他在 2 月 18 日抵達倫敦。中國內地會的朋友知道他的計畫，於是邀請他到英格蘭和愛爾蘭各處講道的信函，如雪片般寄到培蘭路來。

這一次巡迴講道，除了禱告之外，還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就和往常一樣，祈禱和苦幹是相輔相成的。戴德生付上極大的窮苦，在整整一年中，他周遊了整個英國的所有地方，在各處的大城鎮中，在不同的聚會和會議裡，分享異象。他也寫了數以萬計的信函，有時每天要寫三十至四十封。他也接見了無數的申請人，他們都熱切地回應他的呼籲，要往中國去。他還要處理倫敦委員會對《協議書》的異議，並且常常與中國的範約翰聯絡，商討各項行政問題的細則。

「我的精力已耗盡了，」他對範約翰說：「有時真希望我的時候已到，但主賜能力給軟弱的人。」

在戴德生和珍妮的長期分隔裡，經常互通魚雁。「親愛的，我的心為你擔憂顫抖，請儘量多休息，」她用懇求的語調說：「如果你把身子弄垮了，即使得到那一百人，也是得不償失。」

「在我們的聚會中，數以百計的人蒙神賜福，」他告訴她說：「我們並非無故分離。昨天我這樣想：下星期這個時候，我將會在返家途中。我將與珍妮一起。你看我所想念的只有這幾件事。」

戴德生於 1887 年 5 月 21 日慶祝他的五十五歲生辰；而 26 日則是「蘭茂爾號」出發往中國去，以及中國內地會成立二十一周年紀念。在周年紀念聚會裡，他們收到很多奉獻，其中很多是大數額的，有一位奉獻了一千鎊，都是用作支持差派一百位傳教士。

戴德生在周年紀念聚會中講道，他引述一位黑人佈道家的話作開始，說：「神無論作任何事情，都是最美好的。」

「主永遠是信實的，」他對會眾說：「有人對主說：『主啊，加添我們的信心吧！』我們的主不是斥責如此祈求的門徒嗎？他說：你們需要的並非偉大的信心，而是信靠一位偉大的真神。即使你們的信心小如芥菜種，也足以移山。我們需要的，是憑信心倚靠這位偉大的真神，仰望他，遵行他的話，並實踐他所應許的。」

「我們在本年內一直祈求神賜給我們一百位新同工。我們也有主確切的應許：『你們若向父求什麼，他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基於這個應許，我們的信心大大加增；當我們在十一月開始為此事祈求時，我親愛的妹夫海恩波寄給我一百位已被接納的傳教士名單。在我們產生這個意念以先，用了數天時間一起禁食祈禱。我們開始的時候，是與神一起，我們也肯定要與神一起，達成這個心意。我很高興知道這一百位傳教士中，有三十一位已經到了中國，但我更感到快樂的，就是知道中國內地會有超過一萬位同工，他們每天同心的求神把他一百工人全部差派出去。」

「這一百位都是神『美好』的工！……我不知道神是否會豐豐富富的賜給我們超過一百位同工，或是感動其它教會團體，可以差派比一百位更多的傳教士，或是在教會中掀起宣教的熱潮，借此賜福予全世界。我只希望他在這些方面都答允我的祈求，我知道他所作的一定『美好』……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想你們也認識這個與神同工，以及向他祈求的原則。如果這個工作是出於神的命令，我們就可以充滿信心地向他祈求工人。神賜下工人時，我們可以向他求供應。無論我們有沒有經費，我們一定接納合適的工人。我們會對那人說：『親愛的弟兄，現今你第一件工作，就是跟我們一起祈求神賜下金錢，好差你到中國。』

「有了足夠的金錢，在時間及各方面環境都是合適的時候，那人就前赴工廠了。我們不會等到手上有足夠金錢。可以在他到達時交給他，才差派他去。主會按時供應，我們會把金錢匯到中國，供應他的需要……我們要把神擺在眼前，我們要走在他的道路中，在大小事情上都討他喜悅，並且榮耀他。**你們要倚靠神，作神的工，若行在神的道路中，就永不缺乏神的供應……**

「如果這個向神祈求，從神收納的原則是對的話，我認為中國內地會的經歷已經可以證明，它是千真萬確，那麼，我們豈不應在每日的生活中，更多應用它嗎？主的旨意是要他的百姓沒有重擔，滿有供應，而且剛強，健康和愉快……我們豈不應立意不憂慮任何事，只充滿感恩地祈求，把一切重擔、掛慮，帶到主面前，活在他完全的平安中嗎？

「……自從主教導我這是他的工作，我就不知道憂慮。我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討神喜悅。與他行在光中，我便永不會有重擔。」

一位在愛爾蘭的弟兄寫信給戴德生，說：「我和三位基督徒談過，他們在你的聚會中得著一個新的意念，就是神必照他的應許而行。」 每一天，戴德生都在寧靜的清晨裡讀經。然後，當他巡迴全國講道時，他就在聚會中分享神給他的啟示。他有時講解整段經文，有時只講一節，或一句。

戴德生在格拉斯為一個有一千五百人出席的聚會中講道，他的秘書記述，說：「昨晚的信息十分有力，很多人都痛哭流涕，得著神的建立。戴德生解釋了西番雅書第三章後，便簡單、直接的說話，宣講信靠神的信息。他一直講到九時，但全場肅穆，你可以聽見時鐘滴答地響著。」

戴德生簡單直接地講述神的作為，以及地上廣大而迫切的需要，並且向願意委身，信靠神的信徒作出呼召，引起極大的反應。在愛丁堡的一次聚會中，有一百二十人奉獻自己作海外宣教工作。到了1887年10月中，已接納了八十九位候選人的申請，並準備出發。在十一月初，戴德生宣佈共有一百零二位申請人被接納，參與中國內地會的事工；也有足夠的金錢，可以差派他們到中國去。直到年底，一百零二人已全部出發了。這個人數包括兩位助理傳教士。因此，神不單聽了多人的祈求，而且十分準確地照他們所求的數目賜給他們。

在那一年內，英國內地會收到六百位男女申請獻身到海外傳教。倫敦的委員會拒絕降低標準，結果，有六分五人的申請被婉拒了。

「你必須繼續懇切祈求，」戴德生對範約翰說：「也要請我們的朋友代禱，求神彰顯他的名，賜下足夠的經費。我清楚知道今年增加了一百位同工，總共有二百位。要差遣和供應他們，便需多付一萬鎊的開支。我們現在每年的經費只有二萬至四萬鎊，這加增的開支無疑很龐大。我很歡喜聽見神這樣問道：『在我豈有難成的事呢？』但如果我們沒有好好為經費祈禱，我們不久就會為著經費而受試探。」

「每一天，」他在信中繼續說：「我愈來愈為著神把你賜給我們，並且為眾人接納這事而獻上感恩。人的意見或智慧都不足以承擔你的責任。但只要你凡事尋求他的引導，並且在工作壓力中，仍然追求聖潔，為同工祈福，主必繼續使用你，賜福子你。」

1888年1月，內地會已然大大擴展了。戴德生在他的新年信息中說：「我們永不要忘記，我們既不求於人，就必須繼續仰望神。我們收到的每一筆奉獻，都是神所賜予和引導的，給我們帶來屬靈的鼓舞。這正是使我們的工作特別蒙福的原因了，也使我們更多的倚靠他。我們即使滿身是口，也不足以表達我們對他的讚美。」

戴德生確實感到當一百人中最後的一位到達中國時，應舉行一個盛大的感恩讚美會。「神為我們成就的事，正是我們所想所求的，也實在是非常蒙福的事；無論大小事情都可以看見他的確垂聽祈禱。那些憑信祈求的人，必可堅定多人的信心。」

在迎接第一百位傳教士到達中國的人當中，有一位年長的宣教士，他曾經肯定地說：內地會的祈求是不會完全蒙神應允的。

第四十一章 推翻慕迪的原意

1887年11月，一百位傳教士終於齊集。此外，一位霍亨利（Henry Frost）先生也來到培蘭路。他大約三十歲，來自一個顯赫的美國家庭，他的家族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創辦人之一。他仔細的研讀聖經之後，確信那些異教徒是失落的一群，只有借著信靠基督才可以得救。所以，教會有責任盡其所能，把福音傳給他們。他看見劍橋七傑穿起中國服裝的照片，又讀到有關中國內地會的資料，使他很受感動，要獻身向中國傳福音。因此，他來到英國，建議戴德生在北美設立中國內地會的支部。在他們見面之前，他已把他的建議書寄給戴德生。

霍亨利到達時，戴德先還在蘇格蘭，他在培蘭路住了幾天，第一個印象就是每天的祈禱會，他憶述說：「這祈禱會深深的感動了我，它簡單、懇切，所包含的範圍和屬靈的感受，都超過我所認識的。」

在他們見面以前，霍亨利腦海中的戴德生是個高大、魁偉、黑髮黑鬍子。聲音沉厚的人。當他被引到戴德生的房間時，戴德生從後桌站起，向他走來。他憶述說：「他的個子比我想像中矮，金發藍眼，聲音柔和悅耳。」

「歡迎來到英國，並光臨本會和捨下。」戴德生伸出雙手，拉著霍亨利的手說：「我對你的計畫很感興趣，並已為此祈禱多時。」

當時，霍亨利感到他似乎得到啟迪，他憶述說：「起初是從那人而來，然後覺得是從他的神而來。我從沒有見過象他那樣謙和，又是那麼尊貴的人。從那時開始，我的心全屬於他……同時對他的主有更新而深刻的感受。」

他們談了大約一個小時。

「今天晚上再來見我吧，」戴德生說：「我的妹夫海恩波到時會跟我們一起商討此事。」

霍亨利滿心歡喜地回到住所，感到戴德生的反應很積極，相信中國內地會大可伸展至北美。但到了下午，他再和戴德生與海恩波見面時，海恩波卻反對他的建議。

「美國的宣教團體不會歡迎一個英國組織轉移到美國去的。」這是海恩波的論點。

晚上大家再相會時，霍亨利覺得戴德生仍如早上一樣，十分友善。他們一起禱告。但討論開始後，他逐漸察覺他有點改變了。

戴德生這樣說：「種植和移植一棵樹是有分別的。若是移植，樹苗可能枯萎；但若是種植，例如橡樹等，它們多半會生長繁茂，紮根深廣，可以抵受最厲害的風雨。所以，我想我不能接受你的提議。我們希望北美也興起一個純屬北美的中國內地會，在各方面都是本色化。」

這個似乎是最後的決定，霍亨利也沒有多說。然後他記起戴德生說過，明年春天他便要回中國去。

「如果你被邀請在尼亞加拉（Niagara）湖邊大會，以及在慕迪先生的大會中講道，你會考慮在往中國的途中，順道探望美國嗎？」

「可以的，我會接受這個邀請，」戴德生回答。

回到住所，霍亨利感到身體和心靈都十分疲乏。他本來確信他英國之行是神的旨意，但現今他不斷自問：「我怎可以再確知神的帶領呢？」

1888年夏天，戴德生首次到訪美國，隨行有他的二十五歲次子存義，他現在是位醫生，以及他的私人秘書衛侯斯（S, F. Whitehouse），還有利物浦的佈道家華列夫（Reginald Radcliffe）及他的妻子。從英國到美國需時一周。當船抵達紐約碼頭，霍亨利已在那裡迎候了。

尼亞加拉湖邊大會被形容為靈命湛深的基督徒大會。戴德生負責兩次講道。他卻不多提中國，只集中分享基督的榮美。

「我們好象被提升到眾天之上，」霍亨利憶述說：「進到神的面前。」他記得戴德生只謙稱自己為「偉大的主微小的僕人」。

戴德生和存義在大會結束前便離開了，因為要趕赴芝加哥參加慕迪的大會。其餘的兩位講員華列夫和韋達（Robert Wilder）繼續在大會中，強調服從基督的命令，到普世傳揚福音是十分重要的。韋

達的信息和影響，引發了美國學生立志佈道團（American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後來發展成為校園團契（Inter-Varsity Fellowship）。

「支援一位元中國內地會傳教士的費用需要多少呢？」有人詢問華列夫。

「五十鎊吧！」華列夫回答。然後由那美國人自行折算為美元。

大會委辦決定把全部奉獻（在戴德生離開之後，才收集的）送給中國內地會。獻金數目超過五百美元，足夠支援兩位傳教士在中國一年的費用。這款項交由霍亨利轉交戴德生，但附帶一個要求：

「請把這筆錢交給戴德生先生，希望可以用來支持中國內地會中的美國同工。」

大會結束前，私下的奉獻使這筆獻金增至二千美元。霍亨利負責保管這筆款項，他的錢袋幾乎裝不下。

霍亨利決定立即前往愛迪加（Attica）他父親家中，戴德生正在在那裡。他在猜測想這位中國內地會的領袖，聽見這樣一筆可觀的奉獻，不知有何反應。由於趕不上火車，他在半夜才抵達，使他十分失望，因為要等到早上才可以帶給戴德生這個好消息。誰知他下車時，戴德生已在車站等候他。

「親愛的弟兄，你好嗎？」愈德生說。

霍亨利沒有多說，直至他們回到戴德生的房間裡。

「戴德生先生，我有好消息要告訴你。尼亞加拉大會要我轉交一筆錢給你，足夠支持中國內地會八位傳教士。」

戴德生臉色一沉，好一陣子沒有說話。然後說：「我想我們最好先祈禱。」

於是，二人跪在戴德生的床邊，戴德生就求問神的心意。

他們起來後，戴德生仍是一臉嚴肅，問霍亨利說：「奉獻的人有沒有說明這筆錢要用在北美的同工身上呢？」

「有，他們正是如此。」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戴德生似在自言自語。

「我們差不多到了凌晨一時才分手，」霍亨利憶述說：「我們都很歡喜；不過，這位屬靈的長者與他的神有特殊的相交；對他來說，在那種情況下，他的「隱密處」就是肅穆的心靈。」

霍亨利和戴存義兩人對戴德生在慕迪主持的聚會中講道時的情形有清楚的描述。有一個聚會是在芝加哥的青年會大禮堂舉行，那時是 1888 年 9 月。個子不高的戴德生，正預備把眾多與會者帶到神的面前。慕迪坐在他後面。霍亨利憶述他坐在「講臺中間的一張椅子上，挺直而高大」，旁邊坐著許多講員。戴德生站著默禱一會，先把自己完全交托給主，然後領著會眾祈禱。跟著，他開始講道，「好象小孩般說話，也好象先知般宣講，也好象看見在一個貧窮的地方上有一群瀕臨死亡的人般，大聲呼籲。」他講了一個小時，霍亨利形容當時的聽眾「有極大的反應」，然後靜默了一會兒。

慕迪站前來說：「現在請司事人員收奉獻。」

戴德生趕快起來，靜靜的對慕迪說：

「我不是已告訴你，中國內地會從不在聚會中收取奉獻嗎？」

「不錯，但我們不能失去這個機會。」慕迪說，仍請司事繼續上前。於是，戴德生請准向會眾解釋他的立場。

「我十分感激各位和主席的慷慨。不過我代表的差會是從不在聚會中收取奉獻的，以免有些原來用作支持一些固有宣教團體的金錢，因此轉變了用途，我們渴望能協助，而非阻礙各宗派的工作。這些差會一向都靠這些奉獻來維持下去，如果有人想在他們固定的奉獻以外，參與中國內地會的事奉，你們可以寫信跟我們聯絡。」

慕迪說：「咦，你是我所遇見第一位拒收奉獻的人。」

結果沒有收取奉獻。有一個基督徒商人離開會場時，心裡很高興，因為他本來預備奉獻的二十元仍在袋中。但經過一夜良心不安，不能入睡後，他寄出了一張五百元的支票，以支援中國內地的福音工作。

霍亨利由於父親病重，只好留在家中，有數周之久，戴德生自己則到處講道。這段時間帶給霍亨利更多機會去思想和祈禱，並看清楚事情的方向。現在已收到奉獻，支持北美基督徒參與中國內地會的工作，似乎起初否決設立北美支部的決定不能不改改變了。「我不想影響你的決定，」霍亨利在愛迪加家中寫信給戴德生說：「但我誠懇的請求你考慮一下，在這邊設立支部不是有好處嗎？關於這一點，如果你願意聽的話，我還有很多話要跟你說。」

「我以為我們必須成立內地會美國支部，」戴德生寫信給在中國的範約翰說：「如果我帶一些生力軍回來，請不要大感驚訝。決定要成立一個國際性的差會，並不是一蹴即成的事。」「我一生從沒有感到那麼懼怯。」他後來說。但他決定以後，就開始有力地呼籲美國的年輕人到中國去。

「我絕不會因為有了傳教士卻沒有金錢而憂慮，」戴德生有一次對會眾說：「因為主必定看顧屬他的人，他不要我代他擔負責任。但有了金錢，可惜沒有傳教士，卻是十分嚴重的問題。我認為你們美國的弟兄姊妹只把這責任推給我們，卻沒有在你們中間差遣人去，運用這些金錢，實在不好。我們已有金錢，但人在那裡呢？」

「在那段日子，我想偷偷觀察戴德生，」霍亨利憶述說：「事實上，他對我而言，真是有點神秘……並不是說他不正常，我實在從沒有見過象他那麼正常的人。他也不是屬靈狂熱，他是我所相處過最清醒的人。可是，他有一種屬靈的氣質，每一次總使我驚訝，並促使我去尋求他那新奇的經驗。」

霍亨利記得有一次，戴德生住在愛迪加他的家中，他們正計畫一連串的聚會。霍亨利很好奇，要看看一個敬虔的人怎樣從主那裡得著引導。當時戴德生坐在霍亨利的桌子旁邊。

「在我們商討之前，好不好先祈禱呢？」

霍亨利當然同意。戴德生就合起手，垂下頭祈禱：「親愛的主，我們兩個小子，不敢決定我們的腳步。主啊！你知道萬事，求你賜下智慧。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然後他轉向霍亨利，問他說：「你有時間表嗎？」

時間表！霍亨利想。**時間表！**這是多麼平凡啊！我一生常與時間表為伍，但從沒有把它們與神的帶領混為一談。這位神人竟要求時間表！真是希奇。

霍亨利從桌子抽屜內拿出一些時間表。

「這些時間表上有沒有地圖呢？」戴德生問。

於是，霍亨利找出一張地圖。

「好，」戴德生說：「這裡是愛迪加，而我到中國去，必須從多倫多（Toronto）往西走。中間有什

麼地方呢？

終於，兩人訂出了一份行程表，日期和城市都計畫周詳，以致可以準時到達多倫多。霍亨利因此學會了關於引導的一個功課。首先是祈禱，然後用普通常識，當中還要有小孩子般的信心。

與戴德生一起乘火車到蒙特利爾（Montreal）途中，霍亨利看見一份雜誌上的文章，題目是「戴德生在多倫多」。文章的內容使他大感憤怒，擔心戴德生可能會看見，就把雜誌藏在一堆紙下麵。但戴德生已經聽聞有這樣的一篇文章，就撿起來閱讀。

「戴德生頗令人失望，」文章說：「我心目中的他是一位偉大的傳教士，理應有出眾的儀容……據說他是現代偉大的傳教士之一，便應象他們一樣。但事實不然……不認識他的人，在街上絕不會認出他來……也許可稱他為一個和藹的英國人。他的聲音並不洪亮……他的演辭並非雄辯滔滔……他講道時很少人拍掌……他沒有大聲疾呼……即使我們加拿大的宣教士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為中國千萬人發出呼籲時，也比他更有力，更有果效……如果戴德生用別的名字申請在我們安大略省（Ontario）的教會作工，恐怕有人連試用的機會也不給他。」

戴德生放下雜誌，沉默了幾分鐘，然後微笑著對霍亨利說：

「這是十分中肯的評論，他所說的都是真實的。我常這樣想，神使我微小，好讓他彰見他的偉大。

他們兩人躺在火車的臥鋪上，霍亨利睡在上鋪，戴德生坐在下麵。火車向著蒙特利爾急馳，霍亨利在黑暗中躺著，一路想著躺在他下麵那位傑出的人物。」

小人物嘗試裝作偉人並不為怪，但一位偉人卻表現得卑微，實在不容易。戴德生是學效昔日那位謙卑的拿撒勒人。

戴德生無論在那裡講道，都有年輕人和學生願意獻身到中國傳福音，奉獻亦源源而來。霍亨利描述戴德生臉上的「嚴肅表情」已不復見。神的旨意已很清晰，他不用擔憂了。到了九月中旬，已經有超過四十位男女申請參加中國內地會的工作。最後，大批群眾在多倫多歡送八位女士和六位男士，他們被選中作傳教士，與戴德生一同到中國去。在歡送會上，有一位父親分享他與女兒離別的感受，他說：「我沒有什麼寶貴的東西，可以獻給我的主耶穌。她要求我把最好的獻上，我就全心把我最好的獻給他。」後來，戴德生常憶述：「沒有東西是太過寶貴，以致不可以獻給耶穌」這句話，作為他首次北美之行中最珍貴的回憶之一

約有五百至一千人去到多倫多車站，歡送十四位勇敢的北美基督徒。然後，送行的人排列成四行，走到街上，一邊走著一邊唱著歌。

第四十二章 基督命令的再思

戴德生和第一批北美同工由加拿大多倫多乘搭火車，穿過洛鑿山脈，到達溫哥華；然後乘船往中國去，那時是 1888 年 10 月。他們還未抵達中國以前，戴德生已經接到兩位中國內地會同工逝世的噩耗。其中一位是摩裡士（Herbert Moms），是內地會煙臺學校的校長，他由於保護他的學生而被瘋狗咬傷，死於狂犬病。他們到達上海時，聽到更多壞消息。另一位中國內地會、同工死於傷寒，而范約翰的女兒瑪麗到了上海後，由於受到驚嚇，竟失了常性。戴德生在繁忙的工作壓力下，經常要照顧瑪麗和其他病人。瑪麗住在他的房間隔壁，常大聲狂叫並撕扯衣服床單。她發狂得最厲害時，需要幾個人才能

制服她。瑪姬（Maggie McKee）也不幸死於鼠疫。在安慶勞苦工作的顧正道（William Cooper）則染上肺炎，但後來康復了。

「我們經過多重的試煉，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戴德生記述說：「每天都充滿考驗。神似乎每天都問我們：『你是否可以對這些困難說：『父啊，即使如此又怎樣？』』儘管肉體可能軟弱，但他一直扶持我們。我們的家成了一所醫院，現今又成了避難所。這一切只有主知道……日與夜的壓力幾乎是不能承受……但我知主的道路不會錯，我不會另作選擇。」

除此之外，倫敦委員會有些成員，以及在英國的一些友好，都不贊成他在北美所作的事。戴德生為了回答這些批評，寫了一封信給倫敦委員會的一位成員，說他很歡喜知道他對於北美問題的意見，但指出如果沒有去過北美，是很難完全瞭解這問題的。「如果我沒有到過北美，我也跟你一樣惶恐……我只會暫定一切安排，待我回到英國，才有機會跟大家詳細商討，然後作出確實的決定。」他又寫信對珍妮說：「撒但十分兇猛，主的王國到處受到它的攻擊，我們每天的爭戰十分厲害。但我們的神是大能的，我必不軟弱。雖然我們從前曾受過一些試煉，卻不象現今那樣。」

他和珍妮已分別了許多個月。他寫信給她說：「親愛的，跟你長久分離，使我感到生命似乎頓失光彩，就連生活的力量也好象沒有了……盼望遲遲未得實現，使我倍覺愁煩……而我卻不能擺脫它的困擾。渴望使人失去思想的能力……十字架不會叫人覺得舒服，不是嗎？但它可結出美好的果子。」

他心中想的果子也許是差會屬靈的果子。他稱它為「更勝從前」，各地區都有人悔改歸向基督。

內地會面臨種種考驗，范約翰的女兒又變瘋狂起來了，使他忍受很大的試煉。他說：「我從未試過這麼愁苦，似乎一切可怕的事都發生在那幾個月之內。如果沒有戴德生，我真不知道我們應怎樣做。只要看見他的臉容，心中就感到安慰。禁食和祈禱更帶來極大的幫助，從不令我們失望。無論是在困難當中，或在擴展事工的時候，又或者在需要經費或屬靈的福分時，我們都經常從禁食和祈禱中支取能力，而且每一次都很快得到回應。」

他又提到戴德生，說：「他的生命很值得我們學習和探索。只要有象戴德生這樣的人，隨時都可以成立一個宣教組織。他的生命實在奇妙。我從未認識過任何人象他一樣貫徹始終。我年復年地觀察他，也有機會深入地瞭解他。他與神同行，他的生命能發出光輝，無論人們是在疾病或任何困難中，他都能隨時幫助。他能自我犧牲，切實地獻上自己，沒有人可以跟他相比。」

後來，戴德生感到倫敦正處於劍拔弩張的時候，不能靠信函把問題解決。他這次到中國，心中想作的事連一半也沒有完成。儘管如此，范約翰的女兒瑪麗已逐漸康復，而上海吳淞路中國內地會新大樓的建築計畫已定好了，並找到建築商承辦。他們預備蓋建一座大樓，裡面包括祈禱室、會議室、資深同工宿舍等。戴德生花了無數時間，研究建築計畫，甚至每一道門窗的尺寸，他也瞭若指掌。

1889年5月，他回到英國，終於可以疏解倫敦委員會對成立美國支部的異議，使他松一口氣。到了七月，他向范約翰報告說：「我沒有想到事情的發展是這麼順利，實在有很多事項需要感恩和讚美。」不過，倫敦和中國兩地委員之間存著的張力，以及對戴德生的領導方式表示不滿的，仍不絕於耳。

1889年10月6日，戴德生和珍妮在海斯汀（Hastings）珍妮父親的家中，慶祝珍妮四十六歲生辰。就在二十四年前另一個星期日，戴德生奉獻他的一生，到中國內地傳福音。現今他再想起馬可福音十六章15節裡耶穌說的話：「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直至如今，他從未問過自己：「主所

指的萬民究竟是什麼意思？」他多年來努力把福音傳到遠方，也制訂了傳福音到中國內地各省的一些策略，但他從沒有認真思想基督的話有何直接意思。

「我們應怎樣回應主耶穌這個命令呢？」他在海斯汀的那個星期日寫下他的感想：「我們是否要把『主』的名除去，只承認他是我們的救主？我們是否只承認他赦免了我們的罪刑，卻不理會我們是他『用重價買來』的，故不願意接受他的託付，不肯絕對的順服他嗎？我們是否自己作主，儘管他用血買贖我們，我們卻不願意把所有歸給他？我們的生命、我們所愛的人、我們的財產，都是我們自己的，不是他的。我們只奉獻我們認為合適的，在無需作大犧牲時，才去服從他的要求！我們願意耶穌基督領我們到天堂去，卻不願意他掌管我們。」

「每一位基督徒心中必定不會接受這種想法，但每一代的基督徒中，不是有無數人以此為正確的原則去生活嗎？實在太少人真正認識到基督若非掌管一切，他便完全不是我們的主了！如果我們可以談論神的話，而不是由神來判斷我們的話；如果我們可以隨意向神奉獻或多或少，那麼，我們就是自己作主，他卻成了虧負我們的，要感激我們所施捨的，也要感激我們順著他的旨意而行。」

因此，戴德生下定決心。他要確實而有系統地努力把福音傳給中國每一個人。這是基督的命令，是我們應該服從的。他的計畫是這樣的：如果有一千個傳福音的人，每人每天向二百五十人宣講福音；到了一千日，即三年之後，就有二億五千萬人可以聽到福音。

他知道必定有人提出反對。有些人會說傳福音的人不可能每天接觸到二百五十人。但在多年以前，他和賓惠廉曾經試過一些方法，使他們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他知道在他的計算中，還沒有包括早已在中國傳教的一千名外國宣教士所做的工作，也沒有把中國基督徒所作的貢獻算進去，他知道中國信徒的工作十分重要，也很有果效。

此外，可能有人會引證馬太福音末段的經文來反對他，認為大使命不僅是傳，也要施洗和教導——「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所以，很多傳教士忙於辦學和建立中國教會。戴德生也承認這一點，也以此為中國內地會重要的工作之一。他所建議的，是除了正在進行中的各種事工外，還加上一項新的工作。

所以，戴德生在十二月份出版的《中國億兆》中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給萬民聽」。這篇文章就是他在海斯汀從神那裡得著的創見和異象。他不僅是寫給中國內地會的同工和支持者，更是整個基督教會。他發出呼籲，要信徒參與四個緊急的行動：（一）祈求神為中國預備一千位傳福音的人；（二）基督徒聯合一致地行動；（三）有智慧地合作，免致忽略某些地區，或是重複某一地區的工作；（四）教會或個人慷慨奉獻，支持差傳事。

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戴德生及他的兒子存義訪問瑞典和丹麥兩地。他是接受邀請，盼望使瑞典中國佈道會（Swedish Mission in China）與中國內地會建立更密切的聯繫。戴德生在瑞典的聚會中受到熱烈的歡迎。出席人數眾多，支持中國事工的奉獻也十分踴躍。有一位女士把一隻美麗的手錶塞在戴德生手中，說：「這是獻給親愛的主耶穌的。」

瑞典女皇蘇菲亞（Sophia）也邀請戴德生會面。她派了一位宮廷侍女去到他的旅館，用皇家馬車把他接到首都城外五哩的皇宮去。女皇與戴德生談論中國，又請他讀一段聖經。戴德生選讀了列王紀上十章 1 至 13 節：「示巴女皇聽見所羅門因耶和華之名所得的名聲，就來要用難解的話，試問所羅門……」

耶和華你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喜悅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國位；因為他永遠愛以色列……」

據我們所知，女皇的問題沒有難倒戴德生。他向她展示中國內地會的中國地圖，以及有關差會事工的圖表。喝過咖啡並嘗過三文治後，女皇才熱情地和戴德生握手道別。

「到處都有人要見戴德生，」邀請戴德生到瑞典去的何約瑟(Josef Holmgren)憶述說：「他對人充滿愛心，別人也同樣待他。我們探訪一些家庭，儘管孩子不明白他說什麼，但總是圍繞著他，情景實在叫人歡欣。他友善地對他們說話，拍拍他們的頭，告訴他們一些故事。」

戴德生接到邀請，要他在上海的傳教士聯合大會開幕禮中講道。於是，他在1990年春天，第八次到中國去。這次旅程使他有機會進一步反省基督的命令：傳福音給萬民，並為此祈禱。這聚會也給他機會，可發出一千位傳道者的呼籲。

不過，跟珍妮再次分別，使他甚感痛苦。「親愛的，」他在旅途中寫信給她說：「我覺得我已經忘記了自我犧牲的真義，因我不願意跟你分離。這就是我愁雲滿布的原因。一方面，神和他的工作是居首位的；但另一方面，事實卻不是這樣。我不想忽略工作，但我也不能與你分別……我真的希望可以全心全意為神工作。求他在我心裡動工。」

戴德生在船上，準備上海傳教士聯合大會的講章，主題是「耶穌的心和他夠用的恩典」。他會講到喂飽四千人的神跡(太十五29至39)，而且說：「我很高興看見當時有一大群人，人數多得很，門徒認為不可能有足夠食物供應他們。群眾的需要是很實在的，這需要也是即時的。非立時解決不可……我們要注意，在那種情況底下，只靠門徒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他們可能會說：『真是可憐，他們也許懊悔當初沒有預備更多的食物；若靠賴他們，群眾只會挨餓。不過，耶穌也在那裡。他的同在確實地體現了他憐憫世人的心。所有人都吃得飽，所有人都得到滿足、得著力量。眾門徒不僅受責備，也受到教導；更得到豐盛的生命。』」

終於，戴德生回到了中國，在上海傳教士聯合大會上致辭，這大群聽眾來自中國所有基督教團體。他講了一個小時後，不再按著講章，把講題轉為著重聖靈的能力。這題目是他後期最注重的題目之一。

「如果我們籌辦這次會議，是為了完全服從主的命令，我們就應有聖靈的澆灌，是自認聖靈在耶路撒冷澆灌眾人以來，這世界從未經經驗過的。神不會把聖靈賜給那些渴望被充滿的人，但他卻把聖靈賜給那些服從他的人。如果我們為了服從神，決意在中國一個地區的每個城鎮、每條村落傳揚福音，便要快快的傳，並馬上付諸行動，深信聖靈將大大降臨，使我們得著連我們也不知從何而來的供應。我們將會發現福音的火炬從傳教士傳到信徒，傳到本地的同工，以致神的整個教會都蒙福。神把聖靈賜給順服他的人。我們要真正明白他賜給我們的命令，現在就是時候了，這個國家是這樣的開放，我們有那麼多先進的設備，神也賜給我們蒸汽輪船和電訊，可以迅速實踐他的計畫……」

「只要每一個團體派出二十五名傳教士，我們就多得一千位傳教士了。」

大會結束時，決議在五年內招募一千位傳教士，參與中國各項宣教事工，包括與教育和醫療有關的佈道工作。這是一個重大的呼籲，得到英國、美國和歐洲的差會聯合贊助。戴德生被選為招募委員會的主席，向大會報告此事的結果。

那一年四月，中國內地會在上海正式啟用它在中國的新總部。舉行啟用禮那一天，有二百人來到吳淞路，其中三位是戴德生早年在中國認識的好友：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艾約瑟(Joseph Edkins)

和倪維思（John Nevius）。他們看見門口有一塊紀念碑，上面鐫刻著一句話：「為神的榮耀，並在中國拓展他的國度而建」，上面沒有提到中國內地會的名字。數日之後，大力奉獻，使這座新大樓得以落成的伊榮（Archilrald OrrEwing），跟內地會一名女教士在祈禱室中舉行結婚典禮。

有四位墨爾本（Melbourne）的牧師，各有一個異象，就是澳洲的基督徒也應該參與中國傳福音的工作。因此，他們邀請戴德生到這個英國殖民地去。戴氏在八月到達，所到之處都有一大群人聚集聽他講道。

在墨爾本一間很大的長老會中，主席介紹戴德生時，稱他為「我們著名的朋友」。

戴德生靜靜地站立了一兩秒鐘，在場的人都感到他「臉上帶著神的榮光。」

「親愛的弟兄姊妹，」他開始說：「我只是一位有名的主人其中一個小的僕人。」

招待戴德生在墨爾本住了兩周的麥卡尼牧師（H·B·Macartney）性情緊張，他說繁忙的生活使他整天戰慄。當他有任何事情要做時，他就緊張萬分。

「我在書房中，」他對戴德生說：「你在客房中。你要照顧的人有一百萬，我只需要照顧數十人。你的信函都十分緊迫和重要，我的信函相比之下實在無關痛癢。可是，我充滿憂慮和不安，你卻永遠是那麼冷靜。請告訴我，怎會有這麼大的分別呢？」

「我親愛的麥卡尼，」戴德生回答說：「你所說在我裡面的平安，不單是一項值得高興的特權，更是一種需要。如果沒有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們的心思，我決不可能完成我要做的工作。」

「他年約六十歲，」麥卡尼記述說：「肩上背負著十分沉重的擔子，但能處之泰然，毫不焦躁。他的信件堆積如山，任何一封都可能提到某人死亡，或是經費不足，或有關暴亂和種種嚴重的困難。但他讀完每一封信後，便冷靜地逐一回復。基督是他平安之源，安靜是他得力的秘訣。」

在墨爾本麥卡尼的家後面，有一大片公用地，長滿了各式各樣的野花。麥卡尼記得當戴德生處理完他的信件後，總是走到那塊地，站在那裡，觀賞周圍美麗的景色，象孩童般歡天喜地。

事實上，麥卡尼沒有察覺戴德生心中的一些傷痛。再次與珍妮和孩子長期分離，幾乎使他受不了。而且，從英國傳來的消息，說戴德生之二十一歲、正在劍橋大學讀書的兒子戴查理（Charles Edward）遠離了神，帶給家中很壞的影響。即使這樣，戴德生在往澳洲途中，仍寫信給珍妮說：「親愛的，你可以在我返回中國時，前來跟我會面嗎？」

在昆士蘭（Queensland），邵約翰牧師（John Soutney）和他的妻子邀請戴德生在布里斯本（Brisbane）附近葉士城（Ipswich）他們的家中作客。邵牧師三十四歲，是英國人，有三十兒女。他到澳洲來，是因為患病痊癒後，聽從醫生的勸告，在澳洲宜人的天氣下養病。邵牧師到火車站迎接戴德生，他預料會看見一個儀容出眾的人，但見面時，他大感失望。回家後，他向妻子透露他對這位客人的觀感。

「不過，」他補充說：「我確信他是一個好人。」

跟戴德生略為交談後，邵約翰太太靜靜對她的丈夫說：「看看他臉上的光采。」

邵約翰同意他太太的觀察，並思想其中原因，「他經常仰望神，他與神的溝通是那麼深入，使他臉上也似乎泛出神的榮光。他來到這裡不過數小時，我初次見他時，十分失望，但現已轉為極度的敬仰和愛戴。我認識到神的恩典所作成的事，是我從不知道的……他在我家作客，表現極為溫文有禮，又有體恤和恩慈。他很快便適應我們家中的習慣，準時用膳，儘量少麻煩別人，而且敏銳地察覺到別人

為他作的每件事情，並一一道謝。我們也發現他從不高舉自己，處處表現出真正的謙卑。」

由上海傳教士聯合大會發出招募一千位元傳教士的消息，邵約翰夫婦也聽到了。他們便與戴德生商量他們應作何回應。雖然他們感到戴德生也體會他們的回應是出於神的感動，但他們亦莊意到，戴德生仍很慎重地把他們在中國可能面對的境況，跟他們交待清楚。他告訴他們中國的天氣、艱苦的生活、醫療服務的缺乏、跟孩子分離的苦痛。……他喜歡在邵家的花園漫步，並對邵約翰大大說：「在中國，你不會有這樣的花園。」

邵約翰終於成為中國內地會駐澳洲和紐西蘭辦事處的監督。

1890年11月底，戴德生帶領首批澳洲的中國內地會傳教士，一同到中國去。他們是四男八女。在耶誕節前不久，他們抵達上海。戴德生發現最使他喜悅的事，是在歡迎的人群之中，有和他分離已久的珍妮，她在九年之後，終於重回中國。親友和培蘭路的同工為她安排一切，分擔她的家務，使她可以抽身往中國去。自始以後，戴德生和珍妮再不用嘗受長久分離之苦。

1891年1月至4月之間，從歐洲、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共有七隊人到達上海，澳洲的一隊包括了邵約翰在內，使中國內地會增加了七十八名傳教士。到了二月，認北歐來的兩隊人也先後在同一周內到達，他們是五十位北美瑞挪會（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的成員，這個差會後來成為中國內地會的附屬組織。這些北歐人喜愛音樂和歌唱。他們用帶來的結他，教導住在吳淞路的各個同工學唱很多瑞典聖詩。這些生力軍都是那一千名新傳教士的部分成員。

第四十三章 渴求聖靈的能力

「傳教士是西方各國侵略中國的先頭部隊；他們使用法術敗壞中國人；他們把胎兒從母親腹中取出，把死人的眼睛挖來制銀子；耶穌更誘惑猶大的婦女，由於侵犯了皇帝的妃嬪，被判死刑；基督徒敬拜『豬』『主』的諧音字），不肯拜天、地、日、月、星宿、祖先和先賢。」

上述的指控記載于長沙出版的一系列小冊子之中，長沙是排外情緒激烈的湖南省首府。這些仇外書冊的刊印，還得到一位官員的鼓勵及協助。結果在1891年，長江沿岸一帶都爆發了暴亂。甚至在上海，也是擾攘不安，政府也要鎮壓搶掠和暴力之事。有一位循道會的傳教士，他不是中國內地會的成員，在等候長江的渡輪時，被人殺死了；有一位歐洲海關人員試圖上前救助，一同慘遭殺害。天主教的傳教士也同樣遭害。但中國內地會的成員卻沒有一個喪生，他們的佈道所儘管受到不少威嚇，仍沒有為暴徒襲擊。

西方各國政府派遣軍艦保護他們的僑民，並要求中國政府命令各省官員，協助保護宣教士。北京政府不大樂意擔此重任，但面對西方列強的壓力，沒有選擇餘地，只好應允行事。

「我認為近日的暴亂是撒但對聯合大會決定招募一千位傳教士而作出的反應，」戴德生記述說：「不過，神也有他的工作；仇敵雖然兇猛，但只有神是全能的。」他發了一封通函給中國內地會所有傳教士，指示他們在這危險時期應如何行動。他說：「我們不斷鼓勵信徒勇敢面對逼迫，為基督的緣故受苦犧牲。他們會認為我們說得容易，因為依他們來看，我們生活安逸，不用面對危難或損失。所以，在我們危急的時刻，他們會留心我們的行為，並且判斷我們對於『惟獨倚靠他的膀臂，使我們有穩妥的保障』這句話究竟信心如何……我們在此時的行為表現，比我們多年的教導來得更有效。」

到了十月，暴亂終於平息了。一方面是由於不停的下雨（中國內地會的同工一直為此祈求），一方面也由於北京向各省官員施加壓力。

範約翰擔任了五年副主任的沉重職務後，終於不得不回到英國休息，剩下戴德生獨力主持大局，不能離開上海。「親愛的侯爾道，」戴德生寫信給倫敦內地會內務主任說：「你很難瞭解這邊的情況，我要瞭解和愛護我們親愛的同工，聆聽他們的愁苦和困難，他們的失意和掙扎；而且知道有人患病，有人需要幫助時，伸出援手；收到在急難中要求指示的電訊，或是報告有人去世時，給子恰當的指引；收到屠殺、縱火的報告，還有各種不同的事故作出適切的行動；再加上日常的職責，以及應付一個將近五百人的差會在經費上的需求，真使我疲憊不堪。只有一個方法使我不至於倒垮了，就是把各樣事情帶到我們的主面前。他必定幫助，他必能瞭解。」

中國委員會修改內地會的《原則與實踐》和《協議書》之事，使倫敦委員會某些成員不滿。這些衝突一直持續到 1890 年，引致近三十位傳教士辭職。戴德生也指出：「撒但確實十分忙碌。」戴德生不在倫敦時，倫敦委員會有些事情沒有通知他。海恩波因為參與反鴉片運動而分心，似乎不能專心作中國內地會的行政工作，但海恩波認為這樣的指摘對他非常不公平。

也許倫敦委員會和中國委員會之間的對峙是無可避免的。戴德生本來希望中國委員會有執行的權力，運用各區監督的經驗去處理每日碰到的實際問題。可是，倫敦委員會自視為中國內地會的總會，其餘各地的委員會不過是輔助性質。沙威廉（William Sharp）提出由倫敦委員會掌握最高權力。他認為倫敦委員會要向中國內地會在華工作的支持者和捐獻者負責及交待。沙威廉說話尖刻；他對戴德生說：「你的委員會不應徒具虛名，它應有實際的行政權力，當它跟你的觀點不一致時，你總試圖強逼委員會接受你的觀點。我希望你可以容許差會自行運作，而你自己可以集中精神去闡釋聖經，以及激勵教會。」

讓倫敦委員會掌握大權，有違戴德生創立中國內地會的基本原則——以中國作指標。當倫敦委員會干涉一些傳教士反對《協議書》中某些方面時，戴德生的反應是：這是工廠的事，不是母會的事。

他和中國委員會的主張是：在中國的事情該由在中國的人處理。基於中國內地會至今已成為一個國際性的機構，他們說：「把全體同工聯合，成為一體，是當前急務。所有使人感到有所區別和分離的事情，都要一概避免。『沒有人可以事奉兩個主。』以倫敦委員會為最高權力的建議，不僅使很多人心中不服，並感到：『我們是來自某某團體，我們是隸屬它們，不是你們。』……這個本已十分困難的工作，將因此難上加難。」

倫敦委員會仍堅稱英國教會不會喜歡戴德生把行政權力給予中國委員會。他自己必須作出罷免的決定，倫敦委員會必須對內地會的《原則與實踐》和《協議書》有最後之決定權。他們也要求有派代表出席中國委員會的權利。

當倫敦委員會的信在 1891 年 11 月寄到上海，陳述他們的要求時，戴德生覺得差會已經到了一個最嚴重的危機。他對倫敦委員會說：「你們沒有經費支援五百位傳教士，你們不能保障他們在暴亂中的安全；你們不能到這裡來管理差會的事務；我們必須行在神的面前。他按著他們信中各點逐一回復。珍妮感到他那時實在太辛苦了，差點要了他的命。

不過，這個組織面臨的危機並沒有完全佔據了他的時間。他也可以抽出時間細心料理他從洛磯山

脈收集得來的植物標本，並清理他放在吳淞路房子的陽臺上、從多利士海峽（Torres Strait）一個島上所採得的標本。

戴德生也沒有因制度問題引起的爭論，而忽略了差會的屬靈需要。1892年3月，戴德生髮了一封重要的通函給中國內地會每一位成員。他在信中報導了他最近與一些海員、中國僕役、居民和到上海的旅客談道之經過，他說：「現今人們對差會的需求，是聖靈同在的明證。分發了數以千百的單張和聖經冊子，福音信息傳講了數以千次；宣教路程也不知走了多少萬哩；但在使人歸主上，這一切又是多麼微小。作為一個差會，我們務需在神面前謙卑。我們也蒙受神的賜福，可領一些靈魂得救，但那些追趕千人，或是二人使萬人逃跑的在哪裡呢？那些曾經乾渴，現今得著滿足，從他裡面湧流活水江河的，又在哪裡呢？」

「也許我們很少人會對我們工作的結果感到滿意，有些人或許想道：如果我們有更多、更貴的機器，我們必會做得更好。可是，我們需要的，是屬天的能力，不是機器。如果我們現今每天接觸到千百人，卻不能使他們歸向基督，那麼，即使有機器可以幫助我們，接觸到雙倍數目的人，又有什麼用呢？我們倒不如暫停現今的工作，在神面前謙卑、禱告，只求聖靈的充滿，使他無可抗拒的能力可以透過我們流通開去……」

「現在無數靈魂正走向沉淪，因我們缺乏這能力……神賜福那些憑信心，向他追求這恩福的人。萬事都預備好了，只待我們作好準備。讓我們求他查明我們，除去一切攔阻，以致他可以更大使用我們。我們中間任何人，若曾論斷同工，或曾輕率及開玩笑地說『不方便』；或如果我們容許次要的事占去我們的時間和注意力，代替了神的工作；又或如果忽略了讀經和祈禱，我們就要在神面前認罪，祈求他的寬恕，避免將來重蹈覆轍。當除去一切攔阻，重新把自己奉獻之後，我們就要憑信心接受聖靈的充滿，讓他佔據和管治這潔淨了的殿。」

1892年4月16日，內地會的中國委員會會議暫停。會議記錄這樣記著：「中國委員會暫停舉行會議，與上海佈道所的成員同心祈禱，懇求聖靈充滿他們，充滿在中國的整個差會，以及充滿倫敦的委員會。」

他們的禱告蒙神垂聽。

珍妮在同一個月裡記述說：「神在我們中間工作，使我們每一個人都倒空、謙卑，被聖靈充滿。我們經常聚會，充滿自由和能力。」

1892年5月，戴德生和珍妮一同乘船赴加拿大。一方面是出於霍亨利的建議，也為了與北美委員會的成員會面。霍亨利勸他留下來，完全休息。回到英國後，戴德生首先跟委員會個別成員會談，然後才和全體委員開會。儘管仍有不同意見和少許不滿，他們的要求已經軟化。有人以為海恩波會引退，戴德生希望化解這個危機，就建議舉行為期一天的禁食祈禱。

當時，差會面對的不僅是制度問題。1892年也出現人不敷支的情況。1887年，就是發動招募一百位傳教士的那一年，中國內地會收到三萬鎊捐款，1888年的奉獻則接近三萬三千鎊；1889年有近四萬九千鎊；1890年約有三萬鎊；1891年的獻金剛超過三萬六千鎊。但在1892年，每月的收入只有二千鎊左右。捐獻的降低，幾乎可以肯定是由於差會管理出現問題，以及長期為制度爭持不下，以致謠言四起。

1892年7月3日，戴德生從蘇格蘭回來，發覺九月份的奉獻數字特別低，通常他們在每月發給上海的電報裡，報告了每月的撥款，現在卻仍未發出。司庫費查理正等待與戴德生商討應付之策。

「我想我們應多等候一天，才發電報到上海，」戴德生說：「目前，我們應把平常的事務放下，來到神面前，為經費祈求。」

「但我們不能把祈禱後收到的奉獻，加入九月份的撥款中，」費查理提醒他。經費通常是按月寄發的。

他們二人同意把九月的奉獻數字發電報給上海知道。在中午時，培蘭路的同工特別為著這幾個月來不理想的奉獻收入和經濟危機，一起禱告。

到了下午，有一封信寄到培蘭路，內中有一張五百鎊的支票，並指明是要「立即轉往中國」的。

當時，內地會的中國委員會正舉行秋季會議，他們收到第一封電報，提到九月份很少奉獻。委員會成員便一同為神過去曾解救他們脫離危機而感謝神，並祈求更多的奉獻會接著寄來。果然，二十四小時後，他們接到那五百鎊奉獻的消息，範約翰也宣佈他收到另外五百鎊的奉獻。會議記錄這樣記著說：「各委員一同起立，頌唱讚美詩。」

1893年1月，霍亨利從加拿大來到倫敦，他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不僅使差會的制度問題的爭論得以調停，並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他門選舉了一位商人史洛恩（Sloan）為差會幹事，負責倫敦辦事處的日常工作，並參與委員會，使總幹事海恩波有更多時間參與反鴉片運動，以及公關工作。到了三月，那個幾乎使差會陷於分裂的難題終於得到了解決。大家同意倫敦、中國和北美的委員會只有給各區監督提出建議，而無執行的權力。引起爭議的《協議書》則分成數段，分別用來指示不同等級的傳教士。霍亨利被選為北美辦事處的內務主任，范約翰則被接納為內地會的副總主任。

第四十四章 一次家庭旅行

1894年2月，戴德生和珍妮一同離開英國，第九次前往中國。他們途經北美，四月抵達上海。他們的第二個兒子存義（Howard），在上海與戴氏夫婦同行的金樂婷小姐（Geraldine Guinness）結婚，他們二人後來寫了一本人人愛讀的《戴德生傳》

他們在中國逗留數周後，戴德生和珍妮便商議要回國參與和推進「前進應動」（Forward Movement），這是招募一千位傳教士的跟進運動。但當時北部省分發生了問題，戴德生決定親往家看一下。雖然這次旅程需時三至四個月，而且部分地區尚沒有鐵路，戴德生和珍妮還是在最炎熱的季節出發。

戴存義夫婦蜜月後，回到上海，發現父母已離去。戴存義醫生恐怕這次旅程會影響他父親的健康，因此，這對新婚夫婦便出發追趕，最後在漢口趕上了戴德生夫婦。

「父親，這次旅程可能會對你的生命有損。」戴存義說。

「是的，但我們不應忘記『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這話。」（約壹三 16）

他們一行五人，包括戴德生夫婦、戴存義夫婦，還有郭豁達（Joe Coulthard），他在 1879 年參加中國內地會，兩年前跟戴德生的女兒瑪莉亞結婚，他們在五月離開漢口。除了禮拜日，他們每天都走十四小時的路程。戴存義夫婦對於本地人的友善和開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重視家庭關係的中國人，對於這外國家庭的關係也很感興趣，他們覺得他們一家五口一起旅行是很自然的事。

「看他們都對著我們微笑。」金樂婷說。

「也許是因為我們向他們微笑吧。」戴存義說。

這對新婚夫婦並不太喜歡送中的旅店，他們認為它們連英國的牛房也不如。他們對於那些單輪手推車更不習慣，那是當時河南一帶的主要交通工具。這種手推車是用堅硬的木頭製造，中間有一個大輪子，兩邊有手柄。上面有竹簾的篷來遮蔭。乘客可把糧食包和輕便的行李放在前面，用自己的被褥當作墊子。戴存義夫婦稍感安慰的，就是這單輪手推車是為「兩個受害者（乘客）而設計。他們坐在輪子的各一邊，面向後面並排而坐。

「我們坐上去後，」金樂婷記述說：「一個強壯的年輕車夫穿上一條帆布肩帶，拉起車子，跟著稍作平衡——把我們摔向後面，使我們斜斜的坐著。然後，他便喊前面的另一個人拉車。車上嘰嘎一聲，顛簸了一下，經過用力的牽扯，這部笨拙的車子便慢慢前行了。塵土開始在我們周圍，從兩個車夫的腳下，以及車輪下面揚起。我們喘著氣，拼命地抓緊車身。車子輾過凹凸不平的石子路時，隆隆作響。輪子沒有塗上潤滑油，慢慢轉動時發出不規則的隆隆聲。車夫額頭流著豆大般的汗珠，距離我們不足一碼。他彎身努力的拉車。那些友善的群眾消失在遠處，我們的旅程便告開始了。」

經過十日，他們抵達了河南省北部一個熱鬧的南鎮周家口。這裡有郭豁達的佈道所，一間成長中的教會裡的共有七十位會眾，他們熱情的歡迎這批疲倦的旅客。他們中間有一位以前曾經當過滿清官員的陳先生，穿著一件淺色的絲質袍子，向戴德生鞠躬。

「敬愛的先生，沒有你們，我們永不會知道耶穌的愛。」

陳先生把一幅大紅紙遞給戴德生，他在上面寫了這樣的一段話：

本人淨手，敬謹恭候。

可敬的戴德生先生，以及眾位可佩的領袖、長老和牧者，從開始就創立了中國內地會。

先生，您經常在中國和外地旅遊，忍受很多疲累、窮苦……在我們當中；您顯明了您作為使徒的印記（林後十二 11 下、12 節上）。救主榮耀的救恩臨到我們，是由於閣下光臨我們中間，領我們走在真道上；否則，我們絕不能找到進入正路之門……。

我們敬愛的長者，願神賜給您在有生之年，可見到我們的主降臨，耶穌基督將要作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啟十八 14）。先生，我們確信在千禧年國度中，您將享高位，與耶穌基督一同作王；在千禧年結束時，主耶穌升天之際，您將永遠伴著他。

在我們家中，我們整間微小的教會，以致周家口所有人，無不對先生致以萬分的敬意。

端此，並祝

平安

主內不配

陳珠浪

頓首敬啟

「我實在不配邀請可敬的大牧師到寒舍，」陳先生說。於是，他預備一整桌的中國筵席，送到郭豁達家裡，給戴德生一家享用。他用了祭祖時才用的肉食，分別煮了六個大盤。他聽見戴德生不能吃辣椒，就特別為他們預備了一些食物，給他們在路上吃。在這些包裝精美的中國食物上面，還附有一張

短箋。

可敬及尊貴的戴德生先生：

陳珠浪頓首

本人謹以尊敬的心，呈獻一點旅途用品——油泡肉餅、杏仁、醃西瓜。敬請笑納。那些沒有加上辣椒的肉餅，是特別為牧師您烹製。那些有辣椒的肉餅，是給郭豁達先生和您二公子享用的。

謹此，敬祝平安

仲夏首日

他們帶著陳先生慷慨的饋贈，再次坐騾車出發，走了幾個星期。長期的豪雨使道路泥濘不堪。河水高漲，有些地方更見氾濫。有一次，他們來到一個河口，預備過河。由於車夫的猶疑，另一部車子搶先駛進河中，在他們前面過去。這對於中國人來說，是極大的侮辱，除非別人讓路，否則是不可越過別人。

「但這可以給我們機會，看看他們過河的情況。」有人象預言般的說。

那些傳教士和車夫看著前面那部車子愈走愈深，至走到河中一處沙堆上才歇下來。之後，觀看的人都瞠目結舌地看著騾子、車和乘客滑下河中。河水很決淹沒了車子。戴德生一家和他們的車夫在河邊大叫：「不成！不成！完了！完了！」

急流把車子沖翻了，它在水中團團轉。旁觀的人無能為力的眼睛瞪看著車子被河水淹沒。騾子看不見了，乘客似乎也沒有希望。最後，那車子擱在對岸一個轉彎處。令人難以置信的，那車夫和乘客竟然生還。戴德生各人不想跟他們一樣，所以選擇走另一條長而蜿蜒的路，找到渡輪後，才把騾子。車和乘客安全送到彼岸。

數星期後，將近黃昏，他們來到西安。往西望去，在夕陽斜照的天空下，他們可以模糊看見距他們約十哩處的城牆、城門和城樓。西安是陝西省的首府，陝西共有二十二個城，六十個鎮，無數的村落，面積有一萬二千平方哩，是一個廣大的平原。八年以來，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先鋒在包漢（Thomas Botham）的領導下，克服了激烈的反對，在這地開設了多個佈道所。正當包漢的宣教隊伍結出果效，來自北美瑞挪會的五十位宣教士也抵達中國。他們帶著他們的結他，在這個以排外著名的府城，開始了福音的事工。

戴德生此行目的，是要作好安排，使這批北歐同工可以與包漢及其它的內地會同工一起工作，彼此相輔相成。

伊士頓（Easton）和韓德信（Hendrickson）兩位北歐同工，穿上中國服裝，戴上大草帽，出來歡迎戴德生一行人眾，並帶領他們進城。他們所往的每一所房子，都已預備了清潔的涼水。

「經過了漫長而乾渴的旅程，」戴德生在一次聖餐聚會中對那些年輕的北歐教士說：「能夠在同工的住處隨時享用清涼的水，真令人心身一振。我們來到西安，再不會感到乾渴。主耶穌也賜給我一口井，就是我心中的活水泉源。他時常與我同在。我們怎樣使用我們的井呢？我們去到井旁取水，盡情大喝，不再感到乾渴了。所以，有耶穌在心中，喝用他賜給我們的活水，就永不再渴。」

北歐的同工受到批評，因為上海一份德文報紙報導說：「有二十位未婚婦女，竟然沒有男教士保護。中國人能瞭解他們的心意嗎？不會以為他們別有所圖？」戴德生同意管理女教士行為的守則，但對於

這些北歐的單身女同工，他撤回中國內地會教士在中國事奉未滿兩年不可結婚的條例。他為北歐同工安排了西安平原作為工廠，還包括首府太原，他們可以在那裡傳福音和建立教會。韓德信被立為高級宣教士，跟包漢共事。

他們繼續上路，往東北方向去，到了七月下旬，便來到山西省南部。戴德生和珍妮接受席勝魔的邀請，在那裡逗留數天。席勝魔領他們穿過一連串的院落，來到一個廣場，那裡已經為他們預備好筵席。十數根柱子支撐著一個褐色的大布篷屋頂，下面就是一列房間。桌上有燈，地上鋪了新的草席，門上也掛了新的竹簾和彩色的裝飾物。席氏夫婦在床上鋪了新的白床褥。桌子鋪上紅布，中間有一塊四方形的綠色絲質布墊。亮晶晶的銅盤承托在支架上，上面放著潔白的毛巾，並有一塊新的肥皂，是上好的梨牌肥皂！

席牧師夫婦站著伺候，滿面笑容。

「沒有什麼，全不值錢的，我們應為我們尊敬的大牧師及各人預備得更好。」

他們在那裡住了幾天，席牧師親自招呼各人吃飯，還有一班人在旁幫忙。每次戴德生向他道謝時，他總是這樣回答：「老師，若不是您受苦和忍、耐，我們又怎會得著福音哩！這實在是我的喜樂和榮幸。我怎可以不好好款待您們呢？」

1894年6月，中國和日本的軍隊都開進朝鮮半島。戴德生一家正在享受席勝魔的招待時，中日兩國已開始交戰。戴德生回到上海時，中國的情勢已很危急。由於恐怕中國遷怒於所有外國人，戴德生決定暫時放棄返回英國的計畫，因為他覺得中國更需要他。

第四十五章 面對不同的質疑

中國和日本兩國為了爭取朝鮮的控制權，經過多年敵對，終於爆發了戰爭。

日本軍隊攻擊山東的威海衛時，約有兩百名中國士兵受了重傷，但還是沿著海岸，在冰天雪地中艱難地撤退了四十哩，到達煙臺。他們的衣服都染滿了血，有一個士兵膝蓋碎了，仍蹣跚地走著；另一個士兵的肺部中了子彈。還有一些用手代腳爬行，到達時，雙腳都凍壞了；另有一些則在途中死去。

在煙臺，有一位在中國工作了二十年的外科醫生竇偉德（Arthur Douthwaite），開辦了一所中國內地會的醫院，每年都有超過二萬人來求醫，施過數以百計的手術。當時，他馬上召集了一批未受醫學訓練的傳教士，幫助他進行緊急的手術。他們從一個士兵身上取出七粒子彈。中國內地會的醫院接收了一百六十三人，照顧他們；在他們極需關懷時，把基督的愛帶給他們，令他們以往對傳教士的憎厭一掃而空。

甲午戰爭後，一名中國將領來到煙臺的醫院，同行正有一個銅樂隊和一隊士兵。他在醫院裡豎立了一塊銀金字的牌匾，以表達中國軍隊的感謝。他聽見煙臺一所新學校需要石塊來建築校舍，便立即吩咐一個軍用的石礦場供應所需的石塊，並由軍隊幫助運送。

歷代以來，中國人都十分鄙視日本人。所以，這次被日本軍隊擊至潰不成軍，實在是對國體的一次重大打擊。1895年4月簽訂的馬關條約，結束了這場戰爭，但也迫使中國承認朝鮮的獨立，並賠償了大筆金錢，而臺灣和其他一些地區也割讓給日本。

這場戰爭結束時，剛好已屆上海傳教士聯合大會招募一千位宣教士的五年期限。戴德生是招募委

員會的負責人，要向大會報告結果。他的報告指出在這五年期中，共有 1,153 位新同工加入中國的宣教行列。他一方面為神奇妙地垂聽他們的禱告而獻上感謝，另一方面也指出這一千多位傳教士中，只有 480 位是男性。而且大多數是在沿海省分工作，要把福音傳給中國每一個人，還需努力。

「中國歷史中一個重要時刻已經到了，」他代表委員會這樣說：「戰爭雖然結束，但事情並非到此為止。中國將會更開放，並有很多新的發展。如果基督的教會不設法從這些新開的門進入去，其他宗教便乘勢湧入，以後這些門也許又會再次關閉……時間很快過去，如果五年前需要一千人的話，現在的需要就更大了。……」

中國內地會現有 621 位成員，分配在 122 個主要的佈道所中，其中九十個設於從前未有人傳福音的省分內。1895 年 5 月 21 日戴德生六十三歲生日的那一天，他發了一張通告，邀請每一位中國內地會的成員，跟他一起祈求有更多聖靈充滿的宣教士來到中國。

戴德生知道自己日漸衰老，就想把內地會的組織結構鞏固起來，使他這樣的創辦人不能管理時，仍有合適的人來領導。他選了顧正道 (Milliam Cooper) 作為中國的助理副總主任。顧氏三十四歲，在中國工作已有十二年。他負責處理一切行政上的書信往來。除了是寄給范約翰和戴德生的信，或者標明「私函」字樣的信外，其它皆由他負責。他外型健碩，有堅強的信念和獨立自主的思想；不過，他說話時十分有禮，甚至顯得有緬腆。

不想時常都反對你的意見，」他早年在中國委員會時，有一次這樣對戴德生說：「我想最好還是辭職。」

「不要這樣，」戴德生回答說：「我珍惜這些反對的意見，這可以使我少犯錯誤。」

自 1886 年 5 月起，包蘭頓 (James Broumton) 出任差會的司庫和統計員。「每一件事情都要清清楚楚，不能有錯，」他說：「戴德生先生對於細節特別留意。」

吳淞路的大樓啟用後，包蘭頓加入了上海總部同工的行列，獻身作會計和統計的工作達十一年之久，得到戴德生高度的讚譽。費查理十七年來作宣教士和行政人員，之後，他也遷到上海。范約翰、顧正道、費查理、包蘭頓四人成立了一個常務委員會，當中國委員會的其它成員分散各省時，就由他們代替委員會。

自 1886 年，「劍橋七傑」之一的蓋士利在四川開展宣教工作。在 1895 年凱錫克培靈會 (Keswick Convention) 中一個星期六舉行的宣教會議上，主席宣佈蓋士利將被委任為中國西部的會督。英行教會將會負擔他的薪金，把他看為是他們的傳教士；但他仍然繼續其在中國內地會的工作。蓋士利於 1895 年 10 月 18 日在倫敦正式接受按立。「我認為這樣對中國有好處，」戴德生評論說：「蓋士利無論在靈性方面或是工作成就方面，都成績斐然。」

1896 年 5 月，戴德生和珍妮返回英國。當時，范約翰也想留在英國，因為戴德生有信心相信顧正道可以承擔在中國的事務。

有好幾年，由於有人要求由英國方面管理整個內地會，所以，在培蘭路的辦事處便不敷應用了。回溯 1893 年 5 月，倫敦委員會曾考慮另購一個新的總辦事處，就是在紐恩登林蔭路 (Newington Green)，距培蘭路不過一石之遙。新址設有辦事處、會議廳、三十個廳房、公用廳，並有一個接待宣教士學生的地方。

1896年夏天，戴德生和珍妮回到倫敦，他們離開已有兩年，新的總辦事處已經啟用了。儘管紐恩登林蔭路的同工都知道他們正在回程中，但他們故意不通知眾人火車抵達倫敦的時間。

星期六晚上的祈禱會座無虛席。當時，戴德生和珍妮乘坐計程車抵達在紐恩登林蔭路的新總部。他們步向會議廳的大門時，好奇地望著那狹長的三層建築物，在人字形的屋頂上還加蓋了房間。戴德生在1893年詳細構想的計畫，現已成為事實。門上的石碑，刻有一行字：「要信靠神」。他們進去後，安靜的坐在後面。直至禱告會完畢，戴德生的朋友和擁戴者才驚訝地看著他們，圍著二人互相問安。戴德生和珍妮現今就以此地為家了。

戴德生夫婦還在中國時，海恩波已經退休，但他仍住在培蘭路二號。史洛恩（Sloan）接替海氏擔任幹事。戴德生當時記載說：「我的目的是使每一部分的工作達到一個地步：即使沒有我，仍然可以繼續下去。我存著這個意念，去探訪各個不同的部門。」他在英國各地一連串的聚會中講道。他常講的一個題目是「前進運動」——把福音傳給萬民的異象。

1897年春天，戴德生訪問德國，遇上一些對中國內地會存有敵意的人。信義宗國家教會（Lutheran State Church）的領袖並不同意中國內地會超宗派的立場，也有些人懷疑他們憑信心籌款的主張。但很多教牧領袖和宣教團體的總幹事，聚集在柏林（Berlin）德根男爵夫人（Baroness vonDungern）的會客室裡，要一起評價六十五歲的戴德生，但氣氛似乎並不十分友善。

「來到我們這裡的戴德生先生，」男爵夫人說：「並沒有出眾儀錶，但那金色的卷髮使他看起來比較年輕。」

「你是一位循道會牧師的兒子，」第一個開始發問的人說：「也跟浸信會有聯繫。你最近接納了一批受過高深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是聖公會的會友。試問他們怎麼可以跟循道會、浸信會或其它宗派的人同工呢？」

「我們主要的目的，」戴德生回答說：「是在基督裡成為一體。再者，中國幅員廣大，有足夠的地方讓傳教士分佈不同的省分中，保持每一宗派特有的教會制度。最近，我們歡迎了一位英國主教，他是中國內地會的會員，去到中國西部工作。因此，我們中間來自聖公會的同工，便不會欠缺屬靈的領導和指引。龐大的宣教工作，向我們所有人呼召，要我們拋開神學上的歧見。而我們的口號是：『在基督耶穌裡合而為一』。」

「這樣混合不同的教派的情況，在我們來說是不可能的事，」葛士那差會（Gossner）的主任輕聲說。

「主怎樣揀選他的器皿是很令人嘆服的，」戴德生繼續說：「即使是最卑微的人，在他手中仍可以彰顯他的榮美。這就如創造一樣，有壯實、美麗的橡樹，也有生於草地上細小的花朵；兩者都是神手所栽植的。又以我為例吧？既沒有特殊的恩賜，性格害羞；但那充滿恩慈的父神垂顧我。我年輕時，信心不足，他就使我剛強。他教導我在無助中投靠他。為各樣小事祈求，雖然這些事在別人看來，是可以自己解決的……

「他知道我心中的欲望，所以我只需象孩童一樣，單純的信靠他，在禱告中把各樣事情帶到他面前。因此，我很早就經歷到他是何等願意扶助、堅立和滿足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在後來的日子中，每當我祈求，金錢就來到了。」

「你是否可以告訴我們，」有人問：「你曾經感動過一群會眾對宣教工作的需要作出奉獻，而當有

人起來收集獻金，你卻拒絕呢？」

「我曾多次這樣作，」戴德生回答說：「這不是我們收取獻金的方式，因為我們不想挪用其他差會的奉獻。我們接受自由奉獻，卻從不想加給別人的壓力，聚會之後，如果他們願意的話，是可以很容易找到機會，把奉獻寄給我們。一直以來，我們都沿用自由奉獻的。」

「我們聽說，」一位路德會教士說：「由於這個做法，帶來了巨額的獻金。但我們的目的，是要訓練會眾有定期奉獻的習慣。」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戴德生回答道：「不過，各人有不同的帶領。每個人都必須按照他所領受的亮光行事。正如我同才才所說，由於我的軟弱，主指示我作工和祈禱的方式，但我從沒有要求別人仿效我。你們訓練各人，以及全教會定期奉獻，也是很好的……」

經過了超過一小時的問話，德根男爵夫人發言：

「戴德生先生今晚要參加另一個聚會，我們應該讓他休息一會。他要求站著講話，而我們卻舒適的坐在他周圍。」

「剛才，」男爵夫人後來記述道：「有一線陽光照在他的臉上，使他看來充滿喜樂和平安，這似乎是從上面而來的光采。我頓時想起司提及，他看見天開了，耶穌坐在神右邊的情景。」

「在這個人面前，我們應該感到慚愧，」有人低聲說。

「是的，」葛士那差會的主任說：「你說得不錯。我們不會再麻煩我們的朋友了。」說著，便起來，走過去擁抱戴德生，並親吻他。

女主人最後說：「這位有屬天智慧的人，存著謙卑的心，征服所有反對他及其工作的人，這真是多麼奇妙的事啊！」

那年夏天回到倫敦，戴德生發覺差會的經常奉獻數目十分少。於是他祈禱，努力工作，並安排了許多聚會，終於把身體拖垮了。由於嚴重的神經痛和頭痛，迫使他接受醫生的勸告。

「要完全休息，讓別人代管差會幾個月吧！」

戴德生和珍妮便前往瑞士的達浮斯（Davos）旅行。最好的藥物，就是神垂聽他們的禱告，這遠勝山中清新的空氣。原來有一位倫敦的批發商莫東（J. T.orton），奉獻了一萬鎊給差會，作為經常費用。

莫東慷慨奉獻了這筆金錢之後，過了數日就去世了。戴德生夫婦回到英國，知道莫東先生的遺囑，是把他產業的四分之一送贈中國內地會，價值約為十萬鎊！這筆遺產指定用作傳福音和教育基金，每年分期給予一萬至一萬二千鎊，以十年為期。

這筆奉獻大大扭轉了中國內地會的經濟情況，特別是當時英鎊的價值高，在中國的購買力強。大概我們要把當時的數目乘以五十倍，才相等于現今的數值。

戴德生認為這筆奉獻並不純粹將是一個祝福，它也可以帶來壞的影響。它可能使差會減少倚靠神的心，並且到十年期滿後，過去由這筆錢發展開來的工作可能會出現困難。他肯定相信這筆奉獻是神垂聽禱告的結果，但若不是同時有屬靈能力、信心的增長和禱告的支持，這就毫無用處。他把此事與他八年來一直祈求的事連起來禱告——就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都起來，把耶穌的福音傳給中國每一個人。

1897年11月，戴德生夫婦再度經北美到中國去，計畫盡他們所能，在中國各省為傳福音而努力。

第四十六章 少種少收

中日戰爭之後，幾個主要的歐洲國家開始一連串野心勃勃的行動，欲對付軍力薄弱、士氣不振的中國，迫使中國向西方國家就範。他們要求租借港口使中國大部分土地列入他們的勢力範圍，鐵路的建造權也給予外國公司。

這些充滿擴張性的行動，挑起了中國排外的情緒。有些中國人到處攻擊外國人，甚至揚言要把他們逐出中國。有些人則認為中國向西方學習才屬明智之舉。因此，部分政府官員和知識份子發起了改革運動，推動一些頗激進的改革。不過，許多人對滿清政府已失去信心，當中國在甲午之戰敗於日本，而且接連在西方列強手下受辱，他們都極其憤慨；秘密組織紛紛成立，鼓動民眾。1895年，四川爆發了暴亂但感謝主，中國內地會同工無人喪生，部分原因是得到當地官員的保護，但差會的財物則受到很大的破壞。

1895年8月1日，在沿海的福建省，施德華牧師（Robert Stewart）夫婦、他們的孩子和八應中國內地會傳教士被一個秘密組織的黨徒殺害了。戴德生和其它人都認識到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由於某些原因，神似乎收回了他保護傳教士及其家庭的手，以致他們慘死於中國。

不過，在1898年夏天，中國的改革派，得到年輕的光緒皇帝支援。光緒閱讀過不少激進的刊物，不單是中國人所寫，也有李提太大的著作。他推動了後來稱為「百日維新」的改革運動。從1898年6月到9月，頒下一度度的諭旨，修改了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學堂及一所大學，學習西方思想，並鼓勵在中國建造鐵路。

改革派引起了強烈的反對，對立的保守派向頑固的慈禧太后要求支持。在九月，她掌握了朝政，軟禁光緒皇帝，剝奪了他一切權力，只保留他的稱號。她還拘捕並殺害很多改革派的官員，並停止一切新政。

各地經常發生暴亂，戴德生提到當時的政治情勢，指出全面的傾覆似乎已無可避免；慈禧太后的行動鼓勵了全國的排洋情緒。由於留在內陸各省的洋人大多是宣教士，因此，敵對行動的矛頭，便指向他們。

自從「蘭茂爾號」的一夥人在1866年到達中國，三十二年以來，不論是由於意外、暴力或是旅遊，中國內地會都沒有遭受人命的喪失。戴德生為此很感謝神。財物雖有損失，傳教士（包括戴德生本人）也有受傷，但從未有人喪生。他的兒子和媳婦相信「在戴德生心中，已對神有安穩的信靠，知道他必保守差會眾僕人，尤其是在佈道所中獨自工作的嬌弱女同工，她們工作的地點和其他傳教士相距甚遠」。

戴德生第十次到中國，在上海住了幾個月，由於另一次病痛發作，所以只好留在屋內。有一次他出外探訪皮爾遜博士（Dr A·T·Pierson），他是美國人，是位聖經教師，亦是一位作者和詩歌作家，他當時也罹患重病。「啊！真不知道主要用多大的痛苦，使我們倒空自己，認識到沒有我們，他的工作仍可成就。」戴德生在四月時，從上海寫了一封信給皮爾遜。在這段期間，他也找機會和差會中超過二百位傳教士交談。

1898年11月，戴德生的病稍為好轉，可以和珍妮一起往重慶去，那裡有中國內地會在四川的第一間佈道所，建於1877年。他們是要參加華西傳教士會議。這次旅程走了數百哩，沿著長江溯流而上，

開始時他們乘搭汽輪，後來改乘較原始的船隻，在冬天的急流中，向前航進。

他們途經漢口，聽到澳洲宣教士傅朗明（William Fleming）殉道的噩耗，他是中國內地會第一位殉道者。傅朗明死於西南部的貴州，同時遇難的有一位歸主的黑苗族人潘守山，潘氏既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助手。「這消息真使人憂傷，」戴德生寫信給範約翰說：「為道者是蒙福的，但對於我們，對於中國，對於他們的朋友，卻是悲傷的事。不僅悲傷，也是一個予兆。似乎神要用另一種試煉來考驗我們，所以我們確要重新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無疑透過更深刻的苦難，會帶來更滿溢的福杯。我們要緊靠大能的主，從他得著力量……這些試驗不會攔阻事工，反而使事工更加深入和拓展。」這些真是先見之言。

這次宣教會議讓戴德生有機會與蓋士利，並中國內地會在四川的其它宗教領袖交談。但卻要放棄探訪西部別的佈道所，一方面是由於那些地區爆發暴亂，而另一方面也由於年屆六十六歲的戴德生心臟病發，幾乎喪命。珍妮日夜照顧他，信靠神必會使他康復。她獨自在一個房間中，跪在神面前安靜禱告。

「主啊，我們不能作什麼。請按他的旨意行事，為我們承擔一切。」

戴德生不知道珍妮的禱告，但當她返回他的房間時，他看著她，低聲說：「親愛的，我感到好得多了。」

從那時起，他開始重新得力。

雖然戴德生的健康在返回上海途中稍為好轉，但他們仍決定到位於煙臺海邊的內地會健康療養院去，度過 1899 年的夏天。這一次，他們有機會認識那裡三所著名學校的教師和學生。他們很高興地看著小孩子們嬉戲。在奠基紀念日，他們舉行划艇、板球和網球等比賽。戴德生在當中致詞。那是一個溫暖的黃昏，他們在大學的院內舉行晚會。珍妮記得從音樂室中透出來的燈光，跟月色溶液合，美麗極了。有一位教師演奏小夜曲，他是位元出色的音樂家。

那年夏天，戴德生花了很長時間為「前進運動」祈禱，在禱告之餘，他和珍妮也用一些時間，去計畫他們將來隱居之所。戴德生買了一塊地，就在離上海兩天航程的一個山上。他們希望在那裡築一所房子，可以遠離上海總部繁忙的工作。房子上層有一個三面的陽臺，可以觀看茂林鬱鬱的群山和伸展出去的廣闊平原。

雖然有病在身，戴德生仍參加中國委員會在 1899 年 1 月和 9 月之間召開的八次會議，其中只缺席了一次。然後，他和珍妮，以及兒媳戴存義夫婦，從上海坐船往美國去。途中折往澳洲和紐西蘭，因為答應了到那裡講道。之後，他們橫渡太平洋，到達加里福尼亞州，再乘火車到紐約去。

紐約的卡內基禮堂（Carnegie Hall）坐滿了三千五百人，正舉行 1900 年 4 月的聯合宣教大會。會場外也有大型聚會，給公眾和超過一百個宣教組織近 1,900 位元的代表會面。美國總統和紐約州州長也到場歡迎參加者。

戴德生講道的主題為「宣教工作的得力之源」。其時，距他六十八歲生日尚有一月。他坐在講臺上，與一群在宣教工場上的傑出人士並肩而坐。他等候講道時，環顧那宏偉的演講廳——有兩層包廂和三個圓形的看臺。他踏前一步，首先如常的默禱，然後抬起頭微笑。「能力是屬乎神的」，他以這句話開

始了講道。

霍亨利永不會忘記那情景。「他開始講道時聲音溫柔，充滿感情。全場肅穆。臺上經驗豐富的宣教領袖，都伸直腰，聆聽他說的每一句話。」

戴德生繼續說：「……我們都嘗試去做，也有很多人按著自己容易做或方便做的，盡力去做，但神的愛充滿我們的心時，就有一種奇妙的能力，使我們跟保羅一樣願意受苦。我們願意認識他復活的大能（意味著「己」的死亡），並與他一同受苦，以至受死。有一句話是永遠真實的，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

霍亨利憶述說：「全場的人都深受感動，會眾的心都向主開放，心靈迫切地要成為合主心意的人，作合主心意的事。決志奉獻自己，為主而去。」三十年過去了，霍亨利仍聽到有人對他說，戴德生那天早上的信息，使他們的生命有了很大改變。

五月，戴德生從紐約到波士頓，負責主持一些聚會，同行還有皮爾遜博士，他已病癒康復。在一次聚會中，戴德生的思路似乎突然斷了，重複著兩句話：「你只會信得太少，絕不會信得太多。既使我們不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會背乎自己。」

皮爾遜走出來幫忙，接續戴德生主領那次聚會。他後來思想這事，說：「這事令人感到悲哀，但也富有詩意。這次重複說話，是戴德生崩潰的第一個徵兆；這句話反映出他對自己一再的提醒。也是他多年來的宣教工作中，對同工的提醒。這實在是一句祝福的話，也是他一生分別為聖事奉的確據。」

戴德生的醫生兒子戴存義，形容他是「相當嚴重的崩潰」。在海恩波的自傳中，他說：「這次崩潰是由於他身體的耗盡，以致損害了他的記憶和精神。」美國的行程因此要縮短，戴德生和珍妮在 1900 年 6 月回到倫敦。

戴德生太衰弱了，無法再主領聚會，甚至寫信也不行。珍妮安排了與他一起到瑞士的達浮斯(Davos)去，希望可以幫助他慢慢的復原。

戴德生和珍妮於 1899 年 9 月離開中國後，政治局勢變得更壞；中國被日本打敗，又被歐洲列強侵佔港口，外國公司開始建造鐵路，整個中國近於被瓜分的局面。仇外情緒高漲，加上連年饑荒，局勢更不穩定。中國人對傳教士的仇視愈來愈甚，謠言滿天飛，說他們有許多殘忍和不道德的行為，破壞中國的風俗。

慈禧太后命令各地的武裝部隊作好準備，保衛國家。由於這些部隊時常練習拳術，所以被稱作「拳民」。這些拳民以「滅洋」為口號；漸漸有許多不法之徒加入，跟秘密組織勾結起來，迷信邪術，認為這些邪術可以保護他們，免受敵人子彈槍炮的傷害。

到了 1899 年底，拳民開始殺害基督徒，各省官員也沒有加以阻止。到了那年的大除夕，一個隸屬於海外宣揚福音差會的英國傳教士被殺。英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結果有幾個人受罰。然而，到了 1900 年 6 月，慈禧太后不理會大臣的勸阻，違反她侄兒光緒皇帝的意願，發出了一道諭旨，下令殺死住在中國境內的所有外國人。因此，中國便成為其他所有國家的公敵。

第四十七章 配得殉道者的冠冕

儘管 1900 年的義和團之亂是反基督教，兼且仇洋排外，但主要受害者仍是傳教士和基督徒，困傳

教士散佈在中國各地，而其它人則集中在各口岸地區居住。義和團稱中國基督徒為「二毛子」，認為他們是中國國家和文化的叛徒。

義和團運動在中國東北地區最盛，因為其它地區很多中國官員對外國人或多或少都會提供一些保護，因為他們明白中國要與西方列強較量，是非常不智的。事實上，中國政府中的溫和派都想多方設法改變朝廷發給各省的諭旨；據說他們把「遇見洋人格殺不論」的電報改成「遇見洋人一律保護」的字樣。

在義和團之亂中，天主教徒受害最重。單在北京地區死亡的天主教徒，人數已在一萬五千至二萬之間。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墳墓和十七、十八世紀時耶穌會士的墓家，都被挖開，遭受凌辱。山西天主教徒被殺的，約有二千人，其中包括兩位主教和多名神甫。

甘肅省的情況，卻相當平靜，儘管官方下令傳教士離開，但他們仍然留守崗位。1900年9月，位於中國西南的雲南省，有一位旅客遇到在那裡工作的一位神甫。他連義和團暴亂的事都沒有聽聞。當他得知法國領事呼籲所有法國公民離開該區時，他拒絕撤離，說要等他的主教下令才會離開，因為他不願撇下他的群羊。

華北的暴動最厲害。那裡的基督教會只有四十多年歷史，所以受迫害的人數也較少。中國基督徒死難的人數比天主教徒要少；但基督教傳教士的死亡人數卻較多。

當北京地區處於千鈞一髮時，基督教傳教士和一些中國信徒，都跟大多數外國人一起，跑到英國公使的官邸中躲避。大約有七百名基督徒被困在那裡八星期之久。他們得著幾百名外國士兵的幫助，這些士兵是海岸交通未被切斷之前就來到北京的。最後，一支由西方國家和日本組成的強大部隊，從天津攻進北京，並佔領了京城。所以，被圍困的那些基督徒中，傷亡很少。

即使這樣，還是有不少中國基督徒在河北及其它地區遇難。其中保定的殘殺最凶。6月30日和7月1日兩天，有十五位來自內地會和兩名美國差會的傳教士被害。一些目擊者見到殉道者臨死時的鎮靜安詳，都深受感動。

山西有許多浸信會的信徒被殺。在蕭義，內地會有兩名女教士韋愛美（Emily Whitchurch）和史伊蒂（Edith Searell）正在禱告時被殺。八月間，汾州府有七位美國美部會（American Board Mission）及三位中國內地會的成員被害。

東北地區以外，傷亡最慘重的是上海南面的浙江省。消滅洋人的電報下達至浙江時，一字未易，仍是「格殺勿論」巡撫雖然略有猶豫，但還是公開發佈了，稍後又立即收回。在曲縣有一名縣長，因為保護外國人而被暴民所殺。這些暴徒又繼續殘殺，共有十一位內地會成員受害。

其他省則沒有基督教傳教士遇難。他們大都聽從領事的勸告，先行到通商口岸去了。許多教會和教堂被大肆破壞，許多中國基督徒也慘遭虐待，但相比而言，流血事件並不多。

總的來說，在中國境內被屠殺的基督教傳教士，共有一百三十多人，而他們被害的子女，就有五十多名。內地會的傷亡數字，是損失了五十八位傳教士，還有二十一名傳教士子女喪生。被殺害的中國基督徒總數將近二千人。

當初，大家儘量不讓戴德生知道義和團在中國大肆殘殺的事，因他身體十分虛弱，還在瑞士的達浮斯養病。但隱瞞不了多時，他從中國發出一系列電報中，獲悉這慘痛的消息。自從在美國出現精

神崩潰以來，他的精神和體力一直不好。聽到這個消息後，他說：「我不能看書，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能信靠。」

七月時，珍妮寫了一封信到中國，信上這樣說：『我們日日夜夜想著你們，我的丈夫說：『我要盡我所能幫助他們。我們滿有權能的天父，必按他的智慧和慈愛，幫助你們每一個人。』』月間，傳來更多的噩耗，戴德生一再受到打擊，身體衰弱之極，連在房間裡行走也得人攙扶，脈搏的跳動一分鐘只有四十次。

然而，到了十月，他已略為好轉，開始閱讀中國事件的詳細報告。一天早晨，外面下過一片大雪，滿山白皚皚的，他的媳婦樂婷跟他一起閱讀。戴德生正讀到來自山西南部的報告，獲知席勝魔在那裡為主作工，直至 1896 年去世。他含著眼淚告訴媳婦，他讀到韋姑娘和史姑娘的信，是她們被害前一天才寫的。

「哦，想一想，」他說：「若把這些殘害人命的暴徒，換成他的同在、他的懷抱和他的笑容，這就帶來喜悅了！」

他停了停，抑住聲音，說：「現在，他們在那裡也不會感到遺憾，因為他們得到永不褪色的冠冕，主說：『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得的。』」他想到啟示錄三章 4 節的話。

戴德生繼續談到一批由危險地區逃出來，彙集在上海內地會的「難民」。他說要趕到他們中間去，跟他們一起。

「雖然我去了也不能做些什麼，但我知道他們愛我，如果他們能與我分嘗他們的憂傷，我只能跟他們一起哭泣；也許這樣會使一些人得點安慰。」

金樂婷對他說：「父親，沒有人能象你一樣，如此獻出憐憫之情。但您現在卻不宜長途跋涉哩！」

內地會的助理副總主任顧正道，在這次義和團屠殺事件中犧牲了。在當地指導內地會的事工，以及慰問死難者家屬的擔子，除了由副總主任范約翰承擔外，還來了一位好幫手，他就是「劍橋七傑」之一的何斯德（DixonHoSte）。他從河南來上海，準備在此度過夏天，剛碰上範約翰正需要幫助，所以便投入服務。這對於戴德生來說，是很大的安慰。因為多年來戴德生一直覺得何斯德是神安排來接替他的。所以在 1900 年 8 月，戴德生認為自己離世的日子近了，就發了電報到上海，委派何斯德任內地會的署理總主任。

義和團事件過去後，西方國家同意中國政府賠償給各宣教差會和中國基督徒合共四億五千萬兩銀子。最初，戴德生覺得應拒絕接受以金錢來賠償性命，但可接納為房屋和財產損失的賠償。然而跟倫敦及中國的內地會委員會協商後，決定不要求也不收受任何賠償，因為他們要向中國人民彰顯「基督的柔和謙卑」。以後這就成為中國內地會的方針，即使內地會所受的損失比任何團體更多，但仍堅持不變。不過，個人若想接受個人損失上的賠償，內地會也不禁止。有人抨擊內地會這項決定，但英國外交部卻批准了，而且英國駐北京的大使還私自贈給內地會一百鎊的捐款，以表讚賞和同情。

其他基督教宣教團體，很少採納內地會的方針和路線，大多贊成接受對財產損失的賠償。尼爾主教（Stephen Neill）評論說：「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戴德生比其它人更有智慧。」尼爾也提到中國付給美國的第一期賠款，被退還作為華人教育基金，以後各期的賠款也豁免了。

在中國義和團暴亂期間，天主教和基督教傳教士所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和堅毅不屈，都值得我們

致敬。在死亡面前，沒有一位傳教士是有意放棄信仰或信心動搖的。那時，內地會成員所寫的信件中，沒有一封流露過對暴民抱怨，或要向暴民報仇的思想。

有時，只要稍微妥協，就可救回自己的性命，但大多數中國信徒也都守住他們的信仰。一些非基督徒的中國官員，亦敢於違背朝廷意旨，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去保護其屬下地區的外國人，說明他們逃離險境。

1900 年底，戴德生說：「我一直寫信給受難者的家屬，安慰他們。但希奇的是，他們竟因為同情我，而忘記了自己喪失親人的痛苦。」事實上，有三百個內地會成員因聽到他生病了，從上海寫信慰問他。他在 1900 年 12 月回信說：

「當我們把你們簽署的姓名逐個逐個讀完後，我們都感謝神，因為他還把你們留下。這是為了我們，也為了中國。我們所經受的悲慘遭遇是神所容許的，是為了他的榮耀和我們的益處。他考驗了我們和中國的弟兄姊妹後，肯定要重新打開福音的門。以後的工作環境一定會比從前更加有利。

「我們感謝神，因他賜恩給受苦的人。他信賴我們這個宣教組織，讓我們經受如此沉重的考驗。在我們內地會當中，有許多人還配得那殉道者的冠冕。在存留的人中，有些人所受的苦比一些被主接去的人還要多哩！他決不忘記我們為他受的苦。在那試煉臨到的時刻，我竟離開你們那麼遠，實在愧對你們。但施恩座離中國那麼近，照樣，離我們也是那麼近。

「當我們在內地的福音工作有可能再次恢復時，我們會發現環境改變了。可是，我們所驗證的原則，因為是建立在他永不改變的道中，故此仍舊可沿用。神要作教導，願我們一起學習神要教導我們的功課；他要借聖靈裝備我們。進一步的事奉，就是我們等候主來時，他要召我們作的工。」

第四十八章 回天家的路

1901 年夏天，戴德生的身體稍為好轉，有足夠體力往白朗峰 (MontBlanc) 山腳的沙木尼穀 (Chamonix Valley) 一行。但他散步于叢林中時，不幸在松葉上滑了一跤，引起脊椎舊病復發，不得不又有好幾個月關在房間裡。病癒後，他回到英國住了幾個月，並參加紐恩登林蔭路內地會各項的活動。

1902 年 5 月，在他的七十大壽之前，他又回到瑞士。他和珍妮住在日內瓦湖的北邊。在翠華嶺 (Chevalleyres) 的小村莊裡，即維薇鎮 (Vevey) 以北二哩的草地和果園中間，他們租了一棟房子，內有會客室和一個臥房，並且有露臺和陽臺，朝著東面升起的太陽。租金包括每天送來的膳食。他們每天四處漫步，很快結識了許多朋友，上至住在白朗尼 (Blonay) 的中世紀城堡裡的伯爵和伯爵夫人，下至當地的小地主，以及住在木屋中的居民。不久，正如戴德生的兒子和媳婦所描寫的，翠華嶺就成了群山之間的「內地會中心」了。

韋達 (Robert Wilder) 是美國的學生領袖，他來此地居住了六個月。他告訴戴存義夫婦說：「與你父親交談倒不覺什麼，但你父親本人卻真不簡單。遇見他真是我畢生大幸。他身上帶著耶穌基督的香氣。他那堅固的信心，泰然自若的神態和永遠不懈的勤奮，即使在身體十分衰弱的時候，還是一樣。這都深深感動了我。他曾是那麼熱心，現在年老體弱，不得不過退休的生活。每次禱告都不能超過十五分鐘。但他仍然頭腦清晰，充滿喜樂，實在使我印象難忘，我記得他說過：『如果是神容許我離開事奉的崗位，我肯定不表異議。』他的口裡從來沒有一句怨言。他整天都那麼喜樂——白天陶醉在芬芳

的花群中，夜間則欣賞閃爍的繁星。」

戴德生和珍妮多麼願意享受長相廝守之樂。他們在婚後多次不得不因為工作而長時間分離，現在日夜相對為伴是多麼的快樂。戴存義夫婦回想這對身體衰弱的夫妻一起乘火車或船出外時，說：「雖然結婚已久，他們依舊是一對情侶。」他倆手挽著手緩步走向山上風景優美之處，一同欣賞大湖美景和阿爾卑斯山的壯麗。戴德生再次重拾舊日攝影的嗜好，而且花很多小時自己沖曬底片；他又用許多時間觀賞花木，這股熱情還是六十五年前從他父親那裡感染過來哩！

自從他的健康崩潰後，他的精神不能集中，只可讀點消閒刊物、信件以及那本天天為伴的書；他讀聖經，四十年讀了四十遍，同時對照法文譯本，得著新的亮光。

儘管他已經委任何斯德為內地會的署理總主任，但他自己仍保留著總主任的頭銜，並且定期收到何斯德和範約翰寄來的彙報。但當 1902 年 11 月何斯德到瑞士訪問他時，戴德生決定將內地會總主任一職完全移交給他，這安排已經取得其它主任及委員們的同意。委員之一的伊榮說：「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你挑選了一位很可能是我們當中最懂禱告的人。」

1903 年 7 月，戴德生發現六十歲的珍妮體內長了一個腫瘤。由於她母親是患癌症去世的，故此戴德生有點擔心，就給兒子拍了電報。戴存義夫婦於是趕到翠華嶺，並請了一位國際有名的癌病專家，對珍妮作徹底檢查。

這位名醫對戴存義說：「不錯這是癌症。而且病情已經擴散，我擔心手術也救不了。」戴德生和珍妮都沒有詳細追問檢查後的結果。因為不必動手術，所以他們認為這不過是普通的腫瘤而已。由於他倆不追問，所以也沒有人把真實的病情告訴他們。

這年冬天，戴德生夫婦在洛桑度過，那兒附近有一位著名的醫生，也有一間英國人的教會。到了 1904 年春天，珍妮的身體更虛弱，他倆回到翠華嶺，在那裡欣然聽到中國得救的人數增加了。珍妮愈來愈瘦，戴德生自己也很虛弱。但他倆很高興地一起靜坐在陽臺觀看草地上長著水仙花和琉璃子，以及盛開的櫻花，也欣賞林中鳥兒的啼叫。

六月，戴存義又到了翠華嶺；幾天後，珍妮的二十八歲女兒艾美（Amy）也來了。六月以後，珍妮衰弱到連穿衣服的力量也沒有。但因為房間的窗戶是法國式的，向著陽臺敞開，她在室內也能享受優美的景色和新鮮的空氣。

她告訴一位朋友：「我所受的照顧是最好的，我也快樂得很。我馬上要回家了。不知家裡的情景怎樣！主正慢慢地、溫柔地接我回去！」

在寫給媳婦的便條中，她說：「你該知道存義是我極大的安慰，艾美和爸爸也是。他們都是那麼可愛，在各樣事情上寵愛著我。我們的主待我們是那麼溫柔和慈祥，所以我別無所求，只有讚美！」

7 月 29 日晚上，珍妮感到呼吸困難，戴德生坐在她旁邊。

她一直在說：「不痛，不痛。」

次日黎明前，她對戴德生低聲說：「求主快點把我接去吧！」

他猶豫了一下，然後禱告說：「親愛的父啊！求稱釋放她那等候的靈。」

五分鐘後，禱告得蒙應允。

他們把珍妮葬在賴采塞斯（La Chiesaz）教堂後的墓地，讓她安息在紅葉攀藤的灰色古塔蔭下。戴

德生常常兩手捧著獻給珍妮的鮮花，走過白朗尼城堡，來到這座教堂，坐在杉樹下觀看湖光山色，有時含著滿眶淚水。

珍妮死後數星期，戴德生從家中會客廳牆上掛的一句法文金句中得到安慰：

「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Celui qui a fait les promesses est fidele)

當 1905 年春天來臨時，戴德生感到他的健康狀況已經可以應付往中國作第十一次探訪了。他的兒子存義和媳婦跟他一起去，途經美國，至 4 月 17 日在上海泊岸，然後在揚州過復活節。三十七年前，戴德生和瑪莉亞在這裡經歷暴亂，得神保守逃過大劫。

在鎮江，戴德生獨自在河邊的墓地漫步，那兒埋葬了瑪莉亞和他的四個孩子。

在一批年輕的宣教士出發到內地的佈道所之前，戴德生對他們說：「我很榮幸能在此跟你們見面。在過去的年日中，我在此會見過許多人。我的愛妻也在此地去世。在靈裡面，我們所愛的人和我們極其親近，遠比我們所想的還要近；他也在靈裡與我們極其親近，超乎我們所想像的。我們的主耶穌從不離棄或撇下我們。就讓我們依靠他、享受他、住在他裡面。親愛的朋友，務要向他和他的道盡忠。他永不叫你的盼望落空。」

1905 年 4 月 29 日，漢口有三位在中國傳道多年的「老兵」一起在倫敦會的楊格非 (Griffith John) 家裡聚會。幸而有人想到拍照留念。三位長者都蓄著長長的鬍子和穿著厚厚的大衣。丁題良 (W. A.P. Martin) 博士，年七十八歲，是美國長老會牧師，也是神學博士，他坐在一盆棕樹的旁邊。他在五十五年前已來到中國。楊格非博士，年七十三歲。他在中國也經歷了半個世紀。而年紀最幼的戴德生，七十二歲，坐在一張帆布椅上。楊格非年紀雖老，但還是充滿威爾斯人的氣魄和熱情，和戴德生一起唱著讚美詩。

然後，戴德生跟兒子和媳婦一起乘火車北上河南，只花幾小時就到達了。回想十一年前，他們乘獨輪車，要花上兩個星期才到達哩！他們一行三人，探望了河南七個內地會的佈道所。在其中一間教會裡，中國基督徒為他慶祝七十三歲生辰，送他一面鮮紅色的軟緞旗，上面寫著：「人所愛戴」。他們回到漢口時，是 5 月 26 日，正是「蘭茂爾號」啟航中國的三十九周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戴德生和兒子、媳婦，還有金偉飛 (Whitfield Guinness) 和沙德寶姑娘 (Sandebefg，她來自瑞典，她的家曾經接待戴德生) 乘汽輪到湖南省的首府長沙。戴德生以往從沒有到過長沙。但他聽聞湖南是排外情緒最厲害的省分，在前八、九年內，從未有一個傳教士獲准留下傳道，但現在卻有來自十三個宣教差會的一百多名傳教士，他們和中國信徒一同合作，在那裡開展工作。

他們的汽輪向西南而行，橫過洞庭湖，一直下到湘江。船上只有他們是外國人。當時十分炎熱，他們常在甲板上納涼。最令人興奮的是數天之後，金偉飛和沙德寶姑娘宣佈訂婚。

在長沙，戴德生爬到城牆最高處的一座樓臺上，瞭望湖南群山、湘江流域及其下游各城市。他們也視察了巡撫撥給內地會興辦醫院的地點。

6 月 3 日星期六，來自長沙六個不同宣教團體的傳教士，齊集于內地會的會所，參加戴德生的歡迎會。他們都要來見這位擁有八百名傳教士的內地會總主任。會客室的門通往一塊大草地，四周遍植各種花木。他們在這裡舉行茶會。戴德生穿著一身山東的絲綢衣服，跟來賓會談了一個小時。海勒醫生

(Dr·Frank Keller) 特別注意到戴德生臉上那種單純和喜樂的神態。

最後一位客人告別之後，戴存義勸他父親上樓休息一會。住在這屋內的一位內地會傳教士巴厘醫生 (Dr Barrie) 陪著他上樓。他們談了一會，戴德生站起來伸手拿了兩把扇子，一把遞給巴厘。

「哦！你為何不叫我拿來給你？」巴厘問。

「我是想拿一把給你。」戴德生回答。

他們的話題轉到禱告上去了。

「在禱告中，把一切都交托給神，這是我們最大的權利。」巴厘說：「但我有時猶豫，感到有些事情實在太微小，不必禱告。」

「我並不以為然。在我看來，沒有什麼大事與小事之分。只有神才是偉大，我們應當完全信靠他。」

後來，戴德生在他房間裡用晚餐。他的媳婦樂婷獨自站在屋頂天臺上，觀看夜幕低垂後，長沙城中閃閃的燈光。之後，她下去看看房裡的戴德生。

戴德生躺在床上，側身挨著一張椅子，椅上點著一盞油燈，放著一堆信。他顯然正在讀信。樂婷調整一下他的枕頭，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他沒說什麼，所以她開始談到攤開在床上的《宣教評論》(Missionary ReView) 裡刊載的一些圖片。忽然間，戴德生轉過頭來，抽搐一下，就不省人事了。樂婷看到這個情景，立刻奔到門口大聲喊叫。

「存義，海勒醫生！快來呀！」

海勒醫生先到，及時看見戴德生頹然倒在他的枕頭上，他的呼吸已經停止，他的臉色也變了。在樂婷看來，這位中國人的摯友就象小孩子般安詳地睡著了。

一位年輕的中國傳道人和他十八歲的新娘子，正在讀戴德生所著(回憶錄)(Retrospect)的中譯本。他倆很想見見這本書的作者。他們來到長沙的內地會，便聽聞這個噩耗。但他們特別獲准圍在戴德生的床邊。

那位年輕的傳道人問：「我可以摸摸他的手嗎？」

他就握在戴德生的手，說：

「我所敬愛的牧長，我們真真實實愛戴你。今天我們來看你，渴望見到你的慈顏。我們都是你的子女，你為我們開拓了天家之路。多少年來，你愛我們，為我們禱告。今天我們來看你的慈容。你是那麼快樂，那麼安詳。你正含笑，你的神情安靜而喜悅。今晚你不能對我們說話。我們並不求你回到世間來，但我們會追隨你，到你那裡去。你將在那裡迎接我們。」

當地的中國信徒堅持要買最好的棺木。他們把他抬到湘江邊停泊著的一艘船上。船長下令扯下半旗，使船朝東北駛入寬廣的長江。每當船停泊下來，就有許多人把鮮花和花圈送上船。所以，當範約翰在鎮江迎接這船時，只見滿船花簇，靈柩已埋在大堆七彩的鮮花中了。主持葬禮的是何斯德。遺體就埋在瑪莉亞和四個孩子旁邊。

1988年，戴德生的曾孫戴紹曾 (Jim Taylor) 在鎮江昔日英國領事館遺址發現紀念戴德生的碑石，該址現已改成一所博物館了。碑文還是完整無缺，寫著：「恭敬紀念令人尊敬的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牧師。生於 1832 年 5 月 21 日，死於 1905 年 6 月 3 日。他一生常在基督裡。」—— 史蒂亞

後記

戴德生死於中國，距今已有八十五年了，由他一手創立的中國內地會一，也有一百二十五年歷史。《戴德生——摯愛中華》的出版。正適逢中國內地會的周年紀念。內地會承接戴德生的熱誠，要把靠主得救的福音傳遍中國。戴德生所持的宗旨，也一直成為內地會的特色：倚靠神的信實；把福音帶給從未聽過的人，並與他們認同；教導信徒及訓練他們的領袖。

戴德生離世後，「中國的屬靈需要和呼求」，成為不斷的挑戰，在西方國家裡深深震撼一些熱心事主的年輕人。他們熟知愛主的代價。耶魯大學的布頓（Borden）為了對抗回教在中國西北部的擴展，不惜遠赴內地，但仍未踏足神州，已客死埃及了。與此同時，身兼工程師和音樂家的費沙（J.O.Fraser），為著在中國西南邊境的黎族當中推展福音，不斷禱告，為當地教會的增長奠下基石。1934年，年輕的史丹(John and Betty Stam)夫婦在毛澤東長征初期，壯烈殉道，揭開中國教會日後在農業合作化、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期間，受火般試煉的壯烈序幕。

中國教會的增長和發展，真叫人驚歎。1900年，中國共有十萬名信徒，短短五十年間，人數竟有七倍增長（總數超過七十萬人）。偉大的屬靈領袖如宋尚節、王明道、楊紹唐，倪柝聲和計志文紛紛冒起。學生起來參與福音事工，中國人民也組織自己的宣教隊伍。日本侵華及二次大戰期間，很多傳教士都遭受打擊，中國內地會的總部也被迫暫時由上海遷往遠離長江的重慶。煙臺學校的所有師生，也全送進集中營裡。老師卻引領我們高唱：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

雅備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詩四十六 1、7）與父母分隔五年，我們更加領受神是可信的。

然而更大的考驗尚未來臨。四十年代末期，共軍大舉南下，並取得節節勝利。正如湯菲莉（Phyllis Thompson）在她所著的《不願撤退的中國》（China: The Reluctant Exodus）中，悲痛地描寫道：1949年至1952年間，內地會每位成員均被迫離開中國，正如八十六年前戴德生在伯萊墩（Brighton）海灘一樣，中國內地會各領袖聚集在英國的邦茂夫（Boumemouth），一起懇求神的引領。他們順服神的旨意，以無比的信心，再次作出重大的決定。

內地會決定重新部署每位宣教士的崗位，更招納新血，向東亞一帶進發。從星加坡的新總部開始，目標包括日本、臺灣、香港、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本土及印度，日後更擴展至越南、老撾、柬埔寨及朝鮮，因為在這些國家，莊稼已熟，作工的時間卻少。

中國門戶緊閉政策，令很多東南亞國家對任何與「中國」有關的事情，都嚴加防範，經歷無數歲月的中國內地會，也改稱為「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海外基督使團的策略，是在最短時間內，把福音傳給東亞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就是在每個地方建立教會，然後透過這些教會，把福音帶給當地居民。倘若當地已有教會，它便嘗試設立公堂，否則仍

然是集中為福音開荒，建立地方教會。

海外基督使團採用雙管齊下的方法。商業發達的亞洲大城市，固然是出擊的據點，因為這些城市聚集了很多的政府官員、學生及工人；另一方面，他們也關顧一些備受忽略及人跡罕至的部族，深入東亞不毛之地。文字工作成為他們溝通的橋樑，聖經被譯成當地文字。基本神學教育、出版及派發基督徒刊物，成為每個工廠的首要工作。「使團」在泰國郊區，提供廣泛的醫療服務，先後建立三間醫院及推行預防麻瘋的計畫，後來更積極參與難民工作。此外，「使團」亦在菲律賓推行社區發展計畫。在日本則致力酒徒康復，而在臺北及曼谷，工作物件就是妓女。

1965年是海外基督使團的百周年紀念，也為他們邁進二十一世紀定下方位。「使團」發現東亞一帶的地方教會已發展得相當成熟，為此欣喜萬分。然而「使團」並不就此滿足，他們更希望借著聯絡各教會，建立主內真正的合一。多個東亞國家都有宣教界象，紛紛成立委員會，差派宣教士到各地去。今天，已經成立了八個這類的國家委員會。此外，海外基督使團又和印度福音宣教組織建立了美好的聯繫，該組織已差派數位宣教士到泰國，與「使團」攜手事主。

海外基督使團的發展相當穩定，逐漸成為東西兩地信徒的交匯處，一同並肩為主作工，順服神的呼召。雖然這個屬靈團契只在萌芽階段，但我們曉得在神的引領下，萬事皆可成。

戴德生立志與中國人民同享基督，這亦成為中國內地會八十五年來的異象，熱情絲毫未減。可是莊稼的主看見時機到了，在五十年代初期，把整個內地會連根拔起，卻把福音種子散播到東亞每個角落。二十一世紀快將來臨，神再呼召海外基督使團為福音開拓新疆界，將福音傳到東亞地區。千萬離鄉別井的人，渴望在回到他們的家鄉時，那些聽過福音的人已成為基督徒了。另一方面，雖然很多國家都限制傳教士入境，卻仍然歡迎「專業人士」。海外基督使團也看准這個機會，作出應變。

與此同時，海外基督使團仍不忘中國人民。我們還牢牢記著我們的前身就是中國內地會。打從「不得不撤退」起，我們已向舉世教會呼籲，請他們為中國的弟兄姊妹禱告，透過廣播和供應聖經及各種基督教刊物，傳揚福音，並栽培千千萬萬初信的信徒。然而海外基督使團，無意沿用當年中國內地會的模式，在中國重建福音基地，只是盼望向中國的弟兄姊妹學習，服事中國教會，各方協助他們，竭力事主。事實上，中國還有數以百萬計人民，包括少數民族，仍然未聞福音。

戴德生八十五年來，經歷神的信實，為他一生記下了叫人讚歎的見證。海外基督使團同樣經歷神的信實，在革命期間、大戰時期及無數動盪的日子中，「使團」得與神同在，屹立不倒，繼續經歷神的權能、供應及保守。神沒有改變。

《戴德生——摯愛中華》裡所述有關作門徒的功課，並非單單適用於個人或個別組織。它們都是萬古常新，每位信主的人，無論學生、在職的、受雇的或雇主，都同樣可以學習。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行出來。

戴紹曾

海外基督使團總主任

一九八九年夏

星加坡

